

斯大林研究

第 2 辑

1993

中央编译局
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室

斯大林研究

第 2 辑

1993

中央编译局
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室

责任编辑：赵国顺
李京州

内部发行
准印证号 Z2467—931984

工本费 5.00 元

编者的话

斯大林是当代国际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中最有争议的人物，成了世界学术界和舆论界持久的热门话题。他作为杰出的无产阶级政治家、理论家和军事家，领导苏联共产党和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近三十年。他的一生中既有不可磨灭的丰功伟绩，又有后果极为惨重的大失误，其影响所及远远超出一国的疆界。斯大林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是珍贵的遗产。深入系统地研究这份遗产，用唯物史观和辩证方法实事求是地分析他的功过是非，从现实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的高度加以总结，从中得出正确的有益的结论，这对于认识苏联解体、苏共覆亡的深层历史原因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前苏联现实社会主义的曲折道路以及最终遭到的严重挫折，为我们提供了“前车之鉴”，可以从多方面启发和促使我们重新认识社会主义，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本刊将发表新发现的斯大林文献，同时代人的回忆录及有关文函，苏共和苏联国家机关的文件和法令。当代各国学者对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斯大林建立的前苏联的政治经济体制、斯大林时期的对外政策及国际地位等问题的评论。这些评论反映作者的立场和观点，并不代表本刊编者的看法，仅供我国理论工作者参考。

为了办好《斯大林研究》这一内刊不定期刊物，我们欢迎专家学者踊跃投稿，希望关心本刊的读者对本刊的编译工

作多提建议和批评，我们将尽力满足读者的需要，不断改进自己的工作。

本刊系内部资料，请订阅者妥善保管。如有出版物或报刊需要转载或公开引用本刊资料，必须事先征得本刊编者的同意。

斯大林研究

目 录

新文献

- 斯大林给莫洛托夫的信…………… (1)
1928年斯大林西伯利亚之行…………… (17)

理论探讨

- “纯粹社会主义”的兴衰…………… 亚·齐普科 (47)
集体化是怎么回事
…………… B. П. 达尼洛夫、H. B. 捷普措夫、A. 伊利因 (67)
谈谈斯大林给《无产阶级革命》
杂志编辑部的信及其对学术界
和有关人士的命运的影响
…………… 弗·阿·杜纳耶夫斯基 (94)
关于1928—1929年社会主义
建设道路的政治争论…………… Г. A. 特鲁坎 (103)
斯大林进攻农民的预演
…………… И. П. 伊孔尼科娃、A. П. 乌格罗瓦托夫 (121)

传记与回忆

产于大型谎言制造厂的一封信

“短信”(对伪造的列宁与

斯大林之间的通信的考证)…… 德·恩·科斯特申(136)

反李森科学派斗争的史料

…………… B. 伊萨科夫、C. 伊万诺夫、E. 列文娜 (154)

人物与事件

1933年清党时有关布哈林的材料…………… (179)

1937—1938年对工农红军

党组织的镇压…………… O. Ф. 苏韦尼罗夫 (221)

拉斯科尔尼科夫和他给斯

大林的公开信…………… (241)

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

之死…………… 谢·扎·金兹堡 (261)

共产国际与中国

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内

部在对华政策问题上的

斗争(1926—1927年)…………… 亚·格里戈里耶夫 (274)

斯大林给莫洛托夫的信

编者按：1990年《苏共中央通报》、《共产党人》杂志连续发表了斯大林在20—30年代写给莫洛托夫的几十封信，这些信大多是斯大林在外休养期间写的。虽然这都是一些私人信件，但信中所谈的都是当时苏联党和国家的重要而紧迫的问题，因而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20—30年代苏共党内斗争的发展过程，进一步了解苏共领导就当时国内国际的一些问题所作的重大决定的来龙去脉。本刊将陆续译载这些信件。

1

(1925年7月12日于罗斯托夫)

莫洛托夫同志：①

但愿你看这封信以后也能让七人小组②知道信的内容。

① 信的左上角有尼·伊·布哈林的亲笔附言：“我完全同意大家的意见。尼布”。附言后面还有两个签名：“扬·鲁·”和“亚罗斯”。

扬·鲁·——扬·埃·鲁祖塔克(1887—1938)——1905年入党，1923—1926年为政治局候补委员，1926—1932年为政治局委员。

亚罗斯——叶·米·亚罗斯拉夫斯基(1878—1943)——1898年入党，1923—1934年为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和书记，《真理报》编辑部成员。

信的右上角有莫洛托夫做的标记：“1925年—?”。

② “七人小组”由6名政治局委员(斯大林，李可夫，托姆斯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古比雪夫组成，它是为了同托洛茨基作斗争而成立的。该小组预先讨论政治局的议事日程和各项决定，实际上有近两年(1924—1925年)的时间是在领导党的工作。

(1) 我有一些罗斯托夫朋友。据了解，今年的收成总量将近 5 亿普特，也就是说接近 1914 年的历史最高数字（我说的是东南部）。大约富余 2.7—3 亿普特。罗斯托夫的朋友们认为，我们的出口部门（东南部的）能够完成 1.5—1.7 亿普特。这样一来，就可以有 1.5—1.7 亿普特的粮食从东南部地区运到国外去。很好。应当注意到这一事实。

(2) 从报上看到，全苏经济管理部门已经拟定出建设新工厂的计划。我担心，他们会不考虑在边境地区搞建设的诸多不利因素就干起来，而且一旦错过时机将无法纠正所犯的错误。例如，他们想在彼得堡、罗斯托夫建新工厂，这是不合适的。我认为，在制定建设计划时，除了要考虑工厂靠近原料和燃料产地这一原则外，还应注意两点：同农村的结合和新工厂所在地区的战略地理位置。我们的大后方是乌拉尔、伏尔加河流域，黑土区南部（坦波夫，沃罗涅日，库尔斯克，奥廖尔，等等）。现在缺乏工业的正是这些地区（如果不算乌拉尔的话）。而在战局恶化的情况下对我们最有利的后方也正是这些地区。所以，恰恰应当在这些地区发展工业建设。就这方面来看，彼得堡是绝对不合适的。当然，地方上会产生压力，但应当克服它。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说很重要，甚至应当把它提交中央全会（如果为了克服地方压力而需要这样做的话）。很想知道七人小组对此有何看法。

握手！

约·斯大林

附言：我今天动身去索契。

1925年7月20日

莫洛托夫同志：

我在《经济生活报》第159号（7月15日）上读到一篇题为《对第聂伯工程方案的审查》的短评，^①从该短评中看得出，如果我们不及时采取预防措施的话，党（还有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就会不知不觉地陷入耗资2亿卢布的第聂伯工程之中。捷尔任斯基同志好像已经下了“命令”，责成托洛茨基同志“在10月中旬之前”提交一份工程的经济技术及财政计划，同时要求“将准备工作所必需的贷款也纳入1925—1926年预算”。已拨给托洛茨基同志3万卢布用于准备计划。短评坚持认为，还是要谨慎行事……但是，既然拨了3万卢布并规定了提交计划的期限，这件事就算是干起来了，因而也就很棘手。

我认为，就我们的财政状况来看，无论今年还是明年我们都不能去搞第聂伯工程。昨天，外高加索的输油管道计划^②也被否决了，尽管它在当前看来更加现实而且费用低四分之三。试问，我们凭什么非要采纳并不太切合今天的实际而且费用高出三倍的第聂伯工程计划呢？难道我们有那么多钱吗？难道顿巴斯（第聂伯工程所在地区）的燃料现在不是充足而是紧缺吗？干吗这样急着去搞第聂伯工程？

我们需要的首先是为我们的那些破旧的工厂提供新的设

① 短评中谈的是关于着手制订在第聂伯河上建造水电站的方案的决定。
② 1925年7月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了财政人民委员部对苏联人民委员会关于输油管道工程的决定的异议，决定暂停巴库—巴图米输油管道工程建设，以便来年重新审议这一问题。

备。难道这一需求已得到满足了吗？

其次，我们需要扩建一批农业机械制造厂。因为我们现在仍需在国外购买价值几千万卢布的最普通的农机具。

再次，我们需要至少建造一个拖拉机制造厂，一个新型的大工厂，因为没有这样一个或者这样一批工厂，我们就不可能继续发展。

此外，我们还需要建立制铜业，发展铅的生产，改善我们的军事工业，因为没有这些别人赤手空拳也会打败我们。

难道所有这一切都已得到满足了吗？

我们怎么能在缺少资金的情况下忘掉这一切呢？

我认为，除了种种危险之外，我们还存在着一个重大的危险，这个危险就是把那些一点点积攒起来的钱拿来乱花，轻率地将它们白白浪费掉，从而给我们的建设工作造成困难。一个月以前捷尔任斯基同志还明白这一切，可现在他显然已热衷于……

莫洛托夫同志，恳请你给捷尔任斯基同志读一下这封信。鉴于问题很重要，请在七人小组中读一下并将他们的意见简告我。

握手！

约·斯大林

(1925年7月27日)

莫洛托夫同志：^①

一个星期前我发出一封致你本人的信，对第聂伯河石滩电气化工程立刻上马的计划提出了反对意见。还没有收到回信。莫非信在路上丢失了，你收到了吗？不知你是怎样看待这封信的，如果手不懒的话就请写上三言两语。

握手！

约·斯大林

1925年7月28日于索契

莫洛托夫同志：

应当考虑一下组织分配部^②的问题。大概格伊^③不适合这项工作。他年轻，没有什么名气，资历也浅，不会有威信的。不论问到谁，都是这样说的。克里尼茨基^④也不合适，或者更确切说，还不如格伊合适（理由是同样的）。是否该任用

① 右上角有莫洛托夫做的标记：“M/1925”。

② 联共（布）中央组织分配部是处理干部问题的部门。

③ 康·维·格伊（1896—1929）——1916年入党，1924年任俄共（布）彼尔姆区委书记，1925—1930年间任联共（布）中央组织部部长，1924年起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

④ 亚·伊·克里尼茨基（1894—1937）——1915年入党，1924年起任白罗斯共产党（布）中央书记及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

柯秀尔^① 而把格伊派往西伯利亚呢？也许，还可以任用什维尔尼克^② 或者扬松^③？鲍曼^④ 怎么样？他不会太嫩吧？好像他也嫩。总之，组织分配部是件棘手的事，要在代表大会之前解决好。

近日在报纸上看到，纺织辛迪加已作出决定，说是由于缺乏原料——主要是土耳其斯坦的棉花供应不足而不再大力发展明年的生产了。如果这是真的，如果原因确实在于原料，那么在我看来，辛迪加的决定是极为错误的。对我们来说，在美国多买些原料（顺便提一下，美国的棉花现在便宜）然后在自己家里来加工要比在国外购买纺织品有利得多。从各方面来看都更为有利。这是一件值得重视的大事。辛迪加的消极怠惰态度不难理解：它不愿扩大生产是因为扩大生产会带来一些麻烦，既然辛迪加已经如此兴旺发达，何必自找麻烦。这种由于垄断而滋生起来的消极怠惰态度极为有害，无论如何必须加以克服。你要同捷尔任斯基谈谈这个问题，给他看看我的信，让他促一促辛迪加。我再说一遍，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大问题。要么是我们把这个问题解决好，对国家、对工人、对那些可以通过扩大生产而得到安置的失业者都有利；要么是我们解决不好，到那时别的不说，光是我们在这方面让外国布匹商赚去的钱就得几千万。

-
- ① 斯·维·柯秀尔（1889—1939）——1907年入党，1922年起任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书记，1926年起任联共（布）中央书记。
- ② 尼·米·什维尔尼克（1888—1970）——1905年入党，1925—1927年任列宁格勒州委书记和联共（布）中央书记。
- ③ 尼·米·扬松（1882—1938）——1905年入党，1925年起任苏联副工农检查人民委员。
- ④ 卡·维·鲍曼（1892—1937）——1907年入党，1925年起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9—1930年间任莫斯科党委第一书记。

紧紧握手！

约·斯大林

5

(1925年7月)

莫洛托夫同志：①

劳动国防委员会的事的确不太好办。捷尔任斯基情绪急躁，他太累了。②不过无火毕竟不会生烟。就连政治局现在也很为难，因为它管不了经济事务。仔细看看《经济生活报》你就会明白，我们的各项基金是由斯米尔加③、斯特卢米林④再加上格罗曼⑤来分配的，而政治局……政治局正在从一个

① 右上角有莫洛托夫做的标记：“1926年—？”。实际上此信写于1925年7月。

② 1925年7月25日斯大林给捷尔任斯基发去如下的一封信：

“7月25日于索契

亲爱的费利克斯：

我从莫洛托夫那里得知您已申请辞职，恳请您别这样做。您没有理由这样做：（1）您的工作开展得不错；（2）有中央的支持；（3）我们将改组劳动国防委员会，使个别人民委员部无法结成损害国家利益的联盟；（4）我们将把国家计划委员会及其各部门的工作纳入正轨。

再忍耐两个月吧，我们会使情况好转起来，真的。

紧紧握手！

您的斯大林

附言：身体怎样？”

③ 伊·捷·斯米尔加（1892—1938）——1907年入党。1923年秋天起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1924—1926年任苏联劳动国防委员会委员。

④ 斯·古·斯特卢米林（1877—1974）——1923年入党，苏联著名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1921—1937年在俄罗斯联邦和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工作。

⑤ 弗·古·格罗曼（1874—1932？）——俄罗斯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十月革命后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和苏联中央统计局局务委员会委员。1931年被判刑。

领导机构变为一个上诉机构，一个类似“元老院”的机构。^①有时甚至更糟——管事的不是国家计划委员会，而是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各专家“组”。可见，捷尔任斯基不满意是应当的。而工作也因此必不可免地受到损害。除了改组劳动国防委员会的人员构成并有政治局委员参加该委员会外，我想不出别的解决办法。

敬礼！

你的斯大林

6

(1925年8月1日)

莫洛托夫同志：

(1) 我听说曼努伊尔斯基^②故意把托洛茨基文章^③的初稿交给《人道报》发表。如果这事属实，那就太不像话了。如

① 1925年10月15日斯大林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关于政治局的工作及各中央机关之间的相互关系”的问题。会议认为有必要每月规定两天时间供政治局就国家建设，尤其是经济建设问题举行专门会议，其目的方面是为了整顿好苏联各中央机关（人民委员会、劳动国防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国家计划委员会等）的工作，使它们相互之间达到充分的协调一致；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保证政治局对这些机关工作的领导。会上成立了政治局所属的专门解决有关整顿和协调联盟各中央机关工作问题的委员会。

② 德·扎·曼努伊尔斯基（1883—1959）——1903年入党，共产国际领导活动家之一，1923年起为联共（布）中央委员，1924年起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28—1943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

曼努伊尔斯基把托洛茨基的文章交给《人道报》一事未能查清。

③ 指托洛茨基的文章《关于伊斯特曼（列宁死后）一书》（这篇文章的定稿载于《布尔什维克》杂志1925年第6期第67—70页）。美国记者和作家伊斯特曼于1925年在伦敦出版了《列宁死后》一书。伊斯特曼在书中经常引用他在苏联逗留期间与之确有来往的托洛茨基的话，同时还大段引用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中的话。托洛茨基根据政治局的要求写了上述文章，驳斥了伊斯特曼关于联共（布）中央向党隐瞒了列宁的“遗嘱”的论调。

果这事属实，那我们就不认为这是个“错误”，就像你在给我的信中所说的那样，而是某些不知何故对发表托洛茨基文章的定稿不感兴趣的人的手腕。这是毫无疑义的。这件事不能就这样放下不管。我建议把问题提交七人小组并谴责曼努伊尔斯基的不能容忍的行为，他的行为使俄共和《人道报》都处于尴尬的境地，同时必须要查明究竟是谁唆使曼努伊尔斯基干这种卑劣行径的。为弄清情况现告知一些必须知道的事实：a. 文件是根据曼努伊尔斯基的书面请求（应存中央档案馆）并经七人小组同意（向曼努伊尔斯基提供文件的问题是季诺维也夫在七人小组中提出的）交给曼努伊尔斯基的；b. 文件交给他时，托洛茨基的文章还未最后定稿；c. 文件交给他是为了让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上层人物了解情况，而不是为了发表（顺便提一下，请看看曼努伊尔斯基的书面申请）；d. 发表文件即发表我关于伊斯特曼的书的便条的问题在七人小组中进行了讨论，而且我们全都认为我的便条应在托洛茨基的文章的定稿发表后再发表，这一点曼努伊尔斯基是知道的；e. 在曼努伊尔斯基动身赴德国之前（7月初或6月末），我请曼努伊尔斯基把全部文件交还中央书记处，他表示同意，却始终未还文件并将其随身带走。事实就是这样。恳请七人小组将此事一抓到底，从而杜绝这种卑劣行径在我们党内发生。

（2）我不同意七人小组关于只发表托洛茨基的文章的定稿的意见，第一，还应当发表克鲁普斯卡娅的文章^①。第二，

^① 克鲁普斯卡娅的文章《给〈星期日工人〉编辑部的信》载于《布尔什维克》杂志1925年第16期第71—73页。

娜·康·克鲁普斯卡娅（1859—1939）——列宁的妻子和战友。1898年入党，1920年起为政治教育总委员会领导人，1924年起任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7年起任联共（布）中央委员。

在发表托洛茨基的文章后完全可以发表某些文件（其中包括我关于伊斯特曼的书的便条），以证明托洛茨基只是由于俄共的压力才写的文章（否则托洛茨基倒成了拯救党的威望的英雄）。

（3）最后请告我托洛茨基和克鲁普斯卡娅的文章的情况，文章是否已在英国发表。讯问了三次也未见回音。

（4）你至今尚未答复我关于第聂伯工程的信。你可将回信内容口述给托夫斯图哈^①，——他会写信给我。

（5）我不相信托洛茨基“没有读过”你分发给政治局委员的伊斯特曼的文章。托洛茨基是装腔作势。

（6）托洛茨基“答”德国代表团“问”我读过了^②。我不完全赞同他的谈话。《真理报》赞同他的谈话吗？这是托洛茨基集团的纲领。

（7）我的身体逐步好转。马采斯塔温泉的泉水（索契附近）对于治疗硬化、神经紧张过度、心脏扩张、坐骨神经痛、痛风、风湿病效果很好。最好把自己的妻子送到这里来。

握手！

约·斯·

① 伊·帕·托夫斯图哈（1889—1965）——1913年入党，1921—1924年在联共（布）中央机关工作，1924—1926年任列宁研究院副院长。

② 1925年7月8日德国工人代表团访问苏联，1925年7月25日代表团拜访了租让总委员会，在那里会见了托洛茨基。托洛茨基答代表团问发表于1925年7月29日《真理报》。

7

(1925年8月1日以后)

七人小组^①：

七人小组曾经作出决定，等托洛茨基和克鲁普斯卡娅关于伊斯特曼的文章和信在国外刊物发表之后即在俄国刊物上予以发表。鉴于文章和信已在国外发表，而我们不知为何却未发表，我认为有必要就这件事提个醒儿。在目前时刻，当曼努伊尔斯基的做法把一切都搞乱进而不能不引发托洛茨基文章的真实性的问题的时候，发表上述文章和信尤为重要。如果我们发表了这篇文章，那么真实性的问题自然就消失了。而这对党，不光是对我们的党，而且对外国共产党，尤其是对英国和美国共产党，将是有利的。

约·斯·

8

(1925年8月9日于索契)

信读给布哈林听。

莫洛托夫同志：

你8月5日的信收到了。

(1) 看来，在你收到我关于任命什维尔尼克或其他什么

^① 信的右上角有莫洛托夫做的标记：“1925—?”。

人为组织分配部部长的信之前已经任命了格伊^①。对于格伊我们确实有过争论，但后来我改变了自己的意见，此事通知了你，但遗憾的是为时已晚。也好，让我们看一看格伊的表现。两次通过的决定现在根本没有改变的必要。

(2) 我对第聂伯工程感到有些不安，因为对这样一个耗资数亿的事情，人们却打算轻率地予以解决。应当趁为时不晚采取预防措施，同时应努力使这件事的利益不受到损害，不因捷尔任斯基和托洛茨基可能将受些委屈而止步不前。问题应由七人小组来解决。

(3) 至于曼努伊尔斯基，那么这里存在着某种误解，甚至讹诈。我再次声明：1. 把文件交给曼努伊尔斯基是根据七人小组的决定，是为了让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上层人物了解情况，而不是为了发表；2. 我对曼努伊尔斯基说过，在发表托洛茨基文章的定稿之后，在国外发表某些文件，具体发表哪些文件，——这只应当（和能够）由七人小组决定；3. 我没有也不可能向曼努伊尔斯基下达任何有关发表托洛茨基文章未定稿的指示，因为我过去和现在都主张等托洛茨基文章改好后再发表，而不是未改好就发表；4. 我根本就不可能给曼努伊尔斯基下达这样的指示，因为我要求他在出国前把所有文件还给中央委员会（对此他表示同意，但不知为何他没有履行许诺）。问问曼努伊尔斯基——他为什么没有在出国前交还文件？

(4) 发表克鲁普斯卡娅的文章是七人小组决定的，审读工作委托给了我、布哈林、李可夫、季诺维也夫。我同布哈

① 1925年7月27日和8月3日政治局两次讨论了关于任命康·维·格伊为组织分配部部长的问題。

林和李可夫审读了文章并表示赞同。季诺维也夫缺席。人们尤其是布哈林简直太健忘了。

(5) 七人小组决定等托洛茨基的文章和克鲁普斯卡娅的信在国外发表后即在俄国刊物上发表，无论如何不要为此事挑起争论。可能这个决定现在已被七人小组取消。这当然是它的事情。但如果决定未被取消，文章和信就应在我们的刊物上发表。关于这一点有何情况告知于我？

(6) 至于发表我关于伊斯特曼的便条一事，可等我休假回来后再说。没必要着急。

(7) 请转告布哈林，既然《真理报》不同意托洛茨基的答问，那就应当为其加上按语。

(8) 伏龙芝^①的身体如何？

(9) 科托夫斯基^②是在什么情况下遇害的？真可惜，这是个出类拔萃的人。

握手！

约·斯·

别骂我，这封信写长了。

① 米·瓦·伏龙芝(1885—1925)——1904年入党，1924—1925年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和主席，陆海军副人民委员和人民委员，1924年起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② 格·伊·科托夫斯基(1881—1925)——国内战争积极参加者，1920年入党。

([1925年] 8月18日)

莫洛托夫同志：^①

迟复为歉。

曼努伊尔斯基的信既胆怯又狡诈。

尽管有些同志不满意，但我们仍完全坚持我关于欺骗和卑劣的论述。

加米涅夫声称斯大林首先力图发表自己关于伊斯特曼的便条，我认为这是不诚实的。他是以己之心度他人之腹……

你和布哈林做得不对，不该投票反对有关伊斯特曼的文件的提案^②。不能阻断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获得有关伊斯特曼的文件的途径。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想造成使托洛茨基必须退出中央委员会的先决条件，但他们做不到这一点，因为他们没有这方面的材料。托洛茨基以自己对伊斯特曼的书的回答预先决定了自己的命运即挽救了自己。

握手！

约·斯大林

① 信的右上角有莫洛托夫做的标记：“1925=?”。

② 1925年8月11日莫洛托夫给斯大林发了一份密码电报：“现征询缺席的七人小组成员对出席会议的大多数七人小组成员不願布哈林和莫洛托夫的反对而通过的下述提案的意见：‘应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请求，允许俄共（布）代表团将政治局印发的有关伊斯特曼的书的材料转交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不再对外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保密’。”

(1925年8月)

莫洛托夫同志：①

你8月20日来信收到了。今天我同布哈林交换了意见。

(1) 你建议全会② 议程包括5个问题：1. 外贸，2. 工会，3.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4. 工资，5. 中亚的土地改革。对这个议程我没有异议。工资问题(有计划地提高工资等)的准备很重要。这件事是七人小组提出来的，未经政治局讨论将准备工作委托给了施米特③。勤催着他点儿。在准备这个问题时应事先通过政治局。最好再加上工业建设问题，由费利克斯或皮达可夫④ 作个报告(这里没有斯米尔加什么事，他是个冒牌的经济领导人，而且这里说的不是整个经济，而是工业)。但如果费利克斯目前作不了报告，可以拖到下次全会，但要作出坚决保证，即不经政治局批准在这一时期不开工兴建任何一个全苏规模的工厂。

(2) 关于乌克兰贫苦农民委员会问题没有必要形成文件。乌共中央关于这个问题的决定同俄共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决定

① 信的右上角有莫洛托夫做的标记：“VIII/1925=?”。

② 1925年10月3—10日举行了俄共(布)中央全会，会上审议了下述问题：关于外贸，关于工会工作，关于工资，关于农村贫民中的工作，关于当前的经济政策问题等等。

③ 瓦·弗·施米特(1886—1938)——1905年入党。1918年起任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书记；1918—1928年任俄罗斯联邦劳动人民委员。1925—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

④ 格·列·皮达可夫(1890—1937)——1910年入党。1922—1926年任苏联劳动国防委员会委员，1923—1926年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

完全一致。最好在中央全会上将农村工作委员会的报告^①作为一个单独的问题提出来，而且报告中要谈贫苦农民委员会、农民委员会等。这也将是乌共中央决定的意见。你应当作这个报告。一定由你作。

(3) 如有必要，可在下次全会上提出经济计划，报告不是由国家计划委员会来作，而是由李可夫（人民委员会）或加米涅夫（劳动国防委员会）并吸收中央监察委员会来作。

(4) 关于代表大会议程我们以后再谈。

(5) 如有时间信写得勤些，——我将及时复信（我的时间有的是）。

(6) 布哈林说你现在工作严重超负荷。我力争10月或更早些回到莫斯科，以减轻你的负担。

我很健康。身体恢复得相当好。

握手！

你的约·斯大林

附言：关于工会的提纲^②总的来看是可以接受的，但由于个别提法软弱无力和不够明确，还需要进行修改。必须根据安德列耶夫^③的著名讲话的精神进行修改。

约·斯·

原载《苏共中央通报》1990年第9期

（李京州 赵国顺译）

① 莫洛托夫在全会上作了农村工作委员会的报告，报告对乌共（布）中央关于将贫苦农民委员会改组为社会志愿组织以解决贫农和中农经济发展问题的决定表示赞同。报告向农民委员会提出了把农民联合起来“开展互助和助贫”的任务。

② 指米·托姆斯基为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准备的关于工会的提纲。

③ 安·安·安德列耶夫（1895—1971）——1914年入党。1920—1927年任全俄（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书记，1924—1925年兼任党中央书记。

1928年斯大林 西伯利亚之行

(有关集体化的历史背景材料)

斯大林从泽列杰耶沃
(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州) 给联
共(布)中央维·米·莫洛托
夫、斯·维·柯秀尔、阿·伊·
米高扬的密码电报

(1928年2月2日)

莫斯科 联共中央
莫洛托夫 柯秀尔 米高扬

收购工作出现转机。1月份的第六个5天收购了290万普特，超出通常120万普特的指标。这是个重大转机。我想，这个收购指标不仅会保持下去，而且在道路泥泞期到来之前，如果一如既往地施加压力，还可以再提高一些。看来，2月份1800万普特的收购计划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今天动身回莫斯科。斯大林。第24号密码电报。1928年2月2日13时40分于泽列杰耶沃车站。

斯大林从鄂木斯克
给联共（布）西伯利亚边疆区
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的
密码电报

（1928年2月3日）

新西伯利亚 兹洛宾

抄送：基西斯 联共中央 柯秀尔和米高扬

你们2月份的收购计划落后于各地的收购速度。你们给阿钦斯克2月份的收购任务是70万普特，但是阿钦斯克1月份就收购了90万普特，而且现在打算2月份收购100万普特以上，你们给鄂木斯克2月份的收购任务是120万普特，但是鄂木斯克根据已经出现的转机自行把收购任务定为170万普特。伊尔库茨克、图伦、米努辛斯克也有类似情况。我担心，你们对其他专区，特别是对阿尔泰各专区也会出现同样的失误。新的情况和转折局面要求你们立即重新修订计划，使之符合实际情况，提高收购计划。请不要落后于收购速度。斯大林。第26号密码电报。1928年2月3日20时30分于鄂木斯克。

斯大林从卡梅什洛夫给联共（布）中央
阿·伊·米高扬、维·米·莫洛托夫、
斯·维·柯秀尔的密码电报

（1928年2月4日）

莫斯科 联共中央
米高扬 莫洛托夫 柯秀尔

我赞成把西伯利亚2月份的收购计划增加到2200万普特。2月份是西伯利亚最重要的月份。这就要求提高收购计划，尽可能快地完成收购和装运任务。祝贺中央1月份完成8000万普特的收购任务。这是党的重大胜利。斯大林。第27号密码电报。1928年2月4日14时20分于卡梅什洛夫车站。

农村党团员对粮食收购
措施的态度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

西伯利亚边疆区分局新闻通报^①摘要）

（1928年2月10日）

很多专区的党员对加快粮食收购的措施所持的态度同其他农民群众几乎没什么区别。

① 通报第一页上写着：“致联共（布）边疆区委员会，基西斯同志”。——俄文版编者注

一些专区出现了尾巴主义倾向，党员——合作社组织的领导人甚至没采取措施促使居民交粮。普通党员则表现得不知所措，有时对当局采取的严厉征粮措施持抵触态度：

“不能把粮食全部运走，要不然到春季没有粮食或粮食太贵时，我们就会陷入困境。我们应当留一部分粮食，有些储备。”

一些农村支部的党员还同农民一起发牢骚：“现在的税收我们负担不了了”，“上边压得农民喘不过气来”，“为什么国家不考虑农民的实际情况呢？”等等……

有一些专区，他们不仅不协助开展工作，反而公然从事反革命宣传活动。

联共（布）基层组织 的党员

斯拉夫哥罗德专区。斯拉夫哥罗德专区的部分党员甚至不了解突然对粮食收购工作施加压力的原因，在会上作些相反的解释。

在安德列耶夫卡村支部会议上，联共（布）支部书记在解释对粮食收购工作施加压力的问题时说：“用这种战时方式征粮是因为国家遇到了外汇危机，卢布币值不坚挺，工厂得不到充足的原料，（出现了）商品紧缺现象，而且，战争一触即发！”支部还普遍认为，富裕户应该同所有人一样获得减税的待遇，并且解释说：既然他也面临播种落空的危险，我们就该遵照法律给他减税……

新克柳奇村支部很多党员因不交税都应该受罚，可是在

支部的内部会议上，当建议某些党员交税时，他们却回答说：“没有钱，怎么办”。

在米隆诺夫卡村，联共（布）党员科特利亚罗夫煽动说：“现在不用交税，因为政府自己说要按期纳税，应该遵守这个诺言。”

在科尔尼洛夫卡村，联共（布）党员戈利克假装不堪税收负担，把自己的牲畜赶到集市上卖掉。第二天又拿着枕头和水壶到村苏维埃去抵偿 25 卢布的税款。戈利克的举动在当地居民中引起不少的闲话和对当局的不满情绪……

新西伯利亚专区。1月4日别尔茨克村政治部主任斯捷潘诺夫（联共（布）党员）接到粮食收购指示后说：“这是不负责任的态度，这些做法行得通吗？为什么要拼命逼着大家把东西全部交出来。大概，出了什么事情，党对我们保密。反对派是对的，因为中央的政策导致了危机。”斯捷潘诺夫用嘲讽的态度对待这些措施，——他已被撤职。

布格临诺区执行委员会特派员科罗别伊琴科夫（联共（布）党员）在科伊诺沃村执行粮食收购任务时说：“为什么要这样逼农民？他们在那里（在专区）发号施令倒轻松，可怎么贯彻呢？你要和农民打交道的……”

托木斯克专区。1月12日特罗伊茨克区民警局局长西科利诺夫（联共（布）党员）接到区执行委员会关于对蓄意不交纳统一农业税的人采取查封和拍卖财产的措施的命令后，拒绝执行这一命令，认为这项工作不属于他的职责范围……

坎斯克专区。雷宾斯克村苏维埃卡马林斯克消费合作社主席塔列片科（联共（布）党员）拒绝接受从富农那里没收来的粮食，并说：“为什么非搞得人倾家荡产，无论如何我们

不能按苏维埃政权的要求去做”（已送交法庭）。

“苏维埃政权在和平时期采取这样强硬措施，让人很不好理解。这简直是整农民，而我们只有执行，没有其他办法”（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区联共（布）党员利普诺夫）。

“农民已经开始讨厌我们了，我们到处要农业税、保险金、自愿捐献、合作社股金等等。因此，农民很敌视我们”（萨瓦捷耶夫——泰杰尔斯克区联共（布）党员）。

伊尔库茨克区。科丘罗夫斯克村苏维埃主席谢列布里亚尼科夫（联共（布）党员）迫于专区特派员的压力，不得不在会上动员大家交税，他说：“公民们，你们应该交税，否则我就得受审判。你们也看到了，上级组织是怎样对我施加压力的，这可不是我的过错……”

“苏维埃政权做得不对。这不是一个独立政府，朝令夕改，一会儿规定一个期限，一会儿又变了，不知道该相信那一个。难道一个好政府会这样做吗？我们盼望苏维埃政权解救我们，而它却要把我们搞破产”（切列姆霍沃区巴尔霍托夫斯克村苏维埃秘书、联共（布）党员、贫农波普罗夫斯基）。

鲁布佐夫斯克专区。1月12日在区执行委员会委员（联共（布）党员）戈洛瓦诺夫召开的希蓬诺沃区希蓬诺沃村全体农民大会上，农民们对改变交税期限的做法表示不满。戈洛瓦诺夫以及联共（布）当地支部的委员们对农民在这个问题上的发言没有坚持原则说明改变期限和执行这一决定的必要性，反而宣布：“在决议上写反对规定的新期限，这样不妥当（有几个农民提出这样的建议）。最好这样写：得到了有关通知”。

另外，戈洛瓦诺夫在此前召开的希蓬诺沃区党的内部会

议上还说：“党在粮食收购问题上转弯太急，从而造成一些不良后果，这就是，施加压力的做法引起了农民的愤怒。如果我们现在到各村去逼农民交各种款：农业税、保险金、自愿捐献、股金等，就等于我们改变了过去公布的法令和决定。依我看，这样做有点像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甚至比它更糟，因为农民不可能在和平条件下接受这一突变的政策。现在不是20年代，所以党和苏维埃政权会损害自己在居民中的威信，而且有可能使事态发展到公开的暴乱。”

巴尔瑙尔专区。联共（布）帕尔奋诺沃支部书记舍卢杰诺夫说：“尽管对反对派大喊大叫，可我们搞的还是加米涅夫那一套，我怀疑，这样做能有什么结果。”

巴尔瑙尔专区以及杜勃罗夫斯科耶和萨文斯科耶村……党的工作人员也有类似的言论。阿列伊斯克区杜勃罗夫斯科耶村苏维埃主席、联共（布）党员科尔尼延科说：“苏维埃政权向农民征购粮食的做法不对，应该对农民采取更民主的办法，通过宣传说服农民，让他们拿出粮食来。”

比斯克专区。1月14日贫农皮涅金（乌奇普利斯坦村苏维埃主席、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当着很多人的面，针对征税和交纳其他税款的问题讲道：“在十周年到来之际，共产党员已经发疯和就要发疯了。不可能是为建设事业征税。去年也收税，但不像现在这样是强制的。把最后一头牛或者马都卖掉了，这有什么好处呢？难道这样就能够提高经济吗？看来，农民要像1919—1920年那样锻造大刀长矛来保卫自己了。这纯粹是在敲竹杠，要股金、税款、保险金，又要马上一齐交出来，可又不给提供商品。我交5卢布，再多也不想交了；要交就交个退社申请；农民都这样说。只要有50个人

联合起来，撤回自己的股金，就会让办合作社的人唱《乞丐歌》。”

1月12日，这个村的贫农、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阿斯马诺说：“当前党在农村执行的征收各种税款的政策，只能恶化同党的关系，引起农民的不满，不仅富裕农民不满，贫苦农民也不满，他们认为党执行的政策只能使贫苦农民越来越贫困甚至破产。这种强硬措施对富裕户来说是无所谓的事，他夏天卖牛奶能得100卢布，秋天卖肉或其他东西又能得500卢布，他交了所有税款，也不会对经济有一点损失。贫农则不得不卖掉最后一头牛或马。”

1月12日在该村苏维埃会议上，当区执行委员会委员通知大家必须施加压力迫使居民付清税款时，本村贫农（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区青年委员会委员）哈佐夫说：“这种施加压力的做法同20年代一样，因此，是应该锻造大刀长矛了……”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副全权
代表临时代理 瓦列伊科^①
情报处副处长 肖明^②

（新西伯利亚州委员会党务档案馆第2全宗，第1目录，第2571卷宗，第326—333页。）

① Г. О. 瓦列伊科——履行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驻西伯利亚边疆区副全权代表的职责。

②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西伯利亚边疆区分局情报处副处长。

关于粮食收购运动的 进 程

A. M. 佩夫兹纳给
罗·因·埃赫的信
(1928年3月20日)

绝密

尊敬的罗伯特·因德里科维奇：

我今天刚从各区巡视归来。行程大约300俄里。有机会实地验证了我的一些印象。会见了50多名区工作人员，还到各村看了看。

我所到的这些地区是最偏远的、社会结构方面最有代表性的地方。

政治情绪。富农大都有明显的敌对情绪，但是还不愿冒险去公开反对苏维埃。由于各地都有强硬措施，可以使用第169条（针对反革命的）^①，所以，没有出现特殊事件。但在个别地方也有公开举动。

例子：1. 发生过富农撕碎债券的情况。2. 在读报纸上关于我们在中国失利^②的消息时，说成是莫斯科的消息（也就是说布尔什维克失败了）。3. 谣传苏维埃政权要垮台了，特

① 原文就是这样写的。看来，作者指的是1922年6月1日生效的俄罗斯联邦刑法第69条。1927年6月《关于国事罪条例》生效后，俄罗斯刑法第一章《国事罪》的有关条款又重新编号（从第58¹到58¹⁴），第69条的内容放到第58¹⁰条中表述（见《法令汇编》1927年第49期第330页）。

② 指的是1927年12月广州工人武装起义的失败。

别是把有些工作人员到农村来说成是企图快点收罗些路上用的钱，准备溜掉。4. 还有些人说，只有西伯利亚采取这种强硬措施，由此得出结论——应该到别的地方去。

中农，这些最不稳定分子（虽然是中间分子）的牢骚话最多，而且他们大都同富农情绪一样。

贫农的情绪确实正向好的方面转变。他们过去采取的敌对和中立态度完全是由于我们的过错造成的。我们在运动初期完全忽视了贫农。比如，当改变交纳农业税和保险金的期限时，机械地执行这一措施，把这一措施推广到贫困户中。

转变的原因是什么呢？首先是因为组织工作确实活跃起来。比如，有一个区召开了20次贫农会议，与会者近2000人。

与此同时，下列措施也起了很大作用

1. 留下25%没收的粮食；
2. 建立贫农家庭储备；
3. 使贫农有了粮食储备，尽管数量不多（其中包括通过免收谷物加工费用^①的所得）。
4. 增加富农的税款，从而降低或免收贫困户的赋税。

顺便再谈谈关于（各边疆区的）贫农供给问题。我们为什么“抽象地”提问题呢？我们一切工作都在国际范围内“按计划”进行。我认为，而且经验也证明，您关于基层组织征购计划外粮食的指示是完全正确的。那么您是否还记得，大家对这一点所持的怀疑态度吗？

在实际工作中常常有这样的事情。区里一个精明的合作

^① 当时是以谷物等实物形式向磨坊支付加工费用的。

社工作人员收购等级低的原粮、上冻的谷物和其他残粮，这样做一点也不影响计划的完成，这个合作社工作人员靠这个办法储备了 250 普特粮食。

但是，另一点也值得注意。我们这里有人说，贫农要饿死了。事实上，只要让贫农相信有粮食储备就行了。其实目前根本用不着这部分粮食。只要出售一普特粮食，农民马上就会安下心来。我不想以此来说明各地情况都是这样，但我们对心理因素（害怕没有粮食）考虑不周——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贫农情绪转变后已见成效。各区贫农开始帮助我们揭发富农的存粮（当然，大部分是匿名信）。

最后，我不能对农村出现真正转变这个事实保持沉默。开会热很像 1917 年。10 户 8 户在一起开会，有家庭会议，群众大会，还有积极分子参加的村苏维埃会议、合作社工作人员会议、贫农会议等等。而且与会人数之多令人惊讶。就连基层工作人员也指出这一点。各人民宫爆满。因此，居民们思想活跃，积极性非常高。如果我们能够将这个速度保持一、二年，那我们就是完成了一项巨大的工作。

可见，整个政治形势是稳定的，牢骚有一些，但也是合乎情理的（我们折腾得太厉害。）我没见到什么大的乱子和明显滥用行政手段的做法，这不仅因为我们的机构都是好的，而主要是农民十分了解我们的法律，不会允许别人“逼迫”自己。

对机构的评价。我已在上封信中向您讲过，我们主要依靠特派员开展工作，很少依靠各区，总的来说，党组织和村苏维埃起的作用不大。这个评价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应该

指出，一些区的积极分子比我预料的要好。有一些非常优秀的青年。村苏维埃干部大多数都是尾巴主义者。在某些情况下，村苏维埃主席还在工作。但村苏维埃已瘫痪。存在惧怕逆流而上的心理。必须花时间和气力使其振作起来。

合作社工作人员。大部分是些不可救药的人（比我预料的要糟）。在检查工作时合作社积极分子是一盘散沙。很多合作社工作人员都有200—300普特余粮，自己也不上交（这是农民们说的），那些野蛮的官僚们没有任何积极性。他们只是等待上级的指示，机械地完成这些指示，一句话，对这伙人应该严肃处理，不得不采取镇压措施。在3个区逮捕了6名合作社工作人员和5名村苏维埃主席。有些事实我就不一一列举了，但是一些违法乱纪的现象是令人震惊的。比如，在一个村子里，虽然有数十大车粮食，收购人员却不收购，原因是他一点钟才开始收购，而农民一大早就站在那里了。还有酒鬼在收购粮食的情况。

最后还有一个典型的例子——莫赫纳特洛格村。特派员在时，消费合作社收购400普特粮食（一昼夜）。特派员一走，收购就降到80普特。工农检察院特派员来后，收购又增加到900普特。

党组织几乎大都没有参加粮食收购工作。我只想在此谈谈我所见到的两类共产党员。第一类——普通党员。掌管着自己的农庄，有觉悟，能很好地领会党的路线，工作泼辣。另有一类党员（在别的区）给区委会写信，拒绝参加粮食收购工作，理由是“你们”（专区和区里工作人员）领取出差补助费，换句话说，你们干活拿钱，所以我也不愿意白干。补充一点。从笔迹和文体来看，信肯定不是他们写的，这更糟

(这是富农影响的公开表现)。当然，这些都是个别现象。但是农村中的党员群众大都持中立态度，工作不努力（大概这正是我们的过失——没能加以引导）；有些党员存有很多余粮。

关于对党的路线的理解。对党的路线的解释基本上是正确的，我没见到特别过火的行为。但是，当谈论起为什么粮食收购不上来时，党员们从心理上就开始想到，应该给中农施加压力，因为粮食都在他们手里，不过这只是在形势压力下出现的一时的心理失常表现（因为要完成任务）。

由此我就想到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我觉得，我们应该不是从形式上，而是从根本上把党组织的工作重点转向中农，应该克服中农的摇摆性。但是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在粮食收购工作中转变这种情绪是很困难的，因为我们正是向他们收购粮食的。然而，我认为，在播种工作中提供一些中农所需要的物质设备，就可以转变这种情绪。看来，应该在机器设备方面对中农制定些优惠政策，使价格灵活些，使那些不太富裕的阶层也能承受得了。

在签订合同、土地规划，谷粒清选和制定农业措施方面似乎应该明确地考虑一下中农的物质利益。采取这些措施，加上大力加强在中农中的工作，一定能使局面有个转折。您会说，我们的全部政策是针对中农的，但是对中农阶层的政策太杂乱，而且又突然把政策重点只针对贫农。

顺便说一句，这还是些不成熟的想法，需要更仔细地加以考虑。

粮食收购。我越来越相信，我们主要是疏忽了第107条。这种疏忽起了特殊作用（当然是反作用）。这种情况也被富农

加以利用。于是便发生了下面的情况：

1. 在粮食储备数量上做手脚，即把储备的粮食分散到亲属那里，或交给贫农保存（在一户贫农那里发现 150 普特余粮），或交给那些享受不可侵犯权利的红军家属保存，或直接隐瞒。

2. 把大批粮食磨成面粉。

3. 把粮食外运，不是运去卖掉，而是运到附近州保存（斯拉夫哥罗德州）。

富农也在这里挑拨说我们搞余粮收集制。普遍存在的现象是，富农要求委员会检查他们的粮食储备，叫这些人到粮仓来，力争让他们规定出口粮和种子粮的数量，如此等等。

粮食在谁手中？我还没有听到有谁推翻了我们关于粮食在中农手中的看法。而这恰恰是最难办的，因为不能用第 107 条对付中农。假如我们还能接受某些人的忠告，采取降低粮价的办法，那是会取得成效的。我之所以只强调这个问题，是因为那些认为粮食在富农手中（并且只在他们手中）、应该降低粮价的人，他们都在农村，只是我不清楚，他们的看法是怎么得来的。

我还要指出一个典型现象——农民们已经适应了我们规定的每 5 天交纳一次粮食的制度。他们来到合作社，打听完成任务的进度，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交出 10—15 普特粮食。有些农民就这样交出 150 普特。我们面临一个怎样克服这种情绪的问题，因为这种情绪表明，农民不敢保证，当他们把全部余粮都交出来后，就不再逼他们交粮了。在一个区里做过一个试验——把一个完成了所有任务（自愿捐献、借款）、交纳了 150 普特粮食的农民叫来，试图劝说他把余粮全部交

出，并向他保证，以后谁也不会再来打扰他，而且还把他登在光荣榜上。事情的结果是（倒是没有弄到流泪的地步），他开始怀疑我们保证的诚意，但最后他还是同意再交出 50 普特。如果在农村对一些农民采取这样的做法，可能会产生一些效果。

与此同时，还有另一个问题。有些区（个别区）将所有的经济压力手段都用上了，以后怎么办？不可能再规定税收办法了。作为一种尝试，有个区试图采取施加社会影响的办法。将最恶毒的不交纳粮食的人开除出消费合作社，在社会舆论中孤立他，把他的名字写在黑榜上，以此来强迫其他人交纳粮食。这只是尝试。我本人赞成这种做法。区委会上我们一致主张采取这样的办法。不过大家对这一做法的合理性表示怀疑。我们等待着该区的工作结论。

最后是第 107 条的问题。最初各区都对第 107 条抱着极大的希望，但当要弄清余粮的时候，任务则困难得多。所以进展很不顺利。按照一个区工作人员的准确说法，“富农没有了”。这是富农做手脚的结果。必须施加压力，以便使清查余粮的工作更深入地开展起来。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工作人员必须更深入开展工作，而且，正如我已经说过的，把贫农调动起来无疑有利于我们完成任务。

各区工作人员都很辛苦。有些人几周没睡觉了，那样子简直不忍心去看（我也是如此，不过，我不是在抱怨）。我非常担心，我们的人只能坚持到 3 月份。“精神涣散”情况非常严重，尽管如此，4 月 5 日应该结束，否则播种工作会严重受阻（这项工作已经进行得非常困难）。结果出现了一些变化，虽然很困难，但收购数量增加了，我想，本月第四个 5 天将

达到 175 000，尽管收购人员对此深表怀疑。

不过，如果卡缅斯克专区是增加收购任务的三个专区之一，为什么发来电报指责工作不得力呢？也许为了事业的需要当时应当在这封电报里提一提鄂木斯克的“成就”，但为什么要指责卡缅斯克呢？如果抛开边疆区特派员的自负态度，那么完全应该考虑专区工作人员。我再说一遍，关键是我们已经尽其所能去做了。在下一个 5 天，所有的人又要到区里去了。

借款。情况开始好转，已向您汇报。

自愿捐献。我确信，争取额外自愿捐献的尝试不会收到什么结果。至于完成自愿捐献的期限，那是另外一回事。很多区都把期限拖得很长。缩短期限的任务可以完成，更何况有适当的理由（采购木材等）。这基本上是唯一的一项得到群众同情的工作。有些村子准备为七年制学校修建石砌校舍。正在征收追加税。政治效果非常明显。也存在另一种危险，即全村所有自愿捐献的任务都由几户富农缴纳。区委会已经考虑到这些情况，正在纠正过火行动。

商品流转。这方面工作很糟糕。西伯利亚商业股份公司在 3 月份的 20 天里经销了 18 万月计划中的 6 万。消费合作社联社销售工作开展得不好，基层组织商业工作搞得极糟。积压商品越来越多。我不准备就这个问题谈得太多。您知道我的观点，我个人认为，我的结论在实际工作中会得到验证的。仅对国家银行施加压力，未必就能扭转局面。明天我们将在这里更详细地进行讨论。

请原谅作这么冗长的汇报，但我的感受太多了，我必须较详细地向您汇报。如果您的意见同第一封信中谈的一样就

好了。但愿您能简要地告诉我。

顺便再说说我们的一个成绩。私自酿酒现象已经被彻底杜绝。基本上消除了流氓行为。tt 我去的那些地方，农民们说，今年头一次过上了没有打架斗殴、没发生杀人事件的安宁日子。

因此庄稼人喜欢“铁腕政权”。

就此止笔。

致以共产主义的敬礼！

佩夫兹纳

附言：进一步对各区施加压力的做法引起了我的担心，是不是太过火了。下次到各区巡视应该更认真地研究这方面的问题。

卡缅市。

3月20日（1928年）

（新西伯利亚州党务档案馆第2全宗，第2目录，第276卷宗，第12—18页。）

瓦·格·雅科温科^①

给约·维·斯大林的信

(1928年10月3日)

时隔5年，我于1928年6月24日—8月23日又回到自己的故乡西伯利亚边疆区（从前的叶尼塞斯克省）坎斯克专区塔谢沃区和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区。

我始终在考察三个问题：

1. 农民有没有粮食储备；
2. 扩大播种面积的工作进展如何；
3. 农民对政府的非常措施以及新农业税^②有何反应。

关于第一个问题，可以完全肯定地说，农民连最起码的过渡储备粮都没有了，而没有过渡储备粮就不可能维持稳定的农民经济。可以证明这一点的事实是，取消非常措施和开始秋播后，粮食市场上没有出现任何令人满意的活跃迹象。秋播在新粮下来之前并没有开始。还有一个事实可以证明这一点，市场上出售的主要是新粮。出现阴雨天后，每普特粮食

① 瓦·格·雅科温科(1889—1938)——1922—1923年任俄罗斯联邦农业人民委员，1923—1926年任俄罗斯联邦社会保障人民委员，1928—1932年任米·伊·加里宁接待室农业和选举委员会主席。

② 1923年5月10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通过法令实行统一的农业税以取代统一的实物税、劳力畜力税、按户征收的货币税、用于恢复农业的一次性税和各种地方税。农业税的征收是根据农户的耕地和草场数量、人口、成年人及牛的数量、每俄亩收获量来进行的。

根据1926—1927年的农业税法令，不仅对土地和牲畜征收所得税，而且对其他农业领域和收入来源也征收所得税。瓦·格·雅科温科指的是1928年4月21日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的1928—1929年《统一的农业税条例》。该条例对收入最多的农户征收个人税（见《苏联法令汇编》1928年第24期第212页）。

涨价 30—50 戈比。农民如果有储备粮食，不会不把它投到市场上去。至多再过一个月就开始交税了，市场上的粮食将降到正常价格。而正常价格比现在的粮价要低 150—200%。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播种面积：巡视了几百俄里农民土地并同很多农民交谈后，我坚信，扩大播种面积的工作已停顿下来。值得注意的是，没有一块处女地有被开垦的迹象，除了由 1926—1927 年迁来的移民开垦的原始森林周围的土地和重新划分土地的村子里的地（重新划分土地是按阶级特征搞的，贫穷农户就近分给开垦过的土地，殷实农户分到的是距离远一些的未开垦的土地，贫穷农户分到的开垦过的土地并未耕种，而殷实农户只开垦了少量土地）。

至于那些长满草的被抛弃的土地，虽然不太多，但还是看得到。还应补充一点，农户中有缩小播种面积的现象：如果原来一个农户有 15 俄亩耕地，那他至少播种 9.5 俄亩或 10 俄亩。现在有点变化：15 俄亩耕地将播种 8 俄亩，而且无论如何也不会超过 9 俄亩。这是因为燕麦的播种面积急剧减少，只好用麦子喂牲畜。当问到为什么你们要少种燕麦时，有些人回答是缺少种子，而有些人则直率地说：当然啦，本来不应该用麦子喂牲畜。不错，耕种 2 俄亩燕麦是比耕种 1 俄亩小麦容易，但这样会扩大播种面积，还会因此给归到另一类去^①，引起一些不愉快的事。为什么你们的黑麦减产那么多？——黑麦吗，是它长得不好啊，每俄亩黑麦不够交税的。

我对他们说：你们光种小麦会落入困境的——干旱会使小麦减产，还会经常有冰冻，他们回答：反正都一样。

^① 这里指的是按照农户的收入将农户分为不同的征税组。

典型例子是，两个月中我没有在一个农户家看到黑麦面包，大概，有大量面粉喂牲畜。

我对科隆村(在游击战争期间被高尔察克烧毁)的100户农民亲自做了调查。从形式上讲，播种面积增加了，但同一些农民交谈后，他们都承认，今年一些农户少种了2—3俄亩。他们说：去年我们登记的是全部播种面积(3200平方俄丈)，而今年我们是完成给各户下达的播种指令，登记的是公家的亩数(2400平方俄丈)。大家一致认为，今年他们村里少播种150俄亩。

关于农民的情绪。我所到之处的农民都打不起精神。他们对新事物没有兴趣，并且不追求上进。

西伯利亚还保留着远离村庄的垦区经济。从前，通常情况下，农民周六很晚才从开垦区回到家，星期天晚上或至少星期一早上再返回垦区。而现在通常是星期六一大早男人就回家了，星期一晚上，而且往往不是每星期一都如此，才去垦区。星期一白天，他们中大部分人在集市上闲逛，成群结伙，喝酒和怨天忧人。当问到为什么你们在工作日呆在家里时，他们答道：我们遵守苏维埃政权为我们规定的制度，第67条^①惩罚我们播种面积不够，而第107条又罚我们种得太多，我们就是在这40条的范围内应付生活。

这些地区的粮食收购工作同各地一样，我就不谈了。我只想讲一个使农民极其腻烦的方面。从某个合作社系统给一

^① 文中就是这样写的。指俄罗斯联邦刑法第61条，其中规定“不履行义务或不完成国家下达的生产任务，第一次时，有关政权部门根据法律规定的范围给以行政处罚，第二次——强迫劳动不超过六个月或根据该义务或工作处以罚款”。

个村子下达了收购 50—60 普特粮食的任务，召集群众大会，一开就是一天，一会儿叫伊万，一会儿又喊彼得：你报 1 普特，你报 1.5 普特，等等。农民把所有用这种方式来收购粮食的人称为“打场的人”。这不又来了一位，要打 20—30 普特。

农民们普遍认为，苏维埃政权不愿意让农民过宽裕的生活。农民把第 27 条 a 款看作是某种召唤：“不要向前闯”，因为以每户年收入 400 卢布为起点，征税委员会给每个农民收入多算 5—25%，并且相应地提高税收，而第 28 条他们认为就是用来直接惩罚那些跑到前面去的人的^①。

每当同农民谈起某一新生事物和改善经济时，他们马上就会举例向你谈尤金和其他因新生事物而倒霉的农民。他们说，尤金种植农作物——连续三年获得展览会奖金，可现在他住的是别人的房子，连马都没有（尤金——这是一个近 20 口人的农户，他用最新的科学知识来改造自己的经济。1925—1926 年他免交农业税，并且在农业展览会上获得良种牲畜和农作物奖金）。

我还想谈谈受到第 28 条处罚的那些“罪犯”。我可以列出一长串名单，但只举例谈三个区：坎斯克、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塔谢沃。

坎斯克区伊万诺夫卡村农民什库连诺·伊万：

^① 指的是《关于统一的农业税条例》第 27 条 a 款和第 28 条。第 27 条 a 款规定，俄罗斯联邦农户的收入以 400 卢布为界线，如果超过这个界线，税务机构就有权将该农户的收入随意增加 5—25%，然后增加征税额。第 28 条允许“对其收入明显超出一般农民群众的个体农户以及非劳动所得的收入可以不按照规定的标准，而根据地方税务部门掌握的‘一般情况’来征税”。

1. 播种 16 俄亩；
2. 马——4 匹；
3. 羊——13 只；
4. 猪——2 口；
5. 奶牛——4 头；
6. 摇臂收割机 1 台；
7. 梳毛工具 1 套；
8. 手工脱粒机 1 台。

他应交税380 卢布。全家 12 口人。

从来也没有使用雇佣劳力。当他计算保险金、各种地方税等应交的款时，他需交550 卢布。他可以从粮食作物中最多向市场抛售 800 普特。卖这些粮食，他可从每普特小麦、黑麦、燕麦中平均得到 70 戈比，即总共可得到 560 卢布（城里小麦的价格是 1 卢布，但应考虑一点，即往城里运要跑 60 俄里路）。

2. 布尔马金·拉夫尔（科隆村）——游击队员，家庭成员：他本人、妻子和一个靠他们供养的叔叔。他们的全部家当在游击战争期间被白卫分子毁掉了。他现有两匹马、两头牛、3 口猪，播种面积 9 俄亩，所以他也落入这些“罪犯”之列。去年，他交税 70 卢布，今年则应交 174 卢布（科隆有 100 户人家，富农占 10 或 12 户）。

3. 塔拉卡诺夫·德米特里（塔谢沃村）。1919 年他的全部家当都被高尔察克分子毁掉了。他自始至终一直是游击队中的普通战士。在这段时间，他完全靠自己的劳动恢复了家业，修建了房子（房顶还没有盖上）和院内的建筑物，现有 4 匹马、4 头牛、1 台摇臂收割机，1 台组合脱粒机，1 台割草

机，播种面积 14 俄亩，有 10 只羊，两口猪，没有使用过雇佣劳力。农民们说，就是这样的人也被乱征税（本来只应征收个人经营税）。

我曾就这个问题同塔谢沃区互助委员会主席——马利舍夫·尼古拉（前游击队第一连连长，红旗勋章获得者）进行交谈。我们对塔谢沃的“罪犯”逐个回忆一遍，结果在塔谢沃村找出 10 个富农。区政府不让少于这个数了。我对他说，这都是些真正的劳动者，而且他们都一样，他回答我说：既然我们没有更合适的人了。我们有什么办法呢，上边给我们规定指标，要求塔谢沃必须有 10 个富农，而各小村找富农就更难了，那里根本就没有。叶梅利亚诺夫同志走了一趟，什么收获也没有，为此他受到区委会的责备，一个区委会委员又去了，他能找到几个，我就不清楚了。

塔谢沃村共有近 500 所房屋。四分之三的房屋被高尔察克烧毁了。

现在来分析一下这些“罪犯”，看看他们对税收的反应。每个人的态度都不一样。

德米特里·塔拉卡诺夫关心的是如何售出两匹马和两头牛。

布尔马金·拉夫尔——取消所有的园子，只留下一匹马，他愿意干拉脚的活或零工活。

什库列诺·伊万——64 岁。他痛哭流涕地说：“我在城里生活了 47 年，在西伯利亚 17 个年头。刚刚从垃圾堆里爬出来，又要把我推进去。我有生以来还从没受过这样的委屈。”

再举一个第 27 条 a 款的例子。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区执委会，杰尼索夫卡村，彼得·贝斯特罗夫：14 口人之家，兄弟、

女婿和一大群孩子。彼得·贝斯特罗夫曾任游击队第三骑兵连连长，大约1924年以前，他一直在正规部队中，后来当过机械协作社主席，从1928年9月起担任信用社主席。他白手起家。今年他家没扣除人口生活费的总收入是508卢布。地方税收委员会在扣除人口生活费之前就使用了第27条a款，然后再扣除人口生活费，可这时农业税已经计算完了。尽管贝斯特罗夫一再同他们争辩，认为这样做不合理，可区执委会答复他，我们是根据州里的指示办事的。

我说的这是一个比较令人满意的区的情况。根据我的观察，有三个区的富农的比例没有超过2%。塔谢沃区只有1%，或许再多点，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区——稍高些，坎斯克区再高些。

听一些同志讲，坎斯克州南部大概富农比例很高。执行第28条的条例规定，富农比例的平均数是3%，可以在1—5%之间浮动。

我还试图弄清楚居民对这种税收的态度。我同农民（有贫农、中农，还有所谓的“富农”）进行了上百次谈话，他们都叹息地说：“就这样收税，就这么给收走了。”

关于集体，我少谈几句。我还没有发现一个集体，其资本和劳动的投入产出情况比一个中等的、经济较好的个体农户强。风气问题始终很严重，到处都能看到不爱护役畜和农具的现象。其结果是，公社和劳动组合的领导人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可见，对集体形式的问题应予以重视。

讲两句合同的问题。关于预订合同制和收购工作的种种议论使农村气氛紧张，因为粮食很少，农民中有一种情绪——把粮食保存到春天。从农民那儿常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议论，既

然从秋天开始价格就这样高，那么到春天粮食肯定还得贵。

明年的备耕工作进展缓慢。毫无疑问，无论在商品粮地区，还是在播种面积多的个别农户那里，备耕土地都在减少。

瓦·雅科温科

1928年10月3日

莫斯科，格拉诺夫斯基大街，3号楼，59号住宅。电话：

9708

关于农民反苏维埃行动的 事 实

(摘自在联共(布)西伯利亚边疆区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上报告的材料)

(不早于1928年12月)

1

下列表格反映了苏维埃最近一次选举以来农民不同时期的情绪和农村阶级斗争的一些情况。

农民的情绪

恐怖活动

	总数	杀人	其中伤害 和殴打	其他形式(纵火,谋杀, 损害耕畜等)
三个时期中的每一个时期都是 9个月份:				
1、重新选举苏维埃时期 (1926年7月1日到1927年3月31日)	209	18	116	75
2、军事威胁时期 (1927年4月1日到1927年12月31日)	159	15	58	86
3、粮食收购时期 (1927年1月1日到1927年9月30日) ^①	331			
a) 粮食收购第一阶段 (1月到3月)	88	—	23	65

① 原文如此,似应为1928年。——译者注

	总数	杀人	其中伤害 和殴打	其他形式(纵火,谋 杀,损害耕畜等)
b)粮食收购第二阶段和其他运动时期 (4月到6月)	116	12	37	67
c)7月份由于取消了非常措施,改善了收 获形式,减少了恐怖活动,农民情绪出现 转折:				
①6月	52	7	17	28
②7月	38	1	11	26

下列表格表示最近三年农村恐怖活动的比较材料：

农民的情绪

恐 怖 活 动			
	1926 年	1927 年	1928 年 9 个月
总数 ^①			
其中：			
1、杀人	37	23	17
2、伤害和殴打	142	98	99
3、纵火	23	25	22
4、其他形式	54	80	193

① 原件中这一行没填。——俄文版编者注

下列表格表示从 1928 年 1 月份起对党和苏维埃政权的措施表示不满和进行鼓动宣传的事件：

农民的情绪

1928 年

	1 月	4—6 月	7—9 月
1、群众闹事	1	12	1
2、传单和呼书	16	60	8
3、匿名信	1	6	1

注 释

① 在4—6月的12起群众闹事中有11起是粮食供应不足引起的。

② 在4—6月的60份传单和呼吁书中有52份有号召推翻苏维埃政权的内容。

(新西伯利亚州委员会党务档案馆第2全宗,第1目录,第1783a卷宗,第42—43页。)

本文是由 A. 阿尔季佐夫、II. 伊孔尼科夫、B. 科切科夫、C. 梅利钦、C. 波波夫、A. 乌格罗瓦托夫整理发表的。

原载《苏共中央通报》1991年第7期

(孙凌齐译 李永全校)

“纯粹社会主义”的兴衰

亚·齐普科

绝大多数批评斯大林体制的人，同捍卫斯大林体制的人的意见在主要方面是一致的。这样说似乎令人难以置信，但如果好好想一想的话，却确是如此。社会思维的基本模式相同，是按照同一图纸炮制出来的。无论斯大林主义的拥护者，还是斯大林主义的反对者，都把走向社会主义的运动，想象成为正在产生的社会主义不断排除异己的过程。无论斯大林主义的捍卫者还是斯大林主义的批评者，都以为：社会主义就是取消过去的多种成分，而首先是消灭小农生产；不搞强制，不使全国整个经济生活服从中央，社会主义就不可能实现它所必需的计划性；只有通过社会的无产阶级化，才能抵制小资产阶级蜕化的危险；社会主义从“扬弃”资产阶级文化开始；传播无神论会带来无可争议的好处。

斯大林主义的反对者由于把所有这一切都当成公设，在思想上就已经和斯大林主义的捍卫者分不开了。顺便说一句，他们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可能在辩论关于我国的未来时采取积极的进攻的立场。

对这种状况是否可以容忍呢？

今天，现实社会主义已经有 70 多年的历史，我们不分析批判斯大林所遵循的那些原则，根本就无权评论斯大林的行

动，也无权只谴责斯大林体制及其罪行而不注意斯大林主义即斯大林体制的思想内涵。不这样做，我们就还是会从30年代的思想立场出发来批判30年代，我们就会倒退，退到在列宁逝世后争夺权力的党的领导人所共有的对社会主义任务的狭隘认识上去。

他们所有人，同他们所处的时代一样，都有庸俗社会学的毛病，他们把人类社会生活看成是简单机器的运转，过高估计技术的作用，而无视人的因素。他们认为，随着社会的进步，划一的模式会越来越发展，自发的东西将从经济中，从人类生活本身完全排除干净。简单地说，他们全体，所有这些领导人（大概只有尼·伊·布哈林除外），都对丰富而复杂的人类生活估计不足。

当时多数共产党人没有认识而且也不可能认识到对生活实行革命变革带来的全部后果。例如，很少有人想到，使所有那些与他们革命者思想不同的人脱离积极的国家生活，而首先是使革命前的知识分子脱离他们的专业劳动，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特别是在列宁逝世以后卷入权力之争的革命领袖，一般说来，都没有认识到经济服从政治、干部问题服从阶级原则所产生的消极后果。没有认识到党的机关的无限权力，他们所追求的无限权力可能产生的一切后果。更不用说他们过高估计禁令作为解决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的方法的作用，普遍轻视法和整个法文化的传统。而且20—30年代对宗教在人类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对用科学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取代宗教的唯心主义世界观的可能性和方法的认识，是最庸俗最简单化的。

所有这些认识都不同程度地反映在那个时代的党的文献

中，甚至反映在当时最认真最现实地制定的文献中。其中首先是1927年召开的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现在批评斯大林主义的人都把这些决议当成一种示度点，认为一切糟糕的事情都从背离这些决议开始，尤其是从加速实行工业化和集体化开始的。但是，今天能否把本身尚有待深入分析、有待与已有经验加以比较的东西当成示度点，当成绝对的终极真理呢？

非常明显，除了今天反斯大林主义者和斯大林主义者争论的关于摧毁过去的生活方式、生产原则和结构的快慢问题以外，还有“扬弃”这一或那一方面的资本主义遗产是否适当的问题、改造旧社会的界限问题、人们接受这些或那些新措施的原则可能性问题。如果对于社会主义改造的目的认识不正确，要求过高，违反维持社会生活的规律，那么，就达到这些目的的速度和方法展开争论，就是完全没有意义的事情。

不管从哪一方面去完成这一不现实的任务——用骑兵突击的方法还是用长期围困的方法去完成——结果都是一样的。无论采用哪种方法，走向实现不了的目标，违背社会生活的客观规律、违背人的本性，都将白白浪费人力物力，造成无谓的牺牲。骑兵突击的方法或许还好一些：这种方法马上就会见分晓，表明什么样的事情不应该做，什么样的任务不应该提出。

批评斯大林主义的人一般不分析作为斯大林主义的出发点的公设，不从今天的经验的高度来看待这些公设。结果反而强化了那个时代的幻想，似乎防止斯大林体制的产生，抵制领袖暴政和全国性的自相残杀的危险性，都并不十分复杂。似乎不彻底改革国内战争条件下建立的政治体制，不恢复法

制国家，也能防止这一切，只要增加工人在中央委员会内的数量和保护好党的老近卫军就足够了。

值得注意的是，甚至我国革命前的社会思想比 20—30 年代的某些教条更能促使我们去认真地思考斯大林主义的根源和实质。许多俄国社会主义思想家（更不用说费·米·陀斯妥耶夫斯基）都注意到试图让整个社会生活服从于抽象理论的指示的危险性。例如，米·巴枯宁曾注意到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蜕化为新型的“军事官僚集中制”的危险性（特别是在俄国）。他写道：“政府专制从来没有像它依靠虚假民意的虚假代表时那样可怕，那样厉害……似乎比人民本身更加懂得人民的真正利益的少数知识分子因而也是少数特权分子的专制尤其可怕。”第一，这些少数人的代表千方百计要想生拉硬扯地把子孙后代的生活塞进他们的理想中去。第二，这 20 或 30 名学者—知识分子“将要互相倾轧争斗”。

巴枯宁大声疾呼：“成为书呆子的奴隶，人类是多么不走运啊！只要让他们为所欲为，他们就会对人类社会作现在为了有益于科学而对兔、猫和狗作的那些实验……一旦思想成了生活的源泉和唯一的指南，一旦科学和学者领导社会管理，人类将多么不幸。生活将会枯竭，而人类社会将变成无言而驯服的一群人。科学对生活的管理，除了会使全人类变得愚蠢，不会产生其他效果。”

19 世纪的哲学家、政治家、民粹主义思想家彼·拉·拉甫罗夫也发出了同样的警告，他确实与仇恨马克思及其学说的疯狂的巴枯宁不同，他的看法比较平和。

拉甫罗夫写道：“历史已经证明，而且心理学使我们确信，任何无限权力，任何专政都会使最优秀的人物堕落，即使天

才人物也是如此，他们想要用法令为人民做好事，也是办不到的。任何专政都要用强制的力量使自己周围的人成为盲从的工具；任何专政都不仅要用暴力镇压反动派，而且要用暴力镇压那些只是不同意它的行动方式的人；任何夺得的专政在同对手争夺权力的斗争中花费的时间、力量和精力，都要超过借助这一权力实行自己纲领所花费的时间、力量和精力。而关于某一政党放弃用暴力夺来的专政（即关于专政只是“革命的出发点”，不是这样吗，编辑先生？），只有在夺取专政之前才可以设想，因为在党夺取权力的斗争中，公开的和秘密的阴谋此起彼伏，每一分钟都出现新的保持权力的必要性，都表明权力是放弃不得的。”

在公开性的时代，不仅要倾听胜利者的意见，而且要倾听失败者的意见。倾听并不意味着同意。这首先是思索、争论、考虑。

此外，这种分析有助于我们揭示斯大林主义的心理上的根源，比现在一再提及的关于斯大林主义无非是小资产阶级对十月革命的反动的论断要确切得多。这一思想是托洛茨基提出来的，而对他的说法完全可以理解：小资产阶级的标签是打败政治竞争者的有效手段。不过，托洛茨基即使愿意（考虑到他的思维方式、一整套社会公理）也无法对自己的失败作出另外的解释。他把社会生活中所有的基本问题都归结为各阶级的互动，而在革命后俄国的条件下，则归结为无产阶级的“纯洁的”先进的意识与占多数的反动农民群众的“不纯的”意识的互动。托洛茨基以为，一切都是由于过去时代和市侩意识的残余在作祟。他写道：“但在党内和国内，有一个很大的革命者阶层，这些人大多数虽然也来自群众，但

早已经脱离了群众……在地下斗争、武装起义、国内战争时期，这种人是党的战士。在他们的意识中几乎只有一根弦，而这一根弦也是按照党的音叉发声的。当紧张时期过去，这些革命的游牧人过上定居生活后，市侩特点在他们的内心重又苏醒和发展起来……”

今天我们都知道，社会主义革命所遇到的一系列危险，要比左倾反对派领袖们所设想的广泛得多。对新社会起破坏作用的不仅有“市侩特点”，而且还有农业生产的衰退、饥荒、厌弃土地、劳动兴趣下降、缺乏主动精神、无动于衷、漠不关心、酗酒成性、经营不善、依赖倾向、丧失基本社会感情——同情、团结、仁慈。现在我们都知道，执政的共产党为一无例外地控制生活的一切表现、控制社会存在的方方面面，付出了多么昂贵的代价。这样的极权破坏了居民的自主性，导致普遍不愿意独立作出决定，不愿意承担责任，这种极权使党的领导失去了人民的监督，使我国社会封建化、领导机构蜕化变质成为可能。

我们知道这一切后，还可以只用小资产阶级的蜕化来解释斯大林主义的根源吗？坚持这种观点的人只能去揭露经典作家已经揭露过的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或者去揭露农民的宗法的“我们”，扩大小资产者特别是农民私有者的罪行的清单。现在许多批评斯大林主义的人的思考恰恰就是在用斯大林的罪行来补充小生产者的“罪过”，以此来再一次证明“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残余”是多么可怕，并号召保卫“革命意识”的纯洁性。于是周而复始，我们又向 20 年代的号召回归。

但也许主要的问题还不在这里。采取这种态度并不能使

斯大林用以肯定他的国内政策的各种原则、各种政治思想受到批判。谈的还是关于革命取得胜利以后保持党的政治领导的稳定性的方法和价值的问题，关于容许先发制人、采取预防性的暴力去打击有可能夺权的人甚至打击一切不想像斯大林成立的政治局那样思维的人的问题。

为了弄清这些问题，首先需要注意列宁逝世后争夺党内统治权的那些人的政治思维的特点。不这样做，就不能理解是什么机制使党在精神上解除了武装，竟允许暴虐者不受制裁地屠杀千百万人，就不能理解暴虐者建立了哪些全面摧残人性的机制。

早在“最强者取得胜利”之前很久，就已经在号召镇压党内遭到失败的反对派运动的领导人。例如，还在1924年的时候，加米涅夫就主张镇压托洛茨基反对派的领导人，而这完全符合那个时代的情绪。我们都记得，在这之前几年，水兵热列兹尼亚科夫用最简单的群众语言表述了当时的情绪，他说，为了俄罗斯人民的幸福甚至可以杀死100万人。而经济学家列·克里茨基在简直是为革命暴力唱颂歌的《伟大俄国革命的英雄时期》一书中，提出用牺牲的人多少、对历史形成的社会结构的破坏的大小、非无产阶级的各阶级消灭得如何，来衡量革命的道德水平。这本书断言：“无情的阶级特殊性，从社会上消灭剥削者阶级，是道德提高的源泉，是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剥削者进涌奔放热情的源泉。”书中还说：“剥削者阶级属性的烙印只能使人走向集中营，走向监狱，至多能住进已迁进好楼房的无产者留下来的破房子里去。”

斯大林主义的根源就在这里。老布尔什维克近卫军的许多代表容忍斯大林的罪行的原因就在这里。任何人当然都不

会为暴君开脱罪责，但在很大程度上当时的信念也是有过错的，当时以为建立无阶级社会的利益高于一切、革命本身就是命令就是法律。在这方面存在着革命进步与革命暴力的悲剧性的矛盾，也许甚至是主要的矛盾。

大家不妨回想一下：在斯大林之前很久，俄国社会民主党就把保卫革命的利益置于法和民主的传统观念之上，置于道德准则之上。例如，普列汉诺夫就这样说过：“对每一个民主原则都不应该孤立地抽象地来看，而应该从它与被可以称为民主的基本原则的那一原则的关系来看。这一基本原则就是：社会福祉是至高无上的法律。用革命者的语言来说，就是革命的成功是至高无上的法律。如果为了革命的成功要求暂时限制实行这一或那一民主原则，那么害怕这种限制就是犯罪了……革命的无产阶级将要限制上层阶级的政治权利，就像上层阶级过去曾限制无产阶级的政治权利一样……如果人民怀着高涨的革命热情选出了一个非常好的议会，那么我们就应该尽力把它变成长期的议会；而如果选举得不成功，那么我们不要等两年，两星期就可以设法解散议会。”

所以还在本世纪初就已经宣布了特殊的革命法律，宣布了“革命的成功”高于一切的特殊的道德。

托洛茨基只多走了一步，他不仅把革命的成功置于人民的主权、多数人的主权之上，而且正如他所写的，还置于全人类的标准道德的原则之上。他正是按照这一原则——“革命的成功高于一切”来论证镇压不放弃争夺权力的政治反对派是正确的，论证了先发制人对业已建立的政治制度实行预防性保卫是正确的。

1918年，当要对我们现在称之为参加联合的政党（这个

党试图成为执政党)的代表进行镇压时,托洛茨基第一次把这一方法运用于实践。尽管蔡特金及其他欧洲共产党人要求保留左派社会革命党领导人的性命,托洛茨基却坚持处死这些被告,他在解释促使他这样做的理由时写道:“关于革命时代的这种镇压问题具有完全特殊的性质,人道主义的泛泛之论在这个问题上起不了作用。正在进行的是直接争夺政权的斗争,是生死存亡的斗争——这也就是革命——在这些条件下,监禁对于那些指望在最近几星期内就掌握国家政权并把现在掌权的人收监和消灭的人来说能有什么意义呢?从所谓人的个性的绝对价值的观点来看,革命像战争一样,其实同整个人类历史也一样,是要受到‘谴责’的。但为了使个性这一概念本身具有实在的意义,为了使‘群众’这一有些轻蔑的概念不再成为‘个性’这一在哲学上享有特权地位的概念的反命题,群众自己就需要通过革命,确切地说是通过一系列革命的升降机,把自己提高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从标准哲学的观点来看,这条道路是好还是不好,我不知道,老实说我也不感兴趣。但是我坚持认为,这是到目前为止人类所知道的唯一道路。”

不难理解,托洛茨基采取的这一新步骤,已经使社会意识逐渐认识到,镇压遭到失败的政治对手是绝对正确的措施。如果镇压那些不幸生来就是皇位继承人的孩子们是正确的,那么为什么不能镇压那些过去同沙皇制度进行过斗争而现在对革命又造成威胁的同志呢?如果可以镇压对十月革命有自己的特殊理解的社会革命党人,那么为什么不能镇压对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坚持已见的革命布尔什维克呢?

最后,如果革命的成功的确是至高无上的法律,那么怎

样避免牺牲，避免滥用暴力，怎样避免领袖专政呢？

所有这一切对于历史学家来说都不是简单的问题。回避这些问题，例如，只研究工人和农民在革命的各个阶段在党内的比例关系，当然是最简单不过的了。但是，如果不从实质上对革命好好想一想，不想一想关于革命的内部矛盾、关于革命的紧张形势，那么就不必作出要探求产生所谓的俄国启示录的根源的样子。如果我们在思想上还不成熟，还不理解国内战争是一场人民的悲剧（人民找不到其他流血少的克服国内冲突的方法，找不到另外的克服他们厌恶的生活的道路，所以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了可怕的代价），那么就不应当作出我们已经改弦更张、我们的思想不同于赞成30年代为所欲为自相残杀的那些人的样子。

说穿了，对待国内战争这场悲剧的态度，是衡量一个人是否真有文化修养的尺度。阶级斗争即阶级战争这一绞肉机，同斯大林的镇压这一绞肉机一样，是非常令人厌恶的，一点都不值得高兴，一点都不值得赞赏。一个阶级斗志昂扬地消灭另一个阶级，一个兄弟用武力攻打另一个兄弟，在这一点上没有任何教人为善的因素可言。

这一形势的悲剧并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发现。正如马克思所描写的那样，这一悲剧在于：互相斗争的每一方都捍卫自己的神圣的真理，认为自己是正确的。难怪列夫·托尔斯泰要把他打算写的一部关于革命和革命者的长篇小说叫作《没有罪人》。

其实这甚至不像斗争参加者所认为的那样是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而是同一民族的各种不同处境之间的斗争，是它的过去同它的未来之间的斗争。例如，尤其在俄国，旧制度

不仅是沙皇和地主的政权，而且也是民族的过去。马克思指出，旧制度作为现存的世界秩序同只是刚刚诞生的世界进行斗争，站在旧制度一边的不是个人的，而是全世界的历史性的迷误。所以它的灭亡是悲剧性的。悲剧恰恰还在于：在这种形势下，只有通过武装斗争才能弄清谁拥有真理。

斯大林体制的恐怖没有道理，同样，在此以前发生的国内战争时期的恐怖也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哪一种恐怖都不是以残酷对残酷，即对手持武器的敌人的多少还情有可原的残酷。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 1919 年在彼得格勒搞起来的“红色恐怖”包括枪杀人质，实行阶级、阶层集体承担责任的原则，简单他大批屠杀非无产阶级出身的人。杀掉沙皇军队的军官，只是因为他们是军官。杀掉神甫，只是因为他们是神甫。

恐怖从来都是疯狂，是人的兽性的发作。道德不可能起革命的作用。相反，革命只有在继承道德并为保卫道德的利益、保卫人道主义和人性的利益服务时才是正确的。

只有从无条件地拒绝使用暴力，任何人都无权杀害别人的原则出发，才能对斯大林的行为作出客观的评价。这一点上没有可争论的问题。只是许多谴责斯大林体制的人，不想从我国发生的事情当中作出原则性的、非个别的结论，这是令人困惑不解的。

现在我们把斯大林主义的根源作为某种观点的体系来谈一谈。

先谈谈下面一点：在任何历史条件下农民都一定具有“小资产阶级性”的论点，形象地说，是我们意识中至今还没有拔出来的刺。如果直截了当地说，这也就是我们许多人头

脑里的斯大林主义者。反对农民，怀疑农村个体劳动所带来的一切，——这恰恰往往混淆了斯大林主义的批评者和辩护者的界线。斯大林所同意的关于“富农危险”的论点（今天反对改革的人恰好借助于这一论点来为斯大林对农村施行暴力作辩护），同关于在农民占多数的国家里党有发生小资产阶级蜕化的危险的论点如出一辙。

不能对农民一私有者怀疑一切，并不是因为这种怀疑是斯大林所特有的，而是因为它违背了健全的理性。它是反常的。在这种怀疑的背后，无非是一种对另一个、没有这些粗鲁愚昧的农民的更纯洁的世界的幻想。

对作为小生产者、私有者的农民的否定，来自这样一种信念，即相信能建成纯粹的无商品无市场的、社会化大生产会排挤掉一切其他劳动组织形式的社会主义。也可以说，这种思想也是社会原始主义、偏执狭隘的表现，总是幼稚地想消除一切与都市化了的人的理想不相符合的现象。

正如Л.卡尔宾斯基精确地发现的那样，斯大林主义的全部本质掺杂的就是农民必定具有“小资产阶级性”这一教条。由这一教条引出了斯大林主义的一些基本论点，其中包括关于阶级斗争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必定日益尖锐的原理。这一教条产生了以下公设：市场和价值规律具有“资产阶级属性”、国家高于集体、阶级利益高于社会价值。

斯大林同老近卫军中许多代表一样，把市场和资本主义这两个概念混为一谈，所以把一切与市场、自由贸易有关的事物，首先是自由农民——私有者、手工业者，都当成政治瘟疫，当成通往纯粹社会主义王国道路上的最后的也是最难逾越的障碍。而且斯大林和所有左倾反对派分子基本上都不

愿谈论俄国农民是有家庭有孩子的人，是备受折磨、一贫如洗的人。指责布哈林和捷尔任斯基是民粹派，说他们不能站到阶级分析方法的高度，正是因为他们把农民看成是人，他们认为大多数农民很贫穷，衣不蔽体，捉襟见肘，只靠劳动度日。

左派领袖们荒谬地认为农民只是阻碍历史进步、妨碍拯救全人类即妨碍建立无阶级社会的社会力量。因此他们相信，凡是同这种一相情愿地向无阶级社会前进的运动不相符合的人性的东西，都不是真正的人性的东西，只是某种非真的非现实的东西。令人惊奇的是，这一切很像典型的宗教世界观：根本不把异教徒当人，不把自己的道德用于他们身上。正是因为这样，他们实际上才不把非无产阶级的代表当人，才不认为在同这些人即农民业主、私有者、商人、神职人员以及后来的耐普曼分子、合作社工作者、手工业者打交道的时候，一句话，即在同俄国 80% 的人打交道的时候，需要讲良心和道德。

今天我们懂得，阶级分析方法就其本质来说是片面的。这一方法过于注意人身上的那些为完成革命任务所需要的品质。同时它又必然忽视人身上的那些为建设所需要的品质。所以，在阶级分析方法的指导下，人投身革命斗争的意愿比投身有效的有意义的劳动的意愿分量重。

所以在革命爆发的条件下，看人首先要看他的社会出身，看他对工农王国和共产主义平等能否建成的信念，看他为这一神圣的目标服务的决心。

同时不由自主地忽视了人的个性的内在的深层结构、人类生活中更复杂的共同问题，忽视了罪恶、良心、生和死、爱

和恨、罪行和忏悔等问题。

现在，可以设想一下，阶级分析方法在一个 80% 的居民都被当成通向理想道路上的障碍的国家里造成的紧张是多么骇人听闻。因此，党的领导人在 20 年代不得不感到他们处于被包围的堡垒之中，这与其说是由于资本主义的包围，不如说是由于他们生活在一个耐普曼的、市场的、商品的、农民的世界里。是由于他们认为我国社会的大多数人不能也不愿接受新制度。

斯大林并不幼稚，他不相信关于俄国农民具有“社会主义本能”的童话。尽管他仇视农民，但他对农村居民智力才能的评价仍然比现在一些进步和民主的朋友要高。他懂得，农民不会自愿给自己戴上生产合作社的枷锁，而且他们自己永远也不会放弃自己的自由，所以他才认为必须“植入”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

被包围的心理，正是产生斯大林主义的前提之一。我们在长篇小说《阿尔巴特街的女儿们》中所遇到的问题，其答案大概需要在这种心理中去寻找。30 年代斯大林的流放制度较之沙皇时代政治流放者所处的宽容条件来说，是极为残酷的。顺便说一句，革命前对政治流放者的这种宽厚做法，连托洛茨基都感到惊奇。他本人是在第一次流放期间结的婚，生了两个孩子，在一家县级报纸当记者，以后又在乡里当文书，按时收到生活富裕的双亲寄来的汇款。

俄国在革命初期，以后又在 20 年代末和 30 年代采取阶级分析方法，其残酷性不仅出乎欧洲的意料，而且与俄国的习俗也是格格不入的。马克思主义关于小资产阶级在历史上自行消亡的思想，在我国条件下变成“打击富农”的口号，

然后又变成“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

我国人民非常不幸，不仅成年人相信这类口号，而且孩子们也相信。残酷的国内战争从精神上损害了孩子们，他们模仿成年人的极端主义。例如，安德列·普拉东诺夫的小说《地槽》中丧失理智的纳斯坚卡认为，对富农一定要格杀不论。文学家 A. K. 维诺格拉多夫写信给高尔基说：“当两个小孩，是一位钳工先进生产者的孩子，以自己的一个同学是医生的儿子和阶级敌人为理由，把他推到电车底下去的时候，那么这就意味着，在这个家庭里，起作用的远不是人的本性。”

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就是在这种环境中，在这种精神和政治形势下，提出了关于农民在任何条件下都具有有害的小资产阶级性的公设，而后来在 30 年代斯大林把这个公设奉为经典。这一公设可以看作是斯大林主义的根源之一。

毫无疑问，斯大林主义的基础是这位领袖对颠扑不破的社会规律的藐视，是他的极端主义，是他以为可以迫使人们去做不可能的、永远办不到的事情的信念。除此以外，还有他对过去的藐视和否定，其中包括关于必须扬弃资产阶级文化的公设。

关于最后一点已经有不少人谈到了并写了许多文章，我只想指出以下情况：“扬弃”资产阶级文化的思想和政策还产生了至今仍然热中的对查禁的热情，促使产生了非常顽固的幻想：封锁一切“不纯的东西”，破除旧文化的残余的同时也就是在立，所以是一项非常有益的甚至是伟大的工作。

现在简单来谈一谈对过去的否定这种斯大林主义的特点是怎么回事。这种观点必然会产生是由于相信有可能建成纯

粹的社会主义，相信历史正在向理想的、没有矛盾的境界前进，到那时肮脏的旧生活将彻底绝迹，人的整个身心都非常纯洁。到那时一切都是新的，与旧的完全不同。我以为，这一点与 B. 弗罗洛夫在《别无选择》文集中所说的没有任何矛盾，他说苏联社会接受的教育是对人的纯洁的信念，是最具睿智卓识的人提出来的原理，但这个社会却为一帮狂热的权欲熏心之徒开绿灯，听凭他们对人民犯下极其严重的罪行。

反过来，对人是纯洁的思想的信念，恰恰使我国人民上当受骗，这种信念变成了全国性的自相残杀的政策。人民在 30 年代所受到的地狱般的痛苦，只能用某种极其特殊的东西，例如用建立别国从来没有过的制度的诱惑来为其辩解。如果作家亚历山大·普罗汉诺夫以及化学家尼娜·安德列耶娃至今还相信：我们的贫穷，我们的混乱，我们商店柜台中商品匮乏，我们的医院水平低下和计算机质量不好——这都是我们建设“独具一格的经济”所必然要付出的正当代价，而且他们谈起这一点是很认真的，那些曾经建立过真正功勋即推翻了地主和资本家王国的人，为什么不能相信可以建立独一无二的经济，可以培养出新的纯洁的人的奇迹呢？这就是历史给我们设计的陷阱。人们真诚地相信，我们是特殊的人民，特殊的国家，我们国家的建立是为了完成非凡的事业，创造奇迹，是为了“使童话变为现实”。而斯大林就是巧妙地利用了这种信念，利用了完成革命奇迹的人们的这种自命不凡。

充分认识斯大林主义并与之作斗争的复杂性大概还在于：斯大林主义就其本性来说，是同政治积极性、革命的社会主义的文化修养这些最深刻的基调有关的。为什么我国知识分子（不仅是革命的知识分子）这样轻易地容忍了斯大林

对农民施行的暴力，对30年代初剥夺富农和饥荒这些惨剧没有一点反应呢？为什么我国知识分子确信人民生活得很好？！我以为，因为我国知识分子把这一切都看成是建设纯粹的未来社会所必然要付出的代价，他们真心实意地相信我国历史在沿着唯一正确的方向前进。斯大林之所以被人们接受，正是靠着他对新社会的向往，他对可以建成独一无二的，既没有贸易、也没有农民，既没有小铺老板、也没有小市民的社会的信念。

我冒昧地认为，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斯大林比曾号召学会经商和获得利润的列宁更容易被大多数党的积极分子，大多数新的苏联知识分子所接受。列宁晚年放弃了对纯粹社会主义的幼稚信念，这使党的大多数理论家感到非常失望。正是列宁认为这一极其抽象的向往“没有一点旧东西”的新社会的愿望，是革命意识的典型的错误。

而斯大林则相反，他坚持到底，不作任何妥协。他号召进行残酷的阶级斗争，按照“谁战胜谁”的原则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而列宁对幼稚而浪漫主义的关于纯粹社会主义的批评，大多数党员则没有听进去，而“各种人民力量”联合的思想本身，也没有为党的积极分子的意识所接受。这大概就是为什么斯大林轻而易举地战胜了全党喜欢的人物布哈林的原因。布哈林的个人悲剧在于，他是少数几个认真对待列宁关于“用非共产主义的人建设共产主义”的号召的人（李可夫、托姆斯基、捷尔任斯基、布哈林）中的一个。

不过，当时许多人想要由纯洁的人来建设他们的纯洁的光明的未来。这一点不值得大惊小怪，因为即使今天，在关于纯粹无产阶级的、“非市侩的”、“没有贸易”、“没有市场

的”社会主义的理想成为 30 年代的启示录以后，我国知识分子中许多宣称仍然忠于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代表仍然确信，在我们彻底摧毁农民的“我们”的残余之前，我国不可能建成民主的社会主义。

对纯洁的人的信念，对因袭生活陈规旧习、忙于家务、斤斤计较的人的厌恶——这种现象不是新的。作家费多尔·阿布拉莫夫不止一次地说过，我们从共产主义的个性的理想的高度来评价苏联人、农民、劳动者，这种习惯往往是不公正的。这些人支撑着国家，顽强地、一往无前地艰苦奋斗。而我们不去颂扬他们，却有意地贬低他们。俄国哲学家谢·尼·布尔加柯夫早就警告说，对改造世界和人的心灵这一奇迹的信念，会导致产生“对普通人颐指气使的精神贵族的独特变种”。这位思想家写道：“知识分子把为人民服务当作自己的任务。知识分子在对待人民的态度问题上，经常不可避免地动摇于两个极端之间——不是对人民顶礼膜拜，就是成了精神贵族。这种或那种形式的对人民的顶礼膜拜（不管是赫尔岑开创并以对俄罗斯人民具有社会主义精神的信念为依据的旧民粹主义，还是把同样的品质赋予一部分人民而不是全体人民的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这是来自知识分子信念最深处的需要。而同样从这种信念中必然产生相反的东西——睥睨人民，把人民看作需要拯救的对象、需要保姆来培养“觉悟”的未成年者、知识分子所说的没有开化的人。”

如果在上层，而首先是在党内，在党的积极分子中间，在青年积极分子中间，没有流行对纯洁的人的信念，那么，斯大林永远都不可能实行强制的全盘集体化，不可能极其迅速地摧毁农民的即俄国人民的生活习惯。问题还在于：越是用

关于人民的浪漫主义概念的精神（恰好与卢梭的理想相一致），越是用关于未来、关于社会主义的空想概念的精神来教育我们的社会，特别是青年，斯大林经济冒险主义的基础就越加巩固，扎得越深，对这些落后的、仍然是“不纯洁的”人民施行暴力就越容易找到解释的理由。

对人的新个性的信念加强了对一切传统的、民族的东西的厌恶。这种信念只能把人推向左倾冒进，推向对健全理性以至对生活施行暴力。这种信念支持了睿智卓识的人物。这种信念加强了对斯大林建立独具一格、“独一无二的”社会的尝试的颂扬，因而丝毫不加批判。

一般地说，很难解释：为什么共产党人，不仅是我国的共产党人，崇尚卢梭的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关于人的本性的观点呢？马克思和恩格斯尽管接受的是启蒙时代思想的教育，但他们始终是辩证论者。他们同卢梭不同，批判地对待人的本性，认为人身上的种种因素、本能、七情八欲是十分矛盾的。恩格斯写道：“……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或人性的程度上的差异。”^①

对于人的这种观点并不是原罪思想的重复，但它却像基督教一样，促使对人的本性作出清醒的评价，认识道德教育问题的尖锐性，促使对文明社会在制约人的个人主义天性方面所学到的一切作出评价。由此还产生了较之我们对待全人类道德、一般道德准则更为严肃的另一种教条主义态度，即认为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道德方面的本能可能导致极为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40页。

可怕的后果。

而我们，由于忽视人的本性，忽视人的矛盾的本质，就使自己不可能严肃地、在理解人的因素的情况下解决组织和刺激劳动的问题，就无法认识任何政权的本质。把人的本质理想化，不仅不能加强我国社会中的道德氛围，相反，却加以破坏，因为这种理想化导致对天然的制约机制的藐视，使蛊惑分子和伪君子得以践踏普通的圣经准则，嘲弄那些讲良心、正派和品行的人。

原载《科学与生活》杂志 1988 年第 12 期

（刘彦章摘译）

集体化是怎么回事

B. H. 达尼洛夫和 H. B. 捷普
措夫口述，A. 伊利因记录整理

农业集体化和党的 第十五次代表大会

几十年来，我们一直坚信，集体化是继十月革命之后在我国发生的又一次伟大的革命，它标志着我国的基本居民——农民向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集体化消除了农村产生阶级分化和资本主义剥削的最后根源和渠道；集体化还为建立工业、巩固国防、促进整个社会的社会进步和文化进步动员了物力和人力。而集体农庄和集体农庄庄员也确实经受住了战争的考验，为伟大的胜利做出了无法估量的贡献。然而这种官方的评价对许多问题都避而不谈。例如，集体化和消灭富农是在一味加快速度的情况下进行的。对农民的暴力行为导致许多人丧生。又如在集体化和消灭富农过程中，农业生产中一些最重要的要素遭到极严重的破坏（牲畜头数减少一半等等）。至今还有人相信斯大林的陈词滥调：似乎是1927年召开的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宣布了“集体化的方针”。实际上这次代表大会讲的是如何发展各种形式的合作

社，是“在新技术（电气化）的基础上”逐步过渡到集体耕作，而不是在集体化的基础上过渡到机械化。这次代表大会既没有规定农户合作化的期限，也没有为之规定唯一的形式和方法，而是要求采取多种措施，促进千百万农户的生产发展，增加他们的商品产量，把他们吸引到社会主义的轨道上来，因为在我国，巩固的农业合作社体系当时正在逐步形成（到1927年合作社已经联合了1/3的农户）。与这个体系并存的还有同样发达的消费合作社体系和不断发展的手工业合作社体系。它们共占城乡之间商品流转的2/3以上，从而保证了农民经济和社会主义工业之间牢固的经济联系（“结合”）。

同样，代表大会关于采取向富农进攻的政策决定，是指不断限制富农经济的剥削能力和趋向，采取经济手段积极排挤富农经济，而不是采取促使其破产或强制地把它消灭的办法。有关向城乡资本主义成分进攻的任务，代表大会在表述上是非常审慎的：保证相对地缩小按绝对量来说“正在增长”的资本主义成分。

总之，绝不能称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为“农业集体化的代表大会”。这个问题虽然在代表大会工作中占有重要位置，但只是我国需要提出并加以解决的一大堆问题中的一个。

1927年底的粮食收购 危机与“非常措施”

以往，1927年底发生的粮食收购危机被认为是说明“集体化方针”正确并且必须加速实现这一方针的最有说服力的

证明。我们觉得情况要复杂得多。20年代农民经济的发展确实是明显的。这证明，实行土地国有化以及把农民从地主的压迫和大资本家的剥削下解放出来效果显著，也证明了新经济政策的效力。在严重的经济破坏之后，农民用了3—4年就恢复了农业。然而在1925—1929年间粮食生产一直徘徊在比战前稍高一点的水平上，而这对于一个走上了工业化道路的国家来说不能不成为问题。经济作物的生产增长不大，而且不够稳定。牲畜头数增长的速度是令人鼓舞的：从1925年至1928年，大约以每年百分之五的速度递增。总之，小农经济绝没有丧失其发展潜力。但是，从国家工业化的需要来看，这种潜力当然是有限的。

1927年底发生的粮食收购危机是市场波动造成的。上一年，即1926年是收购粮食的好年景。这一年粮食丰收，其他作物减产。1927年正相反，收获的粮食减少4500万公担，而经济作物的产量则有明显的增长。市场的行情促使农民，首先是富裕农民，特别是富农，还有部分中农，把粮食存起来，靠出售经济作物和畜产品来解决自己的商品货币问题。

国家粮食收购的减少对工业建设计划构成了威胁，使经济形势复杂起来，也加剧了城乡的社会冲突。类似的粮食收购“危机”1925年冬也发生过，当时正在开展的工业建设规模也因此不得不有所收缩。可是到了1926年，农业丰收，粮食产量显著增长，弥补上一年计划的亏空绰绰有余，从而保证了工业能够真正高速发展。1927年，工业生产的规模就已超过战前的水平的23.7%。

在粮食收购运动中出现了进入市场的粮食不足及粮价因此暴涨的现象。贫农户和力量单薄的中农户在这之前就卖了

自己的“商品”粮（农村中的这两个阶层秋天被迫低价卖出粮食，春天再以高价买入）。在实现粮食出口和供应计划方面出现了困难。

1928年初，形势变得极其复杂，这就要求谨慎从事。然而刚刚在政治领导层中获得多数支持的斯大林集团，既没有处理国务的才智，也不懂得列宁主义对待农民这个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同盟者的政策原则。地方党的领导人接到斯大林签署的带有威胁性的指示，要求“发挥各级党组织的主动性”，并且告诉它们收购工作是全党的事情，今后在农村实际工作中“把同富农危险作斗争的任务当作工作重点”。从国内战争以来，党中央对党的干部和党的组织从来没有用过这样严厉的措辞。

1928年1—2月斯大林的西伯利亚之行在同富农的危险作斗争中起到了定调的作用。在这次视察过程中，有数十名地方干部由于“手软”、“调和”、同富农“勾结”等等原因被撤职、受处分，甚至被开除党籍。撤换党的、苏维埃的、司法和经济部门的干部的浪潮席卷了所有地区。1928年1—3月，乌拉尔有1157名专区、区和村级机构的干部被撤职。已经开始关闭市场、对农民挨户搜查，不仅把中农户中囤积粮食投机倒把的人，而且把中农户中有少量余粮的人也送上法庭，法庭则作出千篇一律的判决：不管是商品粮，还是生产用粮和生活用粮都一概没收。没收农具的事也频频发生。1928年冬春之交农村中的胡作非为和暴力行为频频发生。甚至发展到实行行政拘留和由法庭判处监禁，“动起手来”、进行肉体摧残的现象也屡见不鲜。最后是用俄罗斯联邦刑法第58条第10款（关于反革命鼓动）来对付那些胆敢公开指责暴力行

为的人。

另外，根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阿·谢·基谢廖夫1928年3月26日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联共（布）党团会议上作的报告就能推断出农村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只摘引几个最典型的段落：“……所采取的这些强制措施和行政压力措施，在我们看来，完全破坏了农民的情绪。”“近来，由于拿走农民的粮食，农村的反苏维埃情绪增长了。如果只拿走富农的粮食也还无所谓，问题是把中农和贫农的粮食都拿走了。”“在北高加索，为加强粮食收购工作而成立了特别三人小组……因为三人小组被授予逮捕权，所以对没有执行他们命令的农民可以逮捕。”“沃罗涅日省博古恰尔劳动改造院的一伙被监禁的犯人写道，他们中的许多人被剥夺，连种子都没剩下，有些人因被没收的粮食超过了自己现有的粮食，因此不得不以钱抵粮，‘春天即将到来，是播种的时候了，而我们却在监狱里受煎熬。’他们请求释放。”基谢廖夫最后确认，“由于播种工作的开展，农民的情绪很坏，农村甚至出现了要减少播种面积的想法（只为自己播种）”。“农民说，难道我们又要搞战时共产主义了吗？他们请求报纸作出解释，他们请求政府给一颗定心丸，并告诉他们今后怎么办。”

在后来的粮食收购运动中，尤其是1929年春天，开始更加普遍、更加强硬地采取“非常”措施。地方组织在无法完成任务的压力下，开始挨户搜查和大肆逮捕。这些做法激起了农民的公开抗议甚至武装暴动。1929年立案的“富农”暴动就达1300起。

违背列宁的原则

这里产生了一个问题：是否有另外的出路来摆脱 20 年代末的经济困境？道路是怎样选择的？为什么把对农民采取高压政策提到首位？

分析粮食收购中发生的危机及克服危机的办法是 1928 年联共（布）中央四月和七月两次全会的中心议题。在这两次全会上，斯大林和布哈林的立场、他们提出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存在着根本的分歧。斯大林认为，粮食收购危机是由于“富农罢工”造成的，是由于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发展起来并得到巩固的富农反对苏维埃政权的行动引起的。他说，“我们有国内敌人，也有国外敌人”，克服困难的办法就是要无情地消灭敌人，首先是消灭富农。

布哈林在分析同样的现象时则特别强调政权机关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他说：“最主要的经济杠杆操在我们手中，从国内情况看，如果我们不犯错误，掌握了这些杠杆我们就能无往而不胜。富农之所以成为危险的力量，首先是因为他们利用了我们的错误。”布哈林和李可夫等人提出，采用新经济政策的办法，放弃“非常”措施，继续发展农民经济，发展商业信贷合作社，提高粮价等，在客观和主观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和农业社会主义合作化，保持并完善新经济政策时期形成的经济机制。

此外苏联第一个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计划（1928/29—1932/33 年）规定的方案也很重要。这一计划经 1929 年 4 月党的第十六次代表会议同意并于同年 5 月由苏维埃第五次代

表大会通过。计划规定要沿着国家工业化道路迈出巨大的步子。同时，农村的合作化进程也会得到强有力的推动：到五年计划末要使 85% 的农户参加各种形式的农业合作社，预计其中的 18—20% 的农户要被吸收到集体农庄中来。还计划采取实际措施来发展“个体成分”即大多数小农户的生产。

1929 年底道路终于选定了，这首先表现在把布哈林等人的建议斥之为向富农让步，把布哈林集团说成是右倾机会主义集团并在党中央十一月全会上把他们排除在政治领导层之外。其次，第一个五年计划事实上被放弃了：再三斟酌过的、相互关联的任务被任意修改、扩大，丝毫不考虑实际情况和可能，不考虑客观规律。一场疯狂轻率的“争速度”的竞赛开始了。这根本违背了列宁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公开放弃列宁的合作社计划。

现在有人写文章说，20 年代末斯大林接过了托洛茨基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构想，甚至说他“比托洛茨基还要托洛茨基”。

这类见解的广为流传很说明问题。这是斯大林死后思想界流行的一个旧观点：企图把对农民实行暴力、建立具有镇压机制的政权以及许多其他事情的责任从斯大林领导集团（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奥尔忠尼启则、古比雪夫、米高扬、安德列耶夫等人）身上推给托洛茨基和整个“左派”。然而，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极左构想——尽管这种构想是非常要不得的——与斯大林的实践之间有着原则差别。“左派”毕竟试图了解某些最大限度加速发展国家工业化的客观条件和手段并使它们发挥作用，这是他们寻找解决过渡时期社会经济问题方法的基础。所以我们不能抹杀斯大林一伙

对农民群众进行强力剥夺的发明权。

下面我们来看看农村中发生的“伟大转变”的实际内容。

努力发展各种形式的合作社的政策变成“集体化的方针”是在粮食收购过程中开始的，而且是与粮食收购直接有关的。继1928年2月13日斯大林发出要求“各级党的组织积极行动起来”，消除粮食收购危机的指示以后，各地又收到了中央书记莫洛托夫1928年3月1日签署的《关于春季播种运动》的通告信。通告信中宣布，“对地方党组织在播种运动中的全部工作的评价将取决于它们在扩大播种面积和增加集体化农户方面取得的成就”。

国家对集体农庄的帮助越来越多，如提供贷款，供应机器和农具，拨给好地，税收上给予优惠等。党、苏维埃和合作社组织积极开展集体农庄的工作。集体农庄的数量在1927年6月是14 800个，到1929年6月已增加到57 000个，集体农庄联合的农户的比重由0.8%增加到3.7%。当时集体农庄是由贫农中最有觉悟的人建立起来的，大体上是在自愿的基础上建立的。然而在那时已经存在从上边搞官僚主义包办的现象，如“摊派”任务，“搞突击运动”、答应提供技术、提供农艺帮助等等无法兑现的诺言。从1928年春天起加速组建集体农庄的进程越来越公开化，并且愈演愈烈。1929年夏天，提出了对整个整个专区的农户实行“全盘集体化”的口号（下伏尔加边疆区的霍皮奥尔专区最先开始）。

不顾一切的加速集体化的倾向反映了斯大林及其周围的人的立场。采取这种立场的基本点是不考虑农民的情绪，对农民没有放弃小私有经济的准备和愿望视而不见。斯大林1929年11月7日发表的《大转变的一年》一文是加速集体化

的“理论”根据。文章断言，基本的中等农民群众都加入了集体农庄、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事实上，当时加入集体农庄的只占农户总数的6—7%，而且贫农占农村人口的1/3以上）。

是胜利……“冲昏头脑”吗？

1929年联共（布）中央十一月全会迈出了加紧进行“集体化速度”方面竞赛的第二步。“全盘集体化”的任务已经“摆在一些州”的面前。中央委员们的报告，地方上发出的关于在组织集体农庄过程中发生操之过急甚至强迫现象的信号，都没有引起注意。例如，斯·维·柯秀尔报告了乌克兰发生的“几十起过火行为”。他说：“我们那里发生过好几起这样的事件，即整批的村庄都转入集体农庄，可是后来都垮掉了，村民们敲着鼓把我们赶了出来。有数十个村子实现了全盘集体化，可后来发现，这些都是虚假的。”

全会上宣读了全苏集体农庄管理委员会霍皮奥尔专区分委员会主席巴拉诺夫的信。信中说：“地方机关都在以突击搞运动的方式进行工作。整个组建集体农庄的工作都是在‘看谁最多！’这样的口号下进行的。在各地，专区的指示有时一下子变成了如下的口号：‘谁不加入集体农庄，谁就是苏维埃政权的敌人！’”

由于这些原因，结果就出现了形式上有60%的农户加入集体农庄的现象，在我写信的时候可能有70%的农户集体化了……如果现在再不采取措施巩固这些集体农庄，就会破坏

集体农庄的名声。集体农庄就会垮掉。必须注意的是，在专区里正在竞相抛售牲畜……”

这封信描述的几乎全部情景，两三个月后差不多在各地都先后出现。

北高加索，伏尔加河下游及乌克兰等地党组织的领导者开始“保证”“在一年至一年半内”，即到1931年夏天实现集体化。但是，就是他们的这些“保证”也被认为是不够的。请看莫洛托夫是怎样说的：“我们有理由说，而我自己对此也深信不疑，1930年夏天我们基本上能完成北高加索的集体化。而下一个秋天我们大概能够说，基本上完成集体化的不仅仅是北高加索。”他还说：“在现在的条件下还谈五年实现集体化，已经完全没有必要。对主要的农业区和州来说，尽管它们实行集体化的速度有很大差别，但现在应该想的不是五年实现集体化，而是在下一年。”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集体化问题委员会（委员会由一些边疆区、州党组织领导人和中央管理机构的领导人组成）的建议，是一次以理智的态度分析业已形成的局势的尝试。

当然，委员会要以联共（布）中央十一月全会的方针为依据。但是，该委员会所制定的决议草案则建议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完成“绝大多数农户”集体化的任务，在主要产粮地区用2—3年的时间，在粮食不能自给地区用3—4年时间。在经济落后的少数民族共和国集体化要推迟到第二个五年计划。委员会建议把农业组合作为集体农庄建设的主要形式，在劳动组合中，“基本生产资料（土地、农具、役畜以及商品食用畜）归集体所有，同时保留农民对满足其家庭消费所需要的小农具、小牲口、奶牛等等的私有权”。委员会还提

出在集体农庄中建立公积金和流动资金的具体原则和方法等等。遗憾的是，连这些根据农村实际经验和对农村现状起码的了解而提出的建议也被置之不顾。农村的全盘集体化已在全速进行。

整个过程是这样的。

根据政治局委员会的建议，联共（布）中央于1930年1月5日通过《关于集体化的速度和国家帮助集体农庄建设的办法》的决议。正像委员会所建议的，产粮区按其完成集体化的期限分为两类地区。但是，斯大林自己提出修改意见，大大缩短了期限。北高加索、伏尔加河中下游大体上要“在1930年秋天或者最迟要在1931年春天”完成集体化。而其他产粮区要在“1931年秋天或者最迟到1932年春天”完成集体化，如此缩短期限并号召“在组建集体农庄方面开展社会主义竞赛”，是与不允许“从上边给集体化运动颁布“任何命令”的指示完全抵触的。尽管决议说明劳动组合是集体农庄“最普遍的”形式，但充其量也只是“向公社过渡”的形式。决议没有采纳关于牲畜和农具逐步公有化和建立公积金等等的建议。就连1930年公布的农业劳动组合示范章程也没有采纳关于这些问题的建议。

在上面的强大压力下，不仅在先进的产粮地区，而且在中部黑土地地区及莫斯科州，甚至在东部各共和国也决定“在1930年春季播种运动期间”完成集体化。粗暴的压力、威胁和笼络人心的许诺代替了应在群众中进行的解释工作和组织工作。不仅开始没收富农的财产，而且连那些不愿加入集体农庄的中农也被没收了财产。在许多地区“被没收财产的人”占农户的10—15%，“被剥夺公民权的人（被剥夺选举权

的人)”占农民总数的15—20%。在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化时发生了严重的歪曲政策的现象。土地共耕社按照行政的方式转而采用劳动组合和公社的章程，在劳动组合中也实行了最大限度的公有化——唯一的一头奶牛、小牲畜和家禽都归公了。

集体化的水平急剧提高：到1930年1月初，有20%以上的农户加入集体农庄，而到3月初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户超过50%。当然其中不少是“虚假的”。由于指示脱离实际，而不执行指示要受到威胁，加之报纸上的大吹大擂，使得许多地方干部不得不走上弄虚作假的道路。农民则普遍不满，公开抗议，直至举行反苏维埃的武装暴动。从1930年1月初至3月中旬，立案的反苏维埃的武装暴动就有2000余起。迫害共产党员和集体农庄积极分子的事件有增无减。宰杀牲畜已经成为普遍现象。

当时真正热中于集体化的是贫农和部分中农，没有他们的积极支持，不论是集体化还是消灭富农都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是，就连最坚决拥护集体农业的人也不能理解和接受1929年冬在农村肆虐的官僚主义暴力行为。

在全盘集体化第一阶段农村中发生的事尽人皆知，当然斯大林及其周围的人也都知道。姑且不谈党和国家正常的新闻渠道，仅在秋冬两个季节从农村写给斯大林和加里宁的控诉、抗议信就有九万封，这些信陈述了农村发生的种种荒唐事。然而对地方组织的压力仍在加码。1930年2月3日，即对农民的强制到了极点时，《真理报》根据斯大林的指示发表一篇社论，声称：“最近作出的在1930—1931年75%的贫农中农户实现集体化的规划还不是上限”。斯大林在1930年2月10日发表的《答斯维尔德洛夫大学学生同志们》的信中要

求“加强没有全盘集体化的地区的集体化工作”，以此作为同富农户的自我消灭和“糟蹋”财产进行斗争的手段。

可是，在1930年2月下半月，党中央就发出指示：组建集体农庄时要避免仓促行事，在那些还没有开始全盘集体化的地区停止没收富农的财产，在各少数民族共和国必须考虑到当地的条件。3月2日《真理报》发表了重新修订的农业劳动组合示范章程，修订稿考虑到了农民的实际情况和情绪（尽管不像政治局委员会原先在草案中建议的那样彻底）。

这一天《真理报》还刊登了斯大林的《胜利冲昏头脑》一文。文章谴责了过火行为，强调集体化必须遵循自愿原则。同时也把集体化过程中出现“偏差”的全部责任推到被指责为“鲁莽”的地方干部身上。然而，截止到2月20日50%的农户实现了集体化这件事，在这篇文章中则被称之为说明“农村向社会主义的根本转变……已经有保障了”的成就。地方工作者的任务是：“巩固既得的胜利，有计划地利用这些胜利以求进一步的前进。”这就使人难以捉摸：究竟应该做什么，是改变当时的现状还是巩固它？

地方组织和集体农庄建设的积极分子被置于非常困难的境地。其中许多人遭到严厉的惩罚，直至法律制裁。而实施这些惩罚的就是那些亲自搞起集体化速度竞赛的人和机构。因此，1930年5—6月筹备召开党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时，在党的基层组织的会议上，许多共产党员尖锐地批评斯大林的集体化政策，批评斯大林从上面对农民施加压力的政策，批评斯大林在评价出现错误和过火行为的原因时不够诚实。1930年6月9日《真理报》刊登的工人马马耶夫《给党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信》最能说明党员的情绪。他在信中勇敢

地提出，“究竟是谁的头脑昏了？”并说，“决议和实际是南辕北辙。应该讲出自己的毛病，而不要以此来教训基层党员群众。”

马马耶夫和其他当时公开批评斯大林一伙的共产党员被公然指责为“反对党内制度和中央的领导”，被斥责为右倾分子并被开除出党。

1930年3—4月，联共（布）中央通过了一系列重要文件，旨在克服集体化中出现的偏向，使农村总的局势正常化。加入集体农庄的“涨潮”变成了退出集体农庄的“落潮”。那些“纸面上的”和强行建立的集体农庄销声匿迹了。农民退出集体农庄的“落潮”持续到1930年8月，这时集体农庄联合的农户占全体农户的21.4%。这个数字表明，相当一部分农民把自己的命运同集体农庄连在一起了，集体农庄的巩固和发展能够也应该成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决定性因素。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任务也正是规定要把18—20%的农户联合到集体农庄中来。这表明，“速度竞赛”除了危害以外，一无所得。

进入全盘集体化时期

1930年8月之后，最初至少纠正了一些问题。开始较积极地使用经济杠杆。主要通过建立国营机器拖拉机站扩大了农业技术改造的规模。1931年共建立了1040个机器拖拉机站。农业劳动的机械化程度明显提高了。对农民的生产资料公有化的过程进行了整顿。1932年3月26日中央作出决定，责成各级地方组织不仅要停止强迫实行牲畜公有化，而且要

帮助集体农庄庄员买进役畜。

国家在 1930 年给予集体农庄巨大帮助，在税收方面向它们提供了许多优惠。然而，对个体农民的农业税却增加了，对他们单独征收一次交齐的税。必须向国家交售的粮食量同样也增加了。

1930 年 12 月举行的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在农业方面，“在五年计划的头两年，我们已经超额完成整个五年计划规定的任务的一倍”，由于“在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和在全盘集体化基础上消灭了富农阶级”，甚至“基本上”解决了粮食问题（?!）。在这里丝毫没有提到上一年冬天的教训。《关于 1931 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定，规定了在全国各类地区实现集体化的控制数字。北高加索、伏尔加河中下游、乌克兰草原地带等地区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户应“不少于 80%”，中央黑土地地区、西伯利亚、乌拉尔、乌克兰森林草原地带、哈萨克斯坦产粮区必须“保证使 50% 的农户集体化”。“粮食不能自给地区”要保证使 20—25% 的农户加入集体农庄。而在全苏联“至少要有一半农户”实行集体化。而且斯大林在给东西伯利亚边疆区区委书记 Ф. Г. 列昂诺夫的电报（1931 年 3 月）中还指出，“不仅不要禁止，相反要鼓励‘地方组织’超额完成任务。”总之，集体化的任务确实完成了，甚至超额完成了：到 1931 年 6 月全国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户已达 52.7%。

1932 年被宣布为“完成全盘集体化的一年”。不过，“基本”完成集体化的标准有所降低，68—70% 的农户加入集体农庄。到秋天，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户达到 62.4%。这样大规模的集体经济便成为我国经济 and 整个社会制度的基础之一。

依靠贫农

对于贫农和大部分是在 1932 年秋天加入集体农庄的中农来说集体化意味着什么呢？

看来首先应该说明在集体化以前农村阶级划分的情况。根据苏联人民委员会税收委员会的统计，1927 年在全体农户中富农户占 3.9%，中农户占 62.7%，贫农户占 22.1%，无产者占 11.3%。正如我们看到的，中农是主要的一部分，贫雇农占 1/3。

贫雇农的特点是，他们没有马，因此即使有土地，也无法独立生产，他们几乎完全依附于农村富裕阶层，特别是富农。“在自由的土地上做自由的主人”的亲身经验告诉他们，单枪匹马地摆脱贫困和奴役地位是不现实的。他们看到，自己的出路在于联合起来。因此他们也就成了积极支持全盘集体化和消灭富农的社会力量。

中农的态度比较复杂和矛盾。他们的生活条件和劳动条件也相当艰难。但是向集体经营形式的过渡意味着彻底摧毁他们已习惯了的生活方式，因此，他们的怀疑和犹豫是不可避免的。在迈出这一步之前，他们想亲眼看到证明集体农庄优越性的明显的实际例证，想得到根据自己的利益，不受强制地建设新生活方式的条件。在这些条件下中农自愿作出选择。

同时，必须考虑到在革命后的年代里，农民作为一个阶级发生了根本变化。现在，劳动农民把苏维埃政权看作是自

己的政权，他们成了工人阶级的真正同盟军。如果依靠贫农，彻底贯彻列宁关于联合中农反对富农的路线是可以避免 20 年代末 30 年代初出现的过火行为的。

现在来看看在苏维埃政权的头几年，在新经济政策时期以及后来的全盘集体化时期，对富农执行的政策。

反对富农这一剥削阶级的斗争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就已经开始了。那时候这个斗争的手段之一是没收富农的生产工具和土地，即直接用暴力剥夺富农的（全部或部分）生产资料。但是，即使在革命和国内战争时期（那时农村中的阶级斗争往往达到武装冲突的地步），富农进入新社会的大门没有关闭，更不用说在新经济政策时期了。富农有权加入各种类型的农业合作社，包括集体农庄在内。当然也有限制：富农不能创办合作社并被选入管理委员会。

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富农户增多了。在 1927 年达到革命后的最高数额，已接近 90 万户。但是这一过程受到国家的严格控制，国家执行的是限制和排挤富农剥削趋向的政策。

1928—1929 年间富农户数锐减。这是在粮食收购期间采取非常措施和没收富农粮食储备及部分生产资料的结果。他们当中有许多人被指控为投机者。1928—1929 年对富农采取的没收多余土地，强迫赎买拖拉机和复杂机器，削减以至最后停止提供贷款和生产资料，加重税收等等措施——这一切动摇了富农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征收相当于全年收入，有时甚至超过全年收入的个人经营税，直接导致富农经济的破产。他们开始缩小生产规模，出卖牲畜、农具和农业机器。一些富农举家迁往城市和工业区。根据苏联中央统计局的统计，俄罗斯联邦富农户所占的比例从 1927 年的 3.9% 减少到

1929年的2.2%，乌克兰则从3.8%减少到1.4%。到1929年秋天富农户的总和所占的比例大约不超过2.5—3%，总数为60—70万户。

1929年夏天通过的关于禁止富农家庭加入集体农庄的决定使农村的局势和整个事件过程急剧尖锐化。这很快就导致富农与全体农民的彻底分裂和对抗，激起了极大的仇恨情绪，使富农的反抗愈演愈烈。没收富农财产的做法也波及到相当大一部分中农。

1929年12月27日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土地问题专家的学术讨论会上宣布转入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1930年1月11日《真理报》发表了《消灭富农阶级已提上日程》的社论。社论号召“向富农宣战，同它作殊死斗争，最终彻底消灭富农”。

1930年1月15日委托以莫洛托夫为主席的政治局专门委员会制定实施这一政策的具体措施和方法。1月30日政治局批准了联共（布）中央《关于在全盘集体化地区消灭富农经济的措施》的决议。规定没收富农的生产资料、牲畜、生产用房和住房、农产品加工企业及种子储备。家庭财产和建筑物被当作贫雇农的股金纳入集体农庄的公积金，部分生产资料用来抵偿富农欠国家和合作社的债务。

被剥夺的富农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积极从事反革命活动的人”，即反苏、反集体农庄活动的参加者（本人被逮捕，家属被驱逐到国内边远地区）。第二类是积极反对集体化的“大富农和过去的半地主”（本人及家属被驱逐到边远地区）。最后，第三类是“其余的富农分子”（他们被安排在原居住地区某一专门指定的村落）。

决议规定，每个地区被剥夺的富农的户数不得超过全体农户的3—5%。这仍然比1930年冬天前保留下来的富农户数多得多。决议规定了在全盘集体化地区（北高加索、伏尔加河中下游、中央黑土地地区、乌拉尔、西伯利亚、乌克兰、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应驱逐到国内边远地区去的富农户的“限额”：第一类6万户，第二类15万户。2月25日又规定了列宁格勒地区、西部地区、莫斯科地区、伊万诺沃工业区、下诺夫哥罗德周围地区被剥夺的富农的“限额”：第一类1.7万户，第二类1.5万户。

“从快审理”

地方干部确实错误严重，他们有时过于“主动”，胡乱威胁，直接施加暴力。但是也不能不看到的是上面提到的斯大林冬天的西伯利亚之行给这些过火行为定下了调子。1928年1月4日的指令首先对粮价上涨问题作了如下说明，“私商和富农利用我们的组织的心慈手软和疲沓拖拉破坏了粮市局面，提高粮价并使农民产生了观望情绪。”指令论证了要求采取极端措施的理由，并公开指示“拘捕投机倒把分子，富农分子和其他破坏市场和物价政策的分子”，“应该不拘泥形式、从快”审理他们。

非常措施从那时起变成了常规。国内战争和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方法不仅被用来反对富农，而且也被用来反对中农。

这一点在没收富农财产时表现得尤为突出。比如，1930年冬季第三类富农大批被划为第二类富农。到处都在努力

“超额完成”上面规定的“定额”、“控制数字”、“任务”。同时还必须注意到，从1930年春天起，问题实际上已经是消灭过去的富农户了，因为根据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2月1日的决议，富农已经被剥夺了租赁土地和剥削他人劳动的可能性。

各地掀起的农民骚乱迫使斯大林领导集团发出“紧急刹车”的信号，并采取措施来纠正最粗暴的专横的暴力行为，为一部分被剥夺的富农和错划为富农的人“恢复了名誉”。例如在库尔斯克区，8 949户被剥夺的富农中恢复名誉的有4 453户，在利戈夫区，4 487户中有2 390户恢复了名誉，占一多半。

1931年2—10月掀起了一场新的、规模最大的消灭富农户的浪潮。成立了以安德列耶夫为首的专门委员会来进行总的领导。1932年3月该委员会取消后，剥夺富农的工作仍在继续进行。它越来越多地表现为对未完成粮食征购任务、盗窃农庄产品和逃避劳动等等行为采取镇压措施……

直到1933年5月8日才向各级党组织和苏维埃组织下达了限制在农村中的镇压规模的指令。这个由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签署的文件证实，“地方上仍然有人主张强迫把富农大批迁出农村和采取严厉的镇压措施。中央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收到立即把10万户富农从各边疆区和州迁出的请求。”指令解释说，虽然“农村的阶级斗争今后也将不可避免地尖锐化”，但是旧的阶级斗争方法已经“过时了”：“由于我们在农村中所取得的成就，我们不再需要采取众所周知的不仅触及富农，而且触及个体农民和部分集体农庄庄员利益的大规模镇压措施了”。

于是便通过了“立即停止一切大规模强行迁徙农民的行为”的决定。但是，事实上这只不过是对强行迁徙的规模作了一些限制——即强行迁徙只应在“个别地区局部地”进行，“仅仅适用于那些积极反对集体农庄、破坏播种和粮食征购工作的农户”。这个指令“允许”强行迁徙 1.2 万农户，把它们“发配往”各个共和国和地区。

当时被剥夺的富农户和殃及的人数尚难确定。遗憾的是，某些作者力图夸大数字，而不顾这些数字的产生是否可靠和有根据。他们想用 1 300 万或 1 500 万的死亡人数激起读者的愤慨。在他们看来，好像“总计”400 万或 500 万这个数字还不足以谴责斯大林对农民施加的暴力。

只有被强行迁徙到国内边远地区去的农户的准确数字（即根据 1930 年 1 月 30 日决议被划入一类和二类的农户）。1930 年强行迁徙了 115 231 户，1931 年强行迁徙了 265 795 户。两年内被强行迁徙到北部、乌拉尔、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的农户共有 381 000 户。一部分富农家庭（20—25 万户）“自动实现非富农化”，即卖光或抛弃自己的家产，跑到城里或工业区去。1932 年及 1932 年后，没有搞专门的强行迁徙运动。但是当时从农村迁出的总户数也不少于 10 万户。大约有 4 045 万户（第三类）应在原居住的边疆区或州的范围内的一些村落居住，这些农户在财产被没收和受尽折磨之后，也大批离开农村到工业区和城市去了。结果，在剥夺富农的过程中消灭的农户总数大约有 100—110 万户。

1932—1933 年的饥荒

1932—1933 年在全国产粮区蔓延的饥荒在个人崇拜时期是禁区之一。

有的出版物已断言，饥荒是按照斯大林方式推行集体化的直接后果。实际上是怎么回事呢？

让我们来看一看数字与事实。1931 年和 1932 年收成与往年的平均产量相比减产并不多，不会造成饥荒的威胁。造成不幸的原因是，为了完成斯大林领导集团在 1930 年任意规定的、与五年计划背道而驰的发展工业的不现实任务，无论集体农庄还是个体农户的粮食都被强行征收了，几乎“颗粒不剩”。即使这样也没有完成任务。

为了购买工业设备需要外汇。而要得到外汇只能用粮食去交换。然而当时正值世界经济危机爆发，谷物价格急剧下跌。但是斯大林领导集团不想修改国家力所不及的工业发展“跃进方针”，仍然不断增加向国外的粮食出口。1930 年粮食产量是 83 500 万公担，可出口 4 840 万公担。1931 年粮食产量大大减少，只有 69 950 万公担，但出口的粮食却增至 5 180 万公担。许多集体农庄庄员的粮食，包括种子储备都被没收了。西伯利亚、伏尔加河流域、哈萨克斯坦、北高加索、乌克兰等地严重缺粮，有些地方开始出现饥荒。集体农庄庄员和个体农民，有时是整村整村的人背井离乡，流入城市或工业区。许多集体农庄解体了。因此在 1931 年被迫采取了一些使农村局势正常化的措施，如粮食放款和种子放款等等，以防止出现大规模的饥荒。

1932年谷物总产量为69900万公担，不过尚未收割的一部分也算在内了。当然存在着客观困难。但是主要问题不在这里。在经历了1931年的痛苦经验之后，集体农庄庄员不得不想办法设法在别处找点活干，以逃避集体农庄的劳动，因为他们对那年打下的粮食的遭遇记忆犹新，那些粮食按“流水”作业的方式，从地里送进脱粒机，不经过集体农庄谷仓，就立即被运往粮食收购点。

到1932年夏，俄罗斯乌克兰产粮地区的农村在半饥饿状态下度过了一个冬天之后元气大伤。地里的庄稼还没成熟，“理发师”便纷至沓来。她们多半是不忍看到孩子挨饿而来的妇女。她们用剪刀剪下谷穗熬粥供全家糊口（这一切通常是在夜里偷偷摸摸干的）。当收获季节来临，第一批刚打下的粮食又要被全部运往收购点的时候，“小偷小摸分子”又出现了。他们把场院的粮食装在衣兜里或藏在怀里带走。

因此，1932年8月7日通过了斯大林亲自起草的保护社会主义财产法。它规定“对盗窃集体农庄和合作社财产的人”可以采取“保护社会的最高措施——枪毙并没收全部财产作为司法制裁的手段，情节轻微一些的，剥夺自由10年以上，并没收全部财产”。对这类案件的被告不得实行大赦。这是一项践踏法制的法律，它的确切含义对于那个时代的人来说是一目了然的。它在农村被称为“五穗谷物法”，它在党内也受到谴责。

到1933年初，在不到5个月的时间里，根据该法律共有54645人被判罪，其中2110人被判处极刑，业已执行的判决大约有1000件。法官们声明，他们“难以举手……”

北高加索、伏尔加河中下游、乌克兰等地的集体农庄

1932年不能完成粮食交售任务。当有人向斯大林报告说，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奥列霍夫区的领导人允许集体农庄保留播种储备，补充保险基金库存时，斯大林发火了。1932年12月7日向各级党机关下达了一道由他签署的通令，宣布这些领导人是“欺骗党的骗子，是打着‘同意’党的总路线的旗号巧妙地推行富农政策的骗子”。他要求“立即逮捕他们，并按罪行轻重判处每个人5--10年监禁”。对其他地区在粮食收购工作中的“怠工者”也照此治罪。当时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还联名签发了一封发往斯大林格勒区的电报，要求对阻碍交售粮食的“罪犯”立即审判和处以5年，以至最好10年的监禁。

向这些地区派遣了非常委员会。如莫洛托夫被派去领导乌克兰的非常委员会。镇压成了收购粮食的手段。许多集体农庄基层党组织、有时往往还有区党组织被宣布为富农组织，区委书记和区执行委员会及集体农庄主席、机器拖拉机站站站长被宣布为怠工者和蜕化变质分子。他们被逮捕被枪决，然后在报刊上予以公布。在北高加索边疆区进行清洗的结果，有26 000名即45%的农村党员被开除出党。在庫班，整村整村的人被驱赶到国内北部地区作为对没有完成交粮任务的惩罚。

1933年4月16日米·阿·肖洛霍夫写信给斯大林，谈到了维申斯克和其他地区在收购粮食工作中使用的令人愤慨的方法。斯大林在复信中指责集体农庄庄员“怠工”，甚至向工人和红军宣布了一场“饿死他们的战争”。而对农村的灾难状况却只字不提。

行政机关的专横和暴力行为的浪潮席卷农村。后来斯大

林和莫洛托夫在上面提到过的 1933 年 5 月 8 日的指令中承认：“不仅集体农庄主席和集体农庄管委会成员抓人，而且村苏维埃主席和支部书记、区和边疆区的特派员也都在抓人。”在这种乱抓乱捕的狂热劲头的支持下，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特别是民警机关头脑发热，往往毫无根据地乱捕人。他们的行动准则是“先捕人，后调查”。指令禁止“未经法律授权的人捕人”，禁止“在审判前监禁那些犯有轻度罪行的人”。但是为时太晚才受到谴责的“疯狂的乱抓乱捕”行动本身是斯大林领导集团在 1932 年收购粮食时在农村推行的专横措施的结果。

1932 年和 1933 年之交的冬季，在我国的产粮区——乌克兰、北高加索、伏尔加河中下游、南乌拉尔、哈萨克斯坦的农村普遍发生了饥荒。出现了整村整村的人饿死的情形。

很难准确地弄清楚到底饿死了多少人。由于已经指出的原因，苏联历史人口学家暂时还拿不出科学研究著作。国外一些苏联问题专家硬说在实行农业全盘集体化时死了 1 300 万农民，其中有 700 多万人死于饥荒。但这些数字甚至在英美学术著作中也遭到了批评。根据历史学家罗伯特·戴维斯、斯蒂文·维特克罗夫特和人口学家巴巴拉·安德森、布赖恩·西尔维尔等人著作中的统计材料所作的较为客观的估计，死于饥荒的人为 300—400 万。

集体化的完成

第二个五年计划初期，农业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1933

年和1934年的谷物总产量平均为68 000万公担，是1921年以来的最低年份。但是国家的粮食收购量却高得惊人：1933年为23 300万公担，1934年为26 800万公担。由于在组织集体农庄时采取了暴力行动，实行了最大限度的牲畜公有化方针和农村遭受饥荒等等原因，畜牧业一落千丈。牛从1928年的6 010万头减少到1933年的3 350万头，猪从2 200万头减少到990万头，羊从9 730万只减少到3 290万只（1934年），马从3 210万匹减少到1 490万匹（1935年）。农村处于半饥饿状态中。

在这种情况下，1935年2月通过的新的劳动组合章程起了积极作用。它概括和确定了集体化农村中的新型关系，规定了集体农庄组织生产和进行分配的主要原则，保证集体农庄庄员个人可以经营副业。

1935—1937年农业生产开始恢复。粮食产量有所增长，牲畜总头数回升，劳动报酬得到改善。农业技术改造初见成效。1937年机器拖拉机站系统已为9/10的集体农庄服务。但是这三年生产的增长还不足以弥补前两年的损失。

至于个体农民的集体化问题，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开始时这种农户约有900万户，由于1932—1933年事件的干扰，个体农户的集体化实际上已停止了。在党内普遍存在着必须认真修改农村政策，特别是修改集体农庄建设方面的政策的意见，比如：有人提议扩大集体农庄庄员的个人副业（扩大宅旁自留地，允许庄员饲养两头母牛等等），鼓励个体经济的发展。

但是1934年6月2日联共（布）中央召开了讨论集体化问题的会议，斯大林在会上讲了话。他宣布集体化的新阶段

即最后阶段开始了。提出通过增税和限制土地利用等等办法转入对个体经济的“进攻”。1934年8—9月提高了个体农户的农业赋税，此外，还规定了他们必须一次缴纳。他们向国家义务交售的粮食定额比集体农庄庄员提高50%。

到1937年集体化完成了。国内共有243700个集体农庄。加入农庄的农户占全体农户的93%。

在谈论集体化的历史和教训时不应忘记，我们是最先走上这条道路的国家，因此不能不看到探索中的客观困难。首先应看到集体农民为国家，为巩固国家的经济和国防实力做了很多贡献，大规模的集体经济为经济和社会进步开辟了广泛的可能性；其次，从我们的教训来看，必须使劳动集体实际上成为独立的主人，使各种关系建立在民主原则基础上，要克服生产者对生产资料和劳动成果的异化，废止国家机关向集体农庄下达指令性计划和官僚主义地发号施令的体制，因为这种体制正是造成农业落后于国家需要、农民抛弃土地和农村凋蔽的原因。

原载1988年8月26日和9月16日《真理报》

（项国兰、高晓惠译 杨启潜、李俊聪校 项国兰编）

谈谈斯大林给《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编辑部的信及其对学术界和有关人士的命运的影响

历史学博士弗·阿·杜纳耶夫斯基教授

1931年10月底，《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第6期发表了（《布尔什维克》杂志第11—12期同时发表）约·维·斯大林的一封题为《论布尔什维主义历史中的几个问题》的信^①，这封信长期以来成为苏联社会科学发过程中一条明确的分界线。30年后，苏共中央书记鲍·尼·波诺马廖夫院士正是针对这封信说过，这封信“为个人崇拜对苏共历史产生的恶劣影响开了个头”。^②

斯大林的这封信出笼时正是20年代末30年代初，当时国际形势相当错综复杂，在这一背景下的党内斗争和政治斗争极为激烈。大家应该记得，早在1927年，斯大林就毫无根据地夸大爆发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他确定不移地把国际社会

① 《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76—91页。

② 鲍·尼·波诺马廖夫《历史科学的任务和历史学科研教学骨干的培养》，载于《全苏改进历史学科研教学骨干培养措施研讨会（1962年12月18—21日）》1964年莫斯科版第19页。

民主党，首先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当作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上的主要敌人。他和格·叶·季诺维也夫以前所作的关于社会民主党是“社会法西斯主义”的个别论断终于具有了成型的政治理论的性质。^① 维·米·莫洛托夫早在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就相当明确地表述了这一理论的实质：“……社会民主党正走在法西斯蜕变的道路上。它已经为此制定了相应的思想体系。”^②

斯大林及其周围的人在明确外部“主要的敌人”的同时，不可能不加紧推进对“内部敌人”的斗争。农民和知识分子（开始是所谓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然后就是全体知识分子）都成了“内部敌人”。

对农民的斗争是通过直接的、大规模的镇压（剥夺富农财产、放逐等）进行的，这种镇压关系到数以百万计的人的生命，实际上给农村以残酷的、毁灭性的打击。对知识分子的斗争起先依靠的是一套吓唬知识分子并使之始终提心吊胆的手段。这种政策早在 20 年代就触及了许多知识分子代表，后来则具有了更有组织的形式（表现为制造了成为 1937—1938 年及以后年代的大规模镇压的序幕的莫须有的审判案）。^③

20 年代和 30 年代初进行的一系列审判案中的第一个案件是所谓的“沙赫特案件”（1928 年 5—7 月）。斯大林从技术

① 参看 Ф. И. 菲尔索夫《斯大林与共产国际》，载于《历史与斯大林主义》1991 年莫斯科版第 131—198 页。

② 《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1930 年莫斯科—列宁格勒版第 417 页。

③ 参看 О. 沃洛布耶夫、С. 库列绍夫《清洗。历史与改革（政论家随笔）》1989 年莫斯科版第 121 等页。

知识分子开刀后，很快就将注意力转向了人文科学家。于是，他向历史学家发难，他们中的大多数在十月革命前就是学有所成的学者，其中不乏俄国史学界的骄傲。对科学院的“清洗”持续了一年多，到1931年2月才告结束。这就是谢·费·普拉托诺夫院士^①“案”，也叫作“科学院案”，国外通过一些书刊^②的介绍早已知道这一案件，而且现在苏联读者通过B. C. 布拉乔夫、Ф. Ф. 佩尔切诺克的文章^③和H. П. 安齐费罗夫回忆录^④的发表也有所了解。制造“科学院案”的借口是1929年1月12日苏联科学院全体会议上人文科学部的八名院士候选人中有三人落选。^⑤1930—1931年进行了“工业党”审判案和其他案件的审判。

于是到了给这一切提供理论根据的时候。1931年1月25日联共（布）中央作出《关于〈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的决议，决议指出：“杂志的工作既脱离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又脱离了国际革命运动的任务”，^⑥而两个月以后联共（布）中央1931年3月15日《关于共产主义科学院的工作》的决议又说：“近几年来阶级斗争的尖锐化也明显地反映在理论战线上。资产阶级的影响以一系列反马克思主义

① 谢尔盖·费奥多罗维奇·普拉托诺夫（1860—1933）——俄国历史学家，俄罗斯科学院院士。

② L. R. 格雷厄姆《苏联科学院与共产党（1927—1942）》，1967年普林斯顿版；A. 罗斯托夫（C. B. 西格里斯特）《四位院士案》，载于《纪念：史料汇编》第4辑，1981年巴黎版；H. П. 安齐费罗夫《回忆录三章》，同上。

③ B. C. 布拉乔夫《谢·费·普拉托诺夫“院士案”》，载于《历史问题》杂志1989年第5期；Ф. Ф. 佩尔切诺克《科学院案》，载于《自然》月刊1991年第4期。

④ H. П. 安齐费罗夫《回忆录三章》载于《星》月刊1989年第4期。

⑤ B. Л. 叶萨柯夫《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年代中的苏联科学：国家对科学领导的基本方向》1971年莫斯科版第192页。

⑥ 《党的工作老手册》第3辑第340页。

理论和修正主义理论的形式表现出来……”^①

于是采取了最初的步骤，准备好了基础，但是需要更有效的行动来切实地作用于社会科学的所有环节（也不仅仅对社会科学）。还必须有一个“纲领性”文献，其理论观点通过具体实施途径的确定将得到确认。

斯大林的信就成了这样的文献。对这封信的分析表明信里所作的一些结论矛盾百出，虚张声势。同时，斯大林这一行动的性质的本身——对他所提到的几个作者粗暴指责和侮辱，给他们乱扣帽子（“腐朽的自由主义者”、“托洛茨基主义私贩”、“骗人的狡猾手段”等等）——立刻带来的后果是：无法进一步开展原则性的、创造性的讨论，人们纷纷进行自我谴责，写悔过书，进而对受到斯大林批判的人进行镇压。

例如，1931年11月底历史研究所在给共产主义科学院主席团的信中说：“为执行斯大林同志给《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的信中的指示，历史研究所完成了下列工作：（1）重新审查了历史研究所的学术人员并将篡改布尔什维主义历史的或者不胜任斯大林同志信中的指示对历史科学所提出的任务的研究人员从研究所除名……（4）改变了研究所的组织结构：取消了几个处……并且组建了一些研究具有现实意义的历史问题的小组。”^② И. М. 阿尔德尔和 А. Г. 斯卢茨基被开除出研究所，他们后来遭到镇压。

这封“信”发表以后，莫斯科斯维尔德洛夫大学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协会促进支部委员会作出决议，根据这个决议，世界通史教研室主任 Г. С. 弗里德兰被免去所担任的职务。

^① 《党的工作者手册》第3辑第340—341页。

^② 苏联科学院档案馆第359全宗，第1目录，第49卷宗，第52页。

“其理由是由于存在一整套反党的、半托洛茨基的、半孟什维克的观点，在政治上不能保证正确的领导”，“弗里德兰不仅在他全部的著作中发表这些观点，而且用这些著作来偷偷贩卖与列宁主义敌对的思想”。^① 1936年弗里德兰被枪决。

1931年12月4日在全苏教育工作者工会科学工作者分组代表大会上恩·科尔曼在报告中指出：“斯大林同志最近写给《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编辑部的信揭露了在托洛茨基分子和半托洛茨基分子企图偷卖反革命的托洛茨基主义这个世界资产阶级急先锋的意识形态的时候，我们的阶级敌人在我们党史战线上的严重罪行……这封信不仅对我们党的历史、对历史学这门科学，而且对整个理论战线都具有重大的决定性的意义……对于我们科学工作者来说，这封信意味着必须从敌对的理论或理论家是否以伪装的形式渗入的角度重新审查每个独立学科的一切著述。”^②

1931年12月24日红色教授学院党史支部全体会议的决议写道：“在讨论的过程中揭发了一些新的反党的私贩进攻的行径并且对被揭露的托洛茨基私贩（米罗诺夫、阿尔德尔）和其他篡改我党历史的人（尤多夫斯基、戈林、瓦格纳、邦特格等等）展开了无情的、布尔什维克的揭发……讨论还暴露了一些身为共产党员的历史学家不愿意彻底揭露自己重

① 苏联科学院档案馆第377全宗，第1目录，第212卷宗，第3页。

② 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第5462全宗，第13目录，第249卷宗，第579—580页。恩斯特·科尔曼（捷克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奥匈军队服役，被俄军俘虏，后来成为典型的党务工作者，无限忠于斯大林，但他在50年代仍被投入狱。科尔曼本人在谈到他在几十年间所坚持的观点时写道：“……我是一个坚定不移的党员，始终反对形形色色的‘偏离’党的总路线的行径，从来也不批评任何领导人，对斯大林崇拜得简直五体投地……”恩·科尔曼《我们本不该那样活着》1982年纽约版第195页。

大的政治性和历史性的错误并按照布尔什维克的方式加以承认（金·巴耶夫斯基、明茨、卢金等人）。”^①在此后的几年中上面提到的10个历史学家中有8人遭镇压后牺牲了。

1932年《阶级斗争》杂志第1期发表了莫斯科历史哲学研究所的历史学家“小组”的文章，研究所以这封“信”的观点抨击了社会学家阿尔德尔所写的研究罗莎·卢森堡理论观点的著作。应该指出，阿尔德尔的著作尽管存在错误观点，还是力图分析卢森堡主义的实质，指出其长处和不足。在这一探索真理的阶段，自然个别问题的提法不无争议。例如，阿尔德尔谈到了战前时期德国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问题。他对这个结论作了这样的解释：“我认为，战前时期的布尔什维克化问题是指第二国际各党的革命化进程，在帝国主义矛盾加剧的影响下建立左翼的过程。”^②“小组”对这样提出问题的可能性都加以坚决拒绝的同时，作出了总的结论：“托洛茨基分子阿尔德尔是追求托洛茨基分子的目标的卢森堡主义的辩护士。”^③

1932年5月党的出版社出版了《为了历史科学的党性》论文集，印数达5万册。其中收入了尼·波波夫、O.格达耶娃、彼·波斯佩洛夫、B.泽依马尔等人发表在《真理报》上的文章，尼·尼基京^④、康·波波夫和卡·拉狄克写给该报编辑部的信，亚·施略普尼柯夫向联共（布）中央递交的声明

① 中央党务档案馆第89全宗，第7目录，第74卷宗，第12页。

② И. 阿尔德尔《罗莎·卢森堡论无产阶级革命》，载于《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1928年第7—8期第172页。

③ 《阶级斗争》杂志1932年第1期第84页。

④ 米·尼·尼基京（1902—1950）——1918年入党，1928年、1935年先后毕业于职工运动学校和红色教授学院。1928年起从事工会和党的工作。1941年起任联共（布）列宁格勒州委员会第三书记。

以及发表在《布尔什维克》杂志上的列·梅赫利斯^①的文章。波斯佩洛夫为这本论文集写了前言。

梅赫利斯在重申斯大林这封信的一般论点以后，将其“批判”的主要锋芒对准施略普尼柯夫，照他的说法，施略普尼柯夫“在混入历史战线的阵地以后，就对党及其领导人进行无耻的诽谤，卑劣地对他多年来一直与之斗争的列宁的党进行报复”。^②梅赫利斯接着写道：“毫不奇怪，一帮托洛茨基私贩——金·埃尔沃夫、明茨等等从这个毒源汲取才智。一些历史学家利用了施略普尼柯夫的‘回忆录’。”^③应该指出的是，埃尔沃夫几年后被枪决。

施略普尼柯夫在他向联共（布）中央递交的声明（1931年3月9日）中“毫无保留地”承认了全部“错误”。但是这并未对他后来的命运有所改变。他落到了与上面提到的历史学家中的大多数一样的下场。尼·尼基京、康·安·波波夫、卡·伯·拉狄克写给《真理报》的悔过信同样也帮不了他们的忙。

在当时那种政治形势下，历史学杂志都有责任必须全文发表斯大林的这封“信”并针对其中提到的问题写出专门的社论。所有准备出版的材料都必须从斯大林的指示的角度重新审查一遍。^④

① 列夫·扎哈罗维奇·梅赫利斯（1889—1953）——前苏联国务和党的活动家。1930年起在《真理报》编辑部工作。1939年起为苏共中央委员。

② 《为了历史科学的党性》，载于同名论文集，1932年莫斯科版第14页。

③ 同上（Л. Я. 金的这种毫无根据的指责甚至无需辩驳。他对施略普尼柯夫的《1917年》的头两卷的批判性分析见《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1927年第3期）。

④ 参看1931年11月26日列·扎·梅赫利斯致《阶级斗争》杂志编辑部的信（中央党务档案馆第89全宗，第7目录，第35卷宗，第8页）。

因此，从这封“信”中得出了十分具体的、影响深远的结论。几年之后，在1937—1938年大镇压时期，安·瓦·舍斯塔科夫1937年10月31日在红色教授学院所作的报告《历史学战线破坏活动的手法》中在指出这封“信”的特殊意义（按照舍斯塔科夫的说法，这封信是“政治战线及历史学战线上尖锐斗争的范例”）^①的同时，力图把1937年的事态和1931年的事态直接挂钩，这样做也决不是偶然的。

应该说，那种把斯大林的一切论断都当作神的启示的要求有时采取了极为粗暴生硬的方式。维·格·克诺林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协会联共（布）党团会议上作报告时说，不应把斯大林的文章看作是“我们文献中新的东西，而应看作只是对列宁主义基本论点的阐述”，他的这种说法受到了种种批驳。有些发言人固执地力图证明，斯大林的信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发展中新的步骤，更有甚者，协会的学术秘书N. П. 卢里耶声称，在斯大林的信发表以前历史学家们根本没有方法论可言而且也不知道什么是理论和实践。这些极端的说法确实没有得到大多数与会者的支持^②，但是这一事实本身不作解释也很清楚了。

正当苏联史学研究开始一系列建设性决定的阶段，通过杂志上发表论文来对一些争论的极为重要的问题进行的讨论中断了，后来也就不了了之。这封信是个人崇拜在历史学领域中公开的、影响十分深远的表现。斯大林的教条主义及其对创造性思想强求一律的意图是苏联史学研究发展中严重的

① 苏联科学院档案馆第638全宗，第1目录，第188卷宗，第1页。

② Т. Я. 杜贝尼亚坚决驳斥卢里耶（参看中央党务档案馆第147全宗，第1目录，第30卷宗，第66页）。

障碍。

在 25 年多的时间里讨论斯大林在信中所涉及的问题实际上成了禁区。至多只允许逐字逐句地重复“各个时代和各族人民的最伟大的理论家”的思想。^①但同时令人感到有趣的是，无论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还是那些年出版的讲义和教材都没有提到过这封“信”。

原载《历史与斯大林主义》1991 年莫斯科版
（邢艳琦摘译 何宏江校）

① 中央党史档案馆第 89 全宗，第 7 目录，第 25 卷宗，第 19 页。例如，H. И. 萨莫卢柯夫在《世界大战前国际舞台上的布尔什维克》（载于《历史》杂志 1939 年第 1 期）一文中写道：“托洛茨基阵营间谍奸细集团的密探私贩们试图篡改布尔什维克党战前的历史。1931 年斯大林给《无产阶级革命》编辑部的信在揭露这些私贩的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同时，这封信是对布尔什维克党史实际的、科学的研究事业中的转折点”（第 59 页）。

关于 1928—1929 年 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政治争论

历史学博士 F. A. 特鲁坎

最后的争论

斯大林认为，1927—1928 年粮食收购下降（官方文件称之为“粮食危机”）是农村阶级斗争加剧、富农暗中破坏的结果，是集体农庄发展缓慢所致。众所周知，类似的粮食困难，以前，例如 1925—1926 年也曾发生过。当时通过减少对工业的投资，暂时降低工业发展速度，促使形势好转，城市和农村的生产得到发展。但是，1928 年斯大林听不得任何放慢工业化速度的意见。他认为所有持不同见解的人都有投降主义情绪，都是自己个人的敌人，只有他才是唯一的永不犯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解释者。

根据斯大林的倡议，政治局一致决定采取包括没收粮食在内的“非常措施”，即超经济的行政强制措施。最初大家认为这是一时出于无奈。斯大林在视察西伯利亚时，每到一站都把党的地方工作者叫到火车上来，不顾具体的特殊情况和遵守法制的必要性，要求“强行”收购粮食，动辄搬用俄罗斯联邦刑法有关打击投机倒把的第 107 条。同总书记争辩是

相当难的——你会被认为是在庇护富农阶级。在运用上述条款时开始出现过火行为，致使在城乡经济关系的最重要环节上偏离总路线。实行新经济政策以来，农民自行处理余粮的权利第一次受到了非议。

但是党的政策的转变并没有就此结束。斯大林昨天还在说国家没有到大规模集体化的时候，突然间开始否定个体农民经济的生命力并号召在最短的时间内“使我国各地区毫无例外地都布满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它们在向国家缴纳粮食方面不仅能够代替富农而且能够代替个体农民”^①。强行“培植”集体农庄的思想越来越强烈地支配着斯大林。

他讲话的口气越来越强硬。他认为在有国内外敌人的情况下，那些不懂得新经济政策的含义是加强斗争、建议在农村实行富人和穷人都喜欢的政策的领导干部，是不应该留在党内的。斯大林认为，目前的困难是新经济政策体系本身的重大缺点造成的，因此需要采用超出新经济政策框框的解决办法。

布哈林对形势进行了分析并得出结论说，这些困难不是不可避免的，它们是“我们贻误时机、计划领导失误”造成的，是可以根据新经济政策原则加以克服的。他认为农业没有一定的积累，根本不可能集体化，一千把木犁也装不成一台拖拉机。1928年6月初，布哈林在给斯大林的一封信中写道，国内外的形势“非常严峻”。他不否定集体农庄，但他认为集体农庄要在几年内才能建立起来，因此近期无法使苏联“摆脱困境”。况且目前还没有用于集体农庄机械化的资金。由

① 《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7页。

于很久不讨论一般政策问题了，领导人（布哈林认为他自己也是其中一分子）缺乏全盘计划。他们的行为“还不如最鄙陋的超验论者”。但是最使布哈林担心的是把作为个别现象的非常措施变成与党的十五大路线不同的新政治路线。他在信的结尾声明，他不愿意也不会国家这样困难的情况下争吵。

斯大林对此信没有作出反应。

联共（布）中央七月全会（1928年）表明，政治局内部的分裂在加深，而政策上的转变遇到抵制。

斯大林在全会发言说，农民不仅向国家缴纳普通税，即直接税和间接税，而且在购买工业品时还要因价格较高而多付一些钱，而在出卖农产品时多少要少得一些钱。斯大林承认，这是为了发展为全国（包括农民在内）服务的工业而向农民征收的一种额外税。这是一种类似“贡赋”的东西，是一种类似超额税的东西，征收是为了保持工业发展的速度。他明确地建议，要继续强迫农民按照低于“成本价”的价格出卖粮食。这一措施不仅针对富农，而且也针对农民中的基本群众——中农，这意味着脱离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这种转变实际上是使非常措施合法化，因为不依靠这些措施已不可能以低价即农民亏本的价格买到粮食。

斯大林确信，任何社会问题都可以单靠行政强制手段来解决，因此他为非常措施辩护，而且提议以后也“决不放弃这样的措施”。为了给这一做法找依据，他提出了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取得成就，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的“理论”。斯大林说，在收购危机时期，我们看到了农村资本主义分子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反对苏维埃政策的第一次大行动。

列宁在解决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同类问题时认为，不应把

重心转到政治斗争方面，而必须转到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①，这是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特殊形式。斯大林的观点则截然相反。他公然声称阶级斗争是党的工作的关键环节，把苏维埃社会发展的动力归结为阶级抗争。

米高扬、卡冈诺维奇、柯秀尔都支持斯大林的立场，强调非常措施是富农的反抗造成的。

在制定决议时，斯大林及其追随者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考虑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的批评和某些具体建议。当时斯大林的阵地尚不稳固，因为伏罗希洛夫和加里宁还在犹豫。最后决定，部分地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停止实行非常措施的运动。

乍一看是布哈林及其同盟者取得了胜利。例如科恩对上述结果就是这样评价的。但后来的事态证明，全会对布哈林分子来说实际上是一次得不偿失的胜利。对他们来说，当时是在有利条件下进行战斗的最后一次机会，因为斯大林要公开痛击“三人团”，要在实现他设想的“伟大转折”，即放弃列宁建设社会主义的原则之前把所有的追随者都团结起来，还需要一段时间。可是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没能利用这个机会。当然他们不可能不清楚，斯大林在全会上已经表述了他依据随着社会主义的推进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的理论制定的新方针的基本任务：用行政强制手段实行工业化和农业改造、采用非常措施、向农村征收“贡赋”和“超额税”。他们非常了解斯大林，应该预料到，眼下斯大林为了清除所有不同意他路线的人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367页。

但是三人团的表现无论如何也说不上是对斯大林挑战的回答。布哈林虽然坚持今后完全中止非常措施，但拒绝遣责过去采用非常措施，说什么不应掀起批判理论和失误的运动，不应事后反击，这样做不会有什么结果。李可夫对大规模地向农民实行行政强制手段也深感不安，他反对继续采用非常措施。他把对农民采取行政强制手段的主要责任揽在自己身上，因为他是人民委员会主席。（“我个人曾经相信行政措施能消除粮食危机。可惜事情并非如此。”）如果说同中农和贫农的关系搞坏了，李可夫承认“我是主要责任者之一……”

这些希望和睦的姿态显然是做给斯大林看的，因为他才应该对强行收购粮食及其灾难性的后果负主要责任。无论是布哈林，还是他的拥护者都没有下决心立即反驳斯大林的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的理论。

托姆斯基谨慎地批评了斯大林的“贡赋”的提法，却得不到任何人的支持。布哈林甚至欢迎在触犯中农的情况下向富农发动坚决的进攻。然而实践证明，这条道路必然导致连劳动农民都一块儿打击的新的非常措施。

布哈林及其拥护者不愿搞对抗，同斯大林分子一起签署了一致的决议，从而加速了自己的失败。在后来的几个月中，他们为了寻求可以接受的妥协不断让步，因而失掉了他们在共产国际、工会、新闻界中所有最重要的阵地，失去了自己所有的公开拥护者。

七月全会以后，他们很快感觉到他们面对的是一个残酷无情而又非常老练的对手——此人在争取权力和不惜任何代价保住权力的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斯大林是什么时候决定用右倾罪名这个武器从政治上消

灭对手的？这个主意很有可能是托洛茨基向他提示的，因为托洛茨基于1928年7月22日从阿拉木图寄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一封信《七月全会和右倾危险》，信中称李可夫和布哈林为“右倾犹大什卡”，说他们麻痹工人，煽动私有者，是在准备热月政变。没过多久，斯大林便开始使用和托洛茨基同样的语言对布哈林进行抨击。……不管怎样，正是七月全会（1928年）之后，斯大林发动大规模运动反对“右倾分子和对右倾分子的调和主义态度”。

1928年7月17日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开幕，会议一直延续到9月1日。在整个会议期间，斯大林及其周围的人不停地攻击实际上已被解除共产国际领导职务的布哈林。斯大林及由他安插的人严格控制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活动。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倾向随之加强，给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

斯大林接着又一次攻击布哈林这位《真理报》编辑，是因为该报9月30日刊登了布哈林的文章《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为迎接新的经济年度而作》，文章揭示了托洛茨基分子种种唯意志论的谬论的危害，包括他们不要平衡地即按比例发展工业和农业的谬论。布哈林有一个恰当的比喻，说托洛茨基分子是一些“拔苗助长”的园丁。托洛茨基分子正是这样提出建议的：靠掠夺农村，最大限度从农业汲取资金来加紧工业化。布哈林强调指出，托洛茨基分子不懂得工业的发展取决于农业的振兴，因此他们的计划只能导致农业破产，同千百万农民的政治关系破裂，使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陷入危机。

布哈林为什么对已被战胜、不可能再对党的政策施加影

响的托洛茨基进行如此猛烈的攻击呢？对这个问题只能有一个答案：布哈林认为自己昔日的盟友斯大林的行为同自己政治上的老对手托洛茨基的观点颇为相似。

《札记》最后深刻地论及改造时期的一般困难，指出官僚主义的障碍和不必要的过分集中压制了群众的创造性。作者得出结论说：“在我国应当使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尽可能多的经济因素都运转起来，调动起来。这就要求把个人的、集团的、群众的、社会的和国家的首创精神极其复杂地组合起来。”布哈林这篇文章实际上是暗中同斯大林论战。斯大林在1928年提出通过“大跃进”、依靠“贡赋”政策，即剥夺农村的办法改造经济的唯意志论道路。布哈林则坚持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所确定的改造速度和方法。他反对抛弃新经济政策和回到“战时共产主义”。

10月8日，当时布哈林不在莫斯科，政治局9个委员中只有4人（加里宁、莫洛托夫、李可夫和斯大林）在场的情况下，政治局会议通过一项决定，指出《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中许多论点尚有争议，《真理报》编辑部不该未经中央政治局同意就发表该文。3个月后，斯大林在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的讲话中说，此文是一篇反党文章，它指望减缓工业发展速度，并按照弗鲁姆金那封著名信件的精神来修改我们的农村政策。许多发言称《札记》是“整个布哈林‘芭蕾’学派的福音”、“张皇失措者的札记”，是“理论路线上的破产”。接着《真理报》编委会和编辑部中拥护布哈林的人全部被撤换。替换上来的工作人员在新任副总编加·伊·克鲁敏的支持下造成了一种局面：虽然布哈林当时还担任总编，但已不再决定编辑政策。

1928年9月，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开始坚决地向同意布哈林观点的莫斯科党组织的领导发起进攻。他们非常清楚这个由政治局候补委员领导的最大的组织在党内的作用。1928年10月18—19日，在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控制下召开莫斯科委员会和莫斯科监察委员会非常全会。他们出席了全会的所有会议。报告人尼·亚·乌格拉诺夫宣读了由政治局10月18日批准、观点自相矛盾的中央委员会《告联共（布）莫斯科组织全体党员书》。其中一方面指出莫斯科组织是遵循党的总路线进行工作的，另一方面又不点名地批评了该组织某些领导人的右倾错误。

斯大林在莫斯科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讲话，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倾向，据他说，如果这一倾向获得胜利，资本主义在我国恢复的可能性就会增加。尽管他宣称政治局没有意见分歧，政治局内既没有左倾分子也没有右倾分子，但这并不能掩盖斯大林所攻击的目标。

1928年11月27日，莫斯科委员会全体会议接受了乌格拉诺夫和B. A. 科托夫的辞职请求。接替他们的是维·米·莫洛托夫和卡·雅·鲍曼。随后对莫斯科组织的工作人员进行了大清洗，让所有同情布哈林的人、保持中立或立场动摇的人看到斯大林的机构有多厉害，凡是公开反对斯大林的人会遇到多大风险。

在联共（布）中央十一月全会（1928年）前夕召开的几次政治局会议上，在今后的农业发展和党在农村的政策问题上出现了尖锐的意见分歧，致使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提出了辞呈。在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奥尔忠尼启则的调解下冲突似乎得到了解决：至少经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同

意撕毁了辞呈。一天后他们又交给斯大林一个 16 条声明，要求停止对他们及其拥护者进行谴责和作组织结论的运动。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提出辞呈后来被定为叛党行为。

围绕着工农业发展速度问题所展开的争论，在审议 1928—1929 年度控制数字的中央十一月全会（1928 年）上仍在继续进行。鉴于总的困难情况，强调指出，控制数字不可能具有不断增长的性质，这些数字无论如何也不是从苏维埃经济和过渡时期的本质得出来的。李可夫尖锐地批评了粮食政策，说在配给制下是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的。李可夫同那些硬说只有建立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才能摆脱粮食困难的人展开了辩论，他认为这是无稽之谈，因为目前 90% 的粮食都是由小生产者提供的，所以他们的作用仍具有决定性意义。

李可夫赞成五年计划第一年的高速度，但是他认为，指望这种速度保持许多年是极其轻率的想法。他反对阶级斗争必然越来越尖锐的论断。可是他那些合理的、经过斟酌的意见遭到了否决。据一些口头发言和报上的反应来判断，很多与会者认为，阶级斗争尖锐化这一问题使其他所有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退居次要地位；他们赞成加速发展工业，全会结束后他们也是按这一精神向群众宣讲的。

斯大林要求增加对工业的基本建设投资 and 加强同右倾分子的斗争，他强调指出，否则国家将面临着灭亡。

十一月全会一致批准的决议带有妥协痕迹：在农业方面可以看到布哈林和李可夫的影响，而在工业化问题上则可以看到斯大林的影响。但是，右倾以及同它调和的倾向被宣布为主要危险，这是基本之点。

布哈林及其拥护者很快就看清楚斯大林干脆对全会认定

刺激贫农中农个体经济是中心任务之一的决议置于不顾。国家陷入极其严重的粮食危机，采用非常措施的危险再度出现。此时布哈林投入了最后的决战。在一个半月的时间里他先后三次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反对偏离新经济政策，呼吁在政治上审慎从事。他在《目前形势和我们报刊的任务》一文中批评那些“疯子”的工业化政策，他们只追求建设巨大工程，而对农民漠不关心，只会大声喊叫：“拿金属来，至于粮食——不关我们的事！”

布哈林认为最大的危险是党的工作者变成自以为是、争权夺利和压制首创精神的官吏。他在另一篇文章《列宁和科学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任务》中谈到不是根据客观统计材料制订出来的，而是在“官僚主义的公文往来”、“主观愿望”、政治上的自以为是和“共产党员的高傲自大”的基础上制订的计划的消极后果。他注意到把生产资料，运输业和金融业前所未闻地集中在国家手里，会大量增加各种错误。

但是布哈林反斯大林最勇敢的表现是他在列宁逝世五周年纪念会上所作的报告《列宁的政治遗嘱》。在当时看来，题目本身就出乎人们的意料。但布哈林并没有涉及到列宁对斯大林的评价，显然他已考虑到，公布列宁信中的评语可能会引起他依然想避免的政治对抗。

报告是针对斯大林的政策，尽管用词非常含糊，但是所有了解国内和党的领导层内的情况的人，对此是非常清楚的。

布哈林首先强调列宁关于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这一思想。根据这一思想，重心已从政治斗争转到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后者是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特殊

形式。当然——布哈林承认——在实践中可能出现阶级斗争尖锐化的时期，但列宁关于我国发展的性质的结论仍然非常正确，而且是他的理论基础。

布哈林在捍卫新经济政策这一社会主义发展的民主道路时，没有漏掉列宁任何重要的思想，“除了”根据列宁有关文章作“一些注释”绝对没有添加任何自己的东西。但是斯大林及其追随者认为布哈林的报告修正了列宁主义最重要的原则，《真理报》则根据这个报告把布哈林说成是伯恩施坦分子。

只有现在，在有了斯大林独裁的惨痛经验之后，我们才充分认识到布哈林报告的深刻含义和不指名地反对斯大林的针对性。布哈林的主要思想很清楚：过去和现在都可以有不同于集权的行政命令体制的选择。这对于打破“社会主义是斯大林主义同义词”的旧框框非常重要。此外报告还启发人们去思考：后来喜欢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这个封号的斯大林实际上对经典作家的，包括列宁的遗产知之甚少，恐怕根本不能算作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斯大林非常清楚报告的内容，立即作出了答复……

斯大林的“大转变”

正当布哈林作完报告大剧院里响起雷鸣般的欢呼声，乐队高奏《国际歌》的时候，斯大林正在克里姆林宫自己的办公室里阅读一份传单《党被蒙住双眼引向灾难》，其中有加米涅夫1928年7月会见布哈林的消息。斯大林据此指责他们严重违反党的纪律，建立派别，企图结成反党联盟以改变党的

领导和党的总路线。

《同加米涅夫谈话记录》犹如厄运一直伴随着布哈林的余生。

在后来的一次尖锐冲突中，布哈林指责斯大林对农民实行军事封建剥削的路线和破坏集体领导，并提请大家注意列宁关于必须把斯大林从总书记职位上调开的遗嘱。

结果成立了中央政治局的一个委员会，以谋求妥协为名建议布哈林投降，以换取停止在党内讨论“他的错误”。布哈林拒绝充当悔过罪人的角色，建议放下小政策，回到大政策上来，恢复相互信任，搞好集体领导。

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共同签署了第二个声明，起因是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的委员会对准备共同制定总路线的诚意不予理睬，起草了要使他们在政治上名誉扫地的决议。决议硬说布哈林企图同加米涅夫集团组成派别联盟，说布哈林反对向富农征个人税（其实他主张征收更高的税，但是要以法律为依据）。

这三位政治局委员强调指出，他们从来都没有反对过党的正式决定。他们反对斯大林及其追随者用“非常措施论”歪曲这些决定，反对把斯大林和党相提并论，甚至以斯大林代替中央，反对把任何反斯大林的言论说成是反对整个党。他们再次提请大家注意列宁的遗嘱，然而在对斯大林进行尖锐的批评时，并没有要求免去他总书记的职务。

斯大林为即将审议和批准上述决议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作了充分准备。1929年4月16日全会开幕那天，出席会议的有302人，其中绝大多数人的情绪都是与“反对派”对立的。尽管按惯例李可夫被一致选为大会

主席，但给全会定调子的《关于党内分歧》的报告却是由完全同意斯大林观点的叶·米·雅罗斯拉夫斯基作的。随着报告人和其他发言人罗织的“三人团”“反党”“派别”行为的增多，发言者的口气也愈来愈严厉，愈来愈咄咄逼人。例如，日丹诺夫斥责三人团“减缓重工业发展速度”和“让农村富农发财致富”的路线，并警告说：“……我们清算了托洛茨基分子，全党也将同你们彻底清算，如果你们还不服从，还不承认错误的话”。

在这种情况下，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不仅坚决拒绝让他们公开忏悔的要求，而且指责斯大林及其周围的人犯有极其严重的政治错误和理论错误。他们把有力的论据都用来论证对斯大林政策的两点主要的批评，即严重破坏列宁的党内生活准则和事实上放弃新经济政策。

列宁嘱咐要保护党的领导的统一（这一问题在他最后的著作中占有中心的位置），斯大林的方针却是分裂这种统一，清算持不同意见的人。列宁关于集体领导的方针被抛到了一边。

布哈林的讲话持续了几个小时。他猛烈抨击斯大林在中央七月全会（1928年）上提出的关于随着向社会主义的推进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的理论。

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的理论对斯大林整个执政时期产生了极坏的影响，这一理论为30年代大规模破坏法制，用镇压和恐怖手段迫害共产党员和党外劳动者提供了依据。

布哈林的“富农倾向”罪名是人为制造出来的，而且是有预谋的。斯大林把“富农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强加给布哈林，指责他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声称

“富农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布哈林和他的朋友所有错误”的基础，是“右倾的旗帜”。当斯大林就此问题发言时，中央监委委员 A. II. 罗济特直截了当地指责他篡改布哈林的观点。

布哈林则严厉批评斯大林关于“贡赋”的提法，认为这一提法抛弃了列宁的“结合”的思想，回到托洛茨基提出的靠对农民进行军事封建剥削来实现工业化的口号上去了。布哈林坚决反对 1929 年 2 月 9 日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的决定中关于“贡赋”的要求。

布哈林及其拥护者向全会提出了自己的经济政策纲领，其实质是：依靠同劳动者的物质利益的结合，保留市场并逐步排挤资本主义成分，保护个人的首创精神，遵守革命法制，坚决放弃非常措施，在兼顾工业利益的情况下采用较灵活的税收和粮价体系、加强农业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一个切实可行的纲领，对加速工业化、对既定的速度和五年计划并没有提出怀疑。布哈林主张用经济办法进行管理，同时指出自己的论敌过高估计了“不靠市场关系去影响农民基本群众的可能性”。他认为，市场联系形式在长期内仍将是决定性的经济联系形式。在粮食收购方面，布哈林不同意采取非常措施，建议调整粮食收购价格，提高收购价格，甚至向国外订购粮食。

布哈林关于集体化问题的观点遭到斯大林多数派特别激烈的反对。布哈林赞同集体化，同时主张保护个体农民。他认为，在使个体经济不断合作化时，应该把集体农庄—国营农场的建设同发展个体经济结合起来。

加里宁坚决反对这种观点。他认为仅靠市场和发挥个体

农民经济的积极性这一空洞口号不可能摆脱粮食危机，因为农业是分散的，且商品率很低。加里宁认为，布哈林以个体经济为依托，在漫长的过程中逐步建立集体农庄的方针是错误的，比较正确的做法是把振兴农业的任务在某种程度上同集体化结合起来。加里宁对布哈林和与他持相同观点的人说，如果在这个基本问题上你们能同我们达成协议，那我们就统一了。

由此看来，布哈林的拥护者与斯大林的追随者之间的争论尽管很激烈，却是围绕着达到同一个目标的方法问题展开的，即如何把俄罗斯变成工业强国，使其在资本主义包围中能够保持独立并向社会主义推进。但是布哈林的拥护者对国内形势切合实际的估计和提出的使国民经济摆脱危机的建议与斯大林及其周围的人的唯意志论观点是截然相反的。

斯大林在捍卫自己纲领的过程中，把主要打击目标对准了布哈林，把他视为在解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列宁思想遗产方面的主要竞争对手。他竭力破坏布哈林这位理论家的声望，千方百计强调，布哈林之所以同他在阶级斗争尖锐化、对农民的态度、新经济政策和市场关系等问题上有分歧，是因为布哈林还在坚持列宁所批评过的那些错误，强调布哈林离列宁主义越来越远，正在变成右倾分子。斯大林认为布哈林的路线是敌视工人阶级和革命的，他提出的工业化速度是缓慢的，对农民的让步是过分的，并暗示早在1918年，在关于布列斯特和约的辩论期间，布哈林就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进行过秘密谈判。这番话听来就像后来判决书的调子。

全会《关于党内事件的决议》草案是根据斯大林的演说起草的，很多地方同讲话的内容完全一致。

李可夫鼓起勇气再次发言，警告大家党正面临着巨大的危险：斯大林强求统一的方法与列宁关于社会主义民主和党内生活准则的概念是根本对立的。“我关心的绝对不是我自己：无论是我、布哈林还是托姆斯基都没有任何自我辩护的成分。”李可夫说，对我们所采取的方针可以“从政治上把我们消灭，党可以并且有权这样做。但是我担心，这样做会极大地危害全党，从此在安排领导和全党生活方面将出现一个全新的阶段”。此话是很有预见性的。

标志着斯大林胜利的决议以压倒的多数被通过。近 250 名与会者中仅有 10 人投反对票，3 人弃权。决议不仅谴责布哈林集团的观点与党的总路线不相容，而且使斯大林关于今后社会主义建设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任务的理论观点合法化。全会决定解除布哈林和托姆斯基在《真理报》、共产国际和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所担任的职务。

对布哈林的攻击仍在继续并且日渐升级。从 1929 年 8 月起，所有的报刊像是接到信号一样，一齐把他叫作“右倾分子的首领和鼓舞者”。

1929 年 11 月 7 日，斯大林宣布了“大转变”，即开始全盘集体化，许诺把苏联变成粮食最富足的国家。几天之后，斯大林还为此找到了理论根据。他在中央十一月全会（1929 年）上，反对 1925 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当时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领导共产国际）上通过的关于农民合作社长入社会主义的说法。斯大林认为，这种说法使人们有理由认为，小农经济和中农经济在没有对它们进行改造，没有对它们进行根本变革的情况下，便可以长入社会主义。他强调说这是不正确的。于是强制全盘集体化便成了这种改造

的主要途径。这严重歪曲了列宁关于不得对农民使用暴力的合作社计划。列宁曾作出全新的结论，“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在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取得了阶级胜利的条件下，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的制度。”^①

在批判“右倾分子”的掩护下，控制数字同由李可夫主持起草并由党的第十六次代表会议和苏联第五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批准的五年计划的任务相比大大地扩大了。这首先涉及到生铁、钢、拖拉机、有色金属的生产。粉碎“右倾分子”使斯大林有可能实现他那野心勃勃的超工业化计划。

对控制数字的讨论，再次引发了对反对派的指责。很多人发言要求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承认错误并放下反党的机会主义武器，否则就把他们从“党的总参谋部”中赶出去。

11月12日李可夫向联共（布）中央全会宣读声明，阐明他、布哈林和托姆斯基“对待党的总政治路线的态度”。他们承认，对影响农村的强大杠杆估计不足是错误的，表示赞成所采取的发展速度、赞成建立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同富农阶级进行无情的斗争。但这并不是斯大林所等待和全会（由于斯大林的坚决要求）所要求的悔过。李可夫拒绝关于右倾的指责，他声明，他和与他持相同意见的人在中央和中央监委四月全会上提出的贯彻党的总路线的方法能保证取得预期的结果，而且同斯大林及其追随者的办法相比痛苦较少。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坚持认为把“非常措施”当作一种体制是根本不能容许的，这是违背列宁遗训的。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365页。

非难、污辱和直接威胁再次落到了“反对派”的头上。斯大林当时极为好战。他要求布哈林集团彻底投降，并威胁说，否则党就要对他们进行狠狠的打击。

会议宣布“右倾分子”不能继续留在党内。反对全会决定的只有3个人：托姆斯基、С. Я. 乌加洛夫和布哈林（他送来了便条）；李可夫未参加表决。布哈林作为“反对派主要的先锋”被开除出政治局。中央委员们在这个历史的转折关头支持斯大林，犯了严重错误。他们为斯大林体制开了绿灯。

原载《苏共历史问题》1989年第12期

（王丽华摘译 李永全校）

斯大林进攻农民的预演

И. П. 伊孔尼科娃、А. П. 乌格罗瓦托夫

从1924年起，苏联国内的粮食收购工作主要是以苏联法律为基础、依靠市场机制、依靠发展城乡经济周转来实施的。但是，1928年又倒回去采取非常措施，即采取行政和司法手段来迫使农民按照低廉的国家价格出售余粮。

在西伯利亚采取最“严厉的”措施是从1928年初开始的。1月7日联共（布）西伯利亚边疆区委员会和各专区委员会收到中央委员会发来的1月6日由斯大林签署的电报。电报指出，粮食收购过程没有任何改观，主要是由于党的机构、苏维埃的机构和合作社的机构的过失造成的。斯大林在电报中要求“对破坏农业价格的富农和投机倒把分子必须采取特殊的镇压措施”，警告党的领导人，如果在1周内不能“改变粮食收购工作现状，中央就不得不撤换现任的党组织领导人”^①。

1928年1月25日边疆区委员会又收到一份中央发来的也由斯大林签署的（1月14日）的电报。电报中说：“情况表明，我们在粮食收购工作中所犯错误的三分之二是由于领导人的失算造成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决定狠狠地抓一下我们

^① 见本刊第1辑第32页。

的党组织并向它们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粮食收购工作措施的严肃命令……私商和富农利用我们的组织的心慈手软和疲沓拖拉破坏粮市局面，提高粮价并使农民产生观望情绪，从而使粮食收购工作更加难做……要想恢复我们的价格政策并取得大的进展，就应当立即打击包买主和富农，应当拘捕投机倒把分子、富农分子和其他破坏市场和物价政策的分子。”^①但这里却只字未提应该由什么机构和以什么法律依据来实施打击并执行拘捕。

斯大林在电报中要求对农民施加压力时，并没有明确提出用什么形式和方法来实施非常措施。可见，当时不论他，还是其他领导人都不清楚这些措施涉及的范围和界限。这种不明确性本身就蕴育了出现专横行为的可能性。

边疆区委员会在执行中央和斯大林的指示时，建议缩短交齐税款和保险费的期限，决定把边疆区各城市的粮食消耗量减少30%，赞成加强向产粮区供应工业品的措施。

联共（布）各专区委员会赞成粮食收购计划并动员党的积极分子执行这些计划。仅4个专区委员会（巴尔瑙尔、比斯克、新西伯利亚、斯拉夫哥罗德）就向各区派出74名特派员。1928年1月，西伯利亚边疆区的各区党委都召开全体会议，主要研究粮食收购运动的问题。

但是，这些措施，无论经济措施还是行政措施，都未能充分激发出农民向国家出售粮食的积极性。粮食收购进度依然很慢。

1928年1月10日边疆区委员会讨论了加强粮食收购工

^① 见本刊第1辑第33页。

作的措施，决定成立粮食工作非常“三人小组”，掌握本地区全部权力，其成员是：罗·因·埃赫（西伯利亚边疆区执行委员会主席）、谢·伊·瑟尔佐夫（联共（布）西伯利亚边疆区执行委员会书记）和 A. H. 兹洛宾（西伯利亚边疆区执行委员会商业部部长）。紧接着，各专区和区都仿效边疆区委员会的做法成立了类似的粮食工作“三人小组”。

1月13日，边疆区“三人小组”决定“研究出具体措施，指示各地同大量囤积粮食的人作斗争”。同一天，边疆区检察长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驻西伯利亚的全权代表通知本部门在各专区的机构，必须查出这些人，以便根据俄罗斯联邦刑法第107条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

1月15日“三人小组”会议讨论了斯大林签署的第二封电报。两天之后，边疆区委员会就指示各地“在每个主要粮食收购区，要对若干名（4—10名）囤积大量余粮、利用粮食困难搞投机倒把并哄抬粮价、拖延交粮和不交粮的富农作为作恶多端的投机倒把分子进行惩罚”^①。

1928年1月17日斯大林来到新西伯利亚。是什么原因驱使他到这个远离中央的外省来的呢？他在1月14日的电报中就称乌拉尔和西伯利亚是最后的储粮地。斯大林强调，对西伯利亚要“拼命地……施加压力”^②。看来，他不仅想施加压力让农民交纳粮食，而且还想观察一下，农民党员占多数的西伯利亚党组织对非常措施有何反应，整个农村有何反应。

1928年1月18日，在斯大林参加下西伯利亚边疆区委员会常委会会议批准了边疆区向中央提供6000万普特粮食

① 见本刊第1辑第35页。

② 同上，第34页。

的收购计划并制定了对农民施加行政压力的措施。而且总书记对边疆区委员会的指示作了很多补充和重要修改。斯大林建议，根据刑法第 107 条以检察院的名义追究富农户主的责任，并且“了解是否有可能通过人民法院不拘泥形式，从快审理一部分这样的案子”^①。

斯大林坚持要求司法机构参与粮食收购工作。边疆区委员会接受了这个要求，决定凡是根据刑法第 107 条立的案必须在 24 小时内调查清楚，由巡回法庭在 3 昼夜内审理完毕，不允许辩护。在这次会议上还确定了边疆区法院、边疆区检察长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全权代表联合通令的基本原则。该通令于 1928 年 1 月 19 日通过并得到“三人小组”的批准。该通令的第 5 条和第 11 条禁止人民法院对按刑法第 107 条立案的案件宣判无罪或作缓刑判决，而各专区法院也不得对他们减刑和满足其上诉的要求。

2 月 25 日，在俄罗斯联邦检察长尼·瓦·克雷连柯的坚持下，这些条款被取消了。但是，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正是这个通令一直是西伯利亚护法机关工作的主要依据。

在斯大林参加下边疆区委员会和边疆区“三人小组”后来举行的会议一再对各项非常措施作详细的说明。当时特别重视护法机关的作用。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负责揭发富农和调查刑事案件。检察长负责起诉、查抄和查封囤积的粮食、逮捕被告、监督审判程序和国家机构的活动。要求刑事案件由巡回法庭去被告居住地审理。民警局应该同私自酿酒行为作斗争并执行法院关于追交欠款的决定。

① 见本刊第 1 辑第 36 页。

斯大林同西伯利亚边疆区各机构明确了非常措施的性质和范围后，开始去边疆区各地视察执行情况。他避开隆重的接待，不作长篇讲话和决议，常常坐在远离主席团的一侧。在视察途中，总书记还到区中心去会见积极分子。他的讲话简明扼要，很多听众都认为有分量和有说服力：“国家需要粮食”；“应当弄到粮食”；“如果我们有粮食，就能够建设社会主义，如果没有粮食，就无法建设”。斯大林讲话时对地方领导人没有加快收购工作的速度提出了警告，他指责专区和区的领导工作不得力，要求对富农采取非常措施。

斯大林的行动在很大程度上对向农民施加行政压力并纵容严重违法的做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然而斯大林要求千方百计完成年度计划的方针并不是一下子就被农村共产党员所接受的。一些人对违法现象表示不理解，其中包括农业税的问题，即对缩短交纳农业税的期限不理解（鲁布佐夫斯克专区和斯拉夫哥罗德专区）。一些党员要求先向农民解释刑法第 107 条内容，然后才采取镇压手段（巴尔瑙尔专区）。截至 1928 年 2 月 10 日，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记录了 11 个专区 37 件农村党员对开展粮食收购运动拟用的办法持否定态度的事例。

有这样一个例子能够表明斯大林对未完成他的要求的事所作的反应。1928 年 1 月 26 日，边疆区“三人小组”会议根据总书记的建议，就运输工作和向中央运送粮食的问题进行了一次“重要谈话”。结果，西伯利亚农业协会主席 Г. В. 韦杰尼亚平被撤职。受处分的有西伯利亚商业股份公司董事会主席 М. Т. 祖耶夫、面包及其他农产品贸易股份公司驻西伯利亚特派员 Ф. Н. 巴拉诺夫、西伯利亚边疆区消费合作社管理委

员会主席 Л. С. 斯特里科夫斯基。下面这个事实也不是偶然现象。1928年1月至5月，1434名不愿意执行斯大林的要求或对此持消极态度的共产党员受到了党纪处分。其中有278名被开除党籍^①（后来一些人的处分得到改正）。

斯大林知道，在贯彻收购计划时，“拼命地……施加压力”的手段与法制是不能并存的。于是，他不分青红皂白地败坏司法机构工作人员的声誉。他指责检察院和法院的代表，说“他们几乎都住在富农家里，在富农家里做食客，所以他们自然要竭力同富农和睦相处……很明显，决不能指望这样的机关和审判机关的干部会给苏维埃国家做出什么好的和有益的事情来”^②。他要求把这些机关中不称职的人清除出去。

斯大林反对施加行政压力的过火行为的片言只语，比如反对所谓的“摊派风”的讲话以及一些决议的有关条款，应该说无非是想以此来玩弄手腕。显然，他根本没有考虑到农民会大规模地起来反对粮食收购。

斯大林的到来，使西伯利亚党组织的工作量急剧增加。1928年1—2月，新西伯利亚“三人小组”开了9次会议，研究了54个关于运动主要方向的问题。“三人小组”提出的速度，推动了党和国家机关其他环节的工作。对派到农村去的专区和区的积极分子提出了严厉的要求。这些积极分子的数量增加了好几倍。比如，4个专区委员会（鄂木斯克、新西伯利亚、坎斯克、图伦）动员并派到各区担任专区和区特派员的有410多人。边疆区各农村的区委员会平均向区里增派5—15人去参加粮食收购工作。

^① 1928年1月27日《苏维埃西伯利亚报》。

^② 《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5页。

这些特派员打破了农村里的平静，加快了收购运动的速度。农村党支部、农村积极分子、苏维埃和合作社的基层机构都积极参加了收购工作。粮食收购运动成了党和苏维埃的最重要的工作，所有其他工作都退居次要地位。

随着工作量的加大和工作节奏的加快，在西伯利亚党和苏维埃机构的工作中，斯大林式的行政命令作风开始扎根。比如，比斯克专区委员会在斯大林干预之前于1928年1月18日和20日通过的决定，总的看来是经过慎重考虑的，要求在采取施加压力的措施的同时在农民中间加强解释工作。但是，1928年1月27日比斯克专区委员会在听取了书记伊林斯基关于边疆区委员会的各项决议和有斯大林参加的巴尔瑙尔会议的情况通报后所通过的一项决议就显得十分严厉。这个特点在其他党组织的决议中也表现得很明显。越来越多地开始使用军事战报中的术语，议论的口气也越来越毫无必要地绝对和严厉。

除了强大的压力措施，往往还进行蛊惑宣传，掀起政治喧哗。阿钦斯克专区委员会书记M. Л. 布佐夫在1928年1月的信中要求各区委“使农村的所有国家组织和社会团体作好充分准备，迅速巧妙地贯彻所下达的指示，村苏维埃、民警局、人民法院尤其应当如此。这些部门的工作应该绝对准确、迅速、灵活……谁不理解这些任务，谁就不理解革命”。1928年1月30日阿钦斯克专区伊塔茨基区委员会向各支部发出了执行粮食收购任务的指令，指令中说：“完成这个革命义务是党组织作为革命先锋队不可推卸的任务……拒绝执行这一任务或表现消极将受到严厉的制裁，直至开除某些党员的党籍，甚至解散支部。”比斯克专区执行委员会驻斯摩棱斯克区

特派员科罗廖夫对有人提出不要干违法的事的建议回答道：“又来这种官僚主义了！斯大林同志已经给你们提出了一个口号——压垮它！打倒它！扼杀它！”^①

基层党组织和苏维埃机构受到的压力特别大。据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专区检察长库尔托夫的报告，特派员常常对村苏维埃主席和委员、合作社主席实施长达 14 天的行政拘留。区执行委员会也这样搞。有时拘留是缓期执行，完成一定的任务后就予以取消。

到 1928 年 2 月中旬，因执行粮食收购任务不得力而被解除职务的有 4 个专区法院的法官，5 个人民审判员，3 个助理检察长，7 个区民警局行政部门负责人，2 个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工作人员，1 个专区委员会书记，14 个联共（布）区委书记，18 个区执行委员会主席，58 个信用合作社主席，76 个农村消费合作社主席，26 个村苏维埃主席和委员，10 个收购人员。

粮食收购工作的第一阶段一直持续到 3 月。然后一度出现低潮。从 1928 年 4 月初至 6 月底掀起运动的第二个高潮。

* * *

农民对待非常措施的态度各不相同。富农持否定态度，贫农在运动初期持消极态度，甚至感到不知所措，只是在示范过程之后和保证把 25% 没收的粮食给他们用来满足家庭需要之后，才开始支持这些措施。中农在观望，只是在受到间接压力后才交出粮食。中农的情绪始终受各种因素的影响摇摆不定。党支部积极开展工作，才避免了中农大规模起来闹

^① 新西伯利亚州党务档案馆第 2 全宗，第 1 目录，第 3064 卷宗，第 24、63 页。

事。但是，农村中各种各样的谣言越来越多：要重新实行余粮收集制了，要打仗了，要闹饥荒了，等等。农民不明白，自己的粮食怎么成了投机的对象了呢？巴拉宾斯克专区斯帕斯基区一个区执行委员会主席说，富农常常问他：“向富农进攻是怎么回事？尤其想知道，‘强行进攻’是怎么回事？”

这种进攻是从向农民催收各种欠款开始的。到1928年5月，根据地方政府和合作社提出的起诉，法院共发布56900多个判决书，索要欠款290万卢布。这些判决文件由民警局负责执行。有时对查抄的财产进行拍卖。上述措施触动更多的是中农和贫农，因为贷款主要是发给他们的。

另一种形式的压力措施是提前征收农业税。1928年1月15日之前征收税款607万卢布，而2月15日前还要征收1060万卢布。当时总共征收了2230万卢布。收税时，对欠交税款的人还采取镇压手段。据不完全统计，到1928年5月初，因不交和拖欠税款被判罪的有2663人，其中80%是中农，只有9.2%是富农。

同私自酿酒行为作斗争，对粮食收购工作产生了一定影响。1927年西伯利亚农村私人酿制了6540万公升酒，共耗费了160800吨（1050万普特）各类粮食，其中有800多万普特谷物。商品粮的数量因此大大减少。西伯利亚边疆区执行委员会经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同意后授权边疆区146个区执行委员会以及各专区特派员对私自酿酒行为给予高额罚款。1928年2月就有16100名私自酿酒者被罚款，其中60.2%是中农，只有16.5%是商人和富农。

然而对农民施加行政压力的主要手段还是根据刑法第107条进行的审判。1928年1月中旬，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

工作人员在边疆区农村中开始清查富农并确定他们的财产状况。他们提出的名单送交各区和专区的“三人小组”，由“三人小组”作出最后决定。此后由检察院逮捕富农中的这些人，余粮被查抄并交粮食收购机构保存。案件在1—3天内调查完毕后转给法院。2月初在边疆区粮食收购地区有50多个巡回法庭。这些法庭审理案件不超过7天。判决书上写明对被告的处罚措施并没收余粮。

仅根据检察院报告的不完全统计，在1927—1928年度粮食收购运动中审判了大约2240人。虽然这些措施首先是针对富农的，但值得注意的是，被告中中农占了很大的比例——20%（贫农占1%）。农民开始交纳粮食。2月份交得最多（占全部计划的26.6%）。

斯大林关于要千方百计完成粮食收购计划的要求，他对边疆区组织施加的强大压力，以及斯大林的领导作风和由缺乏法制观念的工作人员采取的行政压力手段——这是运动过程中出现过火行为和严重违法行为的主要原因。

特派员、地方党和苏维埃工作人员有大量违法行为。在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代表到达之前，很多工作人员就开始行使调查机构的职能。他们试图擅自确定，哪些农户是富农，到处查抄农户，扣押甚至逮捕其户主，要求交出粮食。对农民的罚款数额超出了法律的规定。

很多地方逐门逐户地进行抄家（巴尔瑙尔专区阿列伊斯克区和奇斯久尼卡区，新西伯利亚专区科乌腊克区，鲁布佐夫斯克专区齐敏诺村等）。在鄂木斯克专区、鲁布佐夫斯克专区以及其他一些专区建立了村“三人小组”和工作组，负责向各农户摊派应交的粮食数额。拒绝向收购人员交售粮食的

人将遭到不同形式的镇压。

在1928—1929年度的粮食收购运动中这种工作方式成了主要方式，被称为“乌拉尔—西伯利亚方式”。毫无疑问，这是十分严重的违法行为，因为这样做，离余粮收集制只有一步之差了。

就连护法机关也在破坏法律。检察院和民警局的代表参与了查抄农户的行动。但破坏法律最多的是法院。边疆区法院院长 M. B. 科热夫尼科夫致函边疆区委员会：“1928年1—2月，法院只是……三人小组，有时是特派员掌握的执行机构，因此，法院的各种决定反映的是三人小组的情绪和方针……不是以法律的名义，为维护法制而进行工作，而是以‘案头法典’为依据开展工作。”根据刑法第107条进行的审判不准辩护，不遵守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中很多关键性的要求，往往连被告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被判刑。农村中关于要恢复“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和余粮收集制政策的传闻日渐增多。

这场运动表明，很多法官在政治上无知，屈从于来自党和苏维埃机构的压力。将大批中农甚至贫农判刑，就反映了这种情况。法院常常是在“没收一切剩余品”的口号下进行工作的。于是除粮食外，没收牲畜3415头、房屋45幢、拖拉机2台、脱粒机39台、其他农业机器65台。

在斯大林及其在西伯利亚的追随者的影响下搞的这种粮食收购工作远远超出了法律的范围，超出了限制和排挤富农的政策。这样搞实质上是反对全体农民。

农民13次闹事（从15人至300人不等）是不满情绪日益高涨的信号。其中11次闹事是由粮食困难造成的。很多地

方急需粮食的贫农指责政府不履行诺言，要求不要把粮食运走，就地加以分配。在一些专区发生了自发抢粮食、烧粮仓、偷盗粮食的事件。1928年1—6月，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机构记录的在边疆区散发的反苏传单有76份。恐怖活动日益增多：1927年4—12月间共发生159起恐怖事件，而1928年1—6月间就达252起。

政府机构最初曾试图通过逮捕和依据臭名远扬的刑法第58条追究刑事责任的办法来平息农民对这一政策的不满情绪。但是，这种做法没能奏效。

摆脱日益激化的局势的出路在于力争把粮食收购运动纳入法制的轨道。在西伯利亚党组织中有些党员不仅明白这样做是必要的，而且还努力去做一些工作。边疆区特派员B. A. 卡夫赖斯基在边疆区委员会另一位代表И. С. 努西诺夫的支持下，表示坚决反对鲁布佐夫斯克专区委员会书记M. H. 季亚科夫在波克罗夫斯克区搞的过火行动。在边疆区委员会全体会议上（1928年3月）佩夫兹纳和斯特里科夫斯基表示反对继续实行非常措施。边疆区委员会委员祖耶夫说：“问题在于，如何建立经济领导，以便摆脱我们这几个月实行的这种施加压力的做法。”这些发言还得到了瑟尔佐夫的明确支持。

西伯利亚检察院开始尝试（尽管在很小范围内）消除行政压力的极端做法并恢复法制。还在1928年1月27日，边疆区检察长就向“三人小组”呈交了一份关于没收工作中的过火行为和特派员用余粮收集制的办法搞粮食收购工作的报告。瑟尔佐夫在检察院起草的信上签了字并把这封信作为党的指示下发。这样一来消除了一部分过火行为。比如，边疆区“三人小组”取消了库兹涅茨克专区委员会关于根据刑法

第 107 条追究中农刑事责任的决定。1928 年 2 月 25 日边疆区法院和检察院提出了一份关于 1928 年 1 月 15 日至 3 月 3 日已查明的违法行为的报告。“三人小组”还收到了边疆区法院送来的这类材料。

护法机关对粮食收购工作中滥用职权行为采取的另一种措施是追究犯法的公职人员的刑事责任，这种人的数量很多：立案的有 801 起。所有这些都是斯大林离开西伯利亚后发生的。粮食收购工作第二阶段开始后遵守法律方面的条件有所改善。这时，在法庭审理根据刑法第 107 条起诉的刑事案件时已有公诉人和辩护人参加。受理的案件都是估计余粮数额为 400 普特以上的案件。为什么呢？党的文件说，富农及时把粮食隐藏起来和分散到亲友处。调查富农户的工作就变得更困难了。因此，出现了根据刑法第 107 条对中农立案起诉的大量事例。这经常迫使检察院对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审判农民的事件作出较为迅速的和坚决的反应。据不完全统计，检察院工作人员曾对法院对中农的判决提出过 49 次抗诉。

后来，根据边疆区委员会的建议设立的研究触犯刑法第 107 条而被判刑的人的社会成分的小组的工作，总的说来，对于消除很多过火行为、恢复法制起了促进作用。小组撤销了确属证据不足的判决，撤销了对那些证据不足的案件的审理。仅巴拉宾斯克专区就有 25% 的案件被撤销，而伊尔库茨克专区——47% 的案件被撤销。最终结果是：被判刑的有富农 915 人（占 57.6%）、投机商 566 人（占 35.6%）、中农 104 人（占 6.6%）、贫农 3 人（占 0.2%），总共 1 588 人。1928 年 7 月 5 日边疆区委员会同意了该小组的结论。

同斯大林的断言相反，在西伯利亚没有发现拥有 5—6 万

普特余粮的富农^①。根据1928年1月政治局通过的决议可以采取行政压力措施的、存粮1870普特（30吨）的农户也并不多。根据法院的判决，对一个农户没收得最多的是12500普特（鲁布佐夫斯克专区）和11500普特（斯拉夫哥罗德专区），在粮食收购工作第一阶段，一个农户平均没收886普特，第二阶段平均没收265普特（根据11个专区的材料）。可见，1928年初国家领导人并不清楚富农经济的规模。法院总共没收了190万普特粮食。71%的富农户主被判处剥夺自由6个月至一年。1928年7月，在西伯利亚边疆区各地有494人因在粮食收购工作中触犯刑法第107条而被判处剥夺自由。中央全会后（1928年7月）他们被释放了。

粮食收购运动的结果表明，行政压力这一做法本身并未能达到预期的结果。到1928年7月1日计划完成了97.5%。但是，当时已经清楚，收购工作的成绩与其说是靠采取非常措施，不如说是后来靠受法律保护的国家与农民利益的结合所取得的。党和护法机关采取的加强法制的措施在这个阶段消除了西伯利亚滥用行政手段十分严重的现象。斯大林走后采取的一些行动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消除基本农民群众对非常措施的不满情绪，避免了十分尖锐的冲突。1928年夏季，在农民中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反苏维埃的情绪。

斯大林在1928年2月13日给联共（布）各级组织的信《收购运动的初步总结和今后党的任务》^②中总结了西伯利亚“积累”的经验。这封信于1928年2月作为中央通报发给各地党委。和通常一样，在这封信中“事后”提出的思想和指

^① 见《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4页。

^② 同上，第11—18页。

示同在总书记领导下西伯利亚所搞的实践大相径庭。

斯大林的西伯利亚之行反映了他在后来工作中表现出的很多特点：严厉的行政手段和操纵干部、言行不一、掩饰本意的本领。西伯利亚成了他的一个试验场。新的——斯大林式的——工农“联盟”的形式在这里经过了“加工”。富农从经济人物最终变成了阶级敌人的政治形象，而中农则不得不通过按低廉的收购价格出售粮食来表明自己对国家的忠顺。

斯大林在西伯利亚讲话时提出了农业“社会化”的纲领，这个纲领后来在实践中变成了他的非农民化的政策^①。

对农民采取非常措施标志着进入了一个“新法制”时代，即法制为中央政权的当前需要服务的时代。这完全符合斯大林的观点，他纯粹从是否适宜的观点来看待“法律形式”。

对斯大林来说，除粮食收购工作外，西伯利亚是在全国范围内即将向农民进攻的一个特殊的预演场所。

原载《苏共历史问题》1991年第1期
(孙凌齐摘译)

^① 见《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5—10页。

产于大型谎言制造厂的 一封“短信”

(对伪造的列宁与斯大林
之间的通信的考证)

德·恩·科斯特申

关于“第一次通信”的经过是在列宁葬礼后仅仅几小时公布于众的。

1924年1月28日，斯大林会见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克里姆林军校学员以缅怀列宁，并发表了演讲。正如他事先所强调的那样，在演讲中他未作“关于列宁的生平事业的连贯性的报告”，而“只把一些表明列宁作为一个人和作为一个活动家的某些特点的事实告诉大家”。^①

在斯大林向学员讲述的那些事实中，我们认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关于已故领袖同他这位现任领袖——俄共（布）中央总书记的“第一次通信”的一些情况。众所周知，斯大林是在1922年4月3日担任俄共（布）中央总书记一职的。

我们还是先来看看回忆者本人是怎么说的。

斯大林说：“我最初和列宁认识是在1903年。固然，这次认识并不是经过亲自会面，而是经过互相通信。但是这次认识给我留下了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象，我在党内工作的整个时期中，这个印象始终没有消失过……列宁……不单是一

^① 《斯大林选集》上卷第174页。

个领导者，而且是一个最高型的领导者，是一只山鹰，他在斗争中不知恐惧为何物，大胆地引导我们党沿着前人未曾走过的俄国革命运动的道路前进。这个印象竟这样深深地印入了我的心灵，使我感到必须写封信给一位侨居国外的好友，把这个印象告诉他，要他评论一下。过了不久，当我已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时候——这是1903年底——我收到了我那位朋友的热情的答复，以及列宁的一封简单而内容丰富的信，原来我的朋友把我那封信给列宁看过了。列宁的这封信虽然比较短，但是它对我们党的实际工作做了大胆无畏的批评，并对我们党在最近时期的全部工作做了非常明确扼要的说明。只有列宁才善于把最复杂的事情描写得这样简单和明确，这样扼要和大胆，——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一颗子弹。这封简单而大胆的短信使我更加确信列宁是我们党的山鹰。可惜我按过去地下工作者的习惯，把列宁的这封信同其他许多信一样烧掉了，这是我不能宽恕自己的。

从那时起，我就和列宁认识了。”^①

在1924—1953年及以后的历史文献中，这段回忆被援引约20次并且变成了像“伏尔加河流入里海”一样的无可争辩的事实。

这种情况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与列宁的姐姐安娜·伊里尼奇娜·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有关。她在《无产阶级革命》杂志（1924年11月）上发表的《评〈在伟人的陵墓旁〉一书》中认为斯大林对列宁的回忆极为真实。她在书评中指出，斯大林同志在克里姆林军校学员的晚会上的演讲“简单

^① 《斯大林选集》上卷第174—175页。

明了，真实可信，寥寥数语，就把人物生动地勾画了出来，在我们看来，目前尚无人能做到这一点……”^①

所有这一切也就使列宁年谱的编纂者们有理由把下面这件事作为历史事实确定下来，即1903年底“列宁给流放到西伯利亚的斯大林写了一封信，简明扼要地阐述了党在最近时期的工作计划（信未保存下来。）”^②。

但是，如果说以前列宁和斯大林的“第一次通信”这件事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一直按照俄共（布）中央第一任总书记的最初的说法加以阐释，那么，在社会思想界已开始发生变化，要求对历史科学的老一套进行重新评价的今天，列宁写给斯大林“短信”这一“事实”却仍被视作绝对真实的，这又作何解释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对列宁的“短信”这一“事实”本身作认真、客观的分析。

在这里，我们要首先弄清楚究竟什么原因促使斯大林要讲他同列宁的“第一次”通信这件往事。

第一个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在经过几乎70年光阴之后的今天，只要稍微懂得点历史的人对此也都一清二楚。

斯大林在《回忆》中极为明确地划定了一个时期，即大约1903年11月中旬至12月中旬。现在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一时期对列宁和党来说意味着什么。

当时的形势是：社会民主党人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分裂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后者利用普列汉诺夫的支持，占据了《火星报》编辑部，疯狂地反对列宁及其拥护者。列

① 《回忆列宁》（10卷本）1989年莫斯科版第1卷第289页。

② 《列宁年谱》1970年莫斯科版第1卷第518页。

宁自 1903 年 6 月初起居住在日内瓦什缅—普里韦—迪尤—富艾叶街 10 号的一幢二层小楼里，他的一些最可靠的战友经常来这里聚会。当时在俄国的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就是其中之一，列宁 11 月 8 日给他写信说：“普列汉诺夫背叛了我们，在我们的阵营中斗争极其激烈；由于……普列汉诺夫允许更改党代表大会的决定，这激起了大家的愤怒。我完全退出了编辑部。《火星报》可能停刊。危机尖锐而可怕……但是我为中央委员会而斗争。普列汉诺夫怯懦地叛变以后，马尔托夫派更为嚣张，也想夺取中央委员会，要求把自己的人增补进中央委员会……”^① 列宁在给普列汉诺夫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信中谈了他本人在近期的打算：“我退出编辑部的事自然现在要告知同志们”并“出版一本关于疯狂的闹事者的斗争的小册子”。^② 列宁的《进一步，退两步》一书对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事件和代表大会以后的斗争作了分析。该书于 1904 年 5 月问世，但我们可以看出，书中的一些基本论点，列宁早在 1903 年 11—12 月就已仔细考虑过了。

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列宁的精神和身体状况都极为不佳。他在 1903 年 11 月 18 日给普列汉诺夫的信中说：“非常抱歉，文章拖了一天，昨天不舒服，这些天工作起来十分勉强。”^③ 1903 年 12 月，他工作起来也十分吃力。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在给国内写信时对列宁和她本人这个时期的生活情况作了描述：“去年一冬是那么艰难，脑子都累坏了……”^④ 1904

① 《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44 卷第 387 页。

② 同上，第 386 页和第 384 页。

③ 同上，第 397 页。

④ 同上，第 53 卷第 285 页。

年1月15日，她写信给玛丽亚·亚历山德罗夫娜，也谈了家里的情况：“我们的生活有点不正常，做不好工作。”^①

而列宁是在他最困难的时候，在众多布尔什维克中却对斯大林另眼相看，给他往伊尔库茨克省新乌达村写了一封“短信”。

列宁对斯大林如此另眼相看并在写给他的“短信”中“阐述党在最近时期的全部工作计划”。可以想象，克里姆林军校学员及所有党员由此只能得出一个结论：早在当时，即1903年11—12月，列宁就认为斯大林是他在党内唯一的最好战友和志同道合者。

在总书记公开《回忆》列宁给他的一封“短信”之前，他所控制的党刊就已指出：斯大林早在1905年就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并以此身分于同年夏天抵达高加索最大的工业中心——巴库。1922年10月，十月革命和俄共党史委员会彼得格勒局准备出版（不署名作者）斯大林的政治传记。传记中指出，“在1904—1905—1906年领导了整个格鲁吉亚的党政方面的工作，是社会民主党布尔什维克的秘密杂志《斗争》的主编^②，并领导地方社会民主党组织中的布尔什维克派。1905年，他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的身分到巴库做党的工作。”^③实际上在1905年召开的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的是列·波·克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53卷第526页。

② 《斗争》杂志的主编实际上是格鲁吉亚的革命者、社会民主党人弗拉基米尔（拉多）·克茨霍韦利。他在1903年8月17日被梯弗利斯梅捷赫斯基监狱的哨兵残酷地杀害了。

③ 《1880—1905年参加俄国工人运动的社会民主党人人名词典资料》，弗·伊·涅夫斯基主编，1923年莫斯科—彼得格勒版第1册A—II第238页。

拉辛、阿·伊·李可夫、列宁、德·西·波斯托洛夫斯基、亚·亚·波格丹诺夫。

但是，既然斯大林早在1904年2月就在高加索“领导地方社会民主党组织的布尔什维克的报刊工作”，那么他当然就完全有权当中央委员，何况列宁又恰恰是亲自给他，而不是给别人发了担任这一职务的特殊委任状——一封“短信”。

这就是说，列宁在当时就认为有必要给斯大林，而不是其他什么人写信来及时“阐述党在最近时期的全部工作计划”。

因此，1904年2月，当斯大林逃出西伯利亚流放地，来到梯弗利斯时，就不单是一位政治逃亡者，而且是列宁和列宁所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的思想的代表者。

现在来看看促使总书记要讲列宁同他的“第一次通信”的第二个原因。能在文献中了解到第二个原因要比第一个原因晚得多。只是到了1947年，即在“各时期各民族的领袖”70周年纪念日前不久，《传略》的作者们认为必须（又是斯大林本人的提示）使这个传略也引起注意。于是他们赤裸裸地指出“斯大林在流放地呆的时间不长。他急切地想冲出牢笼，去实现列宁建设布尔什维克党的计划。1904年1月5日斯大林逃出流放地”。^①

原来，斯大林之所以决定不像其他许多人那样服满三年刑期，而要逃出流放地，是因为阐述“建设布尔什维克党的计划”的“列宁的短信在呼唤”他这样做。

40年代末，斯大林责成内务部机关重新翻阅了约25万

^① 《斯大林传略》1947年莫斯科增订第2版第20页。

份“卷宗”，“对保存在档案馆内列宁和斯大林写的文献原件进行清理和登记”^①。

他在其生命的最后几年想在档案中找到什么呢？仅仅是想找到他在苏维埃政权初期所签署的那些与“天才领袖”形象不相符的决议吗？

应当指出，这次清查国家文献库，尽管有国家档案馆和机关档案馆的上百名工作人员参加^②，但并未达到预期效果。一些文献仍然未被销毁。其中有一份是原梯弗利斯省宪兵局局长、沙皇保安处的上校普·伊·帕斯特柳林的报告。他在1917年二月革命时仍任该职。

他从19世纪90年代起在保安处供职，当然会从在各个不同时期混进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队伍中的奸细的告密中对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整个历史了如指掌。他自然也就清楚，孟什维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是从1903年7—8月即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时起产生的。他在1911年3月14日转寄给彼得堡警察司司长的第530号报告中的一段话尤为重要：“根据新获悉的间谍情报，朱加施维里在组织中化名为索索^③和柯巴，从1902年起^④在社会民主组织中工作，起初是孟什维克，后来成为布尔什维克，是（铁路）第1区的宣传员和领导人。”

① 德·沃尔科戈诺夫《胜利与悲剧——斯大林政治肖像》1990年世界知识出版社第2卷第472页。

② 根据本文作者的亲身体会，全面检查一份卷宗平均至少用一个小时的时间。

③ 索索——约·朱加施维里的这个名字我们早在1900年梯弗利斯保安处的文献（保存下来的）中就发现了。

④ 应改为“从1904年起”，此处是女打字员在打帕斯特柳林的情报时出的纰漏，帕斯特柳林本人在审阅时未发现。

这份文献最初是在 1925 年 12 月 23 日俄共（布）外高加索边疆区委员会和外高加索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机关报《东方曙光报》上被发现和公开的。列·达·托洛茨基在他所著的关于斯大林一书^①中援引了这份资料。

在这里，我们觉得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斯大林 1902 年春在格鲁吉亚社会民主党队伍中进行革命活动的一件事情，也就是他 3 月 9 日在巴统作为“热情的科尔希达人”载入党的历史的那一时刻。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路特希尔德地方石油加工厂和城市其他企业的工人约几千人举行游行示威，要求释放关押在地方监狱中的同志。

工人奥瓦金·因德若罗扬是这些事件的参加者之一，他晚些时候即在 30 年代“回忆”说：“我们当时还不知道，这次游行示威是斯大林同志组织的。但从举行游行示威的通知这么快就传达到我们中间这一点以及游行示威的准备工作来看，我们清楚，领导这次游行示威的是一位很了不起的富有经验的组织者，他最清楚，怎样去引导和组织这次游行示威。

1902 年 3 月 9 日的游行示威我终生难忘。许多工人把通向监狱的那条街道挤得水泄不通。斯大林同志走在游行示威的工人队伍的前列。

游行示威的队伍向手持步枪、枪口对准我们的士兵步步逼近。

他们的长官、大尉安塔泽要求游行示威的队伍解散，否

^① 列·托洛茨基《斯大林、斯大林其人及影响》1967 年纽约版第 50 页。

则他将下令开枪。

在最初的刹那间，包括我在内的一些工人开始动摇了。但这时游行示威者中传来了宏亮的声音，号召我们不要解散，要更加坚决地要求释放被捕者。向游行示威者发出这一号召的是斯大林同志。

他的充满激情的话语把游行示威的队伍团结了起来，没有一个人离去。相反，许多工人向大尉和士兵投掷石块，坚决要求释放被捕者。”^①

在这本《回忆录》中，还有一位目击者（他不愿披露姓名，因而未署名）的一段有趣的记述：“……走在前面的是索索同志和格龙季·卡兰达泽。

在大尉安塔泽的指挥下，士兵们端着刺刀向步步逼近监狱的工人迎去。游行示威者中开始骚动不安起来，此时传来斯大林同志的声音：

——士兵们不会向我们开枪的，不要怕他们的长官。照准他们的脑袋打，一定要把我们的同志救出来！”^②

这件事情的结局如何，大家一清二楚：对于“热情的科尔希达人”索索·朱加施维里的“热情的话语”的回答是从士兵枪管里冒出的灰色火焰。结果 14 名工人被杀，52 人受伤。

然而，没有一颗子弹射中唆使人们进行游行示威的“工人的导师”^③。不仅如此，这次事件后，警察逮捕了几百名工人，又用了约一个月的时间在 3 万人的巴统搜查和逮捕“工

① 《1902 年巴统游行示威》1937 年莫斯科版第 161 页。

② 同上，第 203 页。

③ 当时即 1902 年，在沙皇保安处的文献中斯大林被称为“工人的导师”。

人的导师”。

列宁好像知道斯大林的这次行动，也正因为他的这次行动，列宁在一封“短信”中称他是“热情的科尔希达人”。列宁这样做……是对以后来成为孟什维克的尼·齐赫泽和诺·拉米什维里为代表的麦撒墨达西社的多数派的种种企图的反击，因为他们实际上认为索索的行动对革命运动来说是挑拨教唆性的，是有害的。

当时，即1902年夏，把斯大林“从机会主义者”的谴责声中拯救出来的正是他1924年1月接见克里姆林军校学员时未提名说到的那位最亲密的“好友”。就是这位“好友”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梯弗利斯委员会的委员（斯大林于1902年2月底把他增补进委员会中），于夏天来到巴统，为被谴责有奸细行为的斯大林恢复名誉。

他姓达维塔什维利，名米哈伊尔。他是斯大林在梯弗利斯神学院的同学，生于1877年。

格鲁吉亚出版的一本书在描述1896年初宗教学院的“革命运动”时第一次提到他，认为他是一位“革命者”。下面就是这段话的内容：“以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为榜样，格鲁吉亚的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开始创建由工人和学生组成的马克思主义秘密小组。

1896年初，斯大林在梯弗利斯神学院组织了这样一些小组。加入这些小组的其中有：米·达维塔什维利（达维多夫）……达·苏利阿什维利等人……”^①

达维塔什维利后来的政治肖像由达维德·苏利阿什维利

① 尼·阿·恰赫瓦什维利《1870—1904年格鲁吉亚的工人运动》1958年梯弗利斯版第124页。

作了描述：“为了同工人保持更紧密的联系，我和同事米·达维塔什维利弃学（放弃在梯弗利斯神学院的学习。——本文作者注）去工厂工作。置身工人中间使我们学到了不少东西，但同时也发现我们的政治素养较差，应当去学习。

我们筹集了必需的资金，于1903年秋奔赴德国，以便能在莱比锡大学就学。

当时，莱比锡几乎同欧洲所有大城市一样，成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协助小组。”^① 莱比锡党的协助小组于1904年提交给多数人会议的报告中说：“当时莱比锡所有同情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人都参加了这个小组。共有17人。”^②

究竟是哪些人参加了这个小组呢？一位亚美尼亚研究人员道出了这个谜：“1960年，苏利阿什维利在同我们的一次谈话中说在莱比锡达维塔什维利处他见到了邵武勉，他还记得在来自高加索的其他工作者中有季米特里·古尔格米泽、亚历山大·斯瓦尼泽（后来成了斯大林的内兄。——本文作者注）、格龙季·吉科泽、亚美尼亚女大学生伊斯拉埃良。”^③

现在我们来谈谈这些消息的提供者的本人情况。达维德·索克拉托维奇·苏利阿什维利12岁（生于1884年6月5日）就在斯大林小组中研究卡·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他在其《回忆》中讲述了列宁同斯大林经过通信相识究竟是怎么回事。事情原来是这样的。他在阐述1914年9月的形势时说：“我和同事米利通·皮利亚（奥古斯图尔）忧心忡忡地

① 达·苏利阿什维利《同侨居国外的弗·伊·列宁的会见》1957年第比利斯版第3页。

② 《无产阶级革命》杂志1931年第5期第136页。

③ 格·布·加里布日丹尼扬《斯·格·邵武勉在国外的革命活动（1902—1907年）》1971年埃里温版第47页。

在日内瓦大街上走着，心神不安。我们感到特别压抑的是我们自身的软弱无力。^①

‘我的朋友，你要清楚，’前几天奥古斯图尔对我说，‘我们应当去见见列宁，他会向我们阐明目前的形势，指出正确的道路，使我们振奋起来的。你从没有同他交谈过吧？’

‘没有。’

‘我在巴黎时去过他那儿并同他谈过话。我们去找他吧。你看吧，列宁会热情接见我们的。’

‘一定去，我们明天就去！’我高兴地同意了。

第二天我和奥古斯图尔如约去伯尔尼找列宁。

起初交谈不顺利，但当奥古斯图尔提到同列宁的第一次会面，提到当时他转给列宁的那封来自格鲁吉亚的信时，谈话活跃起来。列宁知道我们是从日内瓦来的，就向我们打听米哈·茨哈卡雅、卡尔宾斯基、尼古·基克纳泽。”^②

原来，除达维塔什维利和苏利阿什维利外，还有一位“并非多余的第三者——米利通·皮利亚，他就是奥古斯图尔。如果读者认为这位第三者是杜撰出来的，那就错了。皮利亚（奥古斯图尔）这个人实际上是存在的，但有关他的资料在文献中几乎未见到。达维塔什维利1915年死在凡尔登附近，这位斯大林与列宁通信的“第三位见证人”于何年死于何地，谁能告诉我们呢？

我们不排除这样一种情况，将来有一天研究人员查明，皮利亚1903年11—12月根本就不在日内瓦。但即使不是这样，问题依然存在：列宁的这封信究竟有没有？

① 无力反抗机会主义的头头们。——本文作者注

② 达·苏利阿什维利《祖拉布要塞》1965年第比利斯版第363—365页。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苏利阿什维利说了些什么。1913年10月，苏利阿什维利在瑞士遇见了来自俄国的达维塔什维利。“记得吗，米沙，”我打破沉默问道，“革命前夕我同你去过莱比锡？当时我们把格鲁吉亚的来信寄给了在日内瓦的列宁（着重标记是我们加的。——本文作者注）。”

“当然记得了。”米哈伊尔回答说。^①

根据上述“证词”，斯大林同列宁通信的第一个说法应当是这样的。

达维塔什维利1903年9月初作为当地大学的旁听生来到莱比锡。大约在10月中旬，他从莱比锡往格鲁吉亚寄了一封信，告诉了自己的通讯地址。这封信在10月底到了当时被囚禁在库塔伊西监狱的斯大林手中。索索收到信后就给在莱比锡的米哈伊尔·达维塔什维利写了回信，信中对列宁作了高度评价。

达维德·苏利阿什维利说：“我们把这封信寄给了列宁。不久就收到列宁让我们转给斯大林的回信。列宁在信中称斯大林是热情的科尔希达人。”^②

两个星期后，大约在1903年11月中旬，斯大林所写的、对列宁作了评价的这封信到了莱比锡。而由米哈伊尔·达维

① 达·苏利阿什维利《祖拉布要塞》1965年第比利斯版第330页。

② 达·苏利阿什维利《回忆斯大林》，载于《明灯》月刊1935年第9期第163页。1946年读者才从《斯大林全集》第1卷中得知斯大林写给列宁的、称他为“山鹰”的那封信从库塔伊西寄出的时间并不是1903年秋，而是“稍”晚些时候——1904年秋（见《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47—49页）。

我们注意到斯大林传记中这个颇为有趣的事实，可以设想，用不着再过一个22年，这个事件的研究人员最终会雄辩地证明：这封的确是在1904年10月从库塔伊西寄出的信实际上根本不是斯大林所写，而是他的卓越的同时代人、著名的格鲁吉亚革命者亚历山大·楚卢基泽。

塔什维利转寄的列宁的信大概是在两三个星期后，即 1903 年 12 月初到了格鲁吉亚，但索索已不在那儿了。他已经到了西伯利亚的新乌达村。

既然如此，列宁的这封信就应当留在格鲁吉亚，直到索索从东西伯利亚来信告诉他被流放的通讯地址及现在应当把信给他寄往何处。

结果，好像在 1903 年底即 12 月，索索在新乌达村就收到了列宁的信。那么，根据这种说法，斯大林从新乌达村寄往格鲁吉亚的信走了两个星期，而列宁的那封信从格鲁吉亚到新乌达村也走了两个星期。这是神话还是现实？

对于秘密信件来说，这么长的路程只用两个星期的时间，这是极不现实的。社会民主党人从伊尔库茨克省同格鲁吉亚通信未给我们提供过这种例子。这段路程至少需要三个星期（斯大林本人从新乌达村到巴统不是用了三个星期，而是四个星期），但就是三个星期，按照第一种说法也是不够用的。

那么，我们来看看关于这封“通信”的第二种说法。根据这种说法，斯大林在新乌达村给在某地的米哈伊尔·达维塔什维利写信据说是在 12 月初，而 12 月底就已收到了列宁的回信。

从新乌达村到日内瓦只用了两个星期，这现实吗？下面的一些事实对这个问题作了答复。从新乌达村到巴拉甘斯克（县中心）滑雪橇要一昼夜，再到位于伊尔库茨克—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干线上的济马火车站还需要一昼夜的时间。

济马火车站到托木斯克这条铁路长 1500 公里。当时，乘火车走完这段路程需要几昼夜呢？需要 3—4 昼夜。

这条路线的最后一段——从慕尼黑到日内瓦——长 400

公里。这就是说还需要走一昼夜。

现在我们来算一算，信件从托木斯克到慕尼黑（20世纪初列宁在此出版《火星报》）要走几昼夜。

在这方面我们有极为确凿的事实，下面列举一二：

安·伊·乌里扬诺娃 1902 年 12 月 20 日（7 日）从托木斯克写给《火星报》编辑部的信（第 919 号）走了 17 天，1903 年 1 月 5 日寄到。

弗·米·布龙纳（社会民主党人）1903 年 7 月 27 日（14 日）给《火星报》编辑部写信。该信（第 1350 号）于 1903 年 8 月 12 日寄到，走了 17 天。^①

结论是怎样的呢？结论只能是从新乌达村发出的信途经莱比锡到日内瓦至少需要三个星期。这就是说，关于“列宁同斯大林通信”的第二种方案即第二种说法是经不起科学验证的。

一封“短信”这个神话多么根深蒂固，我们仅举一例即可证明。德·沃尔科戈诺夫在《胜利与悲剧》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当然，斯大林能成长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列宁对他有很大影响。大家都知道列宁在 1903 年 12 月写给斯大林的第一封信，这封信是发往伊尔库茨克省新乌达村的，当时斯大林正在那里流放。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非常仔细地了解来自民族地区的革命者的情况，他从党报党刊上一些短小通告中和同志们的介绍中注意到了约·朱加施维里。他在自己

① 见《弗·伊·列宁和《火星报》编辑部同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组织的通信，1900—1903 年》，三卷本的《文献汇编》，1969 年莫斯科版第 2 卷第 528 页；1970 年莫斯科版第 3 卷第 442 页。

的信中向朱加施维里说明了党的工作中的一些迫切问题。”^①

引起列宁对斯大林加以注意的那些“党报党刊上一些短小通告”究竟是什么呢？原来是两篇文章。一篇题为《编辑部的话》，篇幅确实不长，1901年9月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麦撒墨达西社”的定期刊物《斗争报》上，未署名。另一篇题为《俄国社会民主党及其当前任务》，篇幅长，也未署名，发表在1901年11—12月的《斗争报》上。这两篇文章在40年代收入《斯大林全集》第1卷，但不能证明，这两篇文章的作者确实是斯大林，而不是拉多·克茨霍韦利或者亚历山大·楚卢基泽。

因此，列宁当时并无理由根据这两篇文章和斯大林的“同志们”的介绍认定这两篇文章出自斯大林之手。当时即无论是1901年、1902年还是1903年，斯大林的同志中没有人见过列宁也不可能向他讲述“热情的科尔希达人”的事。

值得注意的是，乌里扬诺夫家族中，除了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无人想去证实列宁同斯大林的“第一次通信”这件事是否真实。无论是克鲁普斯卡娅的回忆录，还是乌里扬诺娃的回忆录都没有提及此事。就连保存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在1903年11—12月同俄国党组织和社会民主党人通信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国外档案馆也没有这封“短信”的副本。

托洛茨基在论斯大林一书中指出，一封“短信”这件事显然是斯大林杜撰出来的。他说：“这篇故事从心理状况和风格上说都是幼稚的，很能代表斯大林的特点。倒填时序绝不

^① 德·沃尔科戈诺夫《胜利与悲剧——斯大林政治肖像》1990年世界知识出版社版第1卷第44页。

是这篇故事仅有的错误。柯巴 1903 年才到达流放地。其次，他究竟是在何时何地写信给侨居国外的‘一位好友’的也是一笔糊涂帐，因为他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以前在监狱里已经蹲了一年半的时间。^① 被流放的人从来无法事先知道自己会流放到什么地方去，因此柯巴不可能把他在西伯利亚的通信地址及时通知国外的朋友，而且柯巴在流放地只度过一个月，这段时间肯定不够他从流放地寄出信去又从国外收到回信。按照斯大林自己的说法，列宁的信不是属于私信性质，而是纲领性的。这类信的副本照例由克鲁普斯卡娅经手寄到一些地点去，而原件则保存在党的国外的档案里。为一个不知名的年轻的高加索人而出现一个绝无仅有的例外是极不可能的。然而档案里没有这封被柯巴‘按过去地下工作者的习惯’烧掉副本的信的原件（当时柯巴整整 24 岁）。但是最令人惊讶的是斯大林丝毫没有提到他给列宁的回信。从他自称敬若神明的领袖那里收到信后，柯巴按理是会立刻复信的。然而斯大林对这一点保持沉默。这种沉默不是偶然的：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的档案里没有柯巴的复信。当然，复信可能被警察中途截获。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警察司的案卷里应当保存一份副本，并且早就会复制出来刊载在苏联报纸上了。”^②

托洛茨基指出：“我认为整个人类历史上找不出和在斯大

① 此处，托洛茨基严重失误：实际上，约·朱加施维里 1902 年 9 月到 1903 年 3 月不在巴统监狱，而是在巴统由警察实行特别监视。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他参加了分裂以原（1900 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梯弗利斯委员会委员、医生亚历山大·沙季洛夫为首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统委员会的活动（见梯弗利斯侦察处处长、骑兵大尉拉甫罗夫 1903 年 2 月 9 日（22 日）给警察司司长的报告第 85 号，载于《1902 年巴统游行示威》一书第 246—247 页）。

② 托洛茨基（斯大林）1990 年莫斯科版第 1 卷第 79 页。

林领导下的克里姆林宫组织起来的规模庞大的谎言制造工厂相似，即使是略微相似的任何事物。而这座工厂的最主要的一项工作就是为斯大林制造一部新传记。”^①他的这段话可能恰恰是针对斯大林“创造”的这个事实而言的。

罗伯特·塔克尔很可能是根据托洛茨基对这封“短信”的说法，认为目前必须指出：“朱加施维里不可能在新乌达村度过的那么短暂的时间里既把信寄到国外又收到国外的回信，而沙皇行政当局也没有把流放的具体地点预先通知被流放者的习惯。”^②

正如我们所见，斯大林在60多年前所杜撰的一封“短信”这件事至今仍然为人们所关注，而且不仅仅是国内的研究人员。在这种情况下，要坚持真理，就应对斯大林十月革命前的传记中许多地方进行重新审查。令人遗憾的是，现在的研究人员几乎对此并未涉足。

原载《半人半马》杂志1992年5—6月

（李桂兰摘编）

① 托洛茨基《斯大林》1990年莫斯科版第1卷第79页。

② 罗伯特·塔克尔《通向权力之路（1879—1929）。历史和个人》1991年莫斯科版第121页。

反李森科学派斗争的史料

B. 伊萨科夫

C. 伊万诺夫 整理

E. 列文娜

原苏联《苏共中央通报》1991年第4、6、7期发表了一批反李森科学派斗争的史料，主要是当事人相互之间的往来通信。这些信件及其他文件对于我们了解当时苏联科学界的状况、矛盾和斗争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本刊从这一辑起分三次予以刊登。

战争快结束时，“苏联农业人民委员部总农艺师”特·杰·李森科的地位发生严重动摇。问题不仅在于他的兄弟投靠了占领军，战后又留在西方，甚至也不在于尼·伊·瓦维洛夫的弟弟谢·伊·瓦维洛夫走上了苏联科学院的领导岗位。起着重要作用的是国际间的合作有了加强，这是反希特勒联盟中几个大国之间军事和政治上相互协作的必然发展（而李森科完全否定“资产阶级科学”的成果）。国家国民经济的发展前景客观上也要求增强真正科学的研究工作的作用，在这一方面，新的科研干部走上领导岗位也起了促进作用。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科学院院士，遗传学家和植物育种学家安·罗·热勃拉克是反对李森科学派斗争的

组织者和带头人，他曾于1930—1931年在美国学习，其间也在加利福尼亚工学院在遗传学奠基人之一、染色体遗传学理论创始人、美国国立科学院院长摩尔根身边学习过。自1934年起，热勃拉克就主持莫斯科克·阿·季米里亚泽夫农业科学院遗传学教研室工作。

热勃拉克知道，要清除苏联遗传学中的严重状况，打破李森科在这一领域的垄断地位，没有国家政治领导的干预是不可能实现的。1944年底到1945年初，他给格·马·马林科夫写了一封长信，力图使中央委员会书记确信，要提高苏联科学的国际威望，遗传学的状况必须实现正常化。

写这封长信的依据，表面上是美国《科学》杂志开展了关于苏联生物学状况的论战，激起了许多苏联遗传学家的爱国主义情感。

这封信刊载如下，已作某些删节。

热勃拉克给 马林科夫的信

(1944年底—1945年初)

最尊敬的格奥尔吉·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

在苏维埃国家发展的整个时期内，我们党和政府的方针是保证国家科学的发展。

苏联科学是基于以往俄国科学家的传统发展起来的，它为世界科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我们的科学繁荣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起着重大作用，同时它又有巨大的国际

意义。

……我国科学家深入研究了某些科学领域，推动着世界科学发展事业和全人类进步事业的前进，在美英科学界中建立总的良好环境方面，他们也起了主要作用。理论科学方面的重大发现有着特殊的影响，因为它们证明一个民族科学上的成熟和整体上高度发展的文化。

在现代生物科学中，有关遗传性和变异性的学科即遗传学起着重要作用。苏联遗传学完全是在苏维埃政权时期发展起来的。在这一短暂时期内，苏联的遗传学达到了如此高的水平，使其能位居世界前列，仅次于美国。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动物学和遗传学教授戴恩发表了庆祝苏美友好十周年（1943年11月7日）的演说，这篇讲话是苏联遗传学高水平的客观见证，刊登在世界性杂志《科学》上面……

令人注目的是，在这篇友好的讲话中着重谈了苏联遗传学的发展问题，却只字未提李森科院士的著作。李森科院士进行的这场反对现代遗传科学的斗争在美国和英国实际已广为人知。戴恩从友谊角度考虑，不愿造成不良影响，在强调苏联高水平的遗传学和苏维埃国家在发展科学中的作用时，对李森科院士反对遗传学的斗争无任何评述。

但是，李森科院士反对遗传学在美国所造成的极其不良的影响，使戴恩教授的友好讲话，甚至戴恩本人都遭到打击。

哈佛大学萨克斯教授在同一杂志上撰文（1944年4月）声称，戴恩没有阐明李森科院士在苏联遗传学领域的消极作用，错误地论述了苏联生物学的状况。萨克斯这篇评论苏联遗传学状况的文章，在美国、英国以及苏联无疑引起了极大

关注。

萨克斯断言，苏联的生物科学是不自由的，因为它是处在政治因素压制之下。他认为，苏联遗传学受压制有三个原因：一是存在着否定异己科学的民族主义立场，二是对希特勒分子在其种族主义理论中歪曲遗传学原理的抵制，三是苏联政治哲学和体制的压制。

反驳这三条论点并不难。萨克斯文章的这些论点说明，或者是他了解情况不确实，或者是他个人有政治偏见。列宁在许多著名讲话中提到，要学习世界科学的经验。斯大林同志在谈到先进科学时，把伟大的俄国科学家的名字同其他国家的科学家联系起来。至于纳粹分子歪曲遗传学原理的问题，那么大家都知道，希特勒分子企图创立“雅利安人数学”、“雅利安人物理”等等。无论是谁未必有根据真的认为，苏维埃国家不承认这些科学，是因为纳粹分子歪曲其原理。似乎苏联认为遗传学原理与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相矛盾，因而遗传学好像遭到政治排斥，这种论题是错误的。与萨克斯的看法相反，众所周知，党和政府的领导人中，谁也没有对遗传学问题发表过意见。

关于遗传学的争论已持续了近10年，如果遗传学受到政治压制，这种争论就不可能发生。许多高校开设了遗传学课程，许多科研单位开展了遗传学的研究工作。

至于反对现代遗传学的斗争，在苏联那仅仅是李森科院士发起的。这场斗争的后果已经明朗。必须承认，李森科院士在遗传学领域的活动，他的多年好友普列津特同志断言遗传学似乎违背马克思主义原理，因而必须予以否定这类“哲理性”的讲话，米京同志断定现代遗传学是一种反动的、保

守的科学流派的发言，所有这些导致了苏联遗传学水平下降。毋庸置疑，如果不是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苏联科学院遗传学研究所所长李森科院士破坏遗传学的组织，进行粗暴的行政干预，如果不是1936年和1939年两场辩论的领导宣布遗传学为社会的反动学科，对遗传学横加诬蔑，那么，现在我们就能够目睹苏联遗传学会有极大繁荣，享有更高的国际威望。应当承认，李森科院士在遗传学领域的活动严重损害了我国生物学的发展，降低了苏联科学的国际威望。

应该注意的是，在辩论的全过程中，很多苏联遗传学家尖锐指出，李森科院士的遗传学观点是庸俗歪曲现代科学原理和达尔文学说的典型事例。李森科经常不准确地援引季米里亚泽夫和米丘林的话，因为他的观念同这些科学家的观点毫无共同之处。

李森科院士在遗传学领域起消极作用的活动，在国外与我友好的国家中造成这样一种印象，以至于萨克斯把苏联生物历史分为李森科前和李森科后两个阶段。关于第一阶段萨克斯写道：“苏联遗传学家、育种学家、植物栽培学家和细胞学家的工作值得高度赞扬，这与苏联政府大力支持科学是分不开的。”

萨克斯作为细胞学和遗传学方面的著名学者，对李森科院士的态度是：剖析他遗传学的观点，并给予全盘否定的评价。萨克斯称李森科的遗传学观点为陈旧落后的观点，他写道，即使李森科150年前发表这些观点，他的理论也没有任何新东西。为维护拉马克的地位，李森科自称是达尔文主义者。李森科的春化处理实验成了他否定现代遗传学的依据。据萨克斯称，春化处理美国还在上个世纪已经发明。现在，美

国和其他国家对春化处理进行检验，据萨克斯说，检验表明这种农业方法对实践毫无用处。萨克斯对李森科在“无性杂交”、“恋爱婚姻”等方面的一些论点是作为笑料引用的，并未加以评论。

在世界性刊物上登载对李森科院士遗传学观点坚决否定的评论已不是第一次。英国著名动物学家沃丁顿在1939年撰写的《现代遗传学导论》一书中写道，李森科有关春化处理的观念，“带有对遗传学的荒唐推测，否定现代遗传学的全部体系”。

多次宣布现代遗传学是伪科学的李森科院士被任命为苏联科学院遗传学研究所所长后，对世界科学舆论和苏联遗传学来说，情况更糟了。他精简了所有主要的工作人员，把遗传学研究所变成了庸俗地、放肆地攻击世界和苏联遗传科学的司令部。

在这封信的最后，请允许我发表几点意见，我个人认为，这些意见有助于发展苏联遗传学事业。

1. 必须保证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系统中遗传细胞学和育种学工作的开展，现在由于李森科院士不能容忍而无法进行。这些工作停滞不前会给农业科学和实践带来严重损失。

2. 更动苏联科学院遗传学研究所的领导人员，保证研究所能深入研究遗传学问题。

3. 保证遗传学论著的发表。有可能的话创办苏联遗传学杂志。

4. 鉴于李森科院士、米京等人讲话造成的危害，要为遗传学的研究工作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5. 尽可能地派遣遗传学家代表前往美国、英国进行经验

交流，了解理论问题方面和在农业运用方面的成就。

刊登在《科学》杂志 1944 年第 99 期，2572 号和 2561 号上的戴恩教授和萨克斯教授文章的英文原文及其译文附于信后。

最尊敬您的热勃拉克

(白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季米里亚泽夫农业科学院教授、1918 年入党的联共(布)党员)

地址：莫斯科，8，克拉斯诺斯图琴切斯基胡同 10 号 14 室。

此信未得到答复，热勃拉克于 1945 年 2 月初又写信给马林科夫，请他亲自接见以便向他汇报遗传学的状况。

热勃拉克给 马林科夫的信

(不晚于 1945 年 2 月 11 日)

最尊敬的格奥尔吉·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

几周前给您寄去了美国教授戴恩和萨克斯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两篇文章。因为在萨克斯的文章中有许多错误的总的政治性结论，所以看来有必要在同一杂志上给予答复。

我撰写了一个反驳萨克斯的初稿，寄给您审阅。可能的话，我国其他生物学家也可起草反对意见。如果有必要将这一反驳发往国外，那么，我来负责将最终文稿译成英文并组织大家签名。我认为，戴恩和萨克斯文章中提到的那些人应当在这份反驳文章上签名。

如果您要更详细地了解我国遗传学状况的话，请您亲自接见我，听取有关汇报。我之所以提出与您亲自交谈，还由于我们党的负责领导没有一人就遗传学问题发表过意见，而李森科院士、凯列尔院士等人却允许在公开发言中作出一些政治结论，使对这门科学不甚了解的听众不明是非。

最尊敬您的热勃拉克

(白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季米里亚泽夫农业科学院教授)

莫斯科，8，克拉斯诺斯图琴切斯基胡同 10 号 14 室。

这封信送到了收件人手中。信上有一批示：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科学处也隶属该部）部长格·菲奥·亚历山德罗夫：“请阅这些材料并同我交谈一次。马林科夫。2月11日。”

热勃拉克是否同马林科夫交谈过，未能查明，但 1945 年 4 月 16 日热勃拉克受到维·米·莫洛托夫接见，向他汇报了遗传学的状况，遗传学对发展我国文化和生产力的重大意义，这一点是清楚的。

热勃拉克自 1945 年 9 月 1 日起，在保留季米里亚泽夫科学院教研室领导职务的同时，到党中央机关来工作，这表明

上层领导对遗传学的态度有所改变。热勃拉克任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处长职务一直到 1946 年 4 月。

虽然李森科在尼·伊·瓦维洛夫被捕后于 1940 年起主持苏联科学院遗传学研究所的工作，并在 1942 年被接纳为科学院主席团成员，但他从未得到科学院人士的支持，在苏联科学院中没有威信。

苏联科学院院长谢·伊·瓦维洛夫院士和学术秘书尼·格·布鲁耶维奇院士考虑到这种情况，于 1945 年 12 月提出了意见书供党中央和政府审批，要求更动苏联科学院主席团成员，因为它的有效任期已满。他们提议选举工作能力强的院士进入主席团，提出了要更换主席团某些成员的问题，其中就有李森科和米京院士，因为他们不参加主席团的工作并未能作为科学家在院士中间享有威望。

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对苏联科学院领导的意见进行了审议。该部部长亚历山德罗夫慎重呈文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

亚历山德罗夫呈 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

（1945 年 12 月）

瓦维洛夫和布鲁耶维奇院士关于上列院士不宜选为主席团新成员的意见，本来是可以同意的。

李森科院士的问题是个特殊问题。他作为全苏农业科学院院长，选为新的主席团成员本来是合适的。但是，应该考

虑到在不记名投票选举中可能出现他的反对派。李森科虽然是主席团成员，但未参加本届主席团的工作。很多院士对李森科的科研工作持怀疑态度，遗传学在其他国家蓬勃发展，而在苏联受到压制，农业科学院土崩瓦解，成了农科院主席团的世袭地，而不再是科学家工作和科研的集体，他们把一切都归咎于李森科；指责他对待受人尊敬的苏联科学家态度粗暴，在纪念大会上接待外宾时举止不当。院士们都清楚，苏联科学院院长瓦维洛夫院士和副院长、生物学分院学术秘书列·阿·奥尔别利院士并不支持李森科院士。在上层主席团选举中，李森科院士尽管有权威机关支持他为候选人，但在不记名投票中只获得 60 票中的 36 票，少于其他任何人，这一点从 1942 年主席团选举投票结果所附资料中能看到，恐怕在这次选举中李森科院士当选的可能性更小了。

要使候选人李森科院士获得所要求的多数选票，给科学院主席团成员下达专门指示，对院士们做认真的工作是必要的……

亚历山德罗夫

总的看来，专门指示是下达了，因为李森科又重新当选为苏联科学院主席团成员。

在此期间，苏联科学院主席团不顾李森科的异议，进行了讨论、审议并向政府提出了建议，除现有的李森科遗传学研究所之外建立新的遗传学和细胞学研究所，同时又提出，在科学院组成中给“遗传学”和“作物细胞学”专业补两个名额，以便加强这些科学领域内真正科学的研究工作。

热勃拉克给 马林科夫的信

(1946年3月1日)

鉴于即将选举苏联科学院正式院士和通讯院士，我请您关注我国遗传学科学的状况。

遗传学是现代生物学中主要学科之一。它研究有机体的遗传和变异过程，因而对弄清生命物质的本质，对掌握植物和动物的进化和育种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

遗传学问题的研究受到世界的极大关注。美国、英国、斯堪的纳维亚和其他国家的许多遗传学所和实验室加紧工作，出版了很多书籍和期刊。遗传学探索范围包括普通生物学的问题，还研究作物新品种和种类的培育方法。它深深扎根于医学的许多分支。甚至人类避免癌症这种研究任务也与遗传学有紧密联系。细胞核及其遗传机构染色体是导致癌症发生的始因。

在评价遗传学对农业的意义时，美国农业部《年鉴》编辑部写道：“遗传学已成为生命科学的重要分支，作为克服困扰着人类的那些苦难和危险的有力手段，作为求得高度富裕的手段，它可同化学和医学媲美。”

应当特别指出的是，在遗传学方法方面现在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具体的说，发明了通过扩大细胞核培育作物种类和品种的方法。英国一些科学家把现代遗传学这一成就同青霉素的发明和原子内部能量的利用相提并论。

遗传学在苏联发展很顺利。但是，近9年来其状况趋于恶化。原因是众所周知的遗传学论战，论战结果使工作规模和干部培养骤然减缩。遗传学研究的组织遭到破坏，这个领域的研究人员四处流散。

为了发展我国整个生物科学和农业科学，必须从根本上改善遗传学状况。那些积极为苏联遗传学工作的科学家当选为苏联科学院正式院士是改善这种状况的重要因素。

苏联遗传学国内两大流派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外都走在前列。一个流派是研究遗传学和作物细胞学的，另一流派是研究进化遗传学的。按照遗传学这种专业的划分，选举的两名苏联科学院正式院士能从根本上使遗传学工作的环境臻于完善，也是建立和繁荣我国这门科学的基础。

如果不能设置两名正式院士的员额，那么请您至少设置一名“遗传学和作物细胞学”专业的员额。

将遗传学和作物细胞学分离出来作为一门独立学科之所以必要，是因为这样划分能明确苏联科学院遗传学工作今后的方向，能使它们接近农业实际需要。

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处长
热勃拉克

苏联科学院1946年11月29日至12月4日举行的院务会议上进行了院士选举。苏联科学院遗传学专业正式院士的名额没有确定下来。但在生物学部中拨出两名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的员额，其中“遗传学”专业一名由尼·佩·杜比宁当选，“遗传学和育种学”专业一名由阿·阿·阿瓦基扬当选。

战后，李森科许许多多毫无根据的许诺和他的理论体系

的伪科学性越来越被苏联科学界代表和中央委员会科学处工作人员所认识。在当代文献中，当分析遗传学家反对李森科在科学上的霸道而开展的斗争时常提到阿·阿·柳比谢夫和弗·普·埃弗罗伊姆松两人的名字，他们于1947年给党中央寄去了一份自己的论文稿，详尽分析了李森科的错误，并对这些错误给国家带来的损失作出评估。在苏共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中的确有相当数量论著批评李森科的错误，但其中前面提名的两人的著作我们暂时未能找到。《自然科学史和技术史问题》杂志1989年第1—4期刊登的埃弗罗伊姆松的著作以及纪念柳比谢夫诞辰100周年而撰写的文章（《自然》杂志1990年第5期）表明，两位作者是在1953年至1954年间完成自己的著作的，即在斯大林主义开始败落和国家政治方针预计改变的情况下完成的。毫无疑问，柳比谢夫和埃弗罗伊姆松的著作周详地论证了李森科的霸道给科学带来的后果，但这些著作实际上已是在另一种历史时期，在镇压制度削弱的条件下完成的，而发表这些著作只有在改革的情况下才有可能。

许多科学家在战后时期对李森科的观点展开了尖锐批评。这些材料绝大部分保存在党中央档案馆。

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士、党员布·姆·扎瓦多夫斯基，好像不久前还支持李森科，他也写了两篇长文：《论遗传性、遗传变异及李森科的其他错误》、《达尔文主义和种内竞争》。但他试图发表文章的各种努力都毫无结果，于是他求助于安·阿·日丹诺夫。1947年4月15日宣传鼓动部副部长兼中央科学处主任斯·格·苏沃洛夫在给日丹诺夫准备的情况报告中是这样写的。

苏沃洛夫呈日丹诺夫

(1947年4月15日)

联共（布）中央书记日丹诺夫同志：

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士、教授、联共（布）党员扎瓦多夫斯基请求给《普通生物学》杂志^①编辑部下达指示，要求刊登他的《论遗传性、遗传变异及李森科的其他错误》和《达尔文主义和种内竞争》这两篇批评李森科院士在遗传学和进化问题方面观点的文章。

扎瓦多夫斯基教授诉说，其中第一篇文章早在1944年他就寄给《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社^②，但没有发表。1945年初这篇文章转给苏联科学院《普通生物学》杂志编辑部，至今搁在那里无进展。他试图争取发表专门分析李森科晚期著作的第二篇文章，同样毫无结果。扎瓦多夫斯基强调说，杂志编辑部没有向他指出上述文章的任何错误或不足，实质上没有给予否定。这些文章甚至博得编辑部领导人员的同感。无原则的观念，不能批评在国家身居高位的李森科，阻碍了这两篇文章的发表。扎瓦多夫斯基教授认为，对待科学批评的这种态度会给苏联科学带来严重损失，导致在科学问题上丧失布尔什维克原则性，在科学刊物上培育“照顾情面”的批评制度。

扎瓦多夫斯基同志打算发表的理论问题，不能认为是已

① 苏联科学院生物学部机关刊物，1940年创刊。

② 哲学和社会经济杂志，1922年1月至1944年6月在莫斯科出版。

彻底弄清的。因此在专门刊物上进行探讨是完全必要的。在生物科学中，对遗传的本质和机制，对进化过程中种内竞争的作用，各种观点迥然不同。扎瓦多夫斯基教授的观点博得苏联生物学家广泛支持。扎瓦多夫斯基对李森科理论论著的批评并无侮辱之意，而是完全集中在分析科学论据上。

科学家们多次向联共（布）中央申诉，抱怨他们批评李森科某些科学观点的文章由于扎瓦多夫斯基已指出的那种考虑不能在杂志、报纸上发表（其中包括白俄罗斯科学院院士热勃拉克教授的信，苏联农业科学院院士彼·米·茹科夫斯基教授的信，齐钦院士的申诉书等等……）。

对这些申诉信以往的做法是转交给编辑部来解决。但即使编辑部同意这些批评文章，也不能刊登发表。其中，《普通生物学》杂志编辑奥尔别利院士实质上也不反对扎瓦多夫斯基的上述文章。可是，正如他在科学处说的那样，鉴于李森科的特殊地位，批评他的理论论著是一件令人不愉快的事情，所以编辑部没有联共（布）中央的指示不能发表批评文章。

很多生物学家声称，他们实际上已无可能讨论生物学重要问题和维护被李森科在报刊上所反对的科学中的理论观点，在生物学上形成了一个流派的垄断状况。科学家们指出，由此可明显地看出，李森科同志生物学方面的理论观点是受到官方赞同的。

我认为向您汇报科学家们的这种心情很有必要。我的看法是，对有争议的生物学问题在专门报刊上进行讨论，对科学的发展是有益的。

请指示

斯·苏沃洛夫

科学中已显露的情况变化不能不使李森科和他的有力庇护者心神不安。苏联农业部长伊·阿·别内迪克托夫、苏联农业部第一副部长巴·巴·洛巴洛夫、苏联农业部副部长阿·伊·科兹洛夫写信给联共（布）中央，抨击了参加 1947 年 3 月 21 日至 26 日在莫斯科大学举行的第二次遗传学会议的与会者和组织者。农业领域行政命令体制头头们的密报原文中仍然利用了以后在那臭名昭著的 1948 年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例会上所提出的那些“论据”：指责遗传学家脱离实际，轻视季米里亚泽夫和伊·弗·米丘林的遗著，甚至迷恋于繁殖果蝇。根据这个建议苏沃洛夫给日丹诺夫一封详尽的情况报告。

苏沃洛夫呈

日丹诺夫

（1947 年 4 月 15 日）

联共（布）中央书记日丹诺夫同志：

别内迪克托夫、洛巴诺夫和科兹洛夫同志请求责成工作组，在李森科院士参加下，对今年 3 月 21 日至 26 日在莫斯科大学召开的第二次遗传学会议的材料进行审议，并给这次会议作出应有评价。

他们提出这个请求的理由是，会议的开幕和举行是委托给在优生学上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的阿·谢·谢列勃罗夫斯基的。他们把李森科院士的缺席以及没有论述达尔文学说、

季米里亚泽夫学说和米丘林学说的报告，同谢列勃罗夫斯基担任会议主席联系起来。来信者对在遗传学会议上的报告有无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表示怀疑。其中，对安排那些研究果蝇遗传性的报告这种做法感到疑惑不解。

由于这封来信，弄清了下列事实。

莫斯科大学各系年年都举行各种学术会议。本学年，仅生物系就举行了三次学术会议：鱼类学和水生生物学会议、发育进程会议和遗传学会议。年底前预计还要举行达尔文主义基本问题讨论会。由此可见，遗传学会议是莫斯科大学各系举行的许多学术会议之一。这次会议是由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谢列勃罗夫斯基教授所领导的遗传学教研室组织的。召开莫斯科大学第二次遗传学会议的事宜是生物系学术委员会决定的，会议议程也是他们确定的。会议召开前三个月，遗传学教研室分别邀请遗传学著名专家在会上作报告。其中也给李森科院士以及 25 名信奉他理论观点的人发了邀请。其中有些人接受了邀请，不仅出席了会议，而且作了报告（如：努日金、库什涅尔、马卡罗夫、菲利波夫同志）。参加会议工作的还有苏联著名遗传学家：齐钦院士、白俄罗斯共和国科学院院士热勃拉克、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杜比宁、纳瓦申教授、格列姆博茨基教授等等。

会议的实际倡议者和领导者是遗传学教研室副主任沙皮罗教授和党组书记阿利哈尼扬副教授。谢列勃罗夫斯基长期重病在身（不能走路和说话），只出席了两次会议，他的开幕讲话稿由旁人代读。发言稿中充满了爱国主义精神，指出了米丘林在科学中的显著作用，指明了联共（布）中央全会对农业科学提出的任务，号召遗传学家完成这项任务。联共

(布)预备党员谢列勃罗夫斯基在卫国战争时期失去了志愿上前线的唯一女儿。那些写信人强调指出的他的优生学错误，是发表在1929年《医学—生物学》杂志上的第一篇文章中出现的。谢列勃罗夫斯基教授承认这一错误，并在1931年至1932年多次在农业科学院和莫斯科大学尖锐批评自己的错误，当时他是该院院士。在以后的年代里又多次作了自我批评。1936年，在全苏农业科学院第四次例会上公布了他的自我批评信件。自1929年后，谢列勃罗夫斯基教授再没重犯优生学错误。与会者不能对谢列勃罗夫斯基18年前犯的错误承担责任。

会上的报告按内容可分为两部分：40份报告论述理论问题，38份报告论述畜牧业、植物栽培学和医学的实际问题。

理论问题报告研讨达尔文主义实验原理、突变过程的物理学和化学、细胞核和染色体组织的发育规律。许多报告批判了资产阶级科学家在遗传学中的空想倾向和唯心主义倾向以及种族主义“理论”。会上的确没有专门论述米丘林和达尔文的报告，但在许多发言中发展了他们的方法。

别内迪克托夫、洛巴诺夫和科兹洛夫同志根据一些报告专门研讨利用果蝇的遗传性，指责会议脱离实际任务。但是并非这些报告决定会议性质。此外，选择果蝇作为研究对象是完全合适的。这是由于果蝇每隔10天就繁殖新一代，从而易于跟踪研究代代相传中遗传的变异。养育果蝇代价低，工作方法简单并已被较好的掌握。果蝇在遗传学上是一种方便的实验研究对象，就像老鼠、蛤蟆和豚鼠对生理学家一样。具体的说，克柳耶娃娅和罗斯金所有的初步实验是用老鼠进行的，谢切诺夫著名的中枢神经抑制实验是用蛤蟆进行的。

会上研究实际问题的报告讨论新种育种问题，探索环境

和生态因素对提高畜牧业产品和作物产量的作用。很多报告人提出了有实际价值的意见。例如，萨哈罗夫同志报告他取得了能抗恶劣气候、不落粒的所谓四倍体荞麦，它同普通的品种相比，多半倍至一倍收成。纳瓦申教授报告取得了四倍体橡胶草，含胶量比以往所知的橡胶草高百分之六十。阿斯陶罗夫教授报告他取得了能高产丝的蚕。格列姆博茨基教授报告他查明了卡拉库尔羊的珍贵品种——锡拉兹羊大量死亡的原因，并指出，他研究出防止死亡的方法保护极珍贵的细毛羊种羊——泊列考斯羊，给育种农场带来了数十万卢布收入。布·恩·西多罗夫和尼·尼·索科洛夫报告他们获得的蓖麻新品种，产量比通常多一倍至一倍半。姆·尔·卡尔普报告他培育了杂交玉米新品种，在许多代内能稳产高产。

会上，遗传学家还作了其他报告，提出了植物栽培学和畜牧学方面很有实际价值的意见。

上述一切表明，莫斯科大学举行的遗传学会议是极为有益的，而别内迪克托夫、洛巴诺夫和科兹洛夫同志企图责难会议，这是不公正的，依据的信息是片面的。

斯·苏沃洛夫

情况就是如此，对科学家的指责在当时未获支持。李森科头上的乌云依然越来越密。

关于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状况的问题于1947年4月16日提交到联共（布）中央组织局的会议上。中央负责同志草拟了一份专门报告，呈联共（布）中央书记日丹诺夫、阿·阿·库兹涅佐夫和格·米·波波夫，报告着重分析了农业科学部门状况，提出了补选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士和通讯院

士问题。

联共（布）中央的专门委员会根本没有推举出主要技术作物、果树栽培学、农业机械化和经济学方面的科学家。现在，国内在农业科学各个领域工作的有 300 多位教授和博士，完全能够推举最为适合的科学家入选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士和通讯院士。

目前，根据联共（布）中央二月全会《关于战后时期振兴农业的措施》的决定，为全面改善农业科学院在农业各个领域的活动，增补农科院新的院士和通讯院士极为必要。

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的工作大大落后于农业对它提出的需要和要求，不从事畜牧学、农业机械化、农业和经济组织方面的学术问题研究。农科院封闭在一个仅与李森科院长的研究有关的农业生物学问题这一狭小范围内，因此，它不再成为如条例所要求的“苏联农业方面的最高科学机构”。农业科学院研究的学术问题范围狭小，以及科学院院士间意见分歧，导致其中多数人实际上中止了院内工作（如：勃里茨克、普里亚尼什尼科夫、斯克里亚宾、扎瓦多夫斯基、谢列勃罗夫斯基、索科洛夫斯基、利西岑以及其他院士）。

农科院很多研究所由那些科学上无甚名望、没有学位和职称的人主持工作。当时，农业科学院建立了 10 个常设分部，现在这些分部实际上已无所事事，各分部形式上由著名学者领导，而实际工作由学术秘书主持，他们中仅 4 人获得科学硕士学位。其他学术秘书根本没有足够素养开展科研工作，某些分部领导试图以水平更高、业务娴熟的农业专家替代不称职的学术秘书，但没有得到院长李森科院士的支持。

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的组织活动是由 1934 年批准的条

例规定的。这个条例自批准之日起没有重新审议过，当时大部分内容已过时。条例没有规定院集体领导的某种形式，以及不记名投票方式选举院士、通讯院士和院长的制度。根据条例，院的领导是院长，他在两名助手——副院长和学术秘书协助下领导全院工作。这个条例是独特的，因为在苏联现有的另外14个科学院中（其中包括专业科学院）规定了院士选举制和领导机构——主席团和分部选举制。

两位副院长之一尼·瓦·齐钦因同李森科院士有原则分歧和组织分歧，实际上不在院内工作，最近一段时间甚至不出席农科院全会。

关于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 状况问题的报告

(1947年4月16日前)

呈联共（布）中央书记

日丹诺夫同志

库兹涅佐夫同志

波波夫同志

根据联共（布）中央书记处1946年11月28日的决定^①，研究了别内迪克托夫、阿·斯克沃尔佐夫和科兹洛夫同志对

^① 联共（布）中央书记处在1946年11月28日的会议上讨论了“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问题，决定“责成由博尔科夫（召集人）、苏沃洛夫和索罗科组成的委员会了解苏联农业部长别内迪克托夫同志、苏联技术作物部长斯克沃尔佐夫同志、苏联畜牧业部长科兹洛夫同志对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问题的建议，研究这一问题，并在今年12月15日前将研究结果上报联共（布）中央书记处”。

补选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士和选举通讯院士的建议。

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建立于1929年。1935年苏联人民委员会批准科学院院士人数为51人。目前科学院院士仅21人。科学院建立以来根本没有进行通讯院士的选举。在科学院院士中仅有一名谷类学家、一名土壤学家、一名蔬菜栽培学家。

根据上述情况，完全有必要补选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士和选举通讯院士。

这种措施能使农科院的活动全面活跃起来，而选举过程本身将有利于开展对农业科研工作中的缺点的批评。研究这个问题时，我们和农业口的几位部长也未能说服院长李森科同志就此事向苏联政府和联共（布）中央作出相应的报告。

当时，在李森科院士得知别内迪克托夫、斯克沃尔佐夫和科兹洛夫建议补选科学院院士和选举通讯院士后，写信给苏联部长会议，声称在苏联政府解决我国农业科学体系的方法论问题和组织问题之前，他不同意补选院士。李森科院士就此事写道：“我重申，不仔细研究和解决这些问题，单靠增补院士不能使农业科学的发展比现状有所好转。”所谓方法论问题，李森科院士是指农业科学中存在的两种学派的斗争。其中的一个学派，李森科称为米丘林学派（达尔文学派），另一派称为孟德尔—摩尔根学派（新达尔文学派）。

李森科院士写道：“我们所研究的科学上的米丘林学派，源于米丘林关于有机体发展学说和威廉关于土壤的形成、发育及与植物、微生物相互关系的学说。”李森科院士对自己与“新达尔文主义者”的原则分歧表述如下：

“我们认为活体中没有任何单独的或特殊的遗传物质。所

谓植物和动物的遗传性，我们理解是活体的特性——生活、生长、发育，而不是特殊的物质。所有这些都是经过活体同外界进行物质交换实现的。活体在生长和发育过程中的形成要经过吸收同化，换句话说，有机体及其各种特性和本质经过吸收同化养料而形成。有机体按自己特性和遗传性从外部环境中选择它所需要的条件。有机体在新的下一代中如何重新形成，其各种特性包括它的遗传性也在下一代中如何形成。所以，改变生活条件和新陈代谢条件，就可改变有机体的构成，从而，与外界条件的作用相适应，有机体的遗传性即本性发生定向变异。

第二种学派，即孟德尔—摩尔根学派，坚决否定这种观点的正确性。大量的实验资料证实米丘林学派在科学中的正确性并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际价值，然而这些资料却遭蔑视、抛弃或抹煞，似乎并不存在。

在农业生物学中称之为孟德尔—摩尔根学派或新达尔文主义的学派，对遗传性理解为特殊物质，单独存在于有机体一般物质之外。孟德尔—摩尔根学派的基本原理是，活体由性质不同的两部分物质组成：一般的众所周知的本体和非一般的、无人知晓的遗传物质。一般物质（本体）适应外界条件的作用而发生变化。遗传物质则不受那种影响。因此，根据这一学说，生活条件不能改变有机体本性。该学说立于空想的基础之上，当然在研究工作中不可能起作用。

关于植物和动物机体本性的空想学说，形式上是合乎逻辑的。所以它较之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基础上的米丘林和威廉学说，更易于被接受。还需补充的是，孟德尔—摩尔根主义的各种变调，令人遗憾地在我们所有高等院校中讲授，而

米丘林遗传学课程实质上根本没有列入教学。由此可见，为什么米丘林学说拥护者在科学界只占少数。

简而言之，无论是农业部门还是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所属的研究机构中，农业生物学的状况就是如此。”

按李森科院士的看法，同农业生物学家的这些分歧迫使他反对选举院士。后来，在联共（布）中央某一委员会会议上李森科承认增补新院士是必要的，但提议不进行选举，而是由苏联部长会议下达有关决定委任院士。

我们认为，列宁农业科学院的现状无助于解决有关振兴农业科学的重要问题。我们的看法是，无论怎样看待农业生物学方面的争论和分歧，总不能让这些争论决定我国整个农业科学的命运，置农业科学院于无所事事的境地。所以，我们支持农业口几位部长关于在最近期间补选全苏农业科学院院士和选举通讯院士的建议。

为了领导这次选举以及为了重新审定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大为过时的条例，我们建议成立联共（布）中央的专门委员会。

博尔科夫
苏沃洛夫
索罗科

1947年4月

联共（布）中央组织局 会议记录摘要

1947年4月16日

2. 关于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状况。

（博尔科夫、李森科、日丹诺夫、马林科夫同志）

1947年7月上半月，在联共（布）中央组织局听取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李森科同志关于农科院活动的报告。

根据对李森科同志报告审议情况决定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新院士的选举问题。

为组织局准备的材料不会令人怀疑：等待李森科的是一次严重打击。他也正在采取对策。他起草了一篇关于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活动的报告，附有情况简报，于1947年6月14日呈报日丹诺夫。组织局会议没有举行。

（待续）

原载《苏共中央通报》1991年第4期

（杨世钧译 袁坚校）

1933年清党时有关 布哈林的材料 [续]

六

关于布哈林同志参加清党的速记记录

1933年11月21日

尼·伊·布哈林：同志们，我发言之前首先要声明，我认为，我们党的组织提出我参加清党的问题是完全正确的。大家知道，中央委员一般是不参加清党的，但如果哪一个团体要求某一位中央委员参加清党，那么这位中央委员就应当参加清党。我认为，我们党的组织向上级机关提出这一问题并要求在这次清党会上对我进一步审查，这样做是正确的，是基于以下几点考虑。

第一，我们国家的整个形势，社会主义进攻的继续，这是一方面；第二，国际危险开始露头，这就要求我们的党、我们党的全体领导成员现在同过去一样地团结一致，甚至比过去更加团结一致。

清党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为清党会使党的队伍得到整顿，甩掉一切包袱，像我们党这样一个大党，包袱肯定是有的；定期清党是我们党发展的规律。因此提出这个问题是正确的，因为我，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在党内的活动中，犯了一系列极其严重的错误，这些错误在政治实践上是极其有

害的。因此我在报告一开始先声明，我毫无保留地拥护党的组织要求我参加清党的决定。

首先请允许我简单地谈谈自己的经历。我不能讲得很详细，因为在我的年龄履历和党内政治履历中各种各样的事情太多，我只有拣主要的讲。

我是知识分子；父亲是教师，母亲也是教师，我出生于1888年。早在孩提时代我就同政治有了联系。从1904年起，我开始对有关问题发生兴趣。当时正处于革命前的形势，我在莫斯科一所中学上5—7年级时，先是积极参加非党革命小组，而后被卷入1905年革命，我这个中学生特别积极地参加了集会、罢工、街头游行，当时就被推举为莫斯科中等学校学生组织的一名领导人，后来又成为全国中等学校学生组织的一名领导人。这个组织起初是个非党组织，参加者中有各种流派的代表人物，后来这个组织发生分裂，分离出一个在全俄各地有分支机构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我也相当快地被推举到了该组织的中央领导岗位。在当时参加的同志当中，有索柯里尼柯夫同志^①，当时他在全俄组织中央委员会。因为整个斗争遵循的是社会主义方向，就由这个组织来领导，而这一组织在最后几年则处于莫斯科党组织的领导之下。

1906年我在莫斯科河南岸区入党，担任宣传员、鼓动员、组织员，为举行一系列罢工而奔波，并在毕业考试期间组织了莫斯科河南岸的壁纸工厂的罢工。1908—1909年我先是被

^① 格·雅·索柯里尼柯夫（布里利安特）（1888—1939）——190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1917年以前在莫斯科和国外从事党的工作。十月革命后从事经济和外交工作，1922—1926年任俄罗斯联邦（后为苏联）财政人民委员。1936年被开除出党。因所谓的“平行反苏中心”案遭到迫害和受审。死后恢复名誉。1988年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决定恢复其党籍。

增补为莫斯科党委会成员，因为我当时已具有丰富的党内政治经验，也是为了进行日益激烈的同召回派的斗争以及同孟什维克的斗争。

后来我入选莫斯科委员会，担任莫斯科河南岸区代表和莫斯科河南岸区责任组织员。我作为区的代表成了莫斯科委员会成员。

我于1909年5月23日（旧历）被捕。出卖我们的是一个大奸细^①，详情就不必说了。过了些日子我取保释放。此后莫斯科组织决定保护我，就是不让我从事秘密工作。我成了把整个合法工作统一起来的中心人物。当时布尔什维克在合法机关中的工作是驱逐取消派。我亲自参加并把各合法机关中的整个工作统一起来。我成了合法机关中的这一工作同地下中央之间的联系人，当时中央的代表是后来被高尔察克枪杀的雅柯夫列夫^②，他是瓦·尼·雅柯夫列娃^③的弟弟。

时隔不久我再次被捕。这一次莫斯科布尔什维克组织遭到完全破坏，一夜之间逮捕了将近86个人^④。许多人记得，我

① 布哈林指的是罗·瓦·马林诺夫斯基（1876—1918）——奸细，莫斯科保安处密探，1912年当选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第四届国家杜马代表，1914年辞去代表资格后出国，在这之后被开除出党，1918年回到苏维埃俄国，经法庭审判后被枪决。

② 尼·尼·雅柯夫列夫（1886—1918）——1904年入党。俄国第一次革命时期在莫斯科从事党的工作，1918年任西伯利亚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在高尔察克分子夺取政权后从事地下工作，1918年被白卫分子逮捕和枪杀。

③ 瓦·尼·雅柯夫列娃（1884—1941）——1904年入党。在莫斯科从事党的工作，1916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莫斯科区域局书记，1918年在莫斯科肃反委员会工作，1920年12月至1921年4月任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书记，1918年加入“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在1920—1921年的工会争论期间加入“缓冲集团”，1924—1926年追随托洛茨基，后同反对派决裂，1937年被开除出党，被镇压，死后恢复名誉，1958年恢复党籍。

④ 原件如此。——俄文版编者注

们是怎样从四面八方给抓来而在保安处会台的。我被关了相当长的时间，莫斯科大多数区警察局和莫斯科两个监狱——塔甘监狱和布特尔监狱我都蹲过。

由于第一个案子我是取保候审的，第二个案子他们不想送我去流放，尽管第二次从表面上看不是法律案子。我设法争取到把我送去流放。我流放的地方是奥涅加。由于第102条对我有威胁，我为此案委托的律师给我发来暗语电报，说我有被判处苦役的危险，确实有大批同志后来被判处苦役。

我从奥涅加逃走。辗转到了莫斯科。我在莫斯科秘密住了将近1个月，便逃到国外。在国外，我到过欧洲各国，后来又来到美洲各国以及亚洲的部分国家。每到一处，我都在布尔什维克地方小组工作，因为我们有一些小组同住在巴黎并代表布尔什维克组织中央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保持着联系。我同中央保持不间断的联系，并以同国外的俄国侨民保持联系为目的。我同伊里奇直接相识是在他住在克拉科夫和他后来住在扎科帕内时，而且在侨居国外期间始终同他保持着联系。1912年我是中央机关报^①出席德国社会民主党开姆尼茨代表大会的代表。

这一时期我开始了更紧张的写作活动。我开始在《真理报》、在我们党的合法刊物《启蒙》杂志^②、还有卡·考茨基^③主编的《国际社会民主党人》杂志工作，当时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开始，大家都为这家杂志写文章。这是我工作

① 指《真理报》。

② 《启蒙》杂志——布尔什维克的合法理论月刊，1911年12月至1914年6月在彼得堡出版。

③ 卡尔·考茨基（1854—1938）——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领袖之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的开端。

在维也纳我同托洛茨基^①进行了斗争。当时在维也纳的有现任驻美国全权代表的特罗雅诺夫斯基^②和现在莫斯科工作的一位叫瓦西里·索洛维约夫的印刷工人。战争爆发前不久，战前1个月或2个月，我在奥地利被捕并被关进位于维也纳附近的“梅尔”军事要塞。过了一段时间我被逐往瑞士。

这次被捕和被逐出奥地利之后，我就同中央委员会住在一起，担任党中央机关刊物的编辑，为当时的《共产党人》杂志^③撰写有关社会民主党的文章。

我出席了伯尔尼代表会议^④。这一阶段的末期我同弗·伊·之间产生了分歧，在这些分歧中我的意见是错误的。这些分歧涉及和平口号问题。我认为，国内战争的口号同和平

① 列·达·托洛茨基（勃朗施坦）（1879—1940）——189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7—1927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1923—1924年成为党内反对派的首领。1927年被开除出党，1929年被逐出苏联。死于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务之手。

② 亚·安·特罗雅诺夫斯基（1882—1955）——190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0年侨居国外，住在瑞士、巴黎和维也纳。1927—1933年任苏联驻日本全权代表，1933—1938年为驻美国全权代表，后来从事教学和写作。

③ 1915年9月出版了唯一的一期《共产党人》杂志（合刊）。出版计划由列宁制订。编辑部成员有资助出版的格·列·皮达可夫和叶·波·博什，以及尼·伊·布哈林。杂志停刊是由于列宁同编辑部在民族自决权问题上产生了分歧（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第307—309页）。

④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支部代表会议是根据列宁的倡议于1915年2月召开的。出席会议的还有：伊·费·阿尔曼德、格·雅·别连基、尼·伊·布哈林、格·叶·季诺维也夫、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尼·瓦·克雷连柯等人。列入议程的主要是战争和党的任务问题。列宁坚持和发展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宣言《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论点，这些论点获得了一致赞同。布哈林在提纲中反对民族自决权的要求，反对最低纲领的要求，宣称这些要求和社会主义革命是矛盾的，列宁称布哈林的提纲“荒谬绝伦；可耻；半无政府主义”（《列宁全集》第2版第47卷第273页）。布哈林的提纲在代表会议上没有得到支持。

口号并不矛盾。弗·伊·指责我是半无政府主义^①，因为我认为进行争取民主要求的斗争的同时必须直接进行社会革命。伯尔尼代表会议上提出反对资产阶级民主的斗争是我们最主要的目的的问题。当时我还有一个重大的分歧意见，就是关于民族问题的分歧意见。我同国际社会民主党即波兰社会民主党、德国社会民主党、荷兰社会民主党和斯堪的纳维亚社会民主党组织的左派一起反对民族自决权，说这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不可能实现的。我提出一个口号：民族自决权就是偷偷地推行保卫祖国的原则，因为我认为，这一权利不值得保卫。这里主要的错误是，我们对革命运动发展进程的多样性毫无认识，这一运动既包括无产阶级革命，也包括民族战争、武装起义，这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一篇名著^②中已作出过阐述。围绕这一问题在《共产党人》编辑部内产生了分歧。

在经历了一连串的磨难之后我转入了秘密状态并离开瑞士。从那时起我的名字不再是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而改为摩西·阿贝·平库斯·多尔哥列夫斯基，我穿越了瑞士、英国和法国等国的边界。结局并不十分顺利，因为在纽卡斯尔我在即将登船时被捕，不过最后还算比较顺利，因为我已学会熟练地签署摩西·阿贝·平库斯·多尔哥列夫斯基这个名字，他们便决定把我放了，但在护照上盖了个黑色印章，表示我是嫌疑分子。

① 见列宁给亚·加·施略普尼柯夫的信（《列宁全集》第2版第47卷第273页）。

② 这看来是指列宁《论正在产生的“帝国主义经济主义”倾向》一文或《论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一文（《列宁全集》第2版第28卷第98—107页，第115—170页）。

在这之后我动身前往瑞典。我应当起转运站的作用，即接送人员和传递消息等。我准确按时地完成了这些任务。我开始在瑞典左派小组工作。我在后来发展为瑞典共产党的青年联盟工作过。我们出版小册子，接送人员，把从俄国来的通讯转给中央刊物等等。我在瑞典刊物做编辑工作，定期为极左派的刊物《风暴之声》供稿，经常在这一刊物上发表文章。而后我在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组织和我们党中央的情报部门工作。因为瑞典当时肯定要站在德国一边，所以我们产生了必须进行真正的斗争的想法。我们打算召开反战代表大会。

我被捕了，后被释放，而后再次被捕并被投进监狱服苦役，我衣衫褴褛，对我的审问滑稽可笑，关于这些审问可以写一本有教益的书。我被监禁了几个月后被驱逐并前往挪威。在挪威我在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组织工作。主持其机关刊物《阶级斗争》的工作，而且有时从头至尾是我一人撰写文章。

后来出于一系列考虑我必须到丹麦去，在那里的德国工人中间开展工作。

由于我被邀请前往美国把孟什维克的报纸^①争取过来，我行动有点不够谨慎，暴露了自己的身份。我已使自己无法在丹麦呆下去，只有一个办法——逃到美国去，我在施略普[尼柯夫]^②的帮助下如愿以偿。

① 布哈林指的是1911—1917年在纽约由一批俄国侨民出版的《新世界报》。从1917年1月起布哈林成了该报实际上的编辑。

② 亚·加·施略普尼柯夫(1885—1937)——1901年入党，1914年初受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的委托前往斯德哥尔摩工作，以建立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同中央委员会国内部分及彼得堡委员会之间的联系。1920—1922年是“工人反对派”的组织者和首领。1933年清党时被开除出党。遭到镇压。死后恢复名誉。1988年12月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决定恢复其党籍。

我取道瑞典前往美国。在那里我险些被捕，因为我随身所带的钱达不到要求出示的数量。好在我有一封布兰亭^①的信，我就靠它才到了美国，到了纽约。我在那里的的工作是在工人中间进行鼓动工作。我几乎走遍了整个美国。革命爆发时我正在芝加哥。在我们的拉脱维亚支部的帮助下我们从孟什维克手中夺过了《新世界报》，建立了齐美尔瓦尔德左派中央。

二月革命爆发时我正在芝加哥组织大规模的游行示威。不久我即取道日本前往[俄国]。在日本，经片山潜^②帮助我与日本革命派别建立了联系，我同片山潜在美国是好朋友。我动身前往莫斯科，一路上在士兵中开展所谓的瓦解工作，我认为自己只能活两个星期。在当时周围的人们都充满爱国主义精神的情况下，我公开号召推翻临时政府，消灭战争，最后被孟什维克的车里雅宾斯克代表苏维埃逮捕。彼得格勒苏维埃的一纸电文使我获释并送往莫斯科。可以说，我进行了很长的一轮鼓动，因为从纽约出发的行程大约为45天。在莫斯科，我被选入莫斯科执行委员会并成为莫斯科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之一，而且当时进行工作的所有同志都知道，无论哪个工厂开会，我必定要进行所谓的瓦解工作。

1917年7月我当选为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并当选为中央委员。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我是报告人，而后又负责起草第六次代表大会宣言，这次代表大会是在我们党处于半地下状态的时刻召开的。1917年秋天我属于坚持起义方针的莫

① 卡尔·亚尔马·布兰亭(1860—1925)——瑞典社会民主党领袖，第二国际领导人之一，瑞典议会议员。

② 片山潜(1859—1933)——日本和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日本共产党的创建人和领导人。

斯科布尔什维克派别，反对一部分采取动摇或妥协和动摇立场的同志^①。我积极参加了起义的准备工作。我以莫斯科委员会的名义在工会中活动，反对国务会议^②，属于同莫斯科组织中的机会主义动摇情绪进行斗争的那个部分。我作了关于在莫斯科起义前夕逮捕资本家的报告。参加制定了布尔什维克关于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问题的决议，我说过，如果资本家不滚开，我们就逮捕他们。而后我参加了准备起义的文字服务工作：参加起草宣言。

后来莫斯科组织派我去报告起义的过程，我在彼得格勒苏维埃党团会议上发言，十分激进地要求枪毙那些擅离职守的同志^③。我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作了关于莫斯科起义的报告，就在当时[我]被任命为《真理报》的编辑。在立宪会议^④内我是布尔什维克党团的主要发言人。

而后我的最大一次失败是布列斯特和约，当时我是“左派共产主义者”的首领，这些人对问题的看法很幼稚。政治上这是对农夫估计不足，实践上这意味着，如果我们跟着这

① 指维·巴·诺根、彼·格·斯米多维奇、П. И. 库什涅尔等人。

② 国务会议是由临时政府在1917年8月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在1917年8月6日通过“关于8月12日莫斯科会议”的决议，指出这次会议是反人民的阴谋。布尔什维克本应发表声明揭露这次会议，然后退出会议。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领导人不允许布尔什维克参加代表团。

③ 指格·叶·季诺维也夫、列·波·加米涅夫、弗·巴·米柳亭、维·巴·诺根、阿·伊·李可夫于1917年11月3日退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以抗议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拒绝建立一个“从布尔什维克到人民社会党人”的联合政府。米柳亭、诺根、李可夫以及伊·阿·泰奥多罗维奇辞去了人民委员的职务。附合他们声明的有达·波·梁赞诺夫、尤·拉林(米·亚·卢里叶)及其他负责工作人员。

④ 立宪会议于1918年1月5日在彼得格勒开幕。立宪会议的大多数成员拒绝讨论布尔什维克提出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布尔什维克党团和左派社会革命党党团相继退场，几小时后会议被警卫部队驱散。1月6日夜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根据列宁的报告通过了解散立宪会议的法令。

一派别走，那么我们的共和国就会遭到极大的危险，说得重一点，就会灭亡 [……]①。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得到了多数票，于是结局不错。德国之行以后我承认了整个“左派共产主义”的这个错误。

详情我就不讲了——当时在经济建设，一长制方面有些分歧。

1918年秋天我作为我们中央委员会的代表专程前往德国，以便同积极进行革命斗争的李卜克内西②、梅林③等人建立联系。我同越飞④大使一起被捕；而后成了霍夫曼⑤将军手中的人质。后来我被释放，乘车到达明斯克，接到电报后又重新出发去参加全德工人和士兵代表大会。途中一天夜里德国军官把 [列车] 调到了另一条线上，[结果] 我又落到了霍夫曼将军手里，除我之外还有拉狄克⑥、马尔赫列夫斯基⑦及其他一批人。那里的处境相当不妙，但我和拉狄克成

① 下一句难以辨认。——俄文版编者注

② 卡尔·李卜克内西 (1871—1919) ——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德国共产党创建人之一。1919年1月柏林工人起义失败后被反革命分子杀害。

③ 弗兰茨·梅林 (1846—1919) ——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德国共产党创建人之一。

④ 阿·阿·越飞 (1883—1927) ——19世纪90年代末起参加俄国社会主义运动。1918年是“左派共产主义者”。在布列斯特和谈期间，初任苏维埃代表团团长，后为团员，最后任顾问。在此后的年代从事外交工作。赞同托洛茨基观点。在得知志同道合者均遭镇压后自杀身亡。

⑤ 麦克斯·霍夫曼 (1869—1927) ——德国将军。1916年9月起任东线德军参谋长，实际上是总司令，在苏维埃俄国同德国及其同盟国举行的布列斯特和谈中，是德国代表团中起着举足轻重作用的人物。

⑥ 卡·伯·拉狄克 (索别尔松) (1885—1939) ——19世纪90年代初起参加波兰和德国的社会主义运动。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党。1927年和1936年两度被开除出党。1937年1月30日因所谓的“平行反苏中心”案被判刑。1989年6月13日苏联最高法院全体会议撤销了判决，理由是缺少犯罪要素。1989年恢复党籍。

⑦ 尤利安·马尔赫列夫斯基 (1866—1925) ——波兰、德国、俄国革命运动的著名活动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参加创建了“斯巴达克联盟”。1919年起为德共中央委员。参加创建了共产国际。

功地策反了押运队。他们提出如发生悲惨事件即引渡全部军官。军官们吓坏了，3分钟之后便通知将我们释放。把我们送到国境，安置到列车上，他们就走了。然后红军过来把我们带走了。

我积极参加了镇压左派社会革命党叛乱的行动。

过了一段时间我先当上政治局候补委员，后来又当上政治局委员。

我曾任中央委员会驻全俄肃反委员会有否决权的代表，处理了一系列案件其中包括“民族中心”^①案，因此案处决了大约65个人。所有这些人的名字和鉴定都是我写的。

有一次我在列昂季耶夫斯基巷作报告时，发生了爆炸^②。有人三次企图〔对我〕实行暗杀，我都幸免于难，但有一次一位刚参加完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姓沙波什尼科夫的军队同志却被杀害。

我是共产国际创建工作的积极参加者之一。起草过共产国际纲领。作过有关议会主义的报告，参加了共产国际及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的领导工作。

1921年我在工会问题争论^③方面犯了一系列重大错误。大家知道，当时有好几个派别。我起初持所谓的缓冲立场，也

① “民族中心”——反苏维埃组织。大本营设在莫斯科。该组织成员主要为知识分子和企业界的代表，按党派划分主要是立宪民主党人。1919年被全俄肃反委员会取缔。总共逮捕了大约700人，其中67人被判处死刑。

② 1919年9月25日，在举行莫斯科党组织积极分子大会的列昂季耶夫斯基巷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所在地发生了炸弹爆炸事件。这次恐怖主义行动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干的。

③ 俄共（布）关于工会问题的争论是1920年末至1921年初进行的。分歧实质上涉及到党在和平时期的政策原则问题，党对农民和非党群众的态度问题，吸引劳动者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方式问题。

就是介于“十人”纲领和托洛茨基观点之间的立场^①。这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一篇著名文章^②中已经指出了，当时[我]支持施[略普尼柯夫]关于必须由工会组织来推荐经济部门领导人的人选的论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了一篇措词尖锐的文章。在工会争论中，我们试图把“学习共产主义的学校”同托洛茨基的“生产场所”统一起来，为此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一篇堪称周密运用辩证方法的措词极其尖锐的讲话中嘲笑了（我们）。[……]^③。

我在这一时期从事工会工作，代表中央委员会在第十次代表大会上作了关于党的建设问题的报告，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我起草了关于党的民主的决议^④。

后来我工作过的部门有：政治局、共产国际执委会及其主席团、《真理报》、《布尔什维克》杂志和各条“战线”。而且中央还委托我从事与青年工作有关的工作，即发表意见和领导共青团中央。

① 《十人纲领》由列宁、杨·埃·鲁祖塔克、斯大林、米·伊·加里宁、格·伊·彼得罗夫斯基、费·安·谢尔盖耶夫（阿尔乔姆）、米·巴·托姆斯基、列·波·加米涅夫、索·阿·洛佐夫斯基、格·叶·季诺维也夫签署。他们认为工会是学习管理的学校，是学习共产主义的学校，是党同群众的联系渠道之一，他们论证了首先应当采取说服教育的方法进行工会工作的必要性。

列·达·托洛茨基、尼·尼·克列斯廷斯基、格·列·皮达可夫等人主张工会国家化，使工会成为国家机构的附属物。他们提出强迫和行政命令的方法作为工会工作的基础。

布哈林是“缓冲集团”（尤·拉林、格·雅·索柯里尼柯夫、叶·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等人）的首领，该集团倾向托洛茨基的观点。

② 指列宁《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的错误》（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0卷第263—306页）。

③ 以下到句末难以辨认。——俄文版编者注

④ 显然是指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的建设问题》的决议（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分册第49—63页）。

列宁同志逝世后，大家知道，他的逝世对所有人和我个人都有很大影响，因为弗·伊·临终时我在场，我非常爱戴他，不仅把他当成一位政治领导人，而且当成一个人来爱戴；我与其他同志一起同托洛茨基主义进行了斗争。这点我不想多谈；你们大概是知道的，当时我没有特别的过错。

在第六次代表大会期间我参与制定了共产国际纲领并在相当大程度上主持了代表大会，负责起草了那一时期党的许多文件。

随后开始了右倾机会主义形成的时期，这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时期，应当比较详细地谈谈这个时期，它表现为我被开除出政治局、共产国际主席团、《真理报》等机构。我要说，这些措施是完全正确的，因为仅凭当时我所坚持的政治方向，就不可能把我留在这些机构内，而且我的留任只会对同我当时那种完全错误和极其有害的政治方针的斗争起阻碍作用。

让我们来看看这个时期吧，因为我认为，在对我进行审查中这才具有最重要的意义，重点应放在这里。

我只是想提请同志们注意，我做了不少工作，也犯了不少错误，所以我如果漏掉了什么，请不要以为我不想说。我愿意对每一个问题从实质上和政治方面作出回答。

我还忘了说开场白。我认为，我参加清党对我们党来说意义很大而不是很小，这是因为一大批年轻的同志可以从中学到一定的教育，在动摇的一切根源及其实际危害都已一目了然的今天更是如此。

这就是我近些年来政治错误（同志们，这里我首先要再重复一遍我在党的最近一次中央全会上的发言，我的发言

刊登在我们的中央机关报上)①。

现在，此时此刻，我丝毫也不认为自己是个右倾机会主义者，我认为，这几年我一直在积极地捍卫党的总路线。

但是另一方面，我应当马上说，如果谈到右倾机会主义者思想体系的发端者，那么我是这方面的主要人物，因为所有最重要的说法、所有观点的提出，我都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我决不会把责任推到任何人头上，我在任何情况下都决不逃避。

我想，首先简略地谈一谈当时的形势是适宜的。

我先心平气和、分门别类地谈一谈，对错误作出分析，而后对此作出政治评价。而且我不会把心平气和地谈第一部分作为挡箭牌，从而逃避最尖锐的政治评价，因为一般说来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对这个问题进行稍稍全面的批评；我认为，必须要这样做，省得半吞半吐的。

如果这样来谈论错误，那么我的主要错误就是由于在哲学上经常倾向烦琐哲学而对辩证法有不正确的认识，或者说根本不懂辩证法。

我认为我的主要错误是根本不懂新经济政策的不断展开的矛盾。

我当时大概是这样看问题的：援引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话并以他的话为依据，却对他的话作了完全错误的解释。[我认为，]我们在恢复时期稍稍壮大并展示了自己的工业化之后，小生产者已不能把我们压垮。我们将有许多经济组织、银行及一大批其他调节机构；进入这一网络的小生产者（包

① 见1933年1月14日《真理报》。

括富农)越多,这一网络就越能坚持得久,反复就减少,其他一切也就迎刃而解了。弗·伊·说,重点是和平的鼓动工作,我也正是这样解释的。

对于从新经济政策开始直到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整个路线,首先应当理解它,[而]不仅仅是谈论它。这样提问题是不正确的。应当看一看所有阶段是怎样具体形成的,并根据这些阶段作出总的结论。

这些年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正当我提出这些说法并在后来以此为依据并且不断重复时,经济和阶级斗争领域出现了巨大的矛盾。富农壮大了,富农已经通过简单商品经济组织起来,于是出现了来自农村的、得益于中介资本和商业资本的残余的加强的资本主义成分和沿着我国大工业的路线前进的社会主义趋势这二者之间的矛盾。

我曾设想,由于我们有社会主义的平衡杠杆,一切都将自然而然地发展,由此而产生了著名的“长入”理论。在这方面我甚至主持通过了几个决定,甚至还发表了包含所有这些内容的执行委员会决议。我并不是想以此来诋毁党的方针,相反,这是由我的过失造成的,因为我当时身居要职,我的错误论断甚至影响到正式的工作。我关于长入的论断类似伯恩斯坦^①。他讲的是无产阶段专政之前的长入,而我讲的是无产阶级专政之后的长入。这方面一个很大的错误是认为,既然资产阶级有其平衡杠杆,有银行,那么我们也有银行和自己的平衡杠杆。我当时认为,我国简单的商品经济的基本趋势是巩固殷实农户。我没有注意到过程的另一个方面。我认

^① 爱德华·伯恩斯坦(1850—1932)——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首领,改良主义理论家。

为，现在一切经济命脉都掌握在我们手里，再加上我们有社会主义的平衡杠杆，因此我们能够在需要的时候进行调整。然而这是不正确的，因为这样的趋势有利于发展的是这些大的杠杆，而不是有利于小商品经济的发展。在扩大商品经济方面我预见到了反对社会主义杠杆体系的那些成分。当时我国的情况要复杂得多，矛盾特别尖锐，所以我当时所作的类比是错误的。

问题的根源究竟在哪里呢？弗·伊·总是说，我的一个长处就是把一切都归结为一个根源。而根源就是不能辩证地提出问题。我不是对问题进行具体的分析，而是套用死板的公式：资本家有其银行体系，于是我们也有自己的银行体系；资本家有其平衡杠杆，于是我们也有自己的杠杆；那里是长入资本主义，于是我们也将长入，不过是长入社会主义。这个前提也是错误的。我没有考虑到我国当时面临的全部复杂性和所有矛盾。当时我国的粮食收购方面存在怠工现象。党采取了打垮富农和以社会主义大经济取代富农经济的方针。而我却提出了一整套错误的东西。我认为，发展殷实农户比较容易，[而]后再对其施加压力。我提出了提高工业品价格的计划，以便在这一基础上建成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这样，靠富裕[农民]和富农，当然还有中农农户，进一步进行建设，即靠富农成分迂回前进。

一盘棋可以有多种下法。但在这种情况下这是不正确的，因为这实际上会导致[……]^①富农阵地的加强。结果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比重得不到增长，得到增长的是富农经济的比重。

① 以下几个词写得难以辨认。——俄文版编者注

我们当时怎么可能迂回前进呢？由此产生的后果将是在以后面临复辟的可能。这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如果富裕阶层的比重提高了，如果它们与城市资产阶级成分联合起来，再加上知识分子，加上所有有害进程，加上必不可免的外部局势的紧张，那么就会出现反面性质的危险。

这样一来，就不懂得阶级斗争的一系列阶段，不懂得社会主义经济在发展，由此产生了我们未能展开社会主义进攻的祸根，它导致了富农分子的反抗。

这有什么不明白的呢？应当弄清一个简单的道理——我们断了富农的前程。当我们一开始社会主义进攻，我们就断了富农在资本主义道路上发展的前程。

从上述整个情况 [得出了] 对富农施加压力的结论，由此得出了断掉富农发展前程和消除这整个机制的问题提法，恕我直言，这一机制同形势有关。由于这种不理解，我们得出了一系列同后来被称作阶级斗争递减曲线的说法有关的结论^①。这些话我都没有说过，但实质上就是这样，党在这方面做得对。

形势要求我们从各个方面而不是从一个方面加强无产阶级阵地和工业化。我们应当奠定自己的工业基础，以造成能巩固社会阵地的真正有效的杠杆。最后，我们必须这样做也是出于外交方面的考虑，就是为了保证国家的独立。

当时我提议，并有一大批同志附议，从大量收入中^②寻找

① 布哈林指的是他在1928—1929年间的讲话，他在讲话中反对斯大林所提出并得到许多党的领导人赞同的所谓随着苏联社会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理论（见布哈林《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问题》1989年莫斯科版第263—264页）。

② 原件如此。——俄文版编者注

并在此基础上加强工业化所需资金。这是空想的、错误的和政治上有害的想法。这样呼吁是可以的，如果能够放弃我国工人阶级进行的工业化的高速度的话。其次，这里不见了调动无产阶级以及所有其他方面的力量的方针。

我们开始加紧实行集体化时，还没有打下今天的机械化基础，但为的是明天开始打这一基础。我当时认为，不追求生产结合，保留商品结合的形式，就利用税收的杠杆。这[会]导致出现加强我们的敌人的趋向。

当时我们实质上已在其他业经形成的杠杆的基础上跨入新经济政策的又一个阶段。

在其他“细节”中包括下面一些“细节”：我的论断同人们若干年前可能作出的论断一样。而且当时还形成了这样一些杠杆，以致可以提出用各种杠杆对农村施加巨大影响的问题，这些杠杆中也包括组织的杠杆，镇压富农的杠杆，加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的杠杆，等等。当时首先提出我所不理解的生产结合的公式。当时已经使用的是那些若干年前还不曾有过的业已形成的杠杆。这样一来，在对小的和细小的经济施加影响的可能性方面的问题提法就发生了变化。

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在这方面起了作用。细小的和小的经济已不再是我国社会主义工业飞速发展的充分基础。当时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实行集体化等的坚定方针已显而易见。因此而出现了一系列其他问题。

还有两个问题必须指出，它们在这方面必须要涉及到。我指的是填补我在《真理报》刊载的第一本小册子（《经济学

家札记》^①中为之辩解的所谓“薄弱环节”。我由于对向农村施加影响的种种可能性估计不足，认为必须极其谨慎。我认为，首先应当寻找限制的因素。这样的理解是错误的。问题是我们进入了改造时期，而我却没有想到这一点，这是个错误。当时问题在于必须来一个跳跃，要进行改造，要加紧进攻，这一进攻在经济技术方面积累了一定的基础，有了相应的速度。当时没有坚决地提出这些“薄弱环节”，赶走它们，坚决予以克服，而是填补这些“薄弱环节”。当然，这并不是说，无产阶级想干什么就能够干什么，这并不是说，这里不应当估量形势，然而这样的公式表明，这一方针有某种消极的东西，而当时要求坚决跨越障碍，要求有坚定、大胆的方针，坚决打破当时形成的比例。不打破比例，就不能着手进行改造，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转而实行改造恰恰意味着打破国民经济各部分之间的旧比例，坚决向重工业倾斜。过后只有像现在这样，才谈得上轻工业的增长，谈得上以将近3倍的速度增长，但这恰恰是具有极其强大的重工业基础的时候。我当时根本不懂断然打破的必要性。

最后，必须提一提对外政策方面。假使当时党没有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同我们进行坚决的斗争，假使当时没有在工业方面、在军事工业、航空工业等方面采取一系列措施。

当时有两个阵营。然而应当说，脱离自己的阵营是不可能的。你要是脱离自己的阵营，必然会进入另一个阵营。假使处理得不果断，假使采取另外的方式，那就会使过程拖长，而且也许对于那些日后认识到自己错误的同志反而更不妙。

^① 见《布哈林选集》1988年莫斯科版第391—418页。

因此我应当说，把这一切看作是富农的代理人的活动是正确的，采取的所有措施及组织结论是正确的。我只能对我犯错误感到懊悔，但不能因中央当时对我采取的措施感到懊悔。

主席：如果右翼反对派得势会怎么样呢？

布哈林：那就会出现严酷的党的斗争。这一斗争必然超出重大党内斗争的范围，党内斗争会演变成鼓动起一切反对社会主义进攻的分子的残酷的国内阶级斗争。这样一来，就会给敌人在阶级斗争中造成更多的机会，复辟的危险性也就显而易见了，况且问题在于这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阶层。富农当然不是资本家阶级，而是一个人数众多的阶级，富农的旁边是殷实农民，殷实农民的旁边是在这种大混乱中一直摇摆不定的那部分中农，其次在城市还有懂技术的知识分子。这些势力在总的力量对比中并非无足轻重，至于有关资本主义复辟的提法，我完全赞成这个观点，并认为有必要再重复一遍。

许多了解我的老同志可能会问：这怎么可能呢？但问题不在这里。我当初认为可以今天愚弄富农明天就把它消灭的想法也许太随心所欲了。实际上呢，我在纵容富农，尽管我准备把整个一生都献给无产阶级。实际结果却恰恰相反。因此这一悲剧一次次地极其清楚地说明，我们的队伍必须有真正铁的纪律、思想一致和行动一致。

我作为共产国际领导人犯错误也是在那一时期。这是一个很大的工作领域，我应当指出，我所犯的一些重大错误成了所有其他问题的基础。我对资本主义的稳定性估计过高，因而，用相当明确的政治语言来讲，我在某种程度上庇护了德国共产党的调和派及其他一些派别，因为当时德国出现了同俄

国问题有关的各种各样的分歧。主要错误是对资本主义的稳定性估计过高。在这方面斯大林同志和党的领导是完全正确的，这已为后来整个事件的进程和后来的思想方针所证实。

这里我还要就自己的理论错误说几句，因为既然要清理，那就应当全面清理。同志们，你们大家都知道，我是我国和整个共产国际的某种理论力量。为避免任何误会，我要说，现在出版了成堆的专著和教科书反驳我，反驳我所写的东西（布拉托夫：比您写的东西还多），——多得多。老实说，对于反驳我的所有文字，我并不是句句都同意。对于党的正式决定中所说的一切，我完全赞同，对于弗·伊·所说的一切，我完全赞同，但我请大家别要求我句句都同意。我认为，这方面的文献中有许多东西是正确的，我要说，其核心是正确的。但不应由此得出结论：不管是谁写的，所有文章我都应当奉为律条，因为人们像我一样同样有错误。

首先我不打算对有益的工作说得过多。我认为，我在自己的一生中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其中包括理论工作。我要在这次会上谈谈自己所犯的确实很严重的理论错误。弗·伊·在著名的遗嘱中揭示了这些错误的经典根源，他说，这样宝贵的理论家却不懂得辩证法。“理所当然的”全党喜欢的人物却不懂得辩证法^①。说得多么好。

你们看，我的核心问题是：迄今为止我在某种程度上确

^① 布哈林引用的是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中的著名论断：“布哈林不仅是党的最宝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他也理所当然被认为是全党喜欢的人物，但是他的理论观点能不能说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很值得怀疑，因为其中有某种烦琐哲学的东西（他从来没有学过辩证法，因而——我想——他从来没有完全理解辩证法）。”（《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339页）

实没有研究过黑格尔学说。过去我的学识非常渊博，现在也是如此。从年轻时起我的学识就非常渊博，大概当时我们党内像我这样博学的人为数不多，但我没有研究过黑格尔学说。

我熟知经验批判主义^①、实证论者^②、康德^③，熟知旧唯物主义者，但对于黑格尔^④，说实话，我的评价不高。我当时认为，这是抽象的东西，是用适合于老处女的语言写成的连篇废话，我可没功夫去研究这种东西。

因此，如果谈到我的哲学观点的基础，那么这些观点首先是（现在用不着羞羞答答而应直截了当地说）机械唯物主义和某种折中主义的混合物，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受了波格丹诺夫^⑤的深刻影响。〔……〕

他那不同寻常、非同一般的博学多识给我留下了印象。他是俄国也可能是全世界最有学问的人之一。我认识他本人，读他的书，就像我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我一直读他的著作，这

① 经验批判主义——哲学流派，19世纪末产生于德国和奥地利，20世纪由于自然科学遇到危机而得到传播。创始人有瑞士哲学家里·阿芬那留斯和奥地利物理学家恩·马赫。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对这一流派进行了尖锐的批判。

② 实证论——产生于19世纪30—40年代的哲学和社会学流派，它断言哲学作为试图对现实进行翔实的研究的独立学科没有存在的必要，认为真正的、“有益的”（“实证的”）知识就是各个专门学科或这些学科的综合的总成果，而获得综合被看成是新的、“实证论”哲学的任务。实证论的著名代表人物有奥·孔德、约·斯·穆勒、亨·托·巴克尔、伊·泰恩、赫·斯宾塞。

③ 伊曼努尔·康德（1724—1804）——德国哲学家，德国古典哲学创始人。

④ 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1770—1831）——德国哲学家，客观唯心主义者，马克思主义的来源之一——德国古典哲学的最著名代表，第一个在唯心主义的基础上对辩证法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⑤ 亚·波格丹诺夫（亚·亚·马林诺夫斯基）（1873—1928）——哲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医生，19世纪90年代起参加社会主义小组的工作。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加入布尔什维克。布尔什维克机关报《前进报》、《无产者报》、《新生活报》的编辑，后成为召回主义的首领。经验批判主义的变种——经验一元论哲学体系的创始人。1909年被开除出布尔什维克党。十月革命后是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鼓舞者和组织者。1926年起任他自己创建的输血研究所所长。

些著作在我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后来我想从内心摆脱这种影响，但这种影响已在我的身上深深扎根。这种机械唯物主义的混合物、经验批判主义的混合物，就是我所推销的那个金玉其外、貌似高深的社会主义大杂烩，但它有着很大的缺陷，这种缺陷表明我没有研究过黑格尔学说。但在那时总共只有两三个人研究过黑格尔学说。我对黑格尔有成见。我甚至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这个问题展开过争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信给我，说我要是能通读一遍黑格尔的著作，那他一定把波格丹诺夫的同义重复的书全都读一遍。但我当时认为读黑格尔的书，读这样的鸿篇巨制枯燥无味。

如果谈得更具体一些，那么这种不正确的想法导致了什么结果呢？

第一，把运动解释为仅仅是机械运动，这在我的著作中屡见不鲜，哲学著作和政治经济学著作中都是如此。在这方面我是始终如一的。我的著作中不正确的哲学观点比比皆是，在许多哲学著作和政治著作中都可以找到。运动的所有各个领域及对运动的本质的各种评价，所有这些都建立在机械论的基础上。就是所谓的“平衡论”^①。我本来可以把平衡论写得比人们对我的批评要好得多。人们对我说，“你谈的是平衡中的静止，而应谈的是运动”。我谈的不是静止，我谈的是作为运动的一种形式的静止。然而由于我们这里人们对平衡论不甚了解，因此他们认为变动的平衡就是静止。而我所谈的

① 可能指的是布哈林的著作《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通俗教科书》（1921年莫斯科版），以及《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问题的提法（简要札记）》（《布哈林选集》第39—49页）。“平衡论”首先是由亚·波格丹诺夫在《普遍的组织科学》（1913年圣彼得堡版第1册；1917年莫斯科版第2册；1922年莫斯科版第3册）一书中加以论证的。

恰恰是变动的平衡。

然而我的主要错误是把平衡的变化当作出发点，而应当是把平衡的运动当作出发点并把平衡的形式看作变动的形式。整个“平衡论”都是不正确的理论，这一理论是反辩证法的和机械论的。但（在批评我的理论时）人们写了许多庸俗政治学的东西。

其次，我对辩证唯物主义的极其重要的特点不理解。我把一切都归结于单个的力量之间的相互关系。由此我引申出一系列辩证法定律。早在青年时代我对马克思的理解就是诡辩式的。马克思批判黑格尔的理论，于是我就认为，马克思否定了黑格尔。这是不正确的。

至于其他问题，世界经济理论，资本主义发展理论等等，那么我在两三年前的正式声明中已经谈过这些问题，我现在彻底放弃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理论^①。

我为什么会主张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理论呢？如果又说到哲学根源，那么这不是辩证法的深奥道理。我曾有过这种倾向，我醉心于此并藐视一切，对其他矛盾视而不见。我当时没有这样的精微，所有这一切铸成大错。我彻底思考过，但却是歪曲的，因而最终也未能把握住整个矛盾。

有人说：请谈谈转换论。

布哈林：转换论中既有正确的地方也有不正确的地方，我不知道你们感兴趣的是什么？

在过渡时期，错误出在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方面，出在垄断和竞争的相互关系方面，出在一系列与我上面所讲的有关

^① 见本刊第1辑第189页注1。

的其他问题方面。

布拉托夫：那么新经济政策呢？

布哈林：谁能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两年前就知道要搞新经济政策呢？如果您谈的不是未来而是过去，——伊里奇说过，我们开始是有一个纲领的，但后来内战打乱了我们的计划。

所有这些问题我都参与了，我的公式化也表现在这方面。我本应提出更加〔谨慎〕的说法，以便说明可能有各种途径。

关于国家和自决，关于和平长入理论〔……〕我认为，我基本做到了伊里奇关于黑格尔学说的教导。我写过一些著作，同志们可以评判一下其中旧的东西剔除得如何。

我再说一遍，我远未涉及所有问题，因为那样一来就得把我所有的著作都复述一遍，但一些尖锐的政治问题我务必要谈一谈，因为否则的话你们完全有理由责备我。

我应当尖锐地提出党内斗争和党内制度这一政治问题。我认为，对这一问题应当更详细地谈一谈。弗·伊·逝世后，正确的领导未能立即形成。斯大林的领导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当时存在着党内斗争，同时也存在着上层的斗争，斗争涉及到一系列党政方针。我们失去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天才，我们失去了弗·伊·，后来，如果从大范围讲，希望得到领导职位的有第三批人：一批是有意识的，另两批是不完全有意识的——托洛茨基主义、斯大林的领导班子和右倾机会主义集团，尽管我并不想取得权力，但这是不作数的。对问题应当抱实事求是的态度，应该讲得清楚，明确，客观。这里自有其党政方针。

托洛茨基主义为什么遭到失败，根源何在？问题在于托

洛茨基暗地里不相信能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这从许多方面都能看出来，这同托洛茨基在革命的某些时期起过积极作用并不矛盾，尽管他所起的并不是通常认为的积极作用，但在某种程度上仍不失为积极作用。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显然认为应当冲破历史：不是完全成功，就是彻底失败。但在作为他的政策核心的理论方针的深处，是暗地里不相信能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他认为苏联不是一个同资本主义相对抗的体系，而是世界经济的一个添头，资本主义这个强大的对手把它纳入了自己的体系范畴并将魔爪伸向这个名叫苏联的较弱的添头。正因为如此，也正是由此便产生了早已出名的公式：如果没有西欧国家无产阶级的国家帮助即没有德国、法国、美国和其他国家工人阶级的胜利，不是社会主义灭亡，就是社会主义政党蜕变。

布拉托夫：你这位“左派共产主义者”当时是否抱着这种观点？

布哈林：不完全是。我当时的思想状况是：对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问题态度不明朗，但并未抱着我们一定蜕变的观点。

我还犯了另一个大错。我认为，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主张（照我当时所用的难听话）是不愿意打仗的投机小贩的主张。农夫大量涌入了党内。

布拉托夫：你在提纲里不是这样说的。

布哈林：这是莫斯科局的提纲^①。我同它没有任何关系。当时我竭力摆脱它。

^① 可能是指恩·奥新斯基（瓦·瓦·奥博连斯基）起草的《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提纲》（载于1918年3月14日《共产主义者报》第8号）。

布拉托夫：我这里有一份摘录（读）。

布哈林：完全正确。我可以在我的册子《阶级斗争和革命》^①中举出类似的东西。我当时并不这样认为。我不认为我们会灭亡。不同之处在于：我认为我们应当进行干预，这必将导致世界革命。关于不可避免会发生热月政变式蜕变的提纲，在我的著作中是找不到的。这是错误的提法。这是未经深思熟虑的理论观点。所有这一切托洛茨基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因此我认为，当托洛茨基鼓吹所有这些货色时，党立即粉碎了他。根据是什么呢？这是赤裸裸的热月政变式的事件。我们应当开创改革时期。他的观点是：这不会有任何成果，要不就是你们开始蜕变了。这一逃跑观点、投降观点已被粉碎。

至于右倾路线，我对它作了相当多的评述。我再说一遍，党处于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因为同已冒头的自发势力的斗争相当艰巨。这场斗争是严酷的。我们现在的领导，我们在两条战线的斗争中、在两翼进行的斗争中以斯大林为首的领导，在所有方面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既包括理论方面，也包括政治指示方面，还包括组织实施党内斗争方面等等。

这里我再说一遍，总路线的制定和干练地进行粉碎反对派的斗争，党员群众和工人阶级的动员，共产国际中的正确路线，对外政策方面极为出色的路线，这都是在两翼进行的斗争中形成的领导的功劳，是斯大林同志本人的功劳。所有这些问题上的〔功劳〕：远东的具体军备、非常措施、马克思

① 指布哈林的著作《阶级斗争和俄国革命》（1917年莫斯科版；1919年莫斯科、彼得格勒版）。

主义者土地问题专家代表会议^①的方针及其他一系列问题上的〔功劳〕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归于列宁直接而合法的继承人——斯大林同志。

所以我要说，可以把斯大林同志看作我国革命力量的思想统帅（鼓掌）。

我要说，与此相关连的是制度问题。

我在第一次发言中已经谈过，现在还要作些补充。那一次我忘了谈一个想法。我认为，也许是不自觉的，但关于某些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反党观点的事情问题，当年反对中央的斗争，大概都同和平长入的幻想有关。这也许是纯粹的个人隐私吧，但我认为在我犯严重错误的整个时期，我始终自认为是党的儿子，我是在党的怀抱中成长起来的，从刚刚懂事时起，从孩提时代起就为党工作。如果说我发生过动摇，那是因为我对我们还在进入的时期缺乏认识。我想说，在组织上这同平静的发展进程的观念有关。我今年45岁，我入党已25年，我入党25年发生过4次严重动摇，这够多的了，但有的人比这还多。

谈谈制度。我想说，有些在第一个报告中作了简要的叙述。问题在于，我们不久前纪念布尔什维克党的诞生——著名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由于这次代表大会同孟什维克发生过争吵。我认为，在列宁的天才贡献中，他的最大贡献在于他把党本身变成了科学分析的客体和对象。我们有一种偏见，认为分析工艺流程是科学，分析整个社会是科学，但如果有人

^① 马克思主义者土地问题专家代表会议于1929年12月20—27日举行。斯大林在代表会议最后一天发表了讲话（见《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26—151页）。

提出研究党的问题，研究这个学术问题，那就不是科学了，就是不屑一顾的事情。同时我认为，哲学、政治经济学、实践等领域中的列宁阶段，与俄国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普列汉诺夫阶段（更不用提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的马克思主义了）的不同之处在于理论与实践的密切联系和积极行动的方针。这一点可以从一切方面得到证明，从认识论到对自由派的态度，[……]①

因此，早在列宁开始研究党的问题时，他就把党的理论同政治结合在一起。我说的理论不是一般[理论]，而是专门研究什么是党、党活动的条件如何的理论。列宁把这同未来阶级战争的进程连在一起。我们正面临国内战争——我们应当建设一个战斗的党。我们在未来世界规模的阶级战争展开的同时建设社会主义，我们正由此走向世界共产主义。我们应当成为一个战斗的党，而不是辩论俱乐部，不是费边社式的团体，应当成为一个有核心的党。这是对问题的科学提法。它已付诸实践。党正在向世界进军。

因此我认为，党章第一条——这不是普通的第一条，也不仅仅是个组织问题——，它同关于革命进程、国内战争、无产阶级专政、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整个观念有着极为深刻的联系。

我想要说的是，这种解释是科学的解释，这是党的理论。而且我应当说，因此我们有的只是铁的纪律，仅此而已。这是由我们党的战斗结构所决定的。

因此对制度、压制等进行批评，这种批评并不是最近时

① 以下至句末无法辨认。——俄文版编者注

期的反对派所特有的。众所周知，第二次代表大会的马尔托夫派和托洛茨基派领导人已经提出过所有这些问题。他们指责列宁实行戒严，压制一切自由，采取非常措施，实行个人独裁，使自己成为党的路线的化身，指责列宁是戒严状态下的独裁者。所有这些假民主的空话有着完全不同的基础，具有不同的党性概念。我们正是坚持这样的结构才取得了胜利。

这里历史在重演。当我们这里形形色色的反对派其中包括第一个反对派和右翼反对派批评领袖至上和制度、攻击斯大林时，所有这些都应作为垃圾扫除干净。党的制度是一个有战斗纪律的、钢铁般的党的制度。我再说一遍，这个党具有历史性领导，它不是凭压制而是凭原则性的政治方针带领我们取得辉煌的胜利，保证我们拥有近年来的这一切，包括美利坚合众国最近承认我们这个伟大的无产阶级强国。这表明，我们得到了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承认。我不想在这件事上散布什么幻想，不必像一个因征服了大叔叔的心而感到高兴的小孩子那样来看待〔这件事〕。

我们还将遇到各种各样的麻烦，值不得为我们的成就而鼓掌欢呼。但美国这个资本主义大国承认两个体系——资本主义体系和社会主义体系的存在，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坚不可摧，仅此一点就有很重要的意义。为此我们应归功于工人阶级，因为我们依靠工人群众的英雄主义做到了这一点，然而我们还应归功于我们的共产党、列宁主义的中央和斯大林同志——世界无产阶级的国际大军的远见卓识的英明统帅。

至于说到因我的过错而产生的右翼反革命集团，我在联

共（布）中央全会^①上，在第十七次党代表会议上都[谈到了]，现在我可以再说一遍，我承认自己对那些现在堕落成为反革命集团的人负有罪责。这些人是：斯列普科夫、艾亨瓦尔德、马列茨基、阿斯特罗夫等^②。我认为我对他们最近的所作所为并无责任，但在右倾机会主义露头时我首先“传染了”他们。

我的第二个错误是，我同他们建立了过于亲密的关系，后来他们不再把我放在眼中并摆脱了我的影响，背着我干起了反革命勾当。我认为自己有义务最坚决地谴责他们并完全赞成联共（布）中央采取的措施。

我想就党的总路线接受历史检验问题再说几句。我想提请大家注意（可以分几部分谈，但我想从另一个角度谈）一个情况。我们人民委员部的所有工作人员和关心理论问题的同志、从事党的工作的党员大概还记得，就在几年以前，就在不久以前，我国存在一个私人资本问题。就我国的私人资本应占多大份额、私人资本有多大危险的问题展开了一场大辩论；说法不一，众说纷纭。

私人资本问题曾经由于“谁战胜谁？”的问题而成为一个大问题。今天谁还考虑私人资本问题，谁还考虑“谁战胜谁？”的问题呢。在我们看来这已不成其为问题了。就在几年[前]我们引以为自豪的只有一个沃尔霍夫工程，当时正值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生命垂危期间，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好几个沃尔霍夫工程。今天我们已置身于另外一种情况下了。几年前许多人认为，战胜小农经济——这是一个遥遥无期的历史

① 指联共（布）中央 1933 年一月全会。

② 所谓“布哈林学派”的代表人物（见本刊第 1 辑第 190 页注 1）。

前景，是几十年以后的事情。而我们用最短的时间在我国的农业中实现了巨大的革命。

我在报刊上撰文，提请注意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说的一段话，他说：我越是研究这个臭东西，我就越是确信，农业改革以至小土地所有制的改革，将是未来的变革的基本内容。否则，马尔萨斯^①神父就是对的了。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工业加速发展的情况下，小农基础及其所有制已不能养活日益扩大的城市。我不知道马克思还有比这个更激烈的说法。马克思对马尔萨斯的评论^②你们是知道的。

马克思的正确论断阐明了问题的提法的深度。我们拥有社会主义大经济。“谁战胜谁？”的问题多年来一直是个核心问题、决定性的问题。现在这个问题已基本解决，也就是说内部问题已基本解决。因此我们确实把我国变成了工业大国，把小经济变成了社会主义大经济，“谁战胜谁？”的问题也就解决了。

我认为，近一年半最大的成就是，我们不仅在工业中而且在农业中建立了新的强有力的劳动刺激手段。在近一个时期，富裕的集体农庄庄员的口号，根据斯大林的指示进行的立法，今年夏天我国农夫感觉到沿着新轨道前进的前景这一局面的形成，——所有这些造成了一种强有力的劳动刺激手

① 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1766—1834)——英国经济学家，牧师。力图用“人口的绝对过剩”，“人口自然法则”的作用来解释劳动者的贫困状况和原始积累时期的失业现象。

② 布哈林引用的是马克思的下述思想：“我越是研究这个臭东西（指比·约·蒲鲁东的著作《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编者注），我就越确信：改造农业，因而改造建立在农业基础上的所有制这种肮脏东西，应该成为未来的变革的基本内容。否则，马尔萨斯神父就是对的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331页）

段，于是整部机器全速运转起来。我们将取得越来越大的成就。新人在形成，新的自然财富在国内不断发现，党的团结在加强，国家的防御能力正像莫洛托夫在最近一次演讲中所说的那样，如果日本人向我们进攻，我们将把他们粉碎和消灭；美国承认我国——这一切都同我上面所说的有关。

主要的是，我国的工业、农业、我国的社会主义实力和政治实力的增强。我们开始在这方面收获我国工人阶级在党的领导下所完成的巨大工作的成果。

党的团结——这绝不像某些同志认为的那样是件小事。这是我们取得胜利的最重要的先决条件。试想，以一个松松垮垮的党如何在国际搏斗中战胜日本法西斯呢？很自然，加强党的团结的方针是胜利的必要先决条件。

布拉托夫：有危险吗？

布哈林：我已经说过，不应当助长乐观情绪，即使在美国承认我们的问题上也是如此。我甚至认为，危险很可能春天就要出现，在国际形势方面可能会出现重新组合。我认为，危险确实存在。问题仅仅在于，危险何时出现。正因为这种危险我们才特别需要保持党的团结。

在我国，个人意志过去没成为成文法，但在战争时期集中力量 and 努力需要个人意志。有一个统一的超集中领导，这没什么不体面的，因为这是我们的内部团结和我们的力量不断增强的推动力之一。军队应当有一个久经考验的统帅。只要党存在，只要我们还没进入世界公社，我说的这些话任何时候都是适用的。

现在我想谈一谈我在报告中说过的问题。当时我对所有的团体、部门、方针进行了详尽的分析。现在我想说的是：我

作为以我为首的机关的领导人，认为自己的责任首先是把我从事的工作变为党的总路线的具体语言。在科学领域我们必须两条战线进行斗争。这既不是在文字上找托词，也不是为了保险起见不得不说，而是要谈事物的实质。既同经验主义作斗争，也同贬低理论任务作斗争。在技术领域——既反对单纯技术观点，也反对阉割技术内容的空谈。发挥党的方针就自然要把它们变成我们的特殊语言，我谈了这方面的成绩和不足。我们产生了一大批指导思想：技术计划思想，科学研究工作计划思想，我们的全部工作都以这些思想为中心进行。

我想补充一些我个人的情况。首先，我认为需要指出，我从事这项工作不是以无事可干的人的身份，不是以遭到痛打并因此在这里躲风头的官僚的身份，我从事这项工作，不是把它当成临时性工作和在这儿等待更好的工作，而是认为这项工作是有意义的，我能够在这方面有所作为。我应当这样说，因为一些同志将就我个人发表意见。至少听到了这样的暗示：这个人倒是作过好的指示，但与实践脱离太严重，没有进行任何具体有效的领导。我承认自己犯过许多错误，但对于这样的评价我却不能同意。我还有其他一些缺点，这我以后要说，但现在我认为必须要说，任何最好的思想，最好的方针，只要没有在组织上落实，只要没有有效地表现出来，那就一钱不值。

布拉托夫：需要好的领路人……

布哈林：您恰恰想到了我要说的话。这正是我们共同工作的 [共同] 点。

请允许我谈谈我个人在机构中的情况。我主管的有科学

院、重工业人民委员部的科学研究局、技术宣传局、部务委员会。有时我要去办委托我办的事情，例如我考察过工人供给部的情况。还有任命或审查教授的鉴定委员会。各种杂志。其他各种服务机构的附带工作如科学家之家理事会、捷尔任斯基俱乐部等。各种接见。我不仅要接见来自人民委员部的人，还要接见学术界人士、工程师，接触文学作品，有时还要间接推动人民委员部的工作等等。有时要审读重要理论著述。有时还有中央委员会委托办的事。例如，高等学校的改革。我经常参加中央委员会有关委员会的工作等等。这纯粹是事务性工作。

说我只是发布一般性指示，那我是坚决反对的。我在科学院作报告。我从事组织工作。我通过上级“推动”问题的解决。前不久我通过中央委员会，后来又通过中央执行委员会。我甚至连预算也亲自去“推动”。谁都知道，我在党团内是一个决定性角色。我是科学技术研究所的所长。

干练的领导。事事都管，直至房屋的位置。我正做这件事。我有意援引这本马克思主义文集^①，它获得交口称赞。

布拉托夫：有危险。

布哈林：什么危险？

布拉托夫：被偷走。

布哈林：您是第一个偷的人。人人都说，这本书搞得不错。不是说我的领导“不具体”吗？我不仅审阅所有文章，而且经常下印刷厂，去装订车间，设法搞到所有材料，包括人造革和皮子，还在肃反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收到了运到火车站

^① 见本刊第1辑第194页注1。

的一批书。我不得不动用肃反工作人员，把铁路职员吓唬了一通，才收到这 100 本书。

关于科学研究和技术宣传总局，我认为我的所有工作人员都不会拒绝证实：主要指示和行动方针从来都是在我的参与下通过的。我的接待室里来访者络绎不绝。我哪儿挤满了人。我不是说这样很好。但我不得不接待大量来访，我已经感到穷于应付。难道我没有处理有关住房、口粮、申诉问题吗？这些都由我来处理，我认为，可惜我处理的事情太多了。我要为杂志撰写文章，我要发表演说。如果报纸上刊出了有关我们工作的文章，那你们大概知道，这都是我写的。

其次是巡视。现在，清洗结束后，我必须马上去乌克兰，去顿巴斯，去巴统。我从没有拒绝过部务委员会的委托。彼得斯基^①前不久对我说，我是最认真地研究工人供给部的人，在这方面收集了具体的材料。鉴定委员会在我的参与下讨论了学位问题，其基本条例是我起草的。我警告不要让一个废物蒙混过关。所有这些都是非常具体的。提起《社会主义改造和科学》杂志，请你们问问杂志工作人员，我不仅要设法搞到纸张，而且要蹲在印刷厂，校改前三次校样。

如果有人对我说，我的领导工作不够具体，我对此无论如何不能同意，我要说，我有很大的过失，但那是另一种性质的过失：第一，我这个人机关工作方面过于民主化，本应由其他同志做的事我做得太多，我缺乏把机关工作人员配备得恰到好处的组织素养。这是我在事务工作方面的一个大过失，由此就产生了我们机关工作的许多严重的问题。这一

^① A. M. 彼得斯基——当时任重工业人民委员部工人供给总局局长。

点我承认。至于我干了所有副手的活，充当〔他们的〕保姆，拉着手把他们送到皮达可夫^①那里去，这也是事实。

所以说我的一大过失就是，有时我不得不处理根本不必由我过问的问题，我们的人员配置不够理想，干部的业务水平不尽如人意。这是我的一大过失。我同意布拉托夫同志的意见：“他不对自己的副手负责”。我对此负有责任，但我再说一遍，如果为了改进工作，就不应当说，你应更具体地进行领导，而应当说，要有一个组织得更好的组织结构，要使工作人员有更高的业务水平，少揽一些应当由别人去处理的事情。这就是我的观点。

现在谈几点结论。结论很短。我认为，我理应从党组织得到组织结论。我声明，我没有也不想提出任何要求，如对工作不满意，有其他希望等。我不想拍着胸脯说，一旦爆发战争，我们将为国捐躯。我认为，这是每一个工作人员的义务，我不想在这方面激发人们的情绪。从自己、从一个党员的角度来说，我唯一的希望是我目前这种在一定程度上失去原有身份的状态尽快结束。我希望我能满负荷工作，因为机构的惰性太强，我在工作中不得不处理许多琐事，有时是不太好的琐事。

布拉托夫：这是谁的错，是谁让你处于失去原有身份的状态呢？

布哈林：常有这种事：报刊上登了我的广播讲话，随后

^① 格·列·皮达可夫(1890-1937)——1910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1933年任重工业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遭镇压。死后恢复名誉。1988年恢复党籍。

又予以撤消。我从来没有指责^①。我说的是机构的惰性。机构常常设置各种各样的障碍。我可以举出许多这样的事。这方面我有很大的过错。根已发芽，[它们]具有惰性作用。

我希望我不留任何尾巴。我真诚地谈了自己的错误，我将担负党交给我的任何工作，我希望在我们党中央委员会和斯大林同志个人的领导之下，我能够为我们伟大英勇的党和我国工人阶级正在从事的伟大事业做一份贡献，并必将为我从青少年起就全心全意投身其中的这一伟大事业做一份贡献。

(莫斯科党务档案馆第 2870 全宗，第 1 目录，第 89 卷宗，第 1—42 页。)

^① 原件如此。看来布哈林想说“任何人”。——俄文版编者注

七

重工业人民委员部科学研究和技术宣传总局党委清党委员会关于布哈林同志的决定

重工业人民委员部科学研究和技术宣传总局党委清党委员会收到了科学研究和技术宣传总局党组织委员会和重工业人民委员部党委核心组关于要求联共（布）中央委员布哈林同志参加清党的决定。

科学研究和技术宣传总局党组织委员会的决定说：

“鉴于科学研究和技术宣传总局的工作对整个工业有巨大的思想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鉴于完成面临的任务需要动员每一个党员关心这些任务的实现。党组织委员会认为，在即将进行的清党过程中我局党组织尤其需要在布尔什维克自我批评的基础上对党组织和每一个党员的工作进行审查，审查每一个党员实际捍卫党的总路线的表现。

因此党组织委员会向联共（布）人民委员部党委清党委员会提出原右倾集团首领、现科学研究和技术宣传总局领导人和我局党组织成员布哈林同志参加清党的问题。”

人民委员部党委核心组的决定说：

“鉴于布哈林同志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曾充当右倾集团的

思想家和首领，并进行反党活动，联共（布）重工业人民委员部党委核心组向清党委员会提出布哈林同志参加清党的问题，以便审查布哈林同志在他的整个实际工作中，特别是在对工业有巨大思想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宣传总局的工作中实际执行党的总路线的情况。”

根据联共（布）中央和中央监察委员会 1933 年 4 月 28 日关于在某一党员大会或某一党的组织要求中央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和检查委员会委员或候补委员参加清党并提出理由充分的声明时上述人员应参加清党的决定，重工业人民委员部科学研究和技术宣传总局党委清党委员会与莫斯科河南岸区清党委员会共同决定：联共（布）中央委员尼·伊·布哈林同志参加清党。

布哈林同志向清党委员会表示，党组织要求他参加清党是完全正确的，因为他“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在党内的活动中，犯了一系列极其严重的错误”。其次，布哈林同志承认犯了理论和政治错误，承认这些错误给党造成的危害，并表示，他认为对他错误的批评及党针对他所采取的措施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他还认为总路线和联共（布）中央的实际领导是正确的。关于党的总路线和党的领导问题布哈林同志说：“总路线的制定和干练地进行粉碎反对派的斗争，党员群众和工人阶级的动员，共产国际中的正确路线，对外政策方面极为出色的路线，这都是在两翼进行的斗争中形成的领导的功劳，是斯大林同志本人的功劳。”“我要说，可以把斯大林同志看作我国革命力量的思想统帅……我将担负党交给我的任何工作，我希望在我们党中央委员会和斯大林同志个人的领导之下，我能够为我们伟大英勇的党和我国工人阶级正在从事的

伟大事业做一份贡献，并必将为这一伟大事业做一份贡献。”

有鉴于此，清党委员会通过决议：

认为布哈林同志是可靠的。

同时清党委员会认为必须指出，布哈林同志说他似乎总感到自己在某种程度上是党的弃儿，这种情况根本不是由于党对他的态度所造成的，而只能解释为布哈林同志自己还没有彻底消除他同党的离心情绪。党的组织为布哈林同志提供了一切机会来消除他由于站在右倾机会主义立场和反对党而造成的同党的离心情绪，例如给他提供了广泛的机会作报告，在党的刊物上撰文，从事积极的党务工作。同时，党的组织有理由对布哈林同志表示某种程度的不信任，因为在斯列普科夫集团从事反党活动期间，布哈林同志没有极其坚定而明确地同过去是他的学生的该集团成员断绝关系。

因此清党委员会建议布哈林同志消除他同党的组织的离心情绪，而他把这一情绪归因于党的组织对他的态度是毫无根据的。

清党委员会主席 （布拉托夫）

（莫斯科党务档案馆第 2870 全宗，第 1 目录，第 89 卷宗，第 66—68 页。）

八

联共（布）中央书记斯大林同志
联共（布）中央书记和莫斯科市委
书记卡冈诺维奇同志
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莫洛托夫同志
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
鲁祖塔克同志

兹呈上重工业人民委员部科学研究和技术宣传总局清党委员会（委员会主席为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布拉托夫同志）根据重工业人民委员部党委核心组和重工业人民委员部科学研究和技术宣传总局党委的要求作出的关于联共（布）中央委员尼·伊·布哈林同志参加清党情况的决定。

布哈林同志是在公开的支部会议上参加清党的。

本决定还未与布哈林同志和支部见面。

请指示。

莫斯科州清党委员会主席 （克诺林）^①

1933年12月13日

（莫斯科党务档案馆第2870全宗，第1目录，第89卷宗，第69页。）

原载《苏共历史问题》杂志1991年第3期

（赵国顺译 张祖武校）

① 原件有本人的亲笔签名。——俄文版编者注

1937—1938 年对工农红军 党组织的镇压

О. Ф. 苏韦尼罗夫

工农红军的党组织在 1937—1938 年遭受了真正的不幸。工农红军一向与劳动人民骨肉相连，工农红军的党组织是联共（布）最可靠的队伍之一，它同联共（布）休戚与共。在此期间在陆军及海军的党组织中进行的真正的大暴行是斯大林周围的人有意在联共（布）中策划的整个大暴行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主要目的是要把列宁的党这个我国社会中积极的先锋队变成“斯大林的”党，变成一群和稀泥的顺民，使他们不但没有能力反对日益巩固的斯大林及其助手们的专制暴君体制，而且还尽一切可能来支持这一体制。

这一过程需要花费不少“精力”和时间。早在 20 年代末这一过程就已很清楚了。1929 年 12 月斯大林 50 岁生日成了一个特殊的区分标志，这一天联共（布）举行党史上从未有过的祝寿活动。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被官方宣传为“胜利者们的代表大会”，实质上是“一个胜利者的代表大会”。而在此之前还没有一次党的代表大会被变为对“领袖和导师”大肆赞扬、大唱颂歌的讲坛。

这一过程在基洛夫遇害后则以完全新的方式加速发展了。1935 年 1 月 18 日，联共（布）中央给各级党组织下发了

一封斯大林亲自参与草拟的内部信件《与基洛夫同志遇害有关的事态的教训》^①。信中指出主要结论是“季诺维也夫派别集团实际上是披上伪装的白卫分子组织形式，完全应该像对付白卫分子一样来对付它的成员”。^②可是这封信并没有举出一点事实来证实对列宁昔日的战友、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们是白卫分子的指控。至于如何对付白卫分子，大家在1935年就已很清楚了：“枪毙”、“送杜鹤宁司令部”、“消灭”、“报销”等等，等等。这封内部信件实质上是让党员群众对镇压思想上作好准备，是使他们逐步认识到，近期将把党内那些仍旧忠于列宁遗训、而不忠于斯大林体制的人从肉体上加以消灭。

从肉体上把所有异端分子消灭干净的方针在这封信对所谓“两面派”的态度上也已经清楚地表明了。“两面派”这一含义不清、模棱两可的用语在1933年4月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关于清党》的决议中就出现了。但是，如果说那时主张把两面派一律“清除”出党，那么现在联共（布）中央则要求：“对于两面派不能只限于开除出党，还应当把他们逮捕和隔离起来，以防止他们削弱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力量。”^③

对所有曾参与这个或那个反对派的非军人和军人中的共产党员开始了真正的捕杀。受迫害最重的是“托洛茨基分子”。被扣上这种帽子的人无一幸免。1937年初，相当于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一个部门的工农红军政治部（主任——一级

① 《苏共中央通报》1989年第8期第95—100页。

② 同上，第99页。

③ 同上。

集团军政委级扬·鲍·加马尔尼克，副主任——二级集团军政委级Г. А. 奥谢皮扬)显然根据上级的指示发布了关于深入研究(审查)军区政治部、军事学院政治部、军区党工委的党内档案材料的第64号指示,为的是查明哪些军人共产党员曾投错了票,没有拥护斯大林多数派的代表们提出的“总路线”。

1937年2月9日伏龙芝军事学院政治副院长军政委级叶·阿·夏坚科向加马尔尼克汇报了自己在这方面努力进行的工作。他报告说,从1923年到1924年学院党组织中的多数党员是拥护“托洛茨基观点”的。例如,1923年12月20日在全院党的会议上投票赞成“加米涅夫提出的俄共(布)中央决议的有48人,赞成‘工人反对派’决议的有27人,而赞成托洛茨基决议的则有204人”。没有记名投票的统计表。看来没有必要也不可能查明13年前究竟是谁投了票和投了什么票。然而“搜索”仍在继续进行。根据夏坚科的安排仔细查看了学院的全部档案材料,并给那些通过任何方式(甚至光凭推测)发现的“反对派的参与者”,也就是没有投票赞成加米涅夫决议(夏坚科甚至没有因为加米涅夫作为“人民公敌”已于1936年8月被枪决而感到难堪)的每个人(!)都建立了个人卡片。这就是说,迟早都要找到这些人,并且必定对他们采取“相应的”措施。

在工农红军的党工委和党组织中风气越来越坏,俯首帖耳、唯唯诺诺、惟命是从的人才能保住性命、站稳脚跟,甚至得到提升。1916年加入联共(布),1936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军事学校党工委书记的团政委级H. M. 马特维耶夫看透了这种风气,甚至不无自得地说,他绝对执行学校政治

部主任巴希列夫的指示：“我一得到信号，就立即开除”。

特种部队军事委员会委员、军政委级 И. М. 格林贝格的一番话告诉我们，在中央二三月全会（1937年）之前一直在进行的这种“把不虔诚的教徒逐出教门”的做法是在什么氛围中进行的。他在1937年3月中旬国防人民委员部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回忆说：“我们在部队审查党的文件时曾经这样干：最好开除掉两三个人，这样以后就不会有人说开除得少了，也防备万一以后真发现了敌人。我们把一些人清除出党，理由是认为他们太消极，而过后谁也弄不清楚为什么说他们消极。”

1937年这个过程发生了质的飞跃。在联共（布）中央二三月全会（1937年）上斯大林明确指出：“……现时的暗害分子和破坏分子，不管他们用哪一种旗帜——托洛茨基旗帜或布哈林旗帜——来掩饰自己，早已不是工人运动中的政治派别了，他们已变成了一伙职业的暗害分子、破坏分子、间谍、杀人凶手的无原则和无思想的匪帮。显然必须无情地粉碎和铲除这些老爷们，他们是工人阶级的敌人，是我们祖国的叛徒。”^①虽然“人民领袖”出于他特有的自我保护、随机应变和口是心非指出，这并不意味着应当打击和根除“那些曾经碰巧走上了某个托洛茨基分子走过的道路的人”，^②但大家知道，这样说只是为了转移视线，主要的目标是一个：揭露“托洛茨基—布哈林分子和其他两面派”，立即把他们驱逐出党的队伍并无情地加以消灭。

1937年6月的头几天在克里姆林宫里举行了有联共

^① 《斯大林文集》1985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62页。

^② 同上。

(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的苏联国防人民委员部军事委员会扩大会议。会议听取和讨论了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所作的《关于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揭露的工农红军中的反革命阴谋》的报告。斯大林本人也讲了话。他在援引了各种现已查明纯系伪造的材料和被捕者本人的“坦白”交待之后，声称国内揭露了一个“由德国法西斯支持和提供资助的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军事政治阴谋”。^①

按照预先炮制并经斯大林批准的方案，1937年6月11日苏联最高法院特别审判庭对8名工农红军高级指挥员进行了“客观而公正的”审理。他们全部被革去军衔并被判处死刑。第二天，6月12日，处决了自国内战争以来就全国闻名的、功勋卓著的军人党员，他们是：苏联元帅米·尼·图哈切夫斯基，一级集团军级伊·彼·乌博列维奇和约·埃·亚基尔，二级集团军级王·伊·科尔克，军级维·马·普里马科夫、维·卡·普特纳、B. M. 费尔德曼和罗·彼·埃德曼。

1916年加入联共（布）的工农红军政治部主任、一级集团军政委级加马尔尼克还是在5月底就听说了有关逮捕“阴谋家”的消息，自知在劫难逃而自杀了。

1937年6月14日中央报纸和军队报纸分别刊登了由伏罗希洛夫签署的国防人民委员部第96号命令。这位“斯大林的人民委员”在宣布清除工农红军中“已被揭露”的反革命阴谋的同时，告诉陆军及海军全体人员说：“这伙人的最终目的是不择任何手段地坚决消灭苏维埃制度……在苏联恢复地主和工厂主的压迫……他们预谋杀害党和政府的领导人。在

^① 《苏共中央通报》1989年第4期第53页。

国民经济和国防事务中进行各种恶毒的破坏活动，企图摧毁红军的强大威力以使它在未来的战争中遭到失败。”这份文件把加马尔尼克说成是害怕“接受苏联人民审判的叛徒和懦夫”。^①

这项曾向全世界宣布的命令，正如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是一项完全骗人的命令。对于工农红军中的党组织来说，正是从1937年6月开始了一个异常悲惨的时期。这位苏联国防人民委员以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名义要求陆军及海军中的所有共产党员立即抛开其他一切事务，去发现和揭露所有的阴谋家以及所有与阴谋家哪怕有一丝联系的人，还有同阴谋家斗争不够积极的人，并毫不留情地把他们全部逐出军队。

毫不奇怪，在军队各级党组织中不容异端的局面已逐渐形成。现在各党组织工作重点是尽快揭露“人民公敌”，而且这一概念在运用到工农红军中的党组织时已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如果说，1937年春天以前首先被列为敌人的是那些以往的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右倾分子以及与他们有联系的人，那么，从1937年6月起那些由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凭空捏造的、并不存在的“反苏反革命的军队托洛茨基分子阴谋的参与者”则成了头号敌人。所有被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总局特别司和军队中的特别处逮捕的军人共产党员，几乎所有在已被捕的“人民公敌”的供词中被提到过的人，大多数被“检举”与“阴谋参与者”有某种“联系”的人，许多只是由于工作关系而与“被揭露出的人民公敌”接近的人，——都遭到了无情的镇压。

^① 1937年6月14日《红星报》。

1937年6月21日官复原职的乌拉尔军区政治部主任A. B. 塔鲁京斯基给刚被任命为工农红军政治部主任的彼·亚·斯米尔诺夫（他与斯米尔诺夫在白俄罗斯军区共事时就认识）寄过一封“私人信件”，信中讲了他所遇到的情况：“在代表会议上我认识了军区中担任领导职务的党的积极分子，这些人基本上还不坏，但当然比白俄罗斯军区要差些，几乎所有的人过去都曾受某一政治案件的牵连，或者现在又因为与已被揭露的人民公敌有着日常生活上的联系而名誉扫地。”这还是1937年6月——对工农红军的党组织实施的大暴行刚刚才开始。

国内和军内的官方宣传都大肆鼓吹每一个苏联人，尤其是共产党员应当把尽力帮助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肃清军队的党员队伍中的托洛茨基—布哈林“军队阴谋分子”当作自己的首要义务和神圣任务。

工农红军政治部的工作人员为这项工作定了调子。他们就宣判“图哈切夫斯基匪帮”死刑一事举行集会，用最肮脏的语言评击自己过去的领导人加马尔尼克，把军人共产党员和全体军人的主要任务之一定为：“……当苏联处于资产阶级包围之中时，每一个红军战士、指挥员和政治工作者应当成为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先进的侦察员。我们保证使自己成为内务人民委员部在揭发人民公敌方面的积极的志愿兵。”^①

由于工农红军政治部持这样的观点，军队中的党组织和普通党员都拒绝把执行上述任务看作是自己对党应尽的义务。下面只是这类“活动”的一些个别事例。

^① 1937年6月14日《红星报》。

1937年7月7日托尔马乔夫军事政治学院院长，军政委级 II. Ф. 涅梅尔泽利在给工农红军政治部主任的私人信件中提到必须立即解除该学院副院长 A. H. 安特罗波夫的职务。他写道：“除了加马尔尼克对他的令人怀疑的称赞之外，他在学院中的活动同样值得注意。他在这段时间里没有揭发过一个敌人（黑体是我用的。——作者）并千方百计地回避这些问题……”信上有一条批语：“召见涅梅尔泽利。斯米尔诺夫。1937年7月9日”。这次谈话当然没有记录在案。但是众所周知，旅政委级安特罗波夫从此消失了，继他之后涅梅尔泽利也消失了。

第五机械化旅临时代理政治委员道托夫 1937年8月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谈到伟大成果时说：“旅的6个营政委已有5个被开除出党”。1937年9月10日生物技术学院代理政治委员、旅政委级 II. 利西岑在给工农红军干部部主任、二级集团军政委级 A. C. 布林的信中提出：“给您写信是为了重述我揭发检举人民公敌韦利卡诺夫和布津诺夫的事实。否则可能会以为我同破坏分子没有进行过任何斗争。”^①

工农红军总参谋部军事学院政治委员、旅政委级 A. II. 加夫里洛夫也急忙报告自己“除根”工作的成绩：“1937年10月15日，当我来到学院的时候，拥有130名联共（布）党员和预备党员的学院党组织有80%的攻击性材料（各种声明和对党的攻击），这些材料放在党委两三个月未加审理。从1937年11月到1938年1月共审理了近40个案件，其中15人被

① 指学院院长、师级韦利卡诺夫和科学工作者布津诺夫。

开除出党，15人中又有10人作为人民公敌被逮捕。”^①

1937年6月开始的对工农红军党组织实施的大暴行是在工农红军政治部主任、二级集团军政委级斯米尔诺夫的积极参与下进行的。1937年12月底他得到提升，担任海军人民委员，而工农红军政治部则由列·扎·梅赫利斯领导。斯大林非常了解这位自己过去的助手，并认定他是完成这场清洗运动的最好的人选。梅赫利斯马上被授予二级集团军政委级的军衔，很快又被提升为一级集团军政委级。而他则加快了对红军党组织的镇压速度。其他一些政治工作者也作了相应调整。

1938年3月外高加索军区参谋部政治委员祖托夫在一次会议上发言说，军区政治部主任、旅政委级拉兹多利斯基简直是对工作人员搞恐怖活动。他把工作人员叫到自己那里，谈话一开始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你是不是敌人？你揭发的敌人多不多？你上交的揭发报告多不多？”如此等等。结果有140名政治工作者离开了外高加索军区。1938年5月举行的全军共青团工作者会议谈起过这位拉兹多利斯基（当时他已被宣布为“人民公敌”）。军区政治部主任1937年11月到达哈尔科夫军事学校后就对政工人员和党组织提出问题：“你们搞什么自由化？！你们的学校中混进了坏人，你们学校里有许多敌人和富农，等等……”出席会议的希什卡叶夫回忆说，自这以后，“我们的党工委也开始随意攻击了”。

上面提到过的那乌拉尔军区政治部主任、师政委级塔鲁京斯基的一些指示最清楚、最无耻地体现了那个悲剧时期许

^① 被逮捕和被杀害的人员中有工农红军总参谋部军事学院第一任院长、师级瓦·A·库钦斯基。死后已恢复名誉。

多政治工作领导人的行为方针。据军区党工委书记巴塔洛夫证实，这位军区政治部主任曾提出这样一个意见：“如果党组织审理一个党员案件而案情又不完全清楚的时候，那一定要把这个党员给记下来（黑体是我用的。——作者），然后让他向上级组织证明自己的党性。”凡是他曾呆过的地方的党组织中都广为流行这种先留后路的想法。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步兵学校的一次会议上塔鲁京斯基指出，“党组织的工作实际成果必须用党组织开除了多少党员和预备党员来衡量。”

1938年1月14日梅赫利斯向各部队发布了一项特别命令。在命令中他不无遗憾地指出，在交换1926年式样的党的文件时，登记卡片的第20栏里没有记录下1928年加入白俄罗斯托尔马乔夫集团的情况。大家知道，这个集团没有任何反党的行为；^①当时的一些误会和矛盾也由于1928年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决定而消除了。可是10年后的今天，梅赫利斯在“发现了”又一个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反对派之后，决定要显示出特别的警惕性来。

当时，“两面派”、“倾向分子”、“人民公敌”的名单层出不穷。1938年3月8日，军事电工技术学院代理政治委员、师政委级萨延科寄出了一份学院中“参加反对派和反党集团的、不坚定的、为反对派分子辩护过或与之有联系的”269名党员的名单。稍微尝试独立思考的人，8年前对生活现实持与官方提出的意识形态条条框框不一致看法的人都被列入这一名单。例如，学员巴赫瓦洛夫被认为有右倾机会主义观点，因为他在1930年曾指出，“我们现在的消费比过去少了”，而学

^① 详见《苏共中央通报》1990年第9期第75—76页。

员 A. 沃伊采霍夫斯基则是因为 7 年前“曾说过集体农庄中存在着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不平等”。

“嫌疑分子”的范围扩大了，挖他们历史的根源范围也扩大了。1937 年 12 月工农红军政治部一个处的处长、师政委级 M. P. 沙波什尼科夫向北高加索军区政治部主任递交了一份供选择的 61 名领导成员的名单，对这些人都有“种种足以使他们身败名裂的报告和检举”。这次的使他们“身败名裂”的资料来自军区党代表会议、军区党员积极分子会议的速记记录以及军区政治部的政治告密材料。总之，紧张的“工作”进行得热火朝天。1938 年 3 月 26 日营政委戈罗霍夫“代表北高加索军区政治部主任”报告了工作成果。由工农红军政治部送来的名单中的 61 人在 1937—1938 年间被“机关”揭露和逮捕的有 40 人，被开除出党和被免职的有 4 人，“单”被开除出党的有 3 人，继续接受审查的有 13 人，退出特种远东红旗集团军的有 1 人。可以说“除根”实际上直接涉及到每一个人。

曾在境外组成自己国家的民族的共产党员都属于被怀疑的对象。1938 年 3 月 10 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党的领导机关部主任格·马·马林科夫向梅赫利斯提供了一份有下列民族的联共（布）党员和预备党员的名单，这些民族是：波兰人、德意志人、拉脱维亚人、爱沙尼亚人、芬兰人、立陶宛人、保加利亚人、希腊人、朝鲜人、中国人、日本人、土耳其人、伊朗人、捷克人、英格兰人、法兰西人、意大利人、匈牙利人等。根据国防人民委员 1938 年 6 月 24 日的指令，到 1938 年底有 4 138 名在国外出生和与外国有联系的（包括上面提到的那些民族的共产党员）政工人员被免去工农红军的

干部职务。

人们早就知道，有需求才有供应。由于最“上层”提出了“捕尽”所有钻进工农红军的“阴谋分子”的要求，不少军人共产党员受到怀疑一切的风气的毒害，匆忙地走上了从来被认为是可耻的不光彩的告密歧途。一切全都本末倒置了，不告发被宣布为犯罪，而告发、互相监视则十分盛行，并开始被认为不仅是党员的义务，而且几乎是革命者的高尚品质。

托尔马乔夫军事政治学院军事师范系主任、团政委级 M. Г. 弗拉德林 1937 年 6 月 25 日写给伏罗希洛夫的一封地道的告发信，一下子告发了 3 个人：前学院院长、二级集团军政委级 B. M. 伊博，弗拉德林过去的同窗——中央伏龙芝苏军之家负责人、军政委级 Ф. F. 罗季奥诺夫以及二级集团军政委级 A. C. 布林。1937 年 10 月 6 日步兵第三军政治委员、旅政委级 H. H. 克列缅季耶夫告发了这个军过去的司令、军级格·伊·库利克。1937 年 10 月 11 日黑海舰队政治部主任、师政委级 П. M. 费尔德曼告发了舰队司令、一级舰队级 П. П. 斯米尔诺夫。同一天总参谋部军事学院学员 A. B. 苏霍姆林告发了军级基·阿·梅列茨科夫。这些警惕性很高的“祖国的儿子”往往都一帆风顺地得到了提升，而被告发的人则往往无影无踪地消失了。干这种可耻的勾当的也有“纪录创造者”。例如，有个叫叶梅利亚诺夫的人写了 47 份告发材料，告发自己所在党组织的 40 个人。这些材料几乎全是伪造的。这个告密者并不走运，他没有被提升反而自己也被清除了联共（布）组织。

根据联共（布）当时的党章，各级党工委应当维护党章规定的陆海军共产党员的合法权利。总的看来，应当说它们

在一定时间里基本上对党员进行了某种程度的保护，排除了对他们的毫无根据的指控，尤其是使他们逃脱了非法的迫害。从某些事实看来，当时工农红军政治部的一些党工委成员，甚至在1937年夏天那种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也竭力客观地对待事关共产党员命运的事情。1937年7月3日，伏罗希洛夫在给乌兹别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阿克马尔·伊克拉莫夫的电报中说：“戈罗多维科夫报告说塔什干军事学校校长、旅级彼得罗夫隐瞒了自己的军官身份并搞反革命阴谋，因此决定把他开除出党，从而也清除出军队。彼得罗夫过去曾受到好评。德宾科曾经请他当军区参谋长或军长。即使现在，德宾科对彼得罗夫的印象仍然很好，他说您对他的优点也是十分清楚的。我请求您关心这件事，告诉我您的意见。我已命令戈罗多维科夫把彼得罗夫送到军区政治部党工委并带上材料，在那里将弄清他的情况。”^①

这封电报说明了许多事情。说明1937年夏天伏罗希洛夫还能够认真负责地履行自己的义务，还说明波罗的海舰队中央委员会前主席德宾科的真诚友谊和勇敢。旅级彼得罗夫直到战前一直安然无恙，他英勇善战、被晋升为陆军大将，从这一点可以断定1937年夏天工农红军政治部党工委对他的案件审理的结局是好的。

也许工农红军政治部党工委还有其他客观审理党员案件的事。这使那些在军队党组织中实施大暴行的策划者们很不满意。1937年10月，1903年入党的党工委责任书记、军政委级K.Г.西多罗夫被清除出工农红军，而党工委委员尤卡姆

^① 军级O.И.戈罗多维科夫当时是中亚军区部队司令。二级集团军级帕·叶·德宾科过去曾领导过中亚军区。

斯、盖杜克维奇和西蒙诺夫则被宣布为人民公敌。没有遭到镇压的只有一个人——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副厅长、曾和该审判厅厅长 B. B. 乌尔里希一起进行不公正审理的 И. О. 马图列维奇。

也是在 1937 年 10 月，重新任命了工农红军政治部党工委的成员：书记——B. K. 康斯坦丁诺夫和 A. И. 列昂诺夫，委员——A. И. 扎波罗热茨、马图列维奇、C. E. 扎哈罗夫。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20 周年纪念日前夕——1937 年 11 月 4 日和 5 日在列宁格勒举行的由书记之一康斯坦丁诺夫主持的工农红军政治部党工委现场会议可以说是新的党工委工作的实例之一。这次会议审查了 48 份对开除出联共（布）的决定的上诉状。党工委会议从 1937 年 11 月 4 日中午 12 点开始，11 月 5 日早晨 7 点结束。工农红军政治部党工委书记就党工委工作的这种做法解释说：“托尔马乔夫军事政治学院的死硬派喜欢饶舌，而在零点以后他们就都累了……应当把他们全部都开除掉，因为他们将全给关起来。”也就是说，人们的命运早已注定了。列宁格勒军区政治部党工委党的侦查员 H. И. 卡捷卢欣在报告案件时对莫斯科代表关于驳回上诉的建议的回答始终是一句说惯了的话：“同意，不反对。”他的这种“不抵抗邪恶”颇受赞许，很快他就被提升为中亚军区政治部主任。

由于各级党工委执行这样的方针，在各地党组织中开始形成了党员实际上只有一条出路的局面——既然你个人已经立案，那就只有被开除。在多数情况下党的会议代替了对这个或那个个人案件的客观审理，变成了党的法庭。那些陷入这种倒霉处境的党员自己也深感在劫难逃。

军队飞行员斯捷潘·苏普伦的经历在这一点上是很典型的。1912年当他5岁时同父亲一起去了加拿大，后来，苏维埃政权建立了，他回到了祖国，成为一名军队飞行员，1930年加入联共（布）。1937年12月11日被选为苏联第一届最高苏维埃代表。然而1937年12月底，工农红军空军科研所（他在这里任试飞员）党的会议对他的个人情况进行了审查，苏普伦被指控，说他在幼年时就去了加拿大；会英语并且没有忘记；在国外出差期间曾担任过后来被揭露是“人民公敌”的科研所所长的翻译；在他任试飞员时没有揭发当时已被捕的工农红军空军司令，二级集团军级 Я. И. 阿尔克斯尼斯。

从这次党的会议的记录来看，这位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坚决驳斥了对他的所有诽谤。他令人信服地证明，他没有掌握也不可能掌握任何关于阿尔克斯尼斯及其他人的“破坏”活动的材料。然而他的命运已经注定。当时在党组织集体中形成了根本容不得不同意见、令人窒息的气氛，当会议就把“虽然与人民公敌关系密切却不进行揭露的”苏普伦开除出联共（布）这一建议进行表决时，“赞成的有33票，反对的却一票也没有”。也就是说，连勇敢的苏普伦本人也没有敢投票反对开除自己。他一旦因政治理由被开除出党，就应立即被清除出军队。这位正直的共产党员没有落得这个下场，是因为工农红军政治部党工委考虑到他在试飞工作中的功绩和他身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决定把他留在党内，只给予严重警告（这是新党工委活动中难得的一件事）。之后苏普伦作为苏联志愿飞行员被派往中国，1940年5月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伟大的卫国战争开始后，他率歼击航空团来到前线，亲

自击落两架敌机。1941年7月4日这一天，他在进行第四次战斗飞行时，与敌人的6架歼击机进行了力量悬殊的战斗，壮烈牺牲。苏普伦中校是伟大卫国战争中第一个被授予第二枚苏联英雄“金星”奖章的人。然而，在1937—1938年的大暴行中有多少像苏普伦这样的人被驱逐出党的队伍啊！

1938年4月梅赫利斯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发言引用了关于在工农红军党组织实施大暴行的初步总结的下述材料（见下表）。

1937年工农红军党组织
审查个人活动的总结

季 度	受党纪处分者	被开除者
第一季度	2 659	702
第二季度	3 444	1 131
第三季度	7 838	3 961
第四季度	9 658	4 547

联共（布）中央一月全会（1938年）《关于党组织在开除党员方面的错误、对待被开除联共（布）党籍者的申诉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态度以及克服这些缺点的办法》的决议，就其实质说本应使工农红军党组织中的局面也得到很大的改观。但实际上陆海军党组织中尽管稍有变化，但大暴行仍和从前一样继续进行，有时候还变本加厉。其实梅赫利斯正是

为此才被派往工农红军政治部去的。

为了执行官方的“除根”方针，仅1938年下半年工农红军中被开除的就有3939人（其中预备党员598名）。这一时期被开除出党的军人共产党员中，1931—1932年入党的有1239人，1928—1930年入党的有772人，1925—1927年入党的有735人，1924年入党的有119人，1921—1923年入党的有207人，1918—1920年入党的有655人，还有80名革命前入党的党员。被开除的主要理由是：盗窃社会主义财产的24人；欺骗党的37人；隐瞒“托洛茨基集团成员身分”的50人；隐瞒社会出身的176人；与“人民公敌”有联系的419人；被定为“人民公敌”的2128人。这样，1938年下半年工农红军中被开除出党的所有人中几乎有65%或是因被定为“人民公敌”，或是因与“人民公敌”有联系而被没收了党证。

完全有证据说明，1937—1938年在工农红军的许多党组织中都笼罩着一种怀疑一切的氛围，简直像精神变态。有一个党员向党组织递交报告，请求把自己的姓杜拉科夫改成切尔内绍夫，因为原来的姓在俄语中不好听。党组织严肃考虑之后……把他开除出党。古托夫大尉在转为正式党员时汇报说他的堂叔曾是毛拉。党组织为防万一就把他“当作人民公敌”开除了。

在整个1938年中，把军人开除出党的活动仍然大规模地、赶任务式地继续进行着，使军队党组织遭受巨大损失，严重破坏了党对工农红军的整个活动及其战备成效施加影响的能力。1938年被开除出党的7753名军人党员中有3497名指挥员，1684名政工人员。领导干部遭到特别巨大、实际上是完全无法弥补的损失。这一年中，153名政治部主任、兵团

政委，301名政治部工作人员，383名部队政委和490名部队及兵团指挥员不再是联共（布）党员。^①

为了公正起见必须指出，1938年秋天到来之际，工农红军政治部党工委在党内为被错误开除出党者恢复名誉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联共（布）中央一月全会（1938年）以后，这个党工委在9个月时间里收到3595份党员及预备党员的申诉书（差不多同前三年内收到的申诉书一样多）。1938年10月1日审理了2784份申诉，对其中的1251个案件撤消了军区党工委的决定。一些党工委工作人员由于对审理被开除者的申诉持形式主义的态度而被追究党内责任。第34步兵师党工委原书记B. A. 托夫尼斯（在他的主持下有34名党员被开除出联共（布），事后上级党的机关恢复了其中32名党员的党籍）自己“因为与人民公敌联系密切，并按他们下达的任务开除党员”而被开除出党。仿佛大量混入工农红军的许多党组织中的“人民公敌”的形象，一如既往地起作用。

这样，工农红军党组织由于不能坚决抵制国内和军内发生的暴力的肆虐，本身在很大程度上成了这一暴力的牺牲品。在那个时期“因为政治原因”而被开除出联共（布）就意味着政治生命的结束，而且被开除者往往注定要遭到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的逮捕，由此还会带来种种后果。

1934年被选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军人共产党员中绝大多数人的命运也是悲惨的。3名当选为中央委员的人中只有伏罗希洛夫幸免于难，并得到提升（实质上他是镇压红

^① 在整个1938年，主要因为“政治罪行”而被工农红军各级党组织和党委会追究党内责任的有19794人（《苏共中央通报》1990年第3期第195页）。

军党组织的元凶之一)。一级集团军政委级加马尔尼克，正如已经提到过的，落到自杀的地步，一级集团军级亚基尔（甚至没来得及把他开除出中央委员会）被枪决。在6名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的军人共产党员中只有谢·米·布琼尼一人免受迫害，因为他几乎是疯狂地拥护清洗，而其余5名——苏联元帅布柳赫尔、叶戈罗夫和图哈切夫斯基，一级集团军级乌博列维奇和二级集团军政委级布林则被宣布为“人民公敌”，以不同的方式被处死。

工农红军政治部在消除1937—1938年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的活动中的无限权力、实际上的“无法无天”方面，在抢救工农红军的首批创建者和国内战争时期和以后的困难时期入党的军人党员方面，本应起重要的作用。正是它应当保护由它管理的陆海军共产党员、陆海军全体人员，使他们不遭受对党内同志情谊的蛮横蹂躏及任何非法的侵扰。但是，1937—1938年工农红军政治部在执行自己这一极重要的任务时实际上是完全不能令人满意的。当然，这有许多原因，其中之一就是工农红军政治部的领导本身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严格控制之下。足以说明问题的是：在它存在的最初20年里，该部的所有主任中只有古谢夫一人于1933年自然去世。除了上面提到的加马尔尼克的悲惨命运，所有其余的人伊·捷·斯米尔加、亚·格·别洛博罗多夫、列·彼·谢列布里亚科夫、弗·亚·安东诺夫-奥夫申柯、安·谢·布勃诺夫、斯米尔诺夫均死于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刑讯室里。陆海军中所有其他在1935年获得二级集团军政委级高级称号的政治工作领导人：M. П. 阿梅林、Л. Н. 阿伦什塔姆、Г. И. 韦克利切夫、Г. И. 古金、B. M. 伊博、С. Н. 科热夫尼科夫、M. M. 兰德、А.

И. 梅济斯、Г. С. 奥库涅夫、Г. А. 奥谢皮扬、И. Е. 斯拉温、А. Л. 希夫列斯、А. С. 格里申（自杀）都成为清洗的牺牲品。工农红军政治部一些主要部门的领导人 Ф. Л. 布卢门塔尔、М. Е. 皮沃瓦罗夫、Б. У. 特罗扬克尔、Х. Х. 哈里东诺夫、А. Н. 赫罗缅科、И. Г. 舒宾等人 都被枪决。所有这些人死后都被恢复了名誉。

在工农红军党组织中实施的大暴行的势头直到 1938 年底、1939 年初才有所减弱。联共（布）中央和各个政治机关采取了有力的措施以保证军队的党组织在人数上有所增加。军队党组织吸收了几万名新预备党员，党员数量大大增加了。他们在维护军纪、加强部队战斗力方面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但是，1937—1938 年军队党组织所遭受的巨大创伤并没有，也不可能完全治愈。数千名因捏造的罪名被枪决的、忠实于祖国的军队共产党员不可能再回到战斗队伍中了。每一个在斯大林恐怖的腥风血雨中奇迹般活下来的人是不会忘记这段历史的。

现在，当我们试图来揭示所有造成红军对 1941 年 6 月爆发的那场大战准备不足的因素时，应当承认，1937—1938 年在工农红军党组织中实施的大暴行也是其中的一个因素。

原载《苏共历史问题》1991 年第 6 期

（门三嫻译）

拉斯科尔尼科夫和 他给斯大林的公开信

费多尔·费多罗维奇·拉斯科尔尼科夫是苏联革命史上的一位传奇人物。他 1892 年生于彼得堡。他的父亲姓谢尔盖耶夫，是东正教的神职人员。他的母亲姓伊林娜，出身贵族。由于他的父母没有正式在教堂举行婚礼，他作为非婚生子女只能随母亲姓。在父亲去世后母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当他 8 岁时，被送往奥登堡亲王孤儿院就读。

他从少年时代起就受到革命文学和进步思潮的影响，深感社会不公，倾向革命。1905 年俄国革命爆发时，他正在五年级读书，曾两次参加学生罢课，并参加代表团向院长请愿，要求改善学习和生活条件，险些因此被开除。1909 年孤儿院毕业后，他考入圣彼得堡工学院。由于他的相貌和陀斯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罪与罚》的主人公拉斯科尔尼科夫相像，同学们都这样称呼他，他从此改姓拉斯科尔尼科夫。

1910 年，拉斯科尔尼科夫 18 岁时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开始为布尔什维克的合法报纸《明星报》撰稿。《真理报》出版后他担任该报编辑部秘书。但他在《真理报》工作仅一个月，1912 年 5 月 22 日深夜他被沙皇警察逮捕，不久被判处流放阿尔汉格尔斯克 3 年。但 1913 年 2 月他遇赦获释，重返《真理报》编辑部工作，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真理报》遭封为止。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拉斯科尔尼科夫进入海军士官候补生学校学习。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时他回到彼得格勒，参加《真理报》编辑部的工作，为报纸撰写了许多文章。同年3月他受党的委托到喀琅施塔得创办《真理呼声报》。

他在喀琅施塔得期间表现出杰出的组织才能，不久被选为喀琅施塔得苏维埃副主席，经常在各种群众集会上发表演说。后来他受彼得格勒党委的派遣，在波罗的海舰队的海军基地做鼓动工作。临时政府把他视为眼中钉，逮捕了他，直到10月13日他才获释。

十月革命一开始，他就参加了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在此期间，列宁经常和这位年轻的海军军官商量问题，听取他的意见。他率领水兵打退了克拉斯诺夫的反革命叛乱，后来又带领水兵赶往莫斯科，支援当地起义者。

从莫斯科归来后，他先后被任命为海军总参谋部政委、海军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1918年开始任副海军人民委员。为了保存波罗的海舰队的主力，防止德军和芬兰白军的覬覦，拉斯科尔尼科夫参与领导了在严冬季节从雷瓦尔和赫尔辛福斯转移236艘军舰的行动。这一壮举史称“冰上行军”。

1918年夏德军要求停泊在新罗西斯克的黑海舰队驶往塞瓦斯托波尔。为了不使舰只落入德帝国主义者之手，拉斯科尔尼科夫赶往新罗西斯克，经过艰苦工作，终于说服了水兵，将这些舰只全部凿沉于黑海。

接着拉斯科尔尼科夫带领黑海舰队的水兵从陆路突破白军的重围抵达察里津。不久他被任命为东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8月22日起担任伏尔加舰队司令。他参加了攻克喀山之役，在他的指挥下3艘雷击舰直插敌后，解救了生命

危在旦夕的 432 名被俘的共产党员和红军战士。

1918 年 12 月拉斯科尔尼科夫任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他受命率领特种舰队从喀琅施塔得出发去雷瓦尔地区侦察。但途中他所乘坐的驱逐舰受到 5 艘英国巡洋舰的围攻。拉斯科尔尼科夫不幸被俘，被送往伦敦关押。

1919 年 5 月 27 日苏维埃政府在芬兰边境用俘获的 17 名英国军官向英国政府换回拉斯科尔尼科夫。他回国后重又担任伏尔加舰队司令，先后参加了保卫察里津、阿斯特拉罕的战斗，并因此荣获一枚红旗勋章。

1920 年他率领舰队转战里海，一举攻克亚历山大要塞，并在伊朗海港恩泽利登陆，夺回被白军抢走的船只、军火和粮草。为此他获得了另一枚红旗勋章。

俄罗斯联邦和阿富汗王国建立外交关系后，他于 1921 年 3 月立即被任命为驻阿富汗的首任全权代表。他在阿富汗任内做了大量工作，改善了俄阿两国的关系。1923 年 12 月离任。

20 年代中期拉斯科尔尼科夫从事文学创作活动。先后担任过《青年近卫军》、《红色处女地》的主编，领导过“莫斯科工人”出版社、中央剧目和演出检查委员会、艺术事业总局等单位。他创作出版了一些作品，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回忆录《喀琅施塔得和彼得格勒在 1917 年》和小说《海军准尉伊林的故事》。他还写过介绍阿富汗和中国情况的书以及其他许多文学、历史著作和政论。他的剧本《罗伯斯庇尔》曾由一些剧院上演。

1930 年起拉斯科尔尼科夫重归外交战线。他先后担任苏联驻爱沙尼亚、丹麦和保加利亚的全权代表。他在索非亚任

内不断听到来自国内的消息，他在革命和国内战争中所熟悉的同志一个个成了“人民的敌人”。他无论如何不能相信他们有罪。不久他本人也受到叶若夫的爪牙的监视。他的回忆录被明令销毁。他的使馆的司机和武官奉召回到莫斯科后被捕。最后他自己也收到了归国的命令。他明白自己已危在旦夕，于是下决心流亡法国。

1937年7月他得知他被当作“人民的敌人”缺席审判，宣布他不再受法律保护。7月22日他发表了《我是怎样被变成“人民的敌人”的》声明。8月17日写了《给斯大林的公开信》。这个声明和这封公开信对于我们今天研究苏共历史和经验教训是不无裨益的。

这一年的8月底拉斯科尔尼科夫在法国尼斯患重病，9月12日去世。苏共二十大后苏联最高苏维埃全会决定撤销1939年对拉斯科尔尼科夫的毫无根据的指控，为他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黄有自编写）

给斯大林的公开信

我要说出的关于你的真相
将要比任何谎言更为恶劣

斯大林，你宣布我“不受法律保护”。你通过这一行动使我获得了和所有在你的统治下不受法律保护的苏联公民同等

的权利，确切些说，我们同样都失去了权利。

就我而言，我将充分给予回报：我把进入你建成的“社会主义王国”的通行证归还给你，并同你的制度决裂。

你的“社会主义”同真正的社会主义距离十分遥远，正如你为所欲为的个人专政同无产阶级专政毫无共同之处一样。当你的“社会主义”取得胜利时，社会主义建设者们得到的只是铁窗生涯。

即使勋章获得者，尊敬的革命民意党人尼·亚·莫罗佐夫^①声称他在施吕瑟尔堡要塞度过20年要争取的就是这种“社会主义”，这也帮不了你的忙。

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不满正在自发地增长，从而强烈要求采取急剧的政治策略，采取类似1921年列宁改行新经济政策时的行动。在苏联人民的压力下你“恩赐”了一部民主宪法。全国以出自内心的满腔热情通过了这部宪法。

1936年宪法体现了全体人民的希冀和渴望，这部宪法的民主原则如果能得到认真的贯彻，将标志扩大苏联民主的新阶段的到来。

但你所理解的任何政治策略，都是欺诈和哄骗的同义词。你所推行的是没有道德的政治，没有诚实的权力，没有对人的爱的社会主义。

斯大林，你是如何对待宪法的呢？

你害怕自由选举，以为这是会危及你的个人权力的“前途莫测的一跃”，于是你践踏宪法，把它视同一纸空文，把选举变成了只有唯一一个候选人的可怜的闹剧，你使最高苏维

^① 尼·亚·莫罗佐夫（1854—1946）——革命民粹主义者，苏联科学院名誉院士。

埃全会上充斥对你本人的歌功颂德。在全会休会期间你悄悄地消灭“耍滑头的”代表，嘲弄他们的不受侵犯的权利，提醒他们说全苏联的主人是您，而不是最高苏维埃。您竭尽全力来败坏苏维埃民主的声誉，败坏社会主义的声誉。您非但没有执行宪法规定的转折路线，反而压制了日益增长的对暴力和恐怖的不满。您逐渐用您的个人专政体制取代了无产阶级专政，从而开始了我国革命史上将称之为“恐怖时代”的新阶段。

在苏联没有一个人有安全感。没有一个人躺下睡觉时知道他能否躲过夜间的逮捕。没有一个人能得到宽恕。无罪的人和有罪的人，十月革命的英雄和革命的敌人，老布尔什维克和非党人士，集体农庄农民和全权代表，人民委员和工人，知识分子和苏联元帅——全都同样地遭到您的鞭子的抽打，全都在可怕的血腥的旋转木马上飞旋不已。

正如火山爆发时大团大团的岩浆轰隆隆落入火山口一样，苏联社会一整个一整个阶层纷纷落入深渊。

您从血腥镇压过去的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和布哈林分子开始，接着歼灭老布尔什维克，然后消灭那些在国内战争中成长起来并承担了前两个五年计划建设重担的党和非党的干部，组织了对共青团的杀戮。

您以同“托洛茨基—布哈林间谍”作斗争的口号作掩护，但是您并不是昨天才掌握权力的。未经您的允许任何人都不可可能“混上”重要岗位。

是谁把所谓的“人民的敌人”提拔到最重要的国家、党、军队和外交岗位上的？

——是约瑟夫·斯大林。

是谁把所谓的“坏分子”无孔不入地安插到苏维埃和党的机关里的？

请读一下政治局过去的会议记录：其中充斥着对清一色的“托洛茨基—布哈林间谍”、“坏分子”和“破坏分子”的任命和调动，而签署这些任命和调动的是：约·斯大林。

你装成是多年来一直受狂欢晚会上的假面怪物蒙骗的轻信的木头人。

“去把替罪羊找出来。”你低声嘱咐自己的亲信，并把自己的罪行硬加在被抓来的牺牲品的头上。

你使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笼罩整个国家，即使是最勇敢的人也不能对你当面说出真相。

“不顾情面”的自我批评的浪潮在你的宝座脚下望而却步。

你像教皇一样绝对正确！你从来不犯错误！

但是苏联人民十分清楚，你这个“普遍幸福的缔造者”应该对一切负责。

你借助肮脏的伪证排演了审讯程序，其指控的荒唐程度超过了你从宗教学校教科书上了解到的中世纪对异端分子的审讯。

你自己很清楚，皮达可夫^①并没有飞往奥斯陆，马·高尔基是自然死亡的，托洛茨基并没有颠覆列车。

你明知这一切都是谎言，却鼓励那些诽谤者说：

“诽谤吧！诽谤吧！诽谤总能起点作用。”

正如你所知道的，我从来不是托洛茨基分子。相反，我

^① 格·列·皮达可夫（1890—1937）——苏联党政领导人，多次当选为党中央委员，后被镇压。

在报刊上和大会上同一切反对派作过思想斗争。即使现在我也不同意托洛茨基的政治立场，不同意他的纲领和策略。我尽管同托洛茨基有原则分歧，却仍然认为他是一个正直的革命家。我现在不相信而且永远不相信他会同希特勒和赫斯有勾结。

你是制作辛辣菜肴的厨师：这些菜肴正常人的胃是受不了的。

你在列宁的陵墓上信誓旦旦，表示要执行他的遗训，像爱护眼珠一样保护党的统一。你这个背叛誓言者连列宁的这个遗训也违背了。

你污蔑、侮辱和枪杀了和列宁多年共事的战友：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布哈林、李可夫等人，你很清楚他们都是无罪的。你强迫他们在临死前忏悔自己从来没有犯过的罪行，把自己从头到脚全都抹黑。

十月革命的英雄在哪里？布勃诺夫^①在哪里？克雷连柯^②在哪里？安东诺夫-奥弗申柯^③在哪里？德宾科^④又在哪里？斯大林，你逮捕了他们。

老近卫军在哪里？活着的老近卫军已经没有了。

斯大林，你枪杀了他们。

你败坏和玷污了你的战友们的心灵。你迫使追随你的人

① 安·谢·布勃诺夫(1883—1940)——苏联党政领导人，曾参与领导十月革命，后任红军政治部主任、党中央书记。后被镇压。

② 尼·瓦·克雷连柯(1885—1938)——苏联党政领导人。十月革命后曾任红军最高总司令，后改任司法人民委员，后被镇压。

③ 弗·亚·安东诺夫-奥弗申柯(1883—1939)——苏联军事活动家，攻打冬宫的领导人之一，历任方面军司令员，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俄罗斯联邦检察长等职，后被镇压。

④ 帕·叶·德宾科(1889—1938)——苏联革命活动家，曾任海军人民委员，后被镇压。

痛苦而又恶心地踏着昨天的同志和朋友的鲜血行进。

你在由你领导下撰写的谎话连篇的党史中把死了的人、被你杀害和污辱的人的功劳和业绩攫为己有。

你消灭了列宁的党，在它的白骨上建成了一个新的“列宁—斯大林的党”，这个党成了为你的个人专权打掩护的好工具。你建党不像任何其他政党的建设那样以共同的纲领和策略为基础，而是以对你个人的无原则的热爱和忠诚为基础。公开宣布党员并非必须了解新党的纲领，但必须像报刊每天在加温的那样热爱斯大林。对斯大林表白忠诚取代了对党纲的承认。

你是同自己的昨天决裂了的、出卖了列宁事业的叛徒。你郑重其事地提出提拔新干部的口号。但是这些新提拔的年轻人中有多少已经在你的单人囚室中受煎熬？斯大林，他们中的多少人已经被你枪杀？

你以施虐淫者的残忍拷打国家急需的有用的干部。你从你个人专政的角度认为他们十分危险。

在战争前夕你摧毁红军——我们国家的宠爱和骄傲，它的强大的堡垒。你使红军和红海军失去了领导人。你杀死了经过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考验、以才华横溢的图哈切夫斯基^①元帅为首的一批最天才的统帅。

你消灭了国内战争的英雄，正是他们利用最新的军事技术改造了红军，使红军成为不可战胜的军队。

你在战争危险最大的时刻继续消灭军队领导人，中级和下级指挥员。

^① 米·尼·图哈切夫斯基（1893—1937）——苏联元帅，曾任工农红军参谋长，副国防人民委员。后被镇压。

布柳赫尔^①元帅在哪里？叶戈罗夫^②元帅在哪里？

斯大林，你逮捕了他们。

你为了安抚惊恐不安的人们，欺骗全国说，经过逮捕和杀戮削弱了的红军变得更为强大了。

你明知军事科学规律要求军队中从总司令到排长都要实行一长制，却恢复了红军和红海军建军初期产生的政治委员制度，而那时我们还没有自己的指挥员，需要从政治上监督旧军队的军事专家。

你不相信红军指挥员，在军队中实行双重领导，破坏了军事纪律。

你在苏联人民的压力下假惺惺地提倡对俄罗斯历史上的英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和德米特里·顿斯科伊、苏沃洛夫和库图佐夫的崇拜，指望他们在未来的战争中会比被你处死的元帅和将军们给你提供更多的帮助。

真正的盖世太保间谍和日本情报人员利用你不相信任何人这一点，成功地在被你搅浑了的水里摸鱼，抛给你大量的伪造的，中伤最优秀、最天才和最正直的人的文件。

在你制造的怀疑一切、相互猜疑、到处刑讯逼供、内务人民委员部至高无上（你让内务人民委员部蹂躏红军和全国）这种恶劣的氛围中，人们相信或者装作相信任何一个“截获的”文件，视为无可辩驳的证据。

以福斯大尉为代表的俄罗斯解放军事联盟^③的“内线”把

① 瓦·康·布柳赫尔（1890—1938）——苏联元帅，被镇压。

② 亚·伊·叶戈罗夫（1883—1939）——苏联元帅，曾任工农红军参谋长，副国防人民委员，被镇压。

③ 流亡国外的白卫分子组织。

诽谤外交使团正直的工作人员的假文件塞给叶若夫的间谍，从而使我国驻保加利亚全权代表处从司机 M. N. 卡扎科夫到武官 B. T. 苏霍鲁科夫都被镇压。

你一个接一个地消灭了十月革命的十分重要的成果。你以反对劳动力流动为名取消了劳动自由，奴役苏联工人，把他们束缚在工厂中。你破坏了我国的经济结构，使工业和运输业解体，败坏了厂长、工程师和工长的威信，你频繁地撤换和任命工程师、厂长和工人，把他们当作“暗藏的、尚未被揭露的坏分子”加以逮捕和迫害。

你使正常工作无法进行，却以反对“旷工”和“迟到”为借口，迫使劳动者在硬性的、反无产者的法令的鞭打下工作。

你的没完没了的迫害使得苏联劳动者的生活变得难以忍受，他们稍有过失就会被解雇，拿了黑籍证^①被赶出宿舍。

工人阶级以忘我的英雄主义，承受着紧张劳动、食不果腹、工资微薄、住房拥挤、缺乏必要的商品的重压。工人阶级相信你在引导他们走向社会主义，可是你欺骗了他们。他们指望一旦社会主义在我国取得胜利，人类杰出的思想家关于世界大同的理想得到实现，大家将过上欢乐轻松的生活。

你连这个希望也剥夺了，因为你宣布社会主义已经彻底建成。于是工人们困惑不解地互相悄悄地打听：“既然这是社会主义，那么，同志们，我们过去为之斗争的又是什么？”

你像歪曲整个马列主义理论那样歪曲了列宁关于国家消亡的理论，通过你的文理不通的蹩脚“理论家”的嘴保证即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也要保留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权力。

① 旧俄时代迫害革命者的证件，持此证者不能再入学或担任公职。

你剥夺了集体农庄农民一切工作刺激。你以反对“浪费集体农庄土地”为借口使宅旁自留地抛荒，目的是迫使农民在集体农庄土地上干活。你这个饥荒的制造者通过体现你的策略的特色的粗暴残酷的方式干尽了坏事，使列宁的集体化思想在农民的心目中威信扫地。

你假惺惺地把知识分子称作“民族精英”，却夺去了作家、学者、画家最低限度的劳动自由。你扼制艺术，使它在你的手中苟延残喘，奄奄一息。被你吓怕了的书报检查机构的暴行和编辑们可以理解的怯懦（他们对一切都要以脑袋作保证）导致苏联文学的僵化和瘫痪。作家不能发表作品，剧作家不能上演剧作，批评家不能说出未被加盖公章的个人的看法。

你使苏联艺术窒息，要求它像近臣那样曲意逢迎，但是它宁可沉默，也不愿为你唱“赞歌”。你扶植的假艺术以令人生厌的单调为你的臭名昭著、使人腻味的“天才”大唱颂歌。

平庸的文丐们把你当作“月亮和太阳生下的”半神来歌颂，而你像东方暴君一般为庸俗的阿谀奉承所陶醉。

你无情地消灭天才的、但不为你所容的俄罗斯作家。鲍里斯·皮利尼亚克^①在哪里？谢尔盖·特列季亚科夫^②在哪里？亚历山大·阿罗谢夫^③在哪里？米哈伊尔·科利佐夫^④在哪里？塔拉索夫-罗季奥诺夫^⑤在哪里？加里娜·谢列布里

① 鲍·安·皮利尼亚克（1894—1941）——苏俄作家。

② 谢·米·特列季亚科夫（1892—1939）——苏俄作家。

③ 亚·雅·阿罗谢夫（1890—1938）——苏联党政活动家，作家，1934年任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主席。

④ 米·叶·科利佐夫（1898—1942）——苏联作家，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

⑤ 亚·伊·塔拉索夫-罗季奥诺夫（1885—1938）——苏俄作家。

亚科娃^①（她错就错在是索柯里尼柯夫^②的妻子）又在哪里？

斯大林，你逮捕了他们。

你追随希特勒恢复了中世纪的焚书。

我亲眼见到过发给苏联各图书馆的长长一串必须立即无条件销毁的书籍清单。我在担任驻保加利亚全权代表时，在1937年收到的要烧毁的禁书清单中发现了我的历史回忆录《喀琅施塔得和彼得格勒在1917年》。在许多作者的姓氏边上标出：“销毁全部书籍、小册子和画像”。

你剥夺了苏联学者、尤其是人文科学学者最起码的学术思想自由，而没有学术思想自由就不可能进行创作工作。

自以为是的不学无术之徒通过种种阴谋诡计、造谣中伤不让大学、实验室和研究所的学者工作。

你向全世界宣告全世界声誉卓越的杰出的俄国学者伊帕季耶夫^③和奇奇巴宾^④院士是“叛逃分子”，幼稚地以为这样可以使他们声誉扫地，其实这只会使你自己丢脸，使全国和世界舆论都知道你的制度的一个可耻的事实：优秀的学者置你的种种善行（住宅、汽车、人民委员会食堂的就餐卡）于不顾，逃离你的天堂。

你消灭了天才的俄罗斯学者。

优秀的苏联飞机设计师图波列夫^⑤在哪里？你连他都没

① 加·约·谢列布里亚科娃（1905—1980）——苏俄作家，著有《马克思的青年时代》、《盗火》等。

② 格·雅·索柯里尼柯夫（1888—1939）——苏联党政领导人。曾任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主席等职，多次担任党中央委员，后被镇压。

③ 弗·尼·伊帕季耶夫（1867—1952）——俄国有机化学家，科学院院士。1927年起侨居国外。

④ 阿·叶·奇奇巴宾（1871—1945）——俄国有机化学家，科学院院士。1930年移居国外。

⑤ 安·尼·图波列夫（1888—1972）——苏联航空设计师，科学院院士。

有放过。斯大林，你逮捕了图波列夫。

没有一个部门，没有一个角落可以安静地从事心爱的工作。剧院院长，卓越的导演，杰出的艺术家弗先沃洛德·梅耶霍德^①从不过问政治。但是斯大林，你逮捕了梅耶霍德。

你明明知道你缺乏干部，每一个有文化、有经验的外交家特别珍贵，你却把苏联的全权代表一个又一个骗回莫斯科，几乎把他们全都杀光了。你彻底破坏了外交人民委员部的整个机关。

你到处消灭我国最宝贵的骨干，年轻的干部，把许多正当盛年的才华横溢、前途无量的外交家杀掉了。

法西斯主义的矛头已经直指苏联，争夺但泽和日华战争正在进行之中（这只是为未来武装干涉苏联作准备），德日侵略的主要对象是我们的祖国，而制止战争的唯一机会是苏联公开加入民主国家的国际联盟，尽快同英法缔结军事同盟和政治同盟，在这危急万分的时刻你却动摇不定，等待时机，像摆锤一样在两个“轴心”中左右摇摆。

你的对外对内政策的一切考虑都不是出于对祖国的爱（你没有这样的爱），而是出于一种担心失去个人权力的畜类的恐惧。你的无原则的专政，像一个烂木墩子一样阻挡了我国前进的道路。你这位“人民的父亲”出卖了战败的西班牙革命者，听任他们受命运的摆布，让别的国家去关心他们。战败者是不幸的！你再也不需要他们了。

你心安理得地让逃避法西斯野蛮行径的犹太工人、知识分子、手工艺人面对死亡，对他们关上了我国的大门，而我

^① 弗·埃·梅耶霍德（1874—1940）——苏联导演，共和国人民艺术家。

国本可以在辽阔的土地上安置下千千万万难民。

我像所有的苏联爱国者一样工作，对许多事情装作没有看见。我沉默得太久了。我很难与之决裂的不是你，不是你注定要灭亡的制度，而是残剩的老的列宁的党，我在这个党里呆了近30年，而你在3年之中就把它毁灭了。我为失去我的祖国而痛苦万分。

越往后，你的个人专政的利益就越会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利益，同全国的利益不断发生冲突，你作为一个攫取了个人权力的暴君正在嘲弄这个国家。

你的社会基础越来越窄。你为了拼命寻找支柱，假惺惺地胡吹乱捧“非党布尔什维克”，制造出一个又一个特权群体，给他们赏赐，送他们礼物，但是你不仅无法保证这些新的“一时的哈里发”的特权，而且无法保证他们的生存权。

你的疯狂的暴行不可能持久。

你的罪行罄竹难书。受你迫害的牺牲者的名字罄竹难书！擢发难数。

苏联人民迟早要把你作为社会主义和革命的叛徒、主要的坏分子、人民真正的敌人、饥荒和假案的制造者送上被告席。

1939年8月17日

我是怎样被变成 “人民的敌人”的

7月17日苏联最高法院缺席判处我以极刑——宣布我不再受法律保护。

法院断言我“逃离职守，投入人民敌人的阵营和拒绝返回苏联”，我不清楚法院的判决依据的是哪些事实。

没有任何人审问过我，也没有任何人要求过我作出解释。

我要公开宣布，对我的案件的判决依据的是捏造的指控。

我不承认自己犯有指控我的每一项罪行。指控我逃离职守。这与事实发生的先后顺序不符。

早在1936年底我在担任苏联驻保加利亚全权代表时，外交人民委员部建议我担任驻墨西哥的全权代表，而我国当时同墨西哥连外交关系都尚未建立。鉴于这一建议显然很不严肃，我断然加以拒绝了。

此后，1937年上半年又先后建议我去捷克斯洛伐克和希腊。我由于对在保加利亚的任职感到满意，拒绝了这些建议。

1937年7月15日我接到了人民委员发来的电报，他根据政府的要求要我立即去莫斯科商谈担任新的、更重要的工作。其理由是我在保加利亚担任的职务是大才小用。还要我立即报告离开的日期，不要往后推。

我考虑到一等秘书和二等秘书都已去莫斯科，就询问工作应交代给谁。这时命令我等待二等秘书返任，并且从另一个全权代表处将来一个副手。

新任命的一等秘书普拉索洛夫直到1938年1月才到达索非亚。此后又不断要求我马上返回莫斯科：人民委员来信谈到拟把我派往土耳其。我请求同意我把去莫斯科的公务旅行和例行的休假结合起来，并得到了批准，条件是要我在苏联境内休假。

1938年4月1日我离开索非亚去莫斯科，关于这一点当天就电告外交人民委员部。我离开索非亚时完全相信我还要回来递交离任国书，并一一进行告别。

我并没有逃离职守，而是完全公开离开的，不仅有正式的批准，而且是直接奉召回国的。苏联在保加利亚的全体侨民都在车站上为我送行。

因此，指控我逃离职守与事实不符，完全不能成立。

过了4天，1938年4月5日，我尚未抵达苏联国境，这时莫斯科失去了耐性，在我还在旅途上就可耻地解除了我的苏联驻保加利亚全权代表的职务，令我十分惊讶的是，这个消息我是从外国报纸上得知的。而且连一点礼貌都不讲：甚至不称我为同志。

我是精通政治的人，懂得紧急解除一个人的职务，并通过广播向全世界报道，这意味着什么。发生这一切之后我才明白我一过国境马上会被捕。

我才明白我和许多老布尔什维克一样成了无辜的罪人，而所有的关于担任从墨西哥到安卡拉的重要职务的建议不过是圈套，是用来诱骗我回莫斯科的手段。

正是用这样的有失国家体面的不光彩的方法诱骗了许多

外交官。建议列·米·卡拉汉^①担任驻华盛顿大使，可是当他回到莫斯科，就被捕并被枪杀了。以任命弗·亚·安东诺夫-奥弗申柯为俄罗斯联邦司法人民委员为借口把他从西班牙召回，为了使这一任命更加令人信服，还在《消息报》和《真理报》上发表了关于这一任命的决定。未必有读者会怀疑这则消息是专门为安东诺夫-奥弗申柯一个人刊登的。

在1938年4月5日发表了解除我的职务的决定（我被当作已经证据确凿、不容置疑的罪人）后再回莫斯科就是无异于自杀的纯粹的发疯。

在巴黎圣母大堂的正门上方，高居于许多塑像之上的是心平气和地手捧自己头颅的圣杰尼斯。但是我宁可忍饥挨饿地过自由生活，也不愿无辜地在监狱中受尽折磨死去，而且连就向我提出的荒唐指控作出辩解的机会也没有。

1938年9月10日我在日内瓦拜访了马·马·李维诺夫^②，想了解一下解职的原因和我的处境。应苏联驻法国大使雅·扎·苏里茨^③的要求，1938年10月12日我来到位于格列涅尔街的苏联全权代表处。

苏里茨受苏联政府委托正式告诉我，除了擅自在国外逗留外，对我没有任何政治指控。他建议我回莫斯科，他保证我回去后没有任何危险。他代表苏联政府强调指出，我在国外擅自逗留期间没有任何反苏反党行为。

这是公正的：尽管令我极为愤慨地解除了我的职务，我

① 列·米·卡拉汉（1889—1937）——苏联外交家，曾任驻波兰和中国全权代表，后被镇压。

② 马·马·李维诺夫（1876—1951）——苏联外交家，当时任外交人民委员。

③ 雅·扎·苏里茨（1882—1952）——苏联外交家。

强压下受到伤害的自尊心和无端的委屈，表现出冷静的自制力，保持了忠诚，让莫斯科采取主动行动。

因此，指控我“投入人民敌人的阵营”与事实不符，完全不能成立。

1938年10月12日还没有指控我“逃离职守”、“投入人民敌人的阵营”，而只是指控我“擅自在国外逗留”，虽然仅此一点根据苏联法律也可被判处死刑。

我在1938年10月18日给斯大林的信中声称，对于当时这唯一的指控我不承认有罪。我用事实向他证明，我暂时在国外逗留不是擅自在国外的而是被迫的。我写信给斯大林说，“我过去和现在从来都没有拒绝返回苏联”。

因此，指控我拒绝返回苏联与事实不符，完全不能成立。

此后再也没有对我提出新的归国要求。我对巴黎全权代表处提出的延长护照的申请被置之不理。

现在我从报上知道了7月17日缺席审判的闹剧。

强制我离开索非亚后宣布我“逃离职守”。随心所欲地解除我的职务后宣布我拒绝返回苏联，根本不顾我给斯大林的书面声明所说的我过去和现在从来拒绝返回苏联。把我的忠诚说成是“投入人民敌人的阵营”。对我申请延长护照的要求的回答是宣布我不受法律的保护。

这一决定使斯大林的司法方法、臭名昭著的审判排演一一曝光，生动地表明：无数的“人民敌人”是怎样被制造出来的，最高法院只要有些什么根据就可以据以判处极刑。

宣布我不受法律的保护是出于恼羞成怒，就因为我这个人拒绝逆来顺受地听任宰割、胆敢保护自己的生命、自由和荣誉。

我抗议这种对公正审判的嘲弄,要求重新公开审理案件,
并向我提供辩护的机会。

弗·拉斯科尔尼科夫

1939年7月22日

原载1988年《星期》周刊第26、49期

(黄有自译)

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之死

谢·扎·金兹堡

奥尔忠尼启则和斯大林之间的关系史悠久而复杂。他们的关系极度紧张，有时竟达到白热化的程度。这种关系是如何逐渐恶化，以至发展到彻底破裂并以1937年2月谢尔戈的惨死而告终的呢？我便是这一切的见证人。

这两位著名的布尔什维克曾多年在革命事业中共同战斗，如青年时代在外高加索、地下工作时期、布拉格代表会议筹备期间、在十月革命前夕、国内战争时期，特别是他们开始在莫斯科一起工作之后。当时在他们的关系中也的确因为对一些事情的看法不一而出现阴影。有时谢尔戈持与斯大林不同的观点。例如，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期间，在决定列宁是否接受临时政府的审判一事上就是如此。

在他们一起共事的整个时期，斯大林对自己这位老乡的表现一直存有戒心。对谢尔戈同基洛夫的友谊斯大林的疑心最大。

基洛夫从列宁格勒到莫斯科，一般都住在克里姆林宫谢尔戈的住所里，他们经常在一起谈论党和国家的大事。奥尔忠尼启则总是全神贯注地倾听基洛夫讲述列宁格勒发生的形形色色的事件。

1934年12月1日发生的事件，对我们全国来说是一场

大悲剧。而对奥尔忠尼启则来说更是特大的悲剧。那是基洛夫最后一次来莫斯科，在他返回列宁格勒的前夕，奥尔忠尼启则似乎已预感到悲剧即将发生，久久不让基洛夫离去，要他事事多加小心。

基洛夫遇刺后，奥尔忠尼启则似乎一下子苍老了许多，变得内向，少言寡语。当他得知基洛夫被害的消息后就对斯大林说，他想立即去列宁格勒。斯大林坚决不同意，对他说：“你有心脏病，你不能去”。我认为这完全是借口。我深信，斯大林之所以阻拦谢尔戈，是因为他知道奥尔忠尼启则会竭尽全力弄清基洛夫被害的真相。据我看，正是在那时种下了另一场悲剧的祸根——奥尔忠尼启则同样莫名其妙地死于非命。

20年代末，我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从那时起，特别是我被任命为以奥尔忠尼启则为首的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后，我便经常去奥尔忠尼启则的住所。那是他继续办公的地方。奥尔忠尼启则不喜欢官僚作风，从不摆官架子。他把全部精力都投注到他所从事的事业中，从这层意义上讲他从来都没有严格地区分工作时间与非工作时间。如果需要的话，他可以在白天和夜间的任何时候给任何人打电话，因此确定在人民委员部他的办公室里举行的会议常常搬到他家里继续进行。

1931年后的几年中，从总的方面我感到斯大林和奥尔忠尼启则之间的友好关系开始逐渐冷淡起来。很难说清是什么原因。但是不论是我，还是我的同事，大概从30年代中期便开始觉察到，一向乐观愉快、沉着稳重的谢尔戈每次从“上面”的接见或开会回来都显得面色阴沉、若有所思。常常

不由自主地脱口而出：“不，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都不会同意这么做！”我不太清楚他指的是什么，当然也就没有提任何不便提的问题了。但有时奥尔忠尼启则却向我询问工业部门的某些工作人员的情况，因此我可以猜想，“那里”的谈话显然是关系到这些人的命运问题。当时，压在建筑机构和工业部门的很多领导人头上的乌云变得越来越浓。

有一次，斯大林在茨哈尔图博疗养地度假。前不久才智露头角的贝利亚为安排好领袖的起居和娱乐活动而奔忙，比其他几个亲信都卖力。一次，有人当着我的面暗示奥尔忠尼启则，认为他也应该去茨哈尔图博，他回答说：“我可不想参加拉弗连季^①这个无赖的加冕礼。”奥尔忠尼启则对贝利亚的这种态度，后来许多年都没有改变，对此他也从不掩饰。至于贝利亚，他却千方百计地激起斯大林对奥尔忠尼启则所依靠的经济干部的不满，从而败坏奥尔忠尼启则的声誉。

在一次审查第三个五年计划草案的政治局会议上，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瓦·伊·梅日劳克作了报告。奥尔忠尼启则在发言中对生产计划谈了几点看法，着重谈了基本建设的计划规模问题。他认为，拨款勉强够用于完成那些应投产的建设项目，而党和政府决议中所规定的一些最重要的和急需的项目就落空了。

使大家感到惊奇的是，斯大林粗暴地打断奥尔忠尼启则，说道：“一个戈比也不给你们增加”。于是奥尔忠尼启则请求责成国家计划委员会（梅日劳克）同重工业人民委员部一起审查并决定，哪些项目可以从计划中砍掉。这又招来斯大林

^① 拉弗连季是贝利亚的名字。

的严厉驳斥：“对国家计划委员会我们不作任何指示，哪些项目暂停，哪些项目保留，你自己去决定。你如果再坚持己见，我建议召开党中央紧急全会，我们在会上把自己的想法都说出来。让全会来决定。”

在讨论国民经济计划时总是争论不休，并且往往相当激烈。我记得，斯大林只对奥尔忠尼启则才如此粗暴。对其他人民委员所提出的要求斯大林却没有任何反应。这次政治局会议给我的印象很深，使我难忘，我无论如何也弄不明白，斯大林为什么这样对待奥尔忠尼启则。

第二天，奥尔忠尼启则把重工业人民委员部的一些负责人叫到自己的办公室，我们开始详细地审查哪些项目可以暂停，哪些已投产的企业适合转产国防产品。问题解决了，似乎这并未受到“上面”的任何严厉批评。

奥尔忠尼启则继续忘我地工作。他的主要依靠力量是有名望的专家，他既善于用自己的热情吸引专家们，也善于激发他们的热情。是奥尔忠尼启则使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免遭逮捕或者把他们从监狱中解救出来。例如，正是他吸引那些从前被判刑的工程师参加设计苏联第一台初轧机。

这显然激怒了斯大林，他不止一次气势汹汹地指责奥尔忠尼启则犯自由主义。但表面上（对广大群众）却装出他们的关系完全正常的样子。因此，他假仁假义地提议为奥尔忠尼启则诞辰50周年举行大庆。这与奥尔忠尼启则的一贯原则是相违背的。同时他也非常清楚，斯大林的“倡议”绝非真心实意。后来奥尔忠尼启则去北高加索的基斯洛沃茨克，在几个朋友参加的小范围内过了生日。我和妻子也应邀去作客。

这时乌云越来越浓。奥尔忠尼启则受到突如其来的打击

——他的兄弟帕普利亚被捕。他怒不可遏地向贝利亚要罪证：“把材料给我拿出来，我要求和兄弟见面。要是我拿到他的罪证，我会亲手枪毙他。”贝利亚安慰他，答应等调查全部结束后一定把材料给他看。然而调查却被故意拖延了很久，奥尔忠尼启则死后不久帕普利亚就被枪决了。

1937年初，正在筹备召开党中央臭名昭著的二、三月全会。这次全会对奥尔忠尼启则来说意义特别重大。他收集了有关工业部门的工作及其干部情况的各种材料，打算在全会上进行斗争。

1937年2月初，奥尔忠尼启则向我讲述了下塔吉尔乌拉尔机车制造厂所发生的事情：厂长马里亚欣和企业的其他几个领导人由于被指控犯有破坏罪而相继被捕。他建议我和重工业人民委员部主管国防工业的巴甫鲁诺夫斯基立即前往出事地点，详细弄清被捕人员搞了哪些破坏活动。

来到塔吉尔后，我立即去建筑工地详细了解情况。陪同我的有总工程师和工地的其他几位工作人员。我用了几天工夫研究了已竣工的车间和各项建筑，后来又极其认真地审查了工程的预算和预算的每一项开支。结果我确信，工程情况良好，工作质量要比乌拉尔其他一些工程的质量高得多，尽管在建筑过程中存在着个别预算项目少量超支的现象。

2月中旬，奥尔忠尼启则从莫斯科来电话查询工地情况，问是否发现了犯罪行为。我如实地向他作了报告，他要我找到巴甫鲁诺夫斯基，立即返回莫斯科并在车上以他的名义向速记员口授关于乌拉尔机车制造厂情况简报，到达后立即去见他。

2月18日晨，我们回到莫斯科。那天正是休息日。我先

在车站给奥尔忠尼启则家打电话。接电话的是他的妻子季娜伊达·加甫里洛夫娜，她对我说，奥尔忠尼启则一清早就问金兹堡是否已回来。可是现在他已睡着了，因此请我和巴甫鲁诺夫斯基先去他们的别墅，他们也要到那里去。

我和巴甫鲁诺夫斯基在别墅里呆了几个小时，始终不见奥尔忠尼启则，于是我又给他家打电话，很长时间没有人接。终于有人拿起电话筒，喘着气，用勉强能听到的声音说：“您应该回自己的家了。会有人打电话给您”。话筒里传来嘈杂的说话声。

中午，重工业人民委员部有人给我来电话，要我立即到部里去。在人民委员部办公大楼长长的大走廊里，副人民委员谢列布罗夫斯基朝我跑来。他抱住我，泣不成声地对我说：“谢尔戈逝世了，据说死于心力衰竭。”

我们都惊呆了，朝奥尔忠尼启则的办公室走去，人民委员部的大部分成员早已来到这里。这时我才知道，前一天奥尔忠尼启则工作到很晚才回家。

回到家后，妻子告诉他，就在他回来前不久，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搜查了他们的家。这使他极为气愤。他马上打电话给斯大林。然而斯大林非常镇静地说：“谢尔戈，你激动什么？这个机关连我的家都可以随时搜查。”

奥尔忠尼启则勉强克制住自己说道：“也就是说政府和政治局之上还有领导它们的国家安全机构？”

斯大林回答说：“听着，你最好来我这儿一趟，我们谈一谈。”

奥尔忠尼启则没有穿大衣，也没有戴帽子，急忙奔向斯大林的住处。他的妻子抓起丈夫的大衣和帽子追了出去，但

是没有追上。于是她决定在大街上斯大林的住所旁等候他。她希望他们最终能就那些使谢尔戈非常激动的问题谈妥，但是没有结果。奥尔忠尼启则非常激动地离开了斯大林的住所，仍然没穿大衣，径直跑回家中。

所有这一切都是后来季娜伊达·加甫里洛夫娜告诉我的。当时，也就是2月18日，我们都来到奥尔忠尼启则的办公室，大家不知所措、默不作声、心情沉重地站着，悄悄地回忆奥尔忠尼启则在人民委员部最后几小时和最后几天的工作情况。大约在16—17点时，克里姆林宫来电话，叫5个人（其中有谢列布罗夫斯基、米·卡冈诺维奇和我，还有两个人的名字我已记不清）去奥尔忠尼启则的住所。我们坐上专门给我们派的汽车，很快便到了那里。我们上了二楼，走进一个大房间——餐厅，看见很多不认识的人在相互交谈。我们被请进卧室，奥尔忠尼启则躺在床上，被子齐肩盖着。给人的印象是他睡熟了。床边站着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日丹诺夫、卡冈诺维奇（拉·莫·）、米高扬、叶若夫、赫鲁晓夫等。默默地站了八九分钟。

斯大林首先打破沉寂，清楚明确地说：“这就是说，谢尔戈身患心脏病一直工作到最后一刻，心脏再也支持不住了……”他转过身对自己身边的人说，该走了。他们都走了，我们又在谢尔戈的床前站了几分钟，之后从卧室来到餐厅，那里有很多我们不认识的人。

斯大林离开时在楼道里对季娜伊达·加甫里洛夫娜说了几句话。

很多年后，那时斯大林已逝世，她才讲述了当时的情况。斯大林严厉地警告她说：“季娜，有关谢尔戈去世的详细情况，

除官方报道外，对谁什么都不要讲。你是了解我的……”季娜伊达·加甫里洛夫娜心里很明白，因此许多年来一直保持沉默。

又过了很多年。一次赫鲁晓夫问我：“谢苗，当时你也和我们去过谢尔戈的住所。你知道他的死因吗？”我回答说，除了官方的说法，我什么都不知道。他对我说，当时，他还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居然什么也不知道。

而到了“解冻”时期才搞清楚，有关谢尔戈死于心力衰竭的官方说法，完全是斯大林本人杜撰出来的。“人民的领袖”死后，贝利亚被镇压了，有些人（远远不是所有的人！）才敢推测谢尔戈的真正死因和当时的情况。人们才开始议论1937年2月19日发表的由联共（布）中央总书记和政治局委员们签署的悼词的虚假的说法。

我特别注意报纸关于谢尔戈于下午5时30分逝世的报道。我非常清楚地记得，下午3点我们已被叫到人民委员部，然后，大约5点钟我们从那里去死者的住所。也还记得，根据斯大林的指示对奥尔忠尼启则的尸体不作验证真正死因的解剖。

奥尔忠尼启则的葬礼后的第二天，斯大林的助手波斯克列贝舍夫打电话给我，转达了“主人”交待的任务，让我提供由我给奥尔忠尼启则起草的关于乌拉尔机车制造厂事件情况的报告。我走进奥尔忠尼启则的办公室，把这次谈话的情况告诉了部务委员会的全体成员，并给他们看了这份报告。他们提出的一个问题是，对这份报告下一步我打算怎么办？我回答说，应该把它交给斯大林。于是米·卡冈诺维奇说，如果这么办就应该提早准备好一个手提箱……（他暗示有可能

被迫启程“去不太远的地方”)。于是我问道：

“您认为，不能这样交去吗？”

“您又不是小孩子，您清楚国内正在干什么。”

“就是说，应该写上乌拉尔机车制造厂有破坏活动？假定我改了报告，那么斯大林在中央全会（由于奥尔忠尼启则去世，此次会议被推迟）上就可以宣布，奥尔忠尼启则不仅包庇了破坏分子，而且还欺骗了中央？……”

当天，我便通过波斯克列贝舍夫把这份报告转交给了斯大林。

二、三月全会开幕的日期到了。当我听到莫洛托夫在报告中讲到下面的一段话时我的感受就不用多说了。

莫洛托夫说：“可以认为，破坏活动还没有彻底揭露出来的另一个例子就是乌拉尔机车制造厂。就是那个应该在最近几年生产出一大批新型车辆的最大的车辆制造厂。多年来，这个厂的领导一直是最猖狂的破坏分子马里亚欣，而且乌拉尔机车制造厂党委书记沙利科·奥库扎瓦也是个托洛茨基破坏分子。

今年2月份，一个权威性的专门委员会受重工业人民委员部之托，到乌拉尔机车制造厂审查破坏事件。领导该委员会的是建筑工业总局管理局局长金兹堡和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巴甫鲁诺夫斯基两位同志。这个委员会得出了什么样的结论呢？……

委员会将建设中出现的毛病归咎于某些超支和副业生产落后，企图以此来论证自己的结论。然而这个委员会政治上的目光短浅是毫无疑问的。甚至破坏分子马里亚欣以前的供词就足以说明，是金兹堡—巴甫鲁诺夫斯基的委员会掩盖了

该厂的真实情况……”

常有人问我，我作为奥尔忠尼启则的最亲密的助手之一，那些年是怎么活过来的，而且1939年还居然被任命为苏联建筑人民委员。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谜。

奥尔忠尼启则去世后，原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梅日劳克主管重工业人民委员部，但时间不长，他甚至还没有来得及熟悉这个部的情况，他的工作就由被任命兼任重工业人民委员的交通人民委员拉·莫·卡冈诺维奇接替。卡冈诺维奇提请政治局批准重工业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新成员的组成名单，其中我被任命为副人民委员，А. И. 扎韦尼亚金被任命为第一副人民委员。

新人民委员就任后最初的一段时间专门了解了各地工业部门的现状，特地去了乌拉尔视察，在各地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说，号召揭露破坏分子。拉·莫·卡冈诺维奇回到莫斯科后邀我去面谈。我料想，他肯定要提乌拉尔机车制造厂的破坏活动。但正相反，他在叙述乌拉尔之行时，特别强调说，他所见到的乌拉尔机车制造厂的情况好极了，而且他的印象同我对他所讲的看法是一致的。卡冈诺维奇又说，为了保证国内运输的发展，这个工厂对铁路运输非常重要。当时，我不禁向他提出我一开头就想提的问题：“工厂里的破坏活动是怎么回事？”他审视着我，沉默了片刻，说道：“请您以人民委员部科学技术委员会主席的名义，把运输机器制造业方面的主要专家请来，对乌拉尔机车制造厂的实际生产能力作评估。”我说我马上去办……

关于乌拉尔机车厂有破坏活动的神话，实际上就这样被制造这一神话的某些领导人揭穿了。

然而，这一神话却种下了恶果，这一点我不愿再回忆。这一神话对奥尔忠尼启则的死确实起了加速作用，看来也不只是对他一个人。

这里要提一下的是格·瑙·卡敏斯基。30年代他任卫生人民委员。关于奥尔忠尼启则死因的医学鉴定就是由他和几个医生联名签字后公之于众的。斯大林一个也没有忘记他们。不久，所有这些都遭镇压；被处决了。据卡敏斯基的好友提供的证明所述，他不愿在有关谢尔戈死因的伪证上签字。卡敏斯基在二、三月中央全会上的发言对他的命运起了致命作用。他在会上谴责国内实施的大规模镇压并警告说，对诚实的苏联人民进行普遍怀疑和在他们中间寻找敌人，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卡敏斯基也成了斯大林专横的无数牺牲品之一。

奥尔忠尼启则的惨死震撼了很多人，引起了人们忧伤的沉思；深感悲痛的是布哈林。他们在党内的多年共事极富有教育意义。那时，原则性强、毫不妥协的谢尔戈对布哈林的错误也进行过批判，但是，正如列宁所教导的那样，对这位“全党喜欢的人物”——布哈林的杰出天才他也完全能理智地作出评价。举一个最典型的例子，中央十一月全会（1929年）后，在布哈林异常困难的日子里，正是奥尔忠尼启则向他伸出了双手，聘请他到自己的重工业人民委员部技术委员会任职。那时我在人民委员会经常见到布哈林。

布哈林的遗孀拉林娜回忆说，布哈林得知谢尔戈逝世的消息后悲痛地说：“现在再没有人可以指望了。”

奥尔忠尼启则究竟是怎么死的？这场悲剧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我认为对这个问题加以澄清是极为重要的。

我绝对不接受关于谢尔戈死于“心力衰竭”的最初的官方说法。60年代曾出现过关于谢尔戈是自杀的说法。这种说法也是不能接受的。所有接近并非常了解奥尔忠尼启则的人，所有熟知他的行为、打算及意图（其中包括在最后时刻他准备参加即将召开的中央全会时的情况）的人，都不会相信他会自杀。他是一个列宁型的不屈不挠的战士。他作了充分的准备来回击斯大林关于随着社会主义不断取得成就阶级斗争必然日益尖锐的夸大提法，他坚决反对屠杀大批党的干部和工业及建筑部门的领导人。

前不久，有人转交给我一份曾在重工业人民委员部担任要职的瓦尔瓦拉·尼古拉耶夫娜·西多罗娃的口述记录。这份记录是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厂的工程师 A. C. 科马罗夫作的。西多罗娃请求他把这份记录“只给谢·扎·金兹堡本人看”。她还请求不要说出所有这些情况都是听奥尔忠尼启则的妻子讲的。

但是，现在我认为可以并必须将这份记录公之于众，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搞清楚奥尔忠尼启则惨死的真相。

下面是这份记录摘抄：

“1937年2月18日白天（上午），一个不明身份的人闯入奥尔忠尼启则的住宅（克里姆林宫内），自称是司机，来给格里戈里·康斯坦丁诺维奇送政治局文件的。季娜伊达·加甫里洛夫娜问：‘谢尔戈自己的司机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呢？’那人回答说，尼古拉·伊万诺维奇今天休息。

接着，来人上了二楼，走进谢尔戈的办公室。几分钟后传来一声枪响。那人走出办公室，从楼梯上下来，问季娜伊达·加甫里洛夫娜：‘您听到枪声了吗？’

季娜伊达·加甫里洛夫娜一进办公室，就看到谢尔戈陷在沙发里，右手耷拉着，右边地上有一支手枪。

那人到来之前，谢尔戈正用格鲁吉亚语打电话，说话很不客气（大概是同斯大林通话）。

非常遗憾，现已辞世的西多罗娃就此结束了她的叙述。

最后我再举个例子，说明斯大林是如何对待自己“亲密的和亲爱的同志与朋友”（摘自“悼词”）的。政府考虑到谢尔戈对建立莫斯科最重要的工业企业所起的巨大作用，并根据一些社会组织的请求，决定在首都诺根广场重工业人民委员部大楼的对面建造奥尔忠尼启则纪念碑。

早在战前雕塑家 B. Я. 博哥柳勃夫和 B. O. 英卡尔就设计好了纪念碑。后来这一决定始终未能实现。

原来，战后文化部向斯大林提交了一份根据中央委员会和政府的决定在莫斯科建造纪念碑的名单。这一名单很快便返回到伏罗希洛夫手里（当时他“主管”文化工作）。该名单中用蓝色铅笔（斯大林最喜欢用的）只划掉一个名字——党和苏维埃国家优秀的活动家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

原载《苏共历史问题》1991年第3期

（王丽华摘编 黄有自校）

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内部 在对华政策问题上的斗争

（1926—1927年）

亚·格里戈里耶夫^①

本文标题提出的课题直至今日仍是联共（布）党史和国际共运史研究工作中的一个“空白点”。在中国1925—1927年大革命时期，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在“对华政策”问题上斗争的某些重要情节，由于思想上政治上有种种限制，必要的文献资料又无法利用，至今仍未披露。“中国问题”在当时，特别是从1927年春季开始，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联合反对派”的政纲和策略，决定了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同“联合反对派”斗争的最后阶段的内容。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内部在这些问题上斗争的结果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致使中共领导人在1925—1927年革命的关键时期和1927年夏遭到惨败后探索摆脱危机出路时迷失了方向。

在这场争论中，联共（布）领导层内“多数派”方面领头的人物是斯大林和布哈林——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当年对华政策的两位“主要设计师”。反对派的主要思想家是托洛

^① 亚·米·格里戈里耶夫——历史学博士，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中国历史和政治研究中心负责人。

茨基、季诺维也夫和拉狄克，他们彼此的观点也有重大分歧。由于有“禁令”，不准利用档案材料或参加争论的其他头面人物在境内外发表过的著作，我国的出版物至今未能对多数派和反对派领导人的立场作出充分的介绍。就连研究中国问题的专著，在分析争论的内容时也仅限于阐述与反对派提出的要中共退出国民党和建立苏维埃的要求有关的那些分歧，而把双方立场中的其他一些重要方面，如对中国社会经济制度的评价和土地问题等置于不顾。尤其必须指出的是，大多数著作首先强调多数派政纲和反对派政纲的差别，于是双方的政纲基本观点相似、有共同的思想政治基础、反映的主要是俄国革命的经验等问题就被“隐蔽”起来了。

联共（布）领导层内在“对华政策”问题上的分歧最初产生于1926年4—5月；这时，中国1925—1927年的国民革命出现了暂时的低潮，“联合反对派”就在此时形成。这次低潮的出现标志着革命第一阶段，也是共产国际在革命过程中推行中共与国民党搞统一战线政策第一阶段的结束。正如在季诺维也夫主持下举行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全会的文件表明的那样，直到1926年3月中旬，后来的各主要争论对手之间还没有因制定和实行这一政策而发生过什么重大的分歧。托洛茨基后来一再声称他从“一开始”就反对中共加入国民党，然而共产国际领导机关的文件、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历次会议的文件却没有提到这一点。在托洛茨基的档案材料中也丝毫看不出当年他的态度与众不同。

共产国际在孙中山的国民党同苏联政府建立联系、中共1923年加入国民党以后的这一时期执行的对华政策是以共

共产国际二大和四大提出的苏维埃俄国和共产国际各党要同东方的民族革命运动互相配合的主张以及四大作出的建立反帝统一战线的决定为基础的，也是对上述主张和决定的发展。苏联援助国民党，中共加入国民党，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在组织上和思想政治上改组国民党的过程中使其变成在军事和政治上强大的、同苏联友好的主要的国民革命力量（或者说主要的力量之一），其条件是扩大群众基础（在很大程度上要靠中共的帮助），建立起一支新的政治化的军队（在苏联和中共的帮助下），由党通过政治机关和政治学习手段加以控制，以取代受军阀控制的雇佣军队。人数不多的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是一种手段，旨在使中共尽快发展、扩大自己的群众基础和国民党左翼力量，以便将来在整个党内具有决定性影响。

早在与国民党进行合作之初，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就在其1923年11月通过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中表明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立场，并将决议交给了当时正在莫斯科的、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代表团。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决议中坚持要求国民党“按照现代精神”解释“三民主义”，实际上是按照共产党最低纲领来解释“三民主义”并提出了一些更高的要求，如建议把“国家社会主义原则”（“民生”）解释为不仅要求外国企业、银行和交通工具国有化，还要把国有化扩展到中国的民族工业；还提出一个口号，要求“耕者有其田，消灭大地主的以及人数众多的中小地主的土地占有制……”文件表示相信国民党“将越来越重视中国工人阶级兴起的运动”，“全力支持”工会和中共。共产国际方面则保证向中共“指明”“必须尽力支持国民党”。换句话说，提出的任务是要

把国民党从一个改良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政党（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当时是这样认为的）变成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激进派政党。国民党领导人部分地采纳了这些建议（除土地要求之外）并把它们写进了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新党纲（尽管措辞相当委婉）；这件事固然意义重大，但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领导人对该组织激进化的现实可能性期望还是过高了。斯大林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讨论有关印度的决议草案时声明，必须摧毁妥协派资产阶级。在谈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五次全会（1925年3—4月）提出的建立工农政党的思想时，他又说，“在中国和印度这类国家，……共产党人已经不能以建立反帝国主义的民族统一战线为目的”，应当改行“工人和小资产阶级革命联盟的政策”，这一联盟可以采取统一的工农政党的形式，即共产党和革命小资产阶级政党的联盟的形式，^① 并指出国民党正是这样的政党。

国民党许多知名人物多次公开谈及学习“俄国经验”的重要性，声明承认共产国际是“世界革命的司令部”，这一切都对造成过高的期望起了一定作用。这类声明（共产国际对此作出的评价是冷静的）带有“外交辞令”的性质，发表这些声明无非是为了得到更加慷慨的援助和个人支持。在国民党内确实形成了左派，他们除拥护“三民主义”外还拥护“三大政策”（联苏、联共、扶助工农）。左派中的一小部分人成了共产党员，或者接受了中共最低纲领中的某些内容，主张更激进地解释孙中山纲领中的某些条款。但是左派中的绝

^① 《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124页。

大多数人仍然坚持多种色彩的民族改良立场，不相信，或者说否定阶级斗争和土地革命的思想。共产国际指望靠事态的发展和中共的影响会像法国和俄国革命那样在国民党内形成一个有影响的，有群众基础的派别——“中国的雅各宾派”，或称“中国的社会革命党人”。由于为“真正的左派”确定了这样一个标准，在国民党内堪称“真正左派”的基本上只有共产党人。

为了加强中共对国民党政策的影响力，又决定把共产党人调到国民党的地方和中央机关中的重要岗位工作，以便“从内部”控制国民党机关；还提出了一个与国民党领导人中的个别激进人物建立“特殊关系”的方针，要利用国民党内的派系磨擦和这些人物的“领袖至上”的个人野心，以便“从上面”使党和军队的方针激进化。这一策略在1926年初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1926年1月）的召开具有明显的“左倾”特征（国民党的几位领导人，其中包括汪精卫和蒋介石发表了比共产党人更“左”的声明），选举的结果是，共产党人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里取得了相当数量的席位，在国民党机关里占据了重要岗位；这一切成了对国民党性质，以及中共在国民党内能有多大作为估计过高的又一根源。

1925—1927年革命一开始，在全国高潮的情况下已经可以看出具体政治行动和军事政治行动的轮廓。由于国民革命力量在广东的根据地得到巩固，在广东建立的由左派占多数的政府，宣布自己为国民政府并采纳了以布柳赫尔为首的苏联顾问团制定的旨在统一中国的“北伐”计划。与此同时，占据出入北京的要冲、宣称拥护国民革命的“国民军”领导人

(冯玉祥等)从1925年下半年开始在中国北方加紧活动。国民军于1925年初同苏联的代表建立了联系,从苏联方面也得到了数量可观的物质和军事援助,庞大的苏联军事顾问团参加了这支军队的工作。北方的中共组织和卡拉汉领导的苏联驻北京全权代表处在与冯玉祥和国民军其他将领建立联系方面起了重要作用。1925年底至1926年初,人们对这支军队的潜力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因为它靠近中国的首都,又与国民革命运动的主要敌人——控制着中国中部地区的吴佩孚和控制着满洲又谋求在北京取得优势的张作霖有尖锐冲突。

联共(布)领导层内各个派别和共产国际当时对中国形势及前景所作的一致评价,反映在专门讨论“中国问题”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全会的决议中。斯大林和布哈林在当时及过后都竭力利用立场一致这个事实去回击反对派。

决议作者称1925年夏季开始的上海和省港的罢工是全民运动的起点,显然是把理想当成了现实。决议作者硬说:“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组成阶级工会的”工人阶级,“显示出自己是争取国家独立和建立人民政权的倡导者和主要战士”。决议认为,正是由于这些事件的影响,“国内所有民主革命组织”,首先是国民党及其广州政府才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和巩固”。根据斯大林1925年多次讲话的精神,国民党被界定为“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城市民主派的革命联盟,其基础是这些阶层在反对帝国主义者和一切封建军阀制度、争取国家独立和建立革命民主统一政权的斗争中有共同的阶级利益”。当然在决议的另一部分也谈到“要用革命民主主义组织领导下的最广泛居民阶层(工人、农民和资产阶级)的民族统一战线来对抗帝国主义者”的任务。给国民党下定义的

行文所用的“城市民主派”这个模糊概念可以证明决议中提到的（和斯大林发言中提到的）“资产阶级”是指革命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决议对广州政府的评价也很高（说它“已经同最广大的工农群众和城市民主派建立了联系……”）。

1926年3月通过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之前，已经出现革命低潮，特别是华北的“国民军”遭到失败（1926年初冯玉祥扔下军队去苏联，在5月到了苏联），因此决议称当时中国的形势是“群众性民族解放运动发展中的某种喘息”。同时决议的若干条文证明还想要回到1925年底至1926年初的军事政治计划，决议写道：“在华北建立国民军……和广州军一起构成建立中国国民革命民主军的基础。”决议还建议中共和国民党坚决支持建立“民主革命的武装力量”，并使之革命化。

在公开发表的全会决议中提到，中共“在政治上独立自主”的进程有了“很大的发展”。同时在秘密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的提纲》（作为给中共的指示）中向党提出了准备为夺取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而斗争的任务。警告中共防止两种倾向：右倾取消主义（即无视无产阶级独立的阶级任务，以致无形中与一般民主国民运动合流）和极左情绪（忘记农民是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中的基本的和决定性的因素，力图“跃过运动中的革命民主阶段，直接解决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权的任务”。）最后这个论点表明，当前的运动阶段不是指“一般国民”运动，而是指革命民主运动。

在决议和提纲中特别强调，中国解放运动中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革命民主倾向能否取得胜利，取决于能否吸引农民参加革命斗争（同时也认为，“外国资本侵入国内破坏了农村的宗法关系”）。

总的说来，上述立场几乎在各个方面都再现了布尔什维克在 1905—1907 年革命中的基本策略思想。顺便指出，决议也直截了当地谈到这一点：“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策略问题尽管情况特殊，还是与 1905 年俄国第一次革命时期俄国无产阶级面临的问题非常相似”。

从理论上说，共产国际“对华政策”中的几乎所有的基本内容——从 1923 年中共加入国民党起，包括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全会决议，都可以看作是（当时确实是这样看的）在中国的条件下运用或发展共产国际二大和四大决议，即二大的《补充提纲》（又称“罗易提纲”，当时大家都一致认为这个提纲是专门为“类似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国家制定的）和为四大反帝统一战线策略提供论证的《东方问题》提纲。

在“对华政策”及其论据中保留了起源于二大和四大文件的那种夸大中国（和印度）资本主义发展水平的倾向、对解决土地和农民问题的意义和途径的阐释、关于“殖民地革命的客观任务超出资产阶级民主范围”的思想以及与此有关的在民族运动范围内强行提出社会要求的方针、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从运动一开始就应该准备发挥解放斗争（首先是在争取农民的斗争中的）领导者作用并同“资产阶级民主派”作斗争的方针、对一切改良主义流派采取的断然否定的态度。从 1924 年起在对待资产阶级和统一战线的政策中出现明显的左倾，当时我国的出版物认为这是忽视了四大的如下论断：统一战线政策的提出“是同世界帝国主义作长期持久斗争的前景相关的”，就连这种明显的左倾也可以从四大同一决议对统一战线政策的解释中找到为自己辩解的“理由”，因为决议说

这个政策不是一种战略，而是权宜之计，是“揭露某些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集团犹豫动摇”的手段。

二大和四大提出的东方无产阶级要夺取领导权必须经过一个“完整的历史阶段”的论断，也不过是同样易拆的路障，阻止不了左倾的去路。这个阶段的时间界限该如何确定呢？在共产国际领导人的观念里从1917年“2月到10月”这几个月不就是这样历史阶段吗？共产国际的这份决议以及后来作出的有关中国的决议都表明，尽管共产国际领导人有种种分歧，但是他们一致认为，早在20年代中期，这个“历史阶段”就已经结束，或快要结束了。

1926年4—5月联共（布）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受中国发生的事变的影响不得不考虑改变过去对国民党和中国形势所作的乐观评价，这时反对派代表人物第一次向共产国际提出建议要求重新考虑对华政策的中心论点——中共加入国民党问题，后来又建议将中东铁路交给中国，这些建议为争论开了头。在此之前，北方“国民军”败局已定，蒋介石1926年3月20日政变的消息不断传来。蒋介石当时极力限制共产党在国民党内日益扩大的影响，极力巩固自己的阵地，短期拘捕了一批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国民党军队中供职的共产党人，后来又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五月全会上通过决议，限制中共在国民党内的活动（不允许共产党人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军队中担任要职，禁止批评孙中山学说）。

1926年4月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根据托洛茨基领导的工作委员会的报告精神通过了关于对华和对日政策的决议，这个决议对中国形势的评价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会的评价有所不同，较为谨慎。它指出了中国革命运动

发展的速度“缓慢”，并提出了主要是对外政策方面的一系列措施；这些措施表明联共（布）领导人当时还探讨过中国（包括华南）事态发展不同于以前的方针。决议没有提到蒋介石政变一事。决议还指出，不应把广州看作仅仅是临时的革命滩头阵地，还应看作不得不“同外国暂时妥协”的“大国”。为了发挥这一论点，决议草案吸收了斯大林的修改意见，建议广州政府“集中自己的精力从内部巩固共和国”，其办法是进行土地、财政和政治改革并加强防御能力。修改意见还说：“广州政府在目前时期决不能考虑进攻性的对外远征以及可能会促使帝国主义分子走上武装干涉道路的一切行动。”决议的另一条说：“如果查明人民军（指北方国民军。——作者注）会把阵地长期让给吴佩孚，那么寻求同吴佩孚妥协以削弱他对英国的依赖看来是适宜的”，这也证明有可能采取不同于1925年的计划和行动。决议的这些论点以及其他一些论点使人可以稍微了解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对华政策”的外交动机，首先是了解当时形成的一种看法，即这一时期的国际环境对于中国革命来说是异常困难的，这是由于欧洲出现了某种稳定……特别是帝国主义者大张旗鼓地提出了中国问题。从文献中可以看出，这里指的是帝国主义国家在结成反华的统一战线，言外之意是这些国家在宣传和政策中把中国革命的事态同苏联和共产国际的行动“串在一起”了。决议建议对中国和国外的反动报刊掀起的要求召回苏联全权代表卡拉汉的宣传给予反击，并公开声明，我们的政策是同情“中国人民争取建立统一的独立的国家和民主制的斗争”，不容许“我们从外部加以干涉的任何想法”。因此文献建议中国的革命力量采取迂回策略，目的是防止大国形成统一战线；还

建议采取暂时让步政策，其中包括向日本让步，以便孤立中国独立的主要敌人——英国。文献虽然没有提到强化“中国南方的共和国”，但是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所有领导人当时都认为强化“中国南方的共和国”是削弱（按照斯大林后来的说法叫作“分散”）帝国主义力量，首先是英国的力量的手段。

托洛茨基首先在1926年4月提出，后来季诺维也夫也提出关于中共退出国民党的建议，5月托洛茨基又提出移交中东铁路的建议；在正常情况下这些建议可以被看成工作上的争论。托洛茨基提出的第一项建议及其他政治局委员对建议的反应（斯大林后来说政治局否决了这个建议）在政治局会议记录上都没有记载。大概只是交换意见而已。但4月底季诺维也夫提出同样建议时情况就不同了，联共（布）中央四月全会（1926年）以后，事情闹到成立联合反对派的地步，4月29日中央政治局就这项决议问题通过一个措辞“严厉”的决定。决定中写道：政治局“……（3）认为国民党与共产党关系破裂问题具有头等的政治意义。认为这种破裂是绝对不能允许的。认为必须贯彻共产党留在国民党内的路线”。当时这个问题在原则上没有得到解决。决定接着写道：“（4）因此认为，在共产国际例行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在任何情况下对组织关系作任何改变都是不容许的，对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是危险的。”

1926年，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七月联席全会上，有关这个问题的争论达到了极端尖锐的程度，联合反对派在写给全会的文件中再一次提出这个建议，同时还提出了移交中东铁路和从中国召回卡拉汉的建议。与之相

配合，在全会上还批评多数派领导人在英俄委员会问题上所持的立场，这看上去就像是对斯大林和布哈林在共产国际的政策发起“全方位的”进攻。

“中国问题”在全会上之所以特别尖锐，还有一个原因是1926年7月初蒋介石不顾中共和苏联驻广州代表“暂缓”北伐的意见，在作好准备后实际上已开始行动。在这种形势下，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领导人，首先是斯大林和布哈林，采取了支持北伐的方针。他们指望，随着群众运动在新地区的发展，中共留在国民党内将为加强共产党人在群众组织、国民党内部及其军队中的作用创造新的条件。抱这种期望的重要依据仍旧是国民党领导人和蒋介石本人对苏联的物质和军事援助、对苏联的政治和军事顾问感兴趣。重建冯玉祥的“国民”军也起了重要作用，他本人又获得一笔可观的资金，已准备从苏联回国。大体说来，这是在新情况下重新搬出1925年下半年至1926年初那种“样式”的计划，所不同的是论据有些变化。在这种形势下可以把反对派的建议说成是对这些计划和国民革命运动没有信心，背离了他们原来的立场。

关于反对派在七月全会上为自己的建议提供论据的情况，主要是从布哈林的阐述中了解到的。布哈林称反对派的路线是面对在中国的接连失利而“建议作出右的让步”。布哈林认为，这些失利是“局部的”，但又是“相当严重的”（“国民军被逼入困境”、“国民党右派企图破坏广州政府和瓦解国民革命运动”）。“遇到困难和挑衅就不要中东铁路”的建议在布哈林看来是不可取的，因为，用他的话来说，这里讲的“铁路线是主要的战略命脉，是我们伸向中国的革命的手指头”。“因报界掀起反对卡拉汉的宣传而召回卡拉汉”、把他

派往日本、把柯普从日本调到中国的建议也遭到否决，理由是，柯普是一个有名的“怀疑任何民族革命运动”的人，而“卡拉汉体现了我们面向民族革命运动的路线”。

布哈林认为“同国民党断绝往来”的建议是非常错误的，因为“……我们的目标应该是有小资产阶级分子参加的广泛的民族革命运动，而国民党就是一个有自己特点的、不同于西欧政党的党”。他接着说道：“我们在这个国民党中起领导作用，实现我党对包括小资产阶级分子在内的整个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权。”在“3月20日事件”以后，在联共（布）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掌握了有关国民党内情况的情报以后还作出这种完全不符合实际的评价，只能说是为了找到攻击论敌的“更有力的论据”。既然掌握了领导权，正在实现梦寐以求的目的，可是自己又放弃了，这不是右倾投降主义吗？全会决议就是这样根据基洛夫的建议，给反对派在中国问题上的立场定性的。决议对联共（布）政治局和联共（布）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中国问题上的做法表示赞同，确认“反对派提出了显然是机会主义的，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是投降主义的建议”；决议指出：“总起来说，这些建议表现了不能容忍的失败主义”。

尽管反击反对派建议的论据很无力，但是中共退出国民党的问题确实具有“头等的政治意义”。拒绝采取这一举动的后果以及在退出的情况下中国事态的发展可能会有哪些方式的问题，我国书刊过去和现在一直在讨论。中共退出国民党是否会像我国某些作者所认为的那样，中共在广东会很快被国民党反动派和军阀打垮？如果共产国际和苏联还试图拨资另建中共自己的武装（中共一些干部提出过这个问题，尽管

在当时，特别是3月20日事件以后，谁也不清楚单就“技术方面”来说怎么才能办成这件事），那倒很可能会这样。加之当时党员人数本来就极少。如果中共离开国民党，不能利用国民党政权的“合法保护”在农村和城市开展工作，那么中共能像在北伐过程中那么快地从人数上和政治上得到发展吗？在那种条件下多半是不可能的。有一种可能性是中共不受很大损失就离开国民党，不建立自己的武装，也不谋求国民运动的领导权，同国民党左派结盟，充当以国民党为对立面、激进的民主的合法反对派。然而经验表明，凡是没有武装力量作后盾的政党，在中国的条件下只能成为人数较少、没有多大影响的小集团。至于说中国解放运动的进程将会如何，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反对派则完全脱离实际地认为，中共能够独立地，而且是在近期内组织和领导强大的工人运动和群众运动。

在1926年7月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反对派对“中国方面”所表现的积极性有所减弱。拉狄克在当时作的一次发言中称北伐是“辉煌的革命行动”。他也谈到了反对派在1926年底遭到的沉重打击（10月，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被开除出政治局、季诺维也夫被正式解除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工作）以及在联共（布）第十五次党代表会议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会上遭到的失败。在这次全会上，反对派的政纲被判定为有“社会民主主义倾向”。此外，反对派内部也存在分歧，围绕对中国形势的评价和对华政策问题争论激烈。

只有拉狄克表现出积极性，但也很有限，他曾先后于1926年7月和9月写信给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以中山大学讲课人的身份），要求首先对下列问题作出解释：在蒋介石

当国民党领袖而鲍罗廷对他“正式表示支持”的情况下，如何“看待”蒋介石的军事独裁？如何看待国民党在农民中进行的工作？国民党应不应该在工人中开展工作？如何支持国民党内的左派？后来反对派就试图援引拉狄克的这些信为他们长期的沉默开脱。

拉狄克信中的含义很清楚。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除了对中共退出国民党的主张持否定态度外，在对华政策的这些重大问题上并没有什么现成的答案。3月20日以后，中共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内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双方代表开始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会（1926年11—12月）为这场争论作了总结。

莫斯科方面仍然指望通过国民党内力量对比的改变来解决“军事独裁”问题，即在国民党内形成有影响的左派，在大力开展群众运动（随着北伐军的推进它在不断扩大）的基础上巩固中共在工会和农民协会中的阵地。与这些方针相配合，再设法“从上面”抵制蒋介石的独裁：中共和国民党左派掀起一个运动，要求蒋介石在党的领导层内的主要对手——1920年3月20日事件后被迫跑到欧洲的左派领导人汪精卫回国。在军队方面让同鲍罗廷有特殊关系的唐生智将军出来与蒋介石“抗衡”。此外还确定将北伐的主要兵力派往武汉，然后绕过上海地区（蒋介石在那里有老关系）北上与冯玉祥会合，冯可能成为又一个与独裁者抗衡的力量。加强国民党左派的计划推动了国民党本身及其政府内的事变进程，在蒋介石及其军队出征后，国民党及政府内的左派活动家表现活跃，受到对蒋介石地位加强表示不满的部分军人的支持。

中共党内就上述问题热烈展开讨论。中共领导人基本上

支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提出的方案，又以更加谨慎（和现实）的态度来评价国民党内左派今后演进的前景。中共领导人指出，在国民党内没有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希望看到的那种左派，更没有准备以激进方式解决土地问题的左派。陈独秀在 1926 年秋冬发表的一系列文章里，后来又在 1926 年 12 月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阐发了如下思想：国民革命一旦成功将意味着建立革命民主政权，即受目前的国民党左派控制的政府，共产党人在现阶段不应争夺这个政权。这个政权要建立的经济制度将是多成份的经济，既有国家资本主义成份，又有私人资本的成份，这种私人资本经过革命将具有“民族-民主资本主义”的特征。陈独秀称这样的国家是“全体被压迫阶级的民主专政”。总起来说，从这些“草稿”中可以看出“新民主制度”构想的某些特征，尽管还有种种差别。事态进程表明，国民党左派无论与共产党人结成联盟还是与之决裂，都不可能“阻止”这种前景的出现。但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会（1926 年 11—12 月）在评估革命前景及中共的任务时把“标杆立得”更高。

（未完待续）

原载《远东问题》1993 年第 3 期

（刘燕明摘译 袁坚校）